香港密約

——日蔣和談秘檔

李紅喜 周冰 劉夕海編著

利文出版

越過戰線的談判，不但在南京、重慶，更機密的發生在香港和澳門。



香港密約

——日蔣和談秘檔

李紅喜 周冰 劉夕海編著

利文出版

香港密約——日蔣和談秘檔 四

作者 —— 李紅喜 周 冰 劉夕海編著

出版 —— 利文出版社

香港九龍界限街33號4樓C座

發行 ——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Tel: 2381-8251 Fax: 2397-1519

美國 —— 華文書報雜誌社

發行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Inc.

507 S. Stoneman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 (818) 282-0361 (818) 282-0387

Fax: (818) 282-9370

印刷 ——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G座

版次 —— 1995年7月初版

ISBN *962 7766 43 7*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布告

日本軍閥夙以征服亞洲並獨霸太平洋為其國策數年以來中國不顧一切犧牲繼續抗戰其目的不僅所以保衛中國之獨立生存實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維護國際公法正義及人類福利與世界和平此中國政府屢經聲明者

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餘之神聖抗戰原期侵略者之日本於遭受實際之懲創後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維持不料強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諸友邦開釁擴大其戰爭侵略行動甘為破壞全人類和平與正義之戎首逞其侵略無厭之野心舉凡尊重信義之國家咸屬忍無可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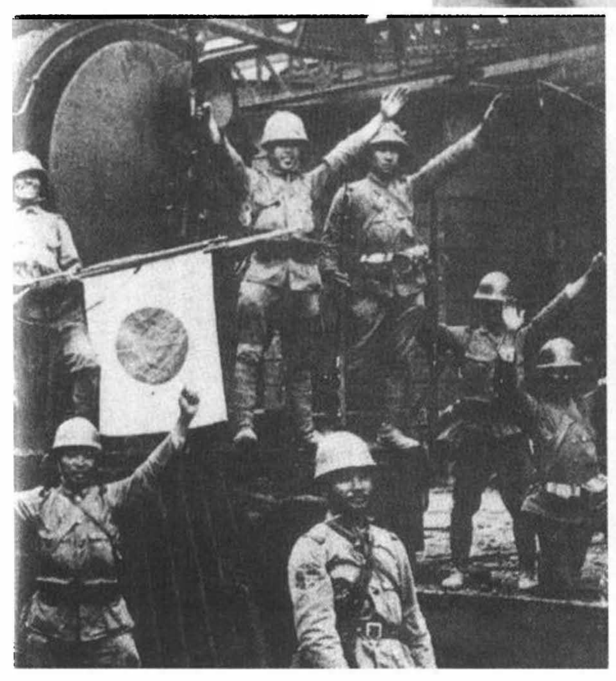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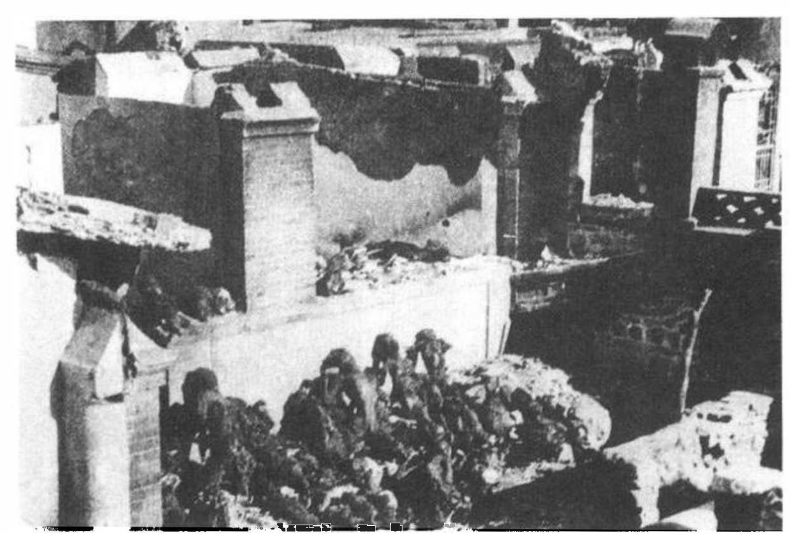
由中國政府主席林森簽發的向日、德、意宣戰的文告。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空軍掩護下，強佔大亞灣，隨即於二十二日攻佔廣州（下圖）。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向香港發起攻擊，英軍苦戰十八日，終失守。

華中重鎮武漢市，是日軍侵華的力爭之地，中國軍隊在重軍攻擊的無奈之下，盡毀市內軍事設施，放火燒城後撤退。圖為日軍攻入空城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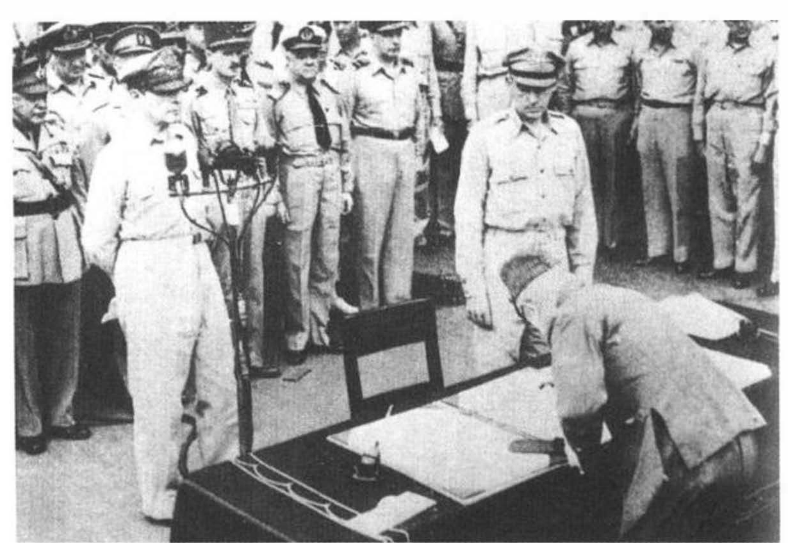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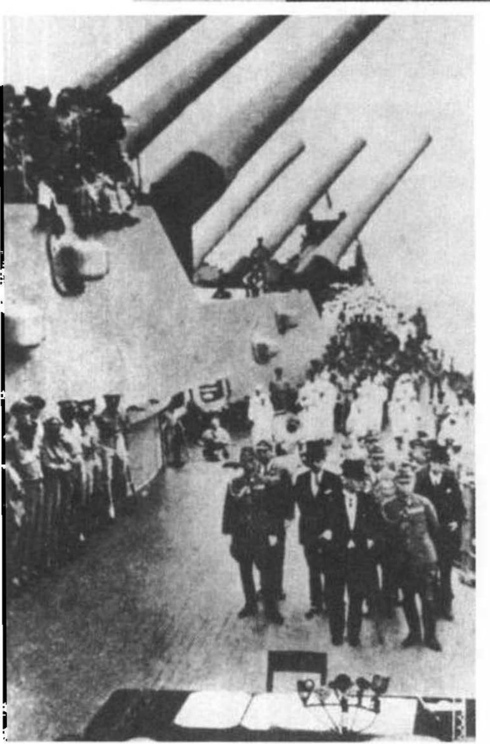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軍炮製的河北丰潤“潘家峪慘案”，日軍集中村民，以機槍掃射，共死傷民眾近二千人。圖為劫後慘況。



一九四三年八月，日軍在河北省進行“掃蕩”，陽平村一帶一千一百五十二村民慘遭殘殺。





（上圖）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在麥克阿瑟將軍及其他盟軍將領的監察下在投降書上簽字。

（左圖）日軍以外相重光葵等代表日本政府和日軍大本營，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美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簽字儀式。



八年抗戰，中國軍民傷亡二千多萬，財物損失千億計，因此當勝利消息傳來時，舉國歡騰。圖為上海南京路的集合慶祝場面。



戰敗並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日本，東京街頭的民眾，在聽到天皇的宣佈後，掩面痛哭。

目録

第五章　尋找第三勢力

第六章　宇垣一成換湯不換藥

第一章

戰爭還是和平

面對故鄉的景色，宋哲元似乎忘記了北平的一切

一九三七年六月。山東樂陵。

回到後顏村老家，宋哲元感到異常地輕鬆和舒坦。自從投筆從戎以後，幾十年間他很少回家居住。坎坷的仕途和艱難的軍旅生活，使宋哲元常常懷有莫名其妙的思鄉之愁，總覺得只有老家，才能給他力量和安全。

就在五月二十一日，帶着剛祝完七十二歲大壽的老母和妻子兒女，在隨從們的前呼後擁下，迎着鄉鄰的羨慕的目光和贊頌的話語，宋哲元回到了家鄉。

門前的打麥場上，總是人來人往，附近的鄉紳，縣裏的父母官，還有兒時的好友和同學，以及七拐八彎的親戚，都絡繹不絕地登門拜訪。

熟悉的鄉音。

真誠的笑臉。

一籃籃他推也推不掉的鷄蛋或者杏棗之類的水果。

使他幾乎忘記他的身份，不由得產生解甲歸田的念頭，這裏，是他躲避暴風驟雨的港灣，在這裏，他呼吸到的是清新和愜意的空氣。

于是，他大興土木，蓋起了豪華威嚴的宋家大院。

重修了祖父和父親的墳墓，一種光宗耀祖的滿足。

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樂陵縣公益事業促進委員會和縣志局，組織辦學和編撰縣志。

他在各鄉選送五百名十三歲到十六歲的少年，編成學兵營，送往北平南苑軍事訓練團訓練。

雖然這些事使他整天忙于應酬和奔波，從早晨到晚上，没有片刻的休息，然而他卻感到輕鬆，感到快樂。只有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躺在床上的他，才感到說不出的難受和疲勞，甚至有一種身心交瘁的感覺。

平津的緊張局勢和幾年來的屈辱外交，他是無法擺脱的，縱使他可以遺忘一切。

爲了生存，他不得不周旋于日蔣之間，但他很快發現這是個錯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南京政府和日本妥協的產物。「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鐵蹄踏遍了東北的白山黑水，接着又越過長城，挑起事端，企圖佔領華北，進而吞併中國。在日本步步進逼的過程中，作爲西北軍的殘部，二十九軍隨着察哈爾同盟軍的解散，也面臨着被南京蔣委員長消滅的危險，二十九軍的軍長宋哲元爲了生存，便不得不忍辱倚重日本人，一掃長城抗戰的豪壯之氣，和南京政府唱起了不是對台戲的對台戲。

于是，宋哲元成爲平津衛戍司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自然這是蔣介石同意了的。

然而剛一上任，他便發現自己已經掉進了尖銳複雜的民族鬥爭的漩渦，置身于蔣介石和日方的夾縫中。

『九·一八』事變後，執行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蔣介石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和排除異己，限制消滅地方實力派上面，處心積慮地想消滅二十九軍，他借口『第二次張北事件』，免去了宋哲元察哈爾主席的職務，將二十九軍的駐地縮小到十一、二縣的窄小地帶，四、五萬的軍隊隨時面臨着喪失立足之地的危險。

一九三五年六月的北平漢奸叛亂事件，給宋哲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他率領軍隊進駐了平津。

但是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野心並沒有改變，只是由于日本人的牽制，蔣介石不得不利用宋哲元，蔣介石覺得有些事讓宋出面讓他成爲自己的替罪羊，也未嘗不是好事。

蔣介石的威脅他尚可應付，日本人的糾纏卻使宋哲元疲于奔命。

宋哲元想利用日本人對付蔣介石。

日本人卻要利用他來侵略中國。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只是暫時達到了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最低要求。

接着『華北防共』和『經濟提攜』又像一條條繩索，緊緊地勒在宋哲元的身上，使他有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

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的幾次外交，更使宋哲元感到了日本的奸詐和狡猾，他有防不勝防的恐懼感。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日本駐華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趁宋哲元在天津，指使漢奸陳覺生代他邀請宋哲元到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沒想到宴會中途，田代皖一郎突然取出早已寫好的《中日華北經濟提攜協定》，滿臉堆笑地放到宋哲元的面前。

望着田代陰險的笑臉。

宋哲元感到一陣陣發冷，身後日本兵木然的臉使他想起了匕首和子彈。

宋哲元不得不在日本人的文本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當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爲震怒。當着宋在中央的代表李世軍的面怒斥他：

『我早已叫你告知宋主任少和日本人應酬來往，一個負重要責任的人，爲什麼隨便到敵人兵營裏喫飯？』

接着又是一紙嚴厲訓斥的電報。

協定的風波尚未平息，出訪東洋又引起了軒然大波。

由于華北抗日空氣日趨濃厚，爲了牢牢控制宋哲元，一九三七年三月底，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又主動邀請宋哲元組團訪日，其費用由日本人出。

這是一個極爲棘手的邀請。

被迫簽訂《經濟協定》的教訓，猶歷歷在目，封疆大吏和二十九軍首腦的身份，使他明白一遇

日方要挾，又會鑄下大錯。

但是如果明確拒絕，不僅局勢會更加惡化，甚至會導致和日本鬧崩。

宋哲元決定借口身體不適，改派張自忠爲代表訪問日本。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時成爲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

南京政府先是緘默，繼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周報》更是長篇累牘地攻擊謾罵。

但是張自忠一行還是在四月中旬赴日考察。訪問了東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受到各方面的熱烈的招待，滿載而歸，每個人都滿臉喜氣，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的效果』。一家日本報紙是這樣報道的。

對日交涉的挫折，再加上日本層出不窮的各種要求，使宋哲元早就產生的返籍休養的主意更加堅定了，他認爲，日方是以他爲交涉對象，如他暫離平津，便使日方失去了糾纏目標，或許可以緩解日方的脅迫之勢。

他曾對副軍長秦德純說：

『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係到我國主權領土的完整，當然不能接受。而日方的無理取鬧，滋擾不休，確實使我痛苦萬分。』

五月，經蔣介石批準後，宋哲元一家浩浩蕩蕩行回到山東老家。

他暫時擺脱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這個職位給他帶來的尷尬的處境。

但是，躲是躲不過的。

日本軍隊並沒有因爲宋哲元的「休養」而停止戰爭的準備，相反，主帥的離去，給二十九軍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和鬆懈情緒。

就在宋哲元離開北平的一個多月後，日軍便在盧溝橋點燃了擴大對華侵略的戰火。

和平的假象被徹底毀滅了，等待宋哲元的是什麼呢？

戰爭還是談判？

或者兩者都有！

戰爭是不是就這樣開始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十二時。北平。

忙碌了一整天累得個精疲力盡的魏宗瀚，正想脫衣睡覺。

忽然，急促的電話鈴聲在客廳裏響起。

又發生了什麼事？一種不祥的預感油然升起。

自從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離開北平回老家樂陵省親，平津一帶的形勢日趨緊張，日本軍隊變得越來越囂張，從六月開始，日本軍隊在盧溝橋地區進行的軍事演習，突然頻繁起來。

由白天演習變成了夜間演習。

由虛彈射擊變成了實彈射擊。

而且，駐豐台的日軍第一聯隊的演習，竟以攻奪宛平城爲目標，反複進行。

莫非宛平城的中國軍隊和日軍發生了衝突？不會，臨走前，宋哲元委員長已經嚴令部下，不得和日軍發生任何衝突，違者軍法從事。魏宗翰忐忑不安地拿起了電話筒。

『喂，魏宗瀚先生吧？我是松井太久郎。』從話筒那端傳來的聲音給了魏宗瀚一個激愣：又是他！

松井太久郎，軍銜大佐，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經常叫囂中國是日本人生存的空間，日本是亞洲的主宰。平時，他總是對宋哲元糾纏不清，宋哲元一走，魏宗瀚這個冀察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就成了替罪羊，三天一拜訪，時不時來個電話，鬧得他幾乎快要精神失常，以至他一見到松井太久郎，就象見了蒼蠅一樣惡心不已。

不，甚至他覺得，就象吞了蒼蠅一樣而且還要惡心。

『我就是，松井先生，有何貴幹？』

『魏先生，剛才我軍有一個中隊在盧溝橋演習時，突然聽見宛平縣城內傳來數聲槍響，致使演習部隊一時混亂，後來清點人數時發現丟失日兵一名，現在我方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索失踪的那位士兵……』。

『松井先生，對于貴方的要求，我由于不了解真相，不便回答，我馬上請示上級再作答覆』。魏宗瀚一邊掏出手帕擦着頭上的冷汗，一邊回答道。

『好，我等着！』隨着松井太久郎的聲音，又是嘭的一聲，電話掛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七日下午，駐豐台的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指揮下，荷槍實彈地開往盧溝橋附近的龍王廟一帶進行軍事演習。

此舉引起了中國守軍的警惕，駐守在宛平城的是二十九軍一一〇旅二一九團的一部，他們立即進入臨戰狀態，注視着日軍的動向。

演習今天有點反常，一場完了，照往常慣例，日軍應該撤回。可是今天，他們不僅不撤，而且加緊構築工事，繼續進行演習。

晚十一時許，在宛平城東北日軍演習的方向傳來數響槍聲，引起了城內守軍的嚴密注意。少頃，幾名日軍來到宛平城下，聲稱丟失了一名士兵，要求進城搜查。

守軍嚴辭拒絕。

『秦德純不愧是搞過外交的』

魏宗瀚立即報告了正在北平主持對日交涉的二十九軍副軍長、北平市市長秦德純。

秦德純，這個曾和日本代表土肥原簽訂過《秦土協定》的外交談判老手，立即作出了應有的反應。

『盧溝橋是中國的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没有征得我方同意就在該地演習，已經違背了國際公

法，損害了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不過，看在中日友好的份上，可以等天亮後，讓我軍代爲尋找，如果查出確有士兵，立即送還』。

魏宗瀚一聽，覺得秦德純說得有理，畢竟是搞過外交的。相信松井聽了這番話也會無話可說，那麼衝突就會馬上解決了。

面對暴跳如雷的松井，王冷齋也不甘示弱

八日凌晨二時，聽了魏宗瀚的回答後，松井暴跳如雷。

好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

好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

好一個二十九軍！

好一個秦德純！

堂堂的大日本帝國皇軍威風哪裏去了！

『魏先生，對于貴方的答覆，我深表遺憾。如果貴方堅持不讓我軍進城檢查，我方將以武力保衛前進！』說完，『咔嚓』一聲將電話掛了。

『喂喂……』魏宗瀚呼叫幾聲之後只好將電話掛了，坐在沙發上，感到頭皮一陣陣發緊。接着又拿起了話筒要通了秦德純。

『市長，松井態度非常强硬，我看是不是派幾個人去和他談談，唉，要是委員長在就好了！』

『好，現在派你，還有王冷齋、林耕宇，再加上周永業四人去和松井談吧！』

『市長有什麼要吩咐的嗎？』

『沒有什麼，只是一定要按照委員長的意思去談，不要做出任何承諾，這次去主要是將情況弄清楚！』

魏宗瀚立即吩咐手下，備車前往日本特務機關處。

一座普通的小平房，座落在城東南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這就是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住處。

剛一進屋，魏宗瀚就發現，除了松井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熟悉的面孔。

『櫻井先生，你也來了！』魏宗瀚道。

『嗯，不過我是代表鄙國來的』。櫻井德太郎，冀察綏署的日本顧問，就在昨天下午，他還參加了二十九軍的一次軍事會議，沒想到今天卻成了談判的對手。

雙方落座之後，松井立即發言：

『剛才接到軍方的報告，失踪士兵已經歸隊，因此，不要貴方再去尋找了，不過……』

不等松井說完，急性子的綏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騰地站了起來：『既然失踪的士兵已經歸隊，那還有什麼可以談的呢？』

說完，恨恨地瞪了松井一眼。

『周先生，不要性急嘛？』松井並没有因爲話被打斷而惱怒，反而語氣變得更加隨和了。『是的，士兵已經歸隊，照理說没什麼事了，可是有一個問題必須搞清楚，那就是那個士兵失踪的原因。而且，如果不查明，我們也無法繼續進行談判。你們知道，我們大日本帝國陸軍可是不怎麼聽話的！』

周永業剛要站起來，王冷齋，河北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縣長，拉了他一下，周只好忍氣順從地坐着。

『松井先生，二十九軍和貴軍的關係向來是友好的，我省和你們的關係也是不錯的，不要因爲一件小事影響兩軍以至兩國的關係嘛。』王冷齋不急不慢地說道。

『我方也希望和平相處，不過，要是連皇軍都没有安全保障，那麼和平也就毫無價值。』

『既然松井先生希望和平，那麼一切好說，至于士兵失踪的原因，只要問問那個士兵就可以了。這樣吧，爲了周到起見，由雙方代表組成一個調查組，雙方各出三名代表，怎麼樣？』

松井瞟了瞟身邊的櫻井德太郎少佐，似乎想征詢他的意見，櫻井點了點頭。

中日雙方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前往現場——宛平縣城調查。

中方代表是：

王冷齋　河北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縣長

林耕宇　冀察外交委員會委員

周永業　綏署交通處副處長

日方代表是：

櫻井德太郎　冀察綏署軍事顧問，宋哲元的私人密友

寺平忠輔　大尉，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副官

齋滕　翻譯

出發前，王冷齋接到密報：駐豐台的日軍傾巢出動，全副武裝開赴盧溝橋。王冷齋沒有在意，認爲這不過是日軍的慣用伎倆：恫嚇。

就在這時，矮胖而殺氣騰騰的日軍聯隊長牟田口突然闖了進來，蠻橫地要求王冷齋、林耕宇二人到豐台兵營一談。王冷齋正想去豐台兵營探探虛實，沒有計較牟田口的態度，滿足答應。

到達豐台後，牟田口閉口不談士兵失踪情況，卻追問王冷齋等人是否有處理事情的權限。王冷齋立刻警覺起來，嚴肅地回答說：『剛才在日本特務機關商量，我們只有調查使命，因爲事態尚未明瞭，處理現在還談不到。』牟田口接着說：『如果事態搞清楚了，還是以當地處理爲宜，閣下是地方行政長官，在貴署管轄境內，應有處理之權，我已委派我的副聯隊長森田徹中佐全權處理。』

王冷齋看出，牟田口之所以提出現地處理權問題，是企圖通過施加壓力，使自己屈服，簽訂有利于日方的協定，以便不戰而奪取宛平。牟田口的這一險惡用心，使王冷齋更覺情況複雜，便用不容辯駁的語氣說：『牟田口大佐，我認爲必須先進行調查，然後再談處理問題。』

牟田口見威脅不成，只好另找辦法，便當面命令森田率領一個步兵中隊，一個機槍小隊，與

代表團前行，名義上是爲了代表團的安全，暗地裏卻囑咐森田乘機佔領宛平西門，便于進攻宛平。

『準備出擊！』王冷齋突然心生一計

當王冷齋到達宛平沙崗時，見日軍正擺好進攻陣勢。這時，早已到達的寺平一反北平時的態度氣勢洶洶地對王冷齋說：

『現在事態十分嚴重，已來不及調査、談判，請貴專員迅速處理，下令城內駐軍向外撤退，待日軍進入宛平城內再行談判。』

王冷齋一聽，怒火衝頂，指着寺平的鼻子質問道：『在特務機關已商定，先從調査入手。剛才牟田口大佐要求現地處理，我已拒絕，你究竟奉何人命令？』

寺平無法回答，便提出另一個問題：『平日我軍均可穿城而過，已有先例，爲何今日演習不能進城？』

王冷齋反問：『你所謂的先例，請指出某月某日。貴軍演習，均在野外，從未有一次穿城而過。』

寺平語塞，不能回答，惱羞成怒地說：『此項要求係奉命辦理，勢在必行，請你見機而行，以免危險！』

這時森田也指日軍陣地恐嚇：『十分鐘內，如無解決辦法，嚴重事件就會立即爆發。』

面對森田的恐嚇，王冷齋漠然一笑，義正辭嚴地告訴寺平：「在特務機關商定的原則，不應變更。要商定處理原則，應該進城談判，否則一切責任由你們承擔。」

既然調查不成，代表團只好進入宛平城談判。

一進入宛平城，寺平立即感覺到，守軍已經做好了迎戰的準備：街道上，隱約可見沙包堆成的掩體，不時傳來喁喁低語聲；路邊，全副武裝的士兵向他們行軍禮。

寺平提出，宛平東門的中國軍隊撤退到西門，由日軍佔據東門後，再進行調查談判。

王冷齋拒絕了寺平的要求。

這時時針已指向八日凌晨四時二十分。

一陣激烈的槍聲從東門那邊傳了過來，王冷齋命令守軍金振中營長去了解情況。一會兒，金振中進來報告說，日軍正在進攻，守軍已開槍還擊。

端坐大桌對面的寺平，臉上浮出得意的獰笑，轉身問櫻井：「今天的天氣真好。」

激烈的槍聲，使王冷齋如坐針氈。

寺平的風言冷語，更使王冷齋憤怒。

「金營長，馬上佈置部隊，準備出擊。」王冷齋突然心生一計。

「慢」，櫻井站了起來，叫住了金振中營長。

「王先生，我們應該想法使雙方停止衝突，不要意氣用事。」沉吟了一會，便說：「這樣吧，我去東門叫我軍不再開槍，貴軍也不要出擊了」。

原來，在進城時，一木囑咐櫻井，想法拖住城內的中國守軍，不要出城參加戰鬥，日軍趁機攻佔城外的龍王廟。櫻井一聽說守軍要出城還擊，立時怔住了。

一會兒，櫻井舉着白旗站在宛平的城牆上。

談判繼續在城內進行。

圍繞着現地處理權問題，王冷齋和寺平唇槍舌劍，各不相讓，無法取得一致的意見。

下午四時，王冷齋宣佈談判終結，要求寺平出城，但寺平堅持沒有談出結果，拒絕回去。

下午五時，牟田口向宛平縣府發出哀的美敦書，提出如下條件：

1. 限于當日下午八時前，中國軍隊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軍撤至永定河東岸，如果逾期，便用大炮攻城。

2. 通知城內居民撤至城外。

3. 城內的寺平大尉、櫻井顧問及翻譯齋滕出城。

王冷齋看完這份最後通牒，明白日軍顯然以武力相威脅，妄想脅迫中國軍隊放棄宛平，以便不戰而得。

『天下哪有這樣便宜的事！』王冷齋想着，立即吩咐書記員：『給我回信，我也有三條：1、本人非軍事人員，對于撤兵一節不便答覆；2、城內人民自有處理辦法，勿勞代爲顧慮；3、寺平等人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願在城內談商，努力于事件之解決。記下啦，馬上派人送出去。』

接到王冷齋的回信，牟田口暴跳如雷。

『炮兵，馬上給我攻擊，將宛平縣城炸成廢墟。』

在日軍的炮聲中，宛平的談判無疾而終。

第二章

戰爭前夜

衝突的火種已在盧溝橋點燃。

是作爲局部事件就地解決，還是引向罪惡的戰爭？

日本政府和軍方意見不一。

八日晨，『七·七』事變爆發的消息傳到東京後，立即在陸軍部引起了軒然大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形成了『擴大派』和『不擴大派』。

力主『不擴大』主張的被稱爲『不擴大派』。主要有：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中將，航空本部部長東久邇，參謀次長多田駿，第一課秩父宮、今田新太郎、堀場一雄等人。

主張擴大戰爭的『擴大派』，以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爲首，包括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大佐、中國課課長永津比重大佐、代理第二部長笠原幸雄大佐等。

陸軍大臣松山元一聽到『七·七』事變發生的報告，異常狂喜，期待已久的機會終于到了。他早就看出，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進攻中國進而實現田中奏折勾畫出的『宏遠』藍圖是極爲有利的，蘇聯正忙于國內的大肅反，再加上德國的威脅，是不會干預日本的行動的，『九·一八』事

變是早有的例證；英國受到德國的牽制，無暇東顧，美國的重心一貫放在歐洲，不大注意遠東，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不僅沒有對日本有任何實質性的制裁措施，相反，美國的源源不絕的戰略物質仍不斷地變成日本軍人手中的槍炮彈藥。

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杉山元立即給天皇上奏宣稱『中國事變用一個月就可解決』。

永津更是揚言，只要日本出現動員聲勢，滿載兵員的列車一通過山海關，中國就會立即投降。

然而，石原莞爾卻堅決反對杉山元的主張，他清醒地認識到，隨着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國內部已大體統一，抗戰力量已隨着內戰的結束而變得强大。一旦發生全面對華戰爭，將有可能因遇到中國的頑强抵抗而陷人長期戰爭的泥潭，而且萬一蘇聯從遠東出兵，夾擊日本，其結果將不堪設想。他主張，當前只有將盧溝橋事變做爲局部事件解決。

擴大派和不擴大派各執己見，爭論不休。

于是七月八日十八時，日本參謀總長向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中將發出如下指示：

爲了防止事件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

八日深夜，杉山元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師團，使他們原定于七月十日復員的步兵聯隊二年兵延期復員。海軍部根據軍令部方針，準備機動兵力，以備對華緊急出兵。

蔣介石決定實行抗戰

就在日本圍繞處理盧溝橋事變產生分歧時，南京國民政府這時也是矛盾重重。

七月八日，軍政部駐北平參事嚴寬向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電告事變消息。正在廬山牯嶺消暑的蔣介石聞報，立即電令冀察當局：「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這時，由于蔣介石還不明白日軍製造事變的意圖，認爲這可能是日軍像以前一樣了爲攫取某些權益而採取的恫嚇。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爲難，使華北獨立乎？」

日本究竟想幹什麼？蔣介石實在鬧不清。

于是蔣介石決定：一方面，針對日軍的進攻，採取防守措施，另一方面，和日本談判解決，同時請求國際干預。

九月上午，蔣介石電令宋哲元由山東樂陵回保定指揮軍事，又密電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由平漢路方面派出兩個師，並四十軍龐炳勛部、八十五師高桂滋部，向石家莊、保定方向開進，準備迎擊日軍的進攻。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向冀察當局指示談判要旨，在和日本人談判時，一定要防範其奸狡的慣用伎倆，以不喪失主權爲原則。

十二日下午，蔣介石在廬山召集汪精衛、程潛、陳誠等高級文武官員會議，商討對日策略。

最後決定：『作和戰兩手準備，力求局部解決，萬不得已時不惜一戰』的方針。同時，由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從電話將上述決定告知秦德純。當晚，何應欽決定派參謀部次長熊斌北上，當面向宋哲元傳達上述『不挑戰，必抗戰』的中樞意見，具體要求是：如宋主任因環境關係認爲還要忍耐以求和平時，只可在不喪失領土主權原則之下與彼方談判以求緩兵，但仍須作全盤之準備。盧溝橋、宛平城不能放棄。

七月十七日，第二次暑期談話會召開。

針對盧溝橋事變，蔣介石發表了重要講話：

『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也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

『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强佔，那麼我們九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與軍事重鎭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解決盧溝橋事變必須遵循四項原則：『（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抗戰守土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

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蔣介石這番講話，立即博得滿場掌聲。參加談話會的學者名流無不振奮，覺得民族雪恨的時機到了。只有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以幾十年和蔣介石打交道的經驗，對蔣介石不能不懷疑：他真的會全力抗日嗎？

周恩來的懷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日方準備擴大戰爭

這時北平的二十九軍和日軍正在邊打邊談。八日晚，秦德純和松井太久郎在北平，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和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羣在天津，分別緊張地進行交涉。九日凌晨三時，中日雙方達成協議：

1、雙方立即停止射擊；

2、日軍撤至豐台，中國軍隊撤至永定河西岸；

3、宛平防務由中國保安隊接任，人數約二三百人，定于當日上午九時接防。

協議是達成了，但能否執行卻無法保證。九日上午，按照中日雙方協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國保安隊，在盧溝橋附近的大井村遭到日軍阻擊，死傷數人，無法前進。

王冷齋用電話同日方交涉，毫無結果。

經中日雙方再次協商，不得不成立監視撤兵委員會，中日雙方各出兩名代表。中方代表是：周思靖，周永業。日方代表是：中島北三郎中佐、櫻井德太郎少佐，由周永業、櫻井負責龍王廟及永定河鐵路橋一帶，周思靖、中島負責大井村、五里店和沙崗一帶。

在王冷齋的要求下，周思靖、中島一起前往大井村，就保安隊接防問題與河邊交涉。河邊提出了三條要求：

1、城內中國軍隊只留一個小隊，其餘全部撤到永定河西岸。

2、保安隊限定五十名，只能攜帶步槍和三十發子彈；

3、爲了監視中國軍隊撤退，由日軍旅團長到宛平城內巡視。

王冷齋同意了前兩條要求，拒絕了第3條要求。

然而形勢很快又發生了變化。

九日上午，日本內閣舉行臨時會議，討論盧溝橋事件。

杉山元首先提出他的看法，他說：「我認爲應該繼續交涉，但目前中國軍隊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發生以來，不法射擊不斷，是一種無信不遜的態度。尤其從二十九軍的兵力和抗日態度來看，不如在此時派出適當的兵力，亦即從國內抽調三個師團派遣到現場。」

杉山元的話立即遭到了石原莞爾的反對，情緒激昂的石原莞爾認爲從國內派兵的時機未到，石原的講話得到了內閣的一致同意。又接到九日凌晨中日雙方達成停戰協定的消息，杉山元的派

兵案擱置起來。

休會兩小時，內閣會議繼續舉行，最後決定了不擴大方針：

1、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國方面的不法行爲；

2、我方堅持不擴大方針，希望由于中國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決事件。

3、如果中國方面不反省，使事態惡化，我方將及時採取適當措施。

4、各閣僚應做好隨時出席臨時內閣會議的準備。

5、帝國政府解決的方針是：要求中國軍隊撤退。處罰事件負責人、中國方面道歉和對今後提出保證。

十日上午，參謀本部第二部和第三課認爲，冀察當局及南京政府還在繼續對日戰爭，這種狀況再發展下去，不僅日本將失去出兵的時機，而且中國駐屯軍將陷入優勢中國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爲了從速救援，應先向華北方面派遣必要的兵力。

十一日上午，日本再次舉行內閣會議。

杉山元再次提派兵的要求：『爲了確保中國方面實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證，必須火速以關東軍及朝鮮軍準備好的部隊增援中國駐屯軍；同時，也要從國內抽調必要的的部分（五個師團，止前暫用三個師團和十八個飛行中隊）迅速派往華北。但今後仍堅持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爲和平解決而努力。』

這個出兵案馬上得到一致通過。

同日下午，日本政府發表《派兵華北的聲明》。聲稱：「爲維持東亞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國方面要對非法行爲，特別是侮日排日行爲表示道歉，並爲今後不發生這樣的行爲採取適當的保證。由此，政府在本日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華北。」

日本國內態度的變化，使得中國駐屯軍的態度變得强硬起來。十日，橋本羣向張自忠提出了新的要求：

1、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軍表示道歉，並聲明負責防止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2、給肇事者以處分；

3、盧溝橋附近的永定河東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

4、鑒于此次事件出于藍衣社、共産黨及其他各抗日團體的指導，今後必須對此作出徹底的取締辦法。

明明是日軍挑起了七七事變，卻反倒要中國方面道歉！

明明是中國的領土、中國軍隊的防地，卻要中國軍隊撤出！

明明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抵抗，卻無理要求取消中國人民的抗日團體。

這簡直是顛倒黑白的强盜邏輯。

很顯然，這是日本爲製造事端，爲擴大戰爭製造借口而提出的條件。

然而，在日方的威逼下，張自忠除第3條外，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對此，國民政府外交部非常不滿，在嚴令責備張自忠的同時，由外交部長王寵惠向日駐華使館提出口頭抗議，嚴正指

出：『此次日軍藉深夜在盧溝橋演習之機會，突向該處中國駐軍猛烈攻擊，以致傷亡中國士兵甚衆，物質損失，亦甚重大，日軍此次行爲，顯係預定之計劃，尤極不法。』並對張自忠答應的日方要求予以否認。

十日夜，北平，秦德純與橋本羣就中國軍隊是否撤出盧溝橋一事，繼續進行談判。

橋本羣要求中國軍隊必須撤出盧溝橋，他恐嚇說：『中國方面如果堅持不撤軍，中日戰爭的擴大就不可避免了，那時日本方面將不負任何責任。』

秦德純見日方如此無理，斬釘截鐵地說：『中國軍隊撤出盧溝橋一事，絶對不能允許。』

橋本羣見秦德純的態度强硬，認爲冀察首腦解決問題没有誠意，但考慮到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在病中，軍中無人指揮，在華日軍又不多，立即開戰没有力量，因此急忙趕回天津，由松井和武官輔佐宮今井代他交涉。

今井也看到二十九軍的態度暫時不會有很大的改變，便改變了要求。他向中方代表提出：『如果中國方面答應日軍要求的條件，日軍即主動簽字，同時從盧溝橋周圍撤兵』。此前，日本條件是中國軍隊先撤，日本才能撤。

果然，中國方面贊成了今井的這一要求。

十一日夜，秦德純與松井太久郎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其内容是：

1、第二十九軍聲明向日軍表示道歉，並對責任者給予處分，負責防止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2、中國軍隊和豐台日軍過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宛平縣城及龍王廟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

3、鑒于本事件孕育于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各抗日團體的指導，今後要採取措施並徹底取締。

但是，當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到了天津後，秦松協定又成了廢紙一張。

十二日，香月清司一到天津，就下令全軍隨着增援部隊的到來，做好對華全面作戰的準備。過去的交涉已失去了作用。

宋哲元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十一日，宋哲元從樂陵抵達天津。

在樂陵過着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宋哲元是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從夢中驚醒的。原來，盧溝橋衝突發生後，秦德純一方面和日本軍隊進行交涉，一面派張克俠等人前往樂陵，匯報情況並接宋哲元回來。

聽到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宋哲元並不怎麼驚訝，見張克俠等人驚慌失措的樣子，宋哲元安慰他們說：『目前日本還不至于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

于是，他一面下令秦德純抵抗日軍的進攻，一面像以前一樣尋找妥協解決的辦法。當蔣介石

要他去保定主持抗戰事務時，他卻親自跑到天津，展開對日交涉。

宋哲元一到天津就表示，『我雖贊成和平解決，但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條件。』又通告聲明：『1、二十九軍絕對尊奉中央命令，槍口不對內；2、冀察領土主權不能任人侵犯；3、對日交涉本着和平原則進行。』

但是，日本方面卻不希望宋哲元這樣，在松井太久郎等人的密謀下，親日分子陳覺生、齊燮元、潘毓桂等人立即包圍了宋，紛紛向他勸說，要他留津和日本人談判。在日方的壓力和親日分子的誘勸下，十二日，宋哲元對外發表企求戰事和平解決的談話。

爲了製造談判氣勢，宋哲元置何應欽要他回保定指揮的命令于不顧，繼續留在天津，同時下令從十四日起，北寧鐵路列車運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嚴，釋放被捕日人；嚴禁與日人磨擦。十四日夜，宋哲元與日本駐屯軍參謀專田少佐會談，專田當面向他提出駐屯軍的七項要求：

1、徹底鎮壓共產黨的策動；
2、罷免排日要人；
3、撤走駐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統各機關；
4、從冀察撤去排日團體；
5、取締排日言論及宣傳機關和學生、民衆的排日團體；
6、取締學校、軍隊的排日宣傳；
7、北平由保安隊擔任警備，城內不得駐屯軍隊。

專田又提出，如果不答應以上要求，就要求解散冀察政務委員會和二十九軍撤出冀察。

宋哲元說：『對于貴軍的七項要求，我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是從各方面考慮，希望能延緩實行。』

之後，由張自忠、齊燮元、陳覺生代表和日方代表橋本羣進行談判。雙方談判結果爲：

1、處罰責任者，中國準備處分當時盧溝橋駐軍的營長金振中，日方要求處分馮治安師長。

2、關于道歉。日方要求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親自道歉，中方擬由副軍長秦德純代表道歉。

3、日方要求北平維持治安，由保安隊代替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中方要求由張自忠的第三十八師擔任；

4、中方立即實行撤兵及取締抗日分子。

正當宋哲元在天津和日軍緊鑼密鼓地談判時，東京的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十七日，參謀本部第一部制訂了《在華北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把對華戰爭分爲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約用兩個月的時間，以優勢兵力擊潰中國第二十九軍，解決華北問題。第二階段，約用三四個月時間，以充足的兵力進攻國民黨中央軍，通過全面戰爭摧毀蔣介石政權，一舉解決中國問題。

同日，陸軍部決定，把對華交涉改爲限期交涉。其主要內容是：

1、規定七月十九日爲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1）、要宋哲元正式道歉；（2）、處罰責任者，罷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3）撤退八寶山附近的中國軍隊；（4）七

月十一日的停戰協定改由宋哲元簽字。

2、中國方面在上述期限内對我方要求事項不予履行時，我軍即停止現地交涉，討伐二十九軍，因此，下令動員在規定期限到來時所需的國内部隊，並立即派往華北；

3、在期限滿了以後，即使中國方面履行我要求事項的態度有所軟化，也要使二十九軍退出永定河東岸地區；

4、以帝國一貫期望把局面限于華北，並求得就地解決的意圖，向南京政府提出：如果中央軍恢復原狀，停止對日挑釁行動，並不妨礙就地解決。

陸軍部這一決定，條件更爲苛刻，無異于最後通牒。

十七日，日本内閣會議批準了這個決定，並電令日本駐華使館和中國駐屯軍分別向中國政府和冀察政務委員會提出有限期通告。

同日，日本駐華武官大城户三治大佐向國民政府軍政部提出通告：『中國中央軍如果採取與《何梅協定》相反行動時，我方將採取認爲必要的行動，由此產生的一切責任完全由中國方面承擔。』

與此同時，日本代理駐華大使日高信六郎會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寒暄之後，日高信六郎便强詞奪理地說：『部長先生，我遺憾地告訴你，由于在華北，中國軍隊多于日本軍隊，日軍受到威脅，因此，日兵增兵華北是必要的，而中國派遣中央軍到華北純屬是擴大事態。鑒于此，請轉告貴國政府：一、立即停止一切挑釁言論和行動；二、不得妨礙在現在兩國繼續進行的

解決事變的交涉。並希望貴國政府務必于十九日前回答。」

天津，香月清司中將向宋哲元提出限期要求，限定十九日前答覆中國駐屯軍十四日通報的七項要求。當夜宋哲元即派張自忠答覆橋本群，大體上承認日方七項要求。但要等到宋哲元回到北平後才能實行，張自忠說：「對于貴方的要求，經我方商定，決定作出如下幾項保證：

1、七月十八日，由宋哲元道歉；

2、兩三日內處分有關責任的營長；

3、對以後的保證，待宋哲元回到北平後實行。

4、罷免排日要人，但不寫入文件之內；

5、北平市內由宋哲元的直系衛隊駐紮。」

但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卻比較强硬。

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十九日下午，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駐華使館：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次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十三日本政府雖亦曾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維持。……

現在我國政府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

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部隊撤回原地。

任何現地協定，須經中央政府承認。

中國政府爲解決糾紛願按國際公法，或有關條約的一切辦法，接受調停或仲裁。」

二十日晨，日本日高信六郎又訪王寵惠，要求確認國民政府十九日的照會，是否對日本十七日提出條件的答覆，王寵惠鄭重地說：『中國對日本没有挑釁情緒，軍隊的北上是出于萬一的考慮，不是爲了挑釁，而且，我不能不告訴先生，關于地方性的解決條款，只有經過中央批準後，才能生效。』

收到中國外交部的照會，日本政府認爲國民政府絲毫没有誠意，其内容實在無法接受。二十日，日本發表强硬聲明，聲明宣稱，中國政府的備忘錄是故意爲圓滿解決事件設置新的障礙，對解決時局全然無望。

忍辱退讓依然不能避免戰爭

爲忠實地履行協定，以解決盧溝橋事件。十八日，宋哲元赴海光寺，向在此舉行葬禮的田代皖一郎表示哀悼，並借此機會走訪了香月清司令，進行婉轉的道歉。次日，宋哲元回到北平。

十九日，日軍又以中國人在順義附近射擊日軍偵察飛機和發射迫擊炮爲借口，發表威脅性的聲明：『從二十日午夜，駐屯軍將採取行動。』

迫于日軍的壓力，宋哲元不得不派代表會見日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羣，商談解決辦法。最後，

雙方代表達成如下條款：

1、徹底鎮壓共産黨的策動；

2、對雙方合作不適宜的職員，因冀察方面予以罷免；

3、在冀察範圍内，由其他各方面設置的機關中有排日色彩的職員，嚴以取締。

4、撤出在冀察的藍衣社、CC團等排日團體。

5、取締排日言論及排日的宣傳機關，以及學生、羣衆的排日運動；

6、取締冀察所屬各部隊、各學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運動。

此外雙方又議定，由冀察當局主動撤出在北平守備的第三十七師。

就在協定簽訂後不久，二十九軍正在履行協定時，相繼發生了廊坊、廣安門事件。

二十五日，日本軍隊借口修理天津附近廊坊車站的軍用電綫，派兵侵入廊坊，當即與三十八師發生武裝衝突。二十六日，日軍駐天津、山海關之間的部隊向前開進，日軍轟炸中國在廊坊的兵營，中國部隊退向通州，廊坊落入日軍之手。

利用這一事件，二十六日，日軍向宋哲元發出所謂最後通告：

八寶山、盧溝橋附近的第三十七師，須于二十七日中午前撤至長辛店；北平市内及西苑的第三十七師另部，須于二十八日中午前，撤至永定河右岸，然後移駐保定地區。

如不按上述實行，即認爲貴軍無誠意，將不得不採取單獨行動。

接到這個充滿火藥味和挑釁口氣的通牒，宋哲元大爲氣憤，爲了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他已

盡力忍讓，做出了許多，然而日軍仍然步步進逼，實在是欺人太甚，當即命令秦德純退回通牒，同時提出口頭抗議。

一見通牒被中方退回，松井惱羞成怒，威脅道：

『條件接受當做，不接受也當做！』

秦德純一聽，不甘示弱地說：『我們可在槍炮上見面！』

松井見威脅不成，便將通牒往地上一扔，氣急敗壞地走了。

幾乎與此同時發生了廣安門事件。

二十六日，日步兵第二大隊五百餘官兵，分乘二十六輛卡車由豐台向北平方向開進，下午七時，日軍汽車直冲廣安門。蠻橫要求入城，企圖闖入北平，遭到二十九軍第二十五獨立旅的截擊，受到了一些傷亡。

此事發生後，駐屯軍劍拔弩張，準備與中國軍廝殺，並下達進攻命令，但後來考慮到時機尚不成熟沒有取勝把握，又撤消了命令。

見通牒被宋哲元拒絕，香月清司令惱怒異常，便在二十七日中午發佈向中國軍隊總攻命令。

二十八日凌晨，松井太久郎電話通告宋哲元：『日軍即刻採取獨自行動，爲不使戰禍波及北平城內，勸告將所有部隊撤出城外。』

稍後，日軍便按照預定作戰計劃向二十九軍的駐地發起了進攻。

戰爭開始了。

第三章

陶德曼調停

望着灰暗的天空，蔣介石不免生出一絲悔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南京總統府。

蔣介石緩步踱到窗前，凝望着灰暗的天空，臉上是一片安祥的神色，仿佛夜幕下沉靜的大海，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他的內心這時正翻滾着一陣又一陣凶濤惡浪。

幾個月來形勢的急劇變化，是蔣介石絕對沒有預料到的。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天津相繼失守，他不得不命令傷亡慘重的二十九軍後撤。華北的陷落，使中國北方的門户大開，亡國的危險迫在眉睫。更爲可怕的是，日軍早在佔領華北的同時，就已經製訂好進攻上海的計劃。八月九日的虹口機場事件，爲日本提供了一個極爲有利的借口。

八月十三日，日本軍艦突然以重炮向上海閘北轟擊，海軍陸戰隊也向閘北、江灣方面大舉進攻。

從此，上海籠罩在慘烈的戰火中。

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蔣介石深深知道，如果依然採取不戰不和的曖昧態度，只會損失更加

慘重，在處理『七·七事變』這件事上，他有了極爲深刻的教訓。

是他，默許宋哲元和日軍談判，以至中了日軍的緩兵之計！

是他，寄希望于美英等西方强國的調停，幻想日本在中國做出讓步的前提下停止戰爭。

可是，結果呢？華北丟了，全面戰爭也爆發了！

八月十四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

八月十五日，除東北以外，中國被劃分爲四個戰區，作戰指導計劃也隨之確定出台。

盡管華北戰場失利，但是上海的抵抗卻使日本人大喫苦頭，進攻上海的日軍死傷累累，從戰役開始到現在，日本傷亡達四萬餘人，上海已經成爲日軍啃不動的硬骨頭。

上海的有力抵抗，使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叫囂不攻自破。這時日本人請求德國出面，實現中日談判，蔣介石深知，抗戰勝利遙遙無期，最好是在抗戰的同時，能夠同敵人談判，畢竟，抗戰是會大大損傷『國軍』實力的，他選擇了邊打邊談這條路。

一方面接受宋子文的建議，利用九國公約牽制日本，另一方面隨時接受調解。他今天，就是在等待擔任調停人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到來，到時，陶德曼會將日本人的談判條件和盤托出，讓他決定是否和日本人進行談判。

其實，陶德曼的意圖他早已知道。十月三十日，陶德曼在拜訪外交部次長陳介時，提出日本人希望與中國實行和平談判來解決中日衝突，由德國出面進行調停，當時，陳介沒有明確答覆還是不行，只是問想知道日本的條件是些什麽，陶德曼便提出要和蔣介石當面談。

『如果我答應了日本的條件，國民政府就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

『陶德曼先生來了！』侍從的一聲低語使蔣介石收回了遠望的視綫。『請他進來。』

在侍從的導引下，滿臉紅潤的陶德曼走了進來，寒暄之後，便直奔主題。

『陶德曼先生，聽說你要擔任調停中日衝突的特使，我很高興，德國是我們友好的國家，陶德曼先生也是我最尊敬的大使，對于你能來調停我表示我最衷心的謝意。陶德曼先生，日本的條件有哪些？我想聽聽。』——蔣介石微笑道。

『作爲中日兩國的友好國家，能夠爲貴國盡綿薄之力，我感到非常榮幸，至于日本的條件，主要有這些……』陶德曼一邊說出日本的條件一邊把日本要求談判的來龍去脈也說了出來。

原來，由于上海久攻不下，日軍傷亡慘重，日本政府便請求德國出面斡旋。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正式表示希望德國或是意大利促進中日『和平』。經請示德國政府，狄克遜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並決定，由德國做中間途徑，日本方面由狄克遜聯繫，中國方面由陶德曼出面，中日兩國不直接進行談判。

十一月二日，日本將議和條件告知狄克遜，並轉達陶德曼，談和條件主要內容有：

1、在內蒙古組織類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

2、華北的不駐兵區域，須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締結和約時，華北行政政權仍全部屬于中央政府，惟希望委派一個親日的行政首長；如現在不能締結和約，而華北又有了新政權，則

應該讓它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本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

3、上海停戰區域須更擴大，由國際警察管理；

4、停止排日，依照一九三五年川越茂向張群提出的要求辦理（修改教科書等）；

5、共同防共；

6、減低日本貨進口關稅；

7、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聽到從陶德曼口中說出的日本議和條件，蔣介石知道，這割掉內蒙、華北僞化和控制上海等嚴苛條件，是日本人用武力得不到之後，便想用和平方法獲取，縱使他想答應，他的士兵和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會答應的，用他的話說：『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中國會發生革命』、『共產黨將在中國得勢』但是，要是直接拒絕這個條件，不僅會惹怒日本，使得日本以千百倍的瘋狂來進攻中國，而且還會影響中德之間的關係。于是，他想試探德國人對這個條件的看法。

『陶德曼先生，首先我請你代我向德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謝，不過，對于這個條件我想請你談談個人的看法！』

『蔣先生，我認爲，這些條件提供了一個談判的基礎。單純從條件來看，是有點苛刻，不過，我們從世界大戰經驗已經看到，一個國家不應該等到精疲力盡的時候，才尋找另外的出路。』

『我同意先生您的看法，但是如果日本不願意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對于日本的任何要求，我都不能接受。對于某些條件，當然可以討論並且得到友好的諒解，但是前提是恢復到戰前

狀態。」

接着，蔣介石又説：『我不能正式承認日本的要求，還有一個理由，因爲現在布魯塞爾會議正討論中國問題，如果中國直接和日本談判，會引起國際輿論的誤解。』

陶德曼解釋説：『我的行動，完全是秘密的，對于中日之間的交涉，外界是不可能知道的。』

『那好，希望您能嚴守秘密。』

送走陶德曼之後，蔣介石没想到日本竟然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實在難以答應，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十一月三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也許它會給帶來好運，但是，希望在實現之前只能是希望，由于日本的拒絶參加，德國和意大利也以種種借口没有到會，對于中國代表提出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的要求，大會也否決了，最後九國公約會議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中國的議案就草草宣佈結束。

由于日軍的作戰没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于談判和戰爭的選擇又陷于激烈的論爭之中，最後擴大派與不擴大派達成了妥協：一方面，繼續增加中國的派遣軍隊，以圖實現武裝佔領中國的計劃；另一方面，通過德國政府，加快與南京政府談判的步伐，迫使南京政府妥協。

于是，從十一月開始，日軍加强攻勢相繼攻佔了北方重鎮太原、濟南，華北全部淪陷；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佔上海，隨即進攻南京，到十一月底，日軍已進抵錫澄綫和宜興、溧陽，廣德等地，南京已暴露在日軍的全面進攻之下。

在武力進犯的同時，日本通過德國政府不斷施放出和平的空氣。

十一月九日，德國軍事顧問福根霍遜向蔣介石進言，請求蔣介石考慮日本的談判條件，並且强調，希望中日談判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願，而且，也是希特勒的意見。同時，福根霍遜又進行外圍戰術，相繼求見了宋美齡、孔祥熙和白崇禧，懇求他們勸說蔣介石，不要固執己見，盡快結束戰爭，他如此恫嚇孔祥熙：『如果戰爭拖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很快就會崩潰，共産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要說日本可以預料這一切，那只是愚蠢的安慰。』

十一月二十八日，陶德曼西上武漢，與遷在漢口辦公的孔祥熙會晤，再次要求孔祥熙注意局勢的變化。

他對孔祥熙說：『如果先生再不考慮日本的條件，其結果將如先生所預料的那樣可怕。』

孔祥熙搪塞說：『中國一切決策權都屬于蔣委員長，對于貴大使的意見，我將全部予以轉達。』

二十九日，陶德曼再次拜會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提出日本的議和條件，要求去南京和蔣介石會面。

在南京駐華大使加緊活動的同時，德國政府又對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施加了壓力。

十二月一日，德國外交部部長牛拉特在官邸特意召見了程天放。

牛拉特說：『請轉告貴國政府，爲中國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盡速議和爲好。中國的軍事實力不用說你們自己清楚，縱使盡最大的努力，也不可能把日本

的軍事勝利扭轉過來。因此，希望貴國能夠考慮到這些，要知道延遲議和的時間越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越大。」

戰場上的接連失利和德國的一再調停，使蔣介石對于日本的議和條件有些動心了，更使蔣介石動搖的是，國民政府內部的分化，特別是主和派的活動，不能不使蔣介石去考慮日本的條件。汪精衛這個蔣介石的主要政敵，自從「七·七」事變以後，一直大唱低調，認爲中國不如日本，戰必敗，主張和日本談判求和。如果只有汪精衛一人持此看法倒沒有關係，當時最高統帥部的左膀右臂何應欽、張羣，以及陳布雷、周佛海等人都主和不主戰，從而在國民政府內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勢力。

蔣介石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他再不出面和日本周旋，汪精衛就會跳出來和日本談判，那時，中國的局勢說不定就不是他能把握得了的。但是，是否和日本談判，他還得征求一下意見，特別是軍事將領的意見，他們才是真正不容忽視的力量。

十二月二日，蔣介石接見了陪同陶德曼從武漢來南京的外交部次長徐謨，聽了他關于德國對于中日談判態度的報告後，便決定立即召集將領會議。

下午四時，會議準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主要軍事將領。當時唐生智已被正式任命爲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全權負責指揮南京保衛戰，白崇禧作爲桂系軍閥的中心人物，擔任國防部長，顧祝同是蔣介石的心腹，因此，他們的意見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會議首先由徐漠報告了陶德曼來京的目的，聽了他的報告，顧祝同率先提問：『徐次長，日本所提的條件是否還有其它的條件，比如說限制我國的軍備。』

徐漠回答：『據德國大使所說，只有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條件，如果中國能答應的話，便可停戰。』

聽到徐漠肯定的回答，會場陷入了沉默。

這時蔣介石開始說話了。

『今天召來各位，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見，剛才已經聽了徐次長的報告，各位有何看法？』蔣介石目光將座位上的人掃了一遍，然後停在唐生智的身上，『孟瀟，談談你的看法。』

正在沉思的唐生智没想到蔣介石會先點他的將，這時他正在考慮南京的防守方案的完善，便說：『哦，還没有成熟的意見呢，我想聽聽其他各位的看法。』

『那麼，健生的看法呢！』

被譽爲『小諸葛』的白崇禧站起回答說：『如果日本的談判條件只有這些，我就不明白爲什麼還要去打仗。』

『你的意思是同意談判？』

白崇禧點頭。

接着蔣介石又一一問了徐永昌等人，他們都表示，如果日本的條件僅限于此，那麼就可以答應。

最後又問到唐生智。

唐生智說：『既然大家同意，我也贊同大家的看法。』

于是，蔣介石總結了會議的要點：

1、德國的調停不應該拒絕。

2、日本的議和條件不能算做亡國條件；

3、華北政權要保存。

這就是說：蔣介石決定有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條件。

陶德曼的夢被現實無情地粉碎了……

剛才召開的會議，仿佛給蔣介石喫了顆定心丸，白崇禧等人的見解和他不謀而合，使蔣介石極爲興奮，現在他將面對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一見陶德曼進來，蔣介石立刻起身相迎，像老朋友似的和陶德曼寒暄。

蔣介石熱情地說：『首先，對于德國促致和平的努力，我表示衷心的感謝，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因爲德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和上次會見相比，蔣介石簡直判若兩人。

受寵若驚的陶德曼根本沒有想到一向冷臉凝霜、不苟言笑的蔣委員長會如此熱情，即使盧溝橋衝突後不久，在蔣介石懇求他出面調停時，態度也沒有這樣的熱烈和誠懇。

陶德曼將日本的議和條件複述了一遍。

蔣介石疑惑地問道：『日本的條件就是這些嗎？態度和上次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不過假如現在不答應，戰爭再進行下去，將來條件就恐怕不是這樣的了。』

『對于那種認爲日本已經成爲這次戰爭的勝利者的看法，我不能夠接受。』

陶德曼知道，牛拉特的談話已經傷害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便替牛拉特辯解說：『鄙國外長只是假設而已，現在中國的抗戰有目共睹，全世界都贊美中國軍隊的英勇偉績。』

接着，蔣介石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日本認爲提出的是最後通牒，那麼我也不能接受。』

『這不是最後通牒，請蔣委員長放心。』

『陶德曼先生，對于日本我們從來就不敢相信，做爲鄰邦，和他們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我從來就没有見到他們哪一次守過信用，對于任何條約，他們都敢撕毁，對于承諾，他們可以出爾反爾；本來我國不考慮和日本談判，不過想到德國如此出力調停，縱使只是爲了表示對德國的謝意，也不得不考慮。我們相信德國，才接受貴國的調停。』

接着蔣介石就日本的條件進行了談論，會談的內容，陶德曼在十二月三日致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是這樣概括的。

（一）、中國接受這些條件作爲和平談判的基礎。

（二）、華北的主權和獨立完整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談判中，自始即由德國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談判中，不得涉及中國和第三國之間的協議。

關于第一點，我告訴他：我認爲中國必須宣佈她自己願以協和的精神和意念來討論這些條件。蔣介石說，他是想這樣做，但希望日本也這樣做。

關于第二點，我要蔣介石注意日本的條件，就是華北的最高首長應該是對日本友善的。蔣介石答說，假如要選派一個人去擔任那個職務，那個人自然是不會反日的。

關于第三點，我向蔣介石聲明，德國無意直接參加和平談判或主持談判。我們寧願就我們力所能及幕後盡力幫助中國。蔣介石希望我們能斡旋到底。

關于第四點，我提醒蔣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認爲這個要求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不衝突。蔣介石沒有反對我的意見。

關于停止敵對行動的問題，我和他說，我認爲停止敵對行動的步驟是這樣，在蔣介石的聲明已經交給日本而日本的同意的答覆也已經收到之後，元首和總理就向雙方政府建議停止敵對行動。蔣介石同意。

蔣介石最後再三要求日本政府對初步的談判特別是條件，保守秘密。這是和平的一個初步條件。我認爲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支持這個要求。否則蔣介石的地位將會大爲動搖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國政府落入親俄的人手中。日本對于蔣介石這種勇敢和願意和平的態度，應該給以種種便利，俾使他能够完成談判。蔣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會見的時候曾經說過，中國不能接受關于內蒙古自治的要求，因爲這意味着要失去兩者，我就問他是否願意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

他說，蒙古的問題可以和日本談判。

蔣介石這個中國保留華北主權、先停戰後談判，以及秘密談判的原則，使陶德曼認爲和平極爲希望，能夠調停成功，不僅會使德國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地位驟增，而且日本也就不會因爲德國堅持不撤走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團而懷疑德國的立場。如果真的實現中日和平的話，陶德曼將會作爲和平使者名垂青史。然而現實卻無情地證明，陶德曼所有的想象不過是南柯一夢而已。

『和平姿態是應該做出的……』

當德國駐日大使將關于蔣介石和陶德曼會談的備忘錄送給日本外相廣田時，廣田對充滿希望的狄克遜無情地潑了一盆冷水。

廣田說：『我現在應該征求陸軍和海軍方面意見，對于是否在一個月以前所提出的議和條件上談判，我無法肯定。』暗示可能要提新的條件。

狄克遜：『廣田先生，直到本月中旬，日軍已經取得第一次勝利後，你還告訴我，談判的基礎仍然不變，可是現在……。』

廣田：『大使先生，最近幾個星期已經發生了不同的情況，坦率地告訴你，陸軍方面的要求已經比以前更苛刻了。』

事後，狄克遜在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是這樣評價廣田的看法的：『從最近這幾日日本在軍事上的巨大勝利和中國的嚴重失敗看來，日本對它提出的要點加以一定的擴大，是不可避免的。』

狄克遜的判斷是正確的。

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戰場上，自十二月一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下達進攻南京的命令後，日軍採用包圍迂回戰術，兵分三路進攻南京，由于指揮失誤，儘管中國守軍浴血奮戰，十二月十三日南京仍然被日軍攻佔。

國際上，日軍試探了英美等國的態度。十二月十二日，日本陸軍炮擊停泊在蕪湖長江上的英國的軍艦：『瓢蟲』號及其附近的英國商船。同日，在南京的長江下游的美國軍艦『潘納』號也被日本海軍飛機炸沉。日本之所以這樣做，是想看看英美等國對日本侵華的態度，正如預料中的，除了無力的照會抗議外，强大的英美兩國並沒有採取其他有力的反擊措施。試探成功表明：對于日本的侵華戰爭，英美是不會干涉的。

十二月十四日，臭名昭著的大漢奸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本的授意下，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南京的攻佔和英意的縱容態度，使日本的强硬派有了有力的證據。南京陷落的當天，近衛文麿首相發表談話說：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國民政府的實體已成問題了。

十二月十四日，東京召開了內閣會議，重新研究十月向德國大使提出的對華議和條件，同時對蔣介石和陶德曼會談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廣田外相首先發言，認爲在付出大量犧牲的今日，以如此輕微的條件，難以同意。

末次内相也提出：『如此條件國民恐不能認可』。暗示如果答應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將會對日本國内的治安問題産生不良影響。

接着，杉山陸相也同樣强調，如果僅得到蔣介石如此的條件，其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最後，近衛首相總結認爲，中國作爲戰敗者如此提議實屬無禮，日本不但不應降低以前提出的條件，而且應在下次内閣會議上追加新的條件。

然而内閣會議的決定遭到了主和派的反對。

本來，對講和的態度，在陸軍部形成了强硬和溫和兩派，前者以陸軍爲代表，並得到政府的支持，他們主張提出滅亡中國的條件，迫使蔣介石投降，實質上是反對講和，是求戰派；後者爲參謀本部，主張在攻佔南京後戰爭即告結束，全力和蔣介石進行談判。

于是，參謀本部直接上書近衛首相，堅決要求取消此次内閣會議的決定：

1、本措施未經審愼考慮的回答，不僅破壞國家的信義，且只能被解釋爲日本製造口實，繼續戰爭進行侵略。這是違背道義的。

2、盡可能接受中國方面此次提議，進行談判。如果進入談判，則將自然打開折衷妥協之路。

3、其條件絶對難以接受，應明確提出我方所希望條件。而該條件早已備妥，只待處理。解決條件需寬大，何況當此企圖日中關係大轉變之時，如此空喊無禮，而無具體對策的措

施，戰勝之國傲慢莫此爲甚。如此，何以結成日中兄弟之誼？

參謀本部的上書使近衛首相大爲感動，然而日本國的利益更應看重，要想實現稱霸的野心，中國是不能不被征服的，而征服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戰爭。

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也許，蔣介石在强大的軍事壓力之下會投降的，不，是不可能，近衛否定了自己的這個想法。

但是，和平姿態是應該做出的，而且更應該表現出千倍的熱情和真誠。

這是政治家起碼的常識。

根據加重了的方案，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內閣會議做出了『關于日華和平談判問題，對駐日德國大使的覆文』的決定。

這個覆文，無疑是一個戰爭的信號。

第四章

調停夢破滅

他收到這份密電時，目瞪口呆

雖然，狄克遜估計到，在日軍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後，日本政府會加重談判的條件，甚至會迫使蔣介石下台，但是，在接到廣田外相遞給他的覆文時，他仍然感到喫驚。

『這些條件遠遠超過十一月三日你告訴我的條件，我認爲中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是極端不可能的，這無疑是一個亡國的條件。』

廣田並不理睬狄克遜的喫驚，反而覺得他有點大驚小怪，冷冷地說：『由于軍事局勢和輿論的壓力，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方案。』

後來，當狄克遜獲悉內閣會議的真相後，他才明白：縱使日本這個在他看來是不可想象的談判條件，在大多數日本內閣成員看來，還是太溫和了，因爲他們並不真心希望和平。而希望這些條件爲中國拒絕，以便可以貫徹對蔣介石進行殲滅戰的政策。

他幾乎不忍心將覆文的內容告訴陶德曼，告訴蔣介石。

一反往常的慣例，狄克遜故意犯了一個『善良』的錯誤，僅僅將覆文的內容報告了德國外交

部而没有發往中國，似乎這樣就能夠減輕陶德曼和蔣介石的痛苦。

當陶德曼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到德國外交部的第二一一號密電後，儘管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戰爭形勢的急劇變化和日本的遲遲不做答覆，使陶德曼這個資深的外交家意識到，日本談判的條件肯定會改變，但見到這個條件時，陶德曼仍然目瞪口呆。

日本竟然提出這樣的條件，叫他怎樣去對蔣介石説？本來，對于日本第一次提出的條件，蔣介石就表現得相當勉强，要不是他和駐華德國軍事顧問的多次努力，要不是元首和政府的一再勸説，要不是看在德國的面子上，蔣介石是不會答應和日本談判的。

可現在，日本的條件竟變得如此苛刻，如此決絶，幾乎和給戰敗國的最後通牒没有兩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陶德曼一遍又一遍地讀着手中的電報，他的手在發抖，他的心在下沉……

原來，由德國外交部轉達給陶德曼的日本覆文是這樣的：

根據本月七日貴大使向本臣口頭説明及所附備忘錄，貴國政府對和平解決日中談判之關懷，及貴國駐華大使的努力，本大臣深感敬佩。

然而，鑒于最近戰局的迅速發展，事態已有重大轉變，帝國政府擬提出以下基本條件。中方如全部以此爲講和原則，並有向帝國政府表示乞和之態度，則帝國亦準備按此開始日華直接談判。

上述原則如不被接受，雖屬遺憾，但帝國將不得不以不同既往之全新觀點處理事變，此意

望予諒解。

基本條件如下：

一、中國須放棄容共，抗日滿政策，並與日滿兩國之防共政策合作。

二、在必要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並建立特殊機構。

三、在日滿華三國間，締結經濟密切合作之協定。

四、中國償付帝國所要求之賠償。

口頭說明：

一、中國應表示實行防共的誠意。

二、中國應于一定期限內，派出媾和使節到日本指定地點。

……

四、如蔣介石對現在秘密提出之原則表明承認之意時，希德方慫恿日華雙方停戰，但希勸告日華直接談判。

其實，除了陶德曼見到的覆文外，日本已制訂好《日華媾和談判條件細目》，其內容更爲詳細，其要求更爲苛刻。

日華媾和談判條件細目

一、中國正式承認滿州國。

二、中國放棄排日反滿政策。

三、在華北及內蒙設立非武裝地帶。
四、華北在中國之主權下，爲實現日滿華三國之共存共榮應設立適當機構，賦以廣泛權限，尤以實現日滿華經濟合作。
五、在內蒙古設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國際地位與現在外蒙相同。
六、中國須確立防共政策，並對日滿兩國防共政策之施行予以合作。
七、在華中佔據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在大上海市區域由日中協力維持治安及發展經濟。
八、日滿華三國締結有關開發資源、關稅、貿易、航空、交通、通信等方面必要之協定。
九、中國應償付帝國所要求之賠償。

『答應日本的基本條件……那才是真正的亡國之舉！』唐生智說

經過再三億考，陶德曼決定遵照外交部的指示，將日本提出的條件以備忘錄的形式轉達給蔣介石。

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婉拒了陶德曼的求見，決定由夫人宋美齡和孔祥熙代爲接見。但是，宋美齡帶回來的卻是一個壞得不能再壞的消息。

日本的苛刻條件，使蔣介石出一身冷汗。他在日記中如此寫道：『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

日本的條件不能接受，那麼是否繼續和日本交涉呢？蔣介石陷入難以抉擇的境地。

上海、南京的相繼失守，國軍損失慘重。悲觀絶望的氣氛籠罩着國民政府，希望議和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本來一直主和的汪精衛、張羣等人又紛紛發表和談的言論，要求蔣介石接受日本的條件，停戰求和。但是，蔣介石明白，這時如向日本求和，時機極爲不利，等于向日本求降，必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危及國民黨的統治。

早在陶德曼提出調停之初，全國的輿論對于中日之間的交涉就頗有微詞，山西的一家大報就猛烈抨擊過陶德曼，攻擊他出賣中國，是日本的幫兇。後來，雖然抗戰的宣傳轉移了輿論的視綫，但是，對于中日之間的秘密交涉，新聞界一直十分關注，有一家報紙在頭版頭條用了這樣一個標題：『誰主張和談，誰就是漢奸。』

而中國共產黨對于蔣介石的活動更是極爲關注，無論在報紙上，在談話會上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講話中，都一再要求全國人民警惕求和勢力的抬頭，號召人民起來孤立投降派。

如果和日本直接談判，接受他們的基本條件，中國共產黨絶對不會像現在對他高呼『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了。

蔣介石一想到這些，就覺得絶不能和日本直接談判，日本的條件絶對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直接拒絶德國的調停呢？

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孔祥熙關于他和陶德曼會談的報告。

十二月二十七日，陶德曼再次會見了孔祥熙，轉達了日本廣田外相的聲明，在這個聲明中，

廣田拒絕了昨天中國提出的兩個要求：1、針對日本要求中國年內做出答覆的條件，中國希望時限能夠得到適當延長；2、中日談判進行的時候停止敵對行動。

孔祥熙向陶德曼表示：「日本現在提出了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條件，也許要求十個特殊政權和十個非軍事區，沒有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陶德曼先生，貴國政府和元首是怎樣看的呢？」

陶德曼沒有直接回答孔祥熙的問題，只是說了這麽一句：「日本的極端分子們批評這些條件，認爲太溫和了，希望貴國政府充分考慮。」

如果斷然拒絕中日談判，正好符合日本極端分子的心願。戰火將會越燃越遠越燒越深，有可能在幾年之內中國全被佔領，到那時，他就要麼投降，要麼像中國共産黨一樣上山打游擊。投降，他是萬萬不能幹的；上山打游擊他和他的軍隊能打得下去嗎？

他喫不起毛澤東朱德那樣的苦！

他的軍隊更沒有紅軍那樣組織嚴密服從命令，恐怕不等中國亡國，他的軍隊就已做鳥獸散了。

既然無法抉擇，那就開會決定吧。

十二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召開了國防會議，討論對日本的和戰問題。

平時，一談起和戰問題時，汪精衛等人總是慷慨激昂，大肆攻擊主張抗戰的人是唱高調，特別是主張抗戰的中共，更被攻擊爲借刀殺人，借抗戰之名圖發展之實。鼓吹戰必大敗，和不致陷于大亂。說到激昂時，往往大拍桌子。可是，今天，聽了日本的談判條件後，他們卻一言不發。

見汪精衛不語，忍耐不住的周佛海打響了頭炮：『各位，既然大家不發言，那我就先發表自己的看法，權當拋磚引玉吧。我認爲，在現在的形勢下，鑒于中日軍事實力的對比，接受德國的調停，和日本和談是上上之策。』說到這裏目光掃了一遍，緩慢道：『至于繼續作戰，那無異于自取毀滅，是下下之策。』

周佛海態度鮮明的講話，立即引起了一片反響，微微頷首以表贊同的有，搖頭大力反對的有，更多的仍然沉默不語。

『孟瀟，談談你的看法？』蔣介石叫起唐生智。

『敗軍之將不言勇，本來做爲南京失守的罪人，我無權發表意見，但是，爲中國着想，答應日本提出的基本條件，進行和談，我看那才是真正的亡國之舉，絕對行不通。』因失守南京一直引咎自責的唐生智一掃往常的穩重和寬容，和周佛海唱起了反調。

幾番爭議之後，仍然沒有得出結果。

最後，還是得由蔣介石出來收拾場面，尚未痊愈的蔣介石啞聲說：『今日形勢，除投降外無和平可言，捨抗戰外無生存可圖，爲國爲民着想，我認爲抗戰比議和要好一些，不過，我們不要放棄任何可能和談的機會，只要不損害民族利益，縱使個人作出犧牲，也是可行的，這樣吧，由外交部將日本條件電告我駐外使節，並令轉告各國政府；看看他們的反應。』

一九三八年元旦，國民政府機構進行改組，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則由孔祥熙升任，副院長則由熟悉對日關係的張羣擔任。這次改組，對外顯示

國民政府抗戰力量的加强，同時，由于張羣素爲親日派也爲中日關係的改善準備了條件。

蔣介石要福根霍森轉告德國政府：「假如軍事部署正確，國内的士氣恢復，彈藥補給充足，中國可以再進行六個月的戰事。」

言下之意，希望德國出面，勸說日本放寬談判的條件。蔣介石總認爲，德國的意見對日本政府的決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響。

『你認爲日本的補充聲明如何？』蔣介石對王寵惠問道

一九三八年元旦之夜，雖然戰爭的威脅日益臨近，但是武漢的節日氣氛並没有減弱，相反，由于政府機關的驟集，節日氣氛更加濃厚。

霓虹燈下，舞曲之聲四處可聞。

暗淡的燈光下，一對對男女翩翩起舞，一片祥和的氣氛。

但是，坐在外交部辦公室的王寵惠博士卻心急如焚，毫無節日的歡樂之感。

作爲中日交涉的信使，陶德曼將日本所謂「非正式」條件的補充說明交給了他。做爲外交部長，近日他深感責任重大。對中日交涉的信心日漸消失，而這個補充說明，不過是亡華要求的具體化和明確化。

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項，首先是要中國承認「滿洲國」，並表示有積極排除共産黨的證據，不過並不要求中

國參加防共協定或廢除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第二項，所謂『非武裝區域』，是指：①內蒙，②華北，③上海附近已爲日本佔領區之一部（約爲自市區至湖沼之地段）等三個地區。所謂特殊機構（政權）則爲：內蒙方面，須具有和外蒙相同地位的『自治政府』，在上海是在租界外設立特殊政權。

第三項，關于經濟協定一節，是指關稅與商務方面。

第四項，所謂『賠償』，一部分爲戰費賠償，一部分爲日本財產損失的賠償；日本軍的佔領費用亦須由中國負擔。

此外，關于停戰一事，日本主張：由中國派遣代表赴日本議和；必須等中國提出相當保證之後，始可考慮停戰。

日本實在是欺人太甚，即使對待戰敗國，也不應該如此傲慢無禮。

王寵惠決定立即報告蔣介石。

正如王寵惠所料，蔣介石見到這個補充聲明後，並沒有表現出過分的沮喪，甚至顯得相當的冷靜，全然没有他上次接到類似文件時所表現出的驚訝和憤怒。

『寵惠，你認爲日本的補充聲明如何？』蔣介石放下補充聲明後，抬頭問。

『委員長，我認爲日本的條件是亡國條件，日本認爲戰場上取得了主動權，便可以滅亡中國。提的條件完全是訛詐，企圖使我方在軍事失利的情況下，屈辱求和。』

『日本提出的條件，等于征服與滅亡我國，應該拒絕。不過在此不利的形勢下，還是要虛與

委蛇，這樣吧，對于陶德曼，不要馬上作答，縱使問起，只說我方正在考慮。另外電告東京許世英，讓他加緊了解日方的真實意圖。」蔣介石說完，不知是身體虛弱還是用力過多，頭一歪枕在了靠背椅上。

蔣介石無奈，只好採取拖延戰術，他給許世英這樣一份電報……

一月二日，中國駐東京的大使許世英接到了外交部長王寵惠的電報，電報稱：我方初以日本條件空泛廣闊，無從考慮。昨日陶大使又轉達駐日本德國大使與日方各要人歷次談話印象。政府對此方案正在研究，在未決定最後辦法以前，你可以和駐東京德國大使聯絡談話，聽取其講述，勿表示具體意見，同時，如有日方要人求見，勿予拒絕，而以同樣態度應付之。

決定採取拖延手段對付日本的條件後，一月四日，由于北方戰事緊張，蔣介石飛往洛陽，部署抗戰事宜，而外交事務，暫時由孔祥熙和王寵惠主持。

『這是蔣介石的緩兵之計……』杉山元怒不可遏

本來，日本要求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作出答覆，由于蔣介石借口條件不夠明確，要求寬限時日，日本只好將補充說明送達中國，希望中國政府作出明確的決定。但是，蔣介石還是採取拖延的策略，這使得日本政府大爲惱怒。

一月九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在上海發表談話。宣稱：『國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現

在情勢必須考慮兩點：即壓迫國民政府與樹立佔領地區之新政權。恐怕日本將會否認國民政府爲中國的中央政府。」

同一天，東京召開大本營與政府的聯席會議，通過了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

一月十一日，召開御前會議，經天皇裁定，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如下：

帝國堅定不移之根本方針，在于與滿洲國及中國之合作，形成東亞和平之樞軸，並以此爲核心，對和平做出貢獻。

至于上述根本方針，關于解決此次中國事變，應一掃兩國過去一切對立，從大局出發重建兩國邦交。並以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取得渾然一體相互融和之實，和爲最終目標。首先確立防止事變重演所必要之保障，同時在兩國間確實約定以下各項：

（一）、日滿華三國，完全停止諸如破壞友好之政策、教育、貿易，以及其他一切措施，並杜絕可能招致上述惡果之行動。

（二）、日滿華三國，共同行動以期實現文化合作及防共政策。

（三）、日滿華三國約定在產業、經濟等方面，根據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之精神，施行互惠。

基于上述方針，帝國特運用緊密結合的政略與戰略，以期適當實行以下各項：

（一）、如中國現中央政府，此時重新考慮幡然悔悟而以誠意求和，則依據條件（甲）所列日華媾和談判條件進行談判。

(二)、如中國現在中國政府不來求和，則今後帝國不再以該政府爲解決事變之對手，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並與之簽訂調整兩國邦交之協定，協助新生中國之建設。

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將採取措施使之毀滅或納入新中央政權之手。

……

除了確定根本方針外，對于中國答覆的期限不得不再次後延。在這次御前會議上，以杉山元爲首的激進派對于最後期限的延期大爲惱火，他曾指着廣田外相的鼻子道：『限一九三七年年底答覆，本來已經夠寬的了，可你們還是答應後延，一月五日又到十日，蔣介石不做答覆，已經表明他們無意談判，可你這個笨蛋竟然答應再次推遲：一月十五日，這是蔣介石的緩兵之計，你懂不懂，你這個……』

見杉山元如此失態，近衛文麿制止了他。

『杉山陸相，給蔣介石答覆期限的延遲，是大家決定報請天皇同意的，是大家的責任，不要只指責廣田君一人。』

近衛一插嘴，杉山元不好再罵下去。

天皇說：『以往的決定既然已成事實，也就算了，不要再糾纏，一月十五日是最後的期限，絕對不能再推了。如果中國方面再不答覆，就按剛才決定的根本方針辦。』

長期對華侵略政策已經出台。

蔣介石的拖延策略也使陶德曼十分焦急。

日本政府的一再緊逼，使陶德曼這個調停人覺得非常難堪。幾次詢問中國外交部，回答總是百分之百的模糊，國民政府正在考慮啦，蔣委員長外出要等他回來才能決定啦，這樣的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讓他難以回答。

一月十日，日本駐德大使拜訪牛拉特時已經表示：日本政府決心把戰事堅持到底，若戰事越延長，和平條件也就越苛刻。甚至，日本決定如果蔣介石再不接受和平條件，就不再以蔣介石爲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

日本大使請示德國加重調停人的份量，勸說中國認請當時的形勢：如果相信中國在軍事上有獲勝的可能，那只是幻想。

德國外交部命令他加緊行動。

一月十二日，他又收到了狄克遜從東京發來的電報，這個電報使陶德曼意識到：他這個調停人失敗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狄克遜在電報中說，日本政府希望電告德國駐漢口的大使館，請大使館盡力向中國政府要求迅速答覆。假如一月十五日得不到答覆，日本政府將保留自由行動的權利。

無疑，這是一個最後通牒。

不能再讓中國老是研究日本的條件，是做出明確答覆的時候了，離十五號還有兩三天，也許中國有可能改變態度。

陶德曼決定再訪王寵惠，先疏通一下，儘管他知道王寵惠對于日本的和平條件根本没有決定

權，但現在委員長不在漢口，無法勸服他，也許通過王寵惠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實，對于日本的一再威脅，蔣介石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和談是根本不可能的。蔣介石在等待國際形勢的轉變，等待英美和蘇聯的參戰。

對于陶德曼的造訪，王寵惠似乎早有準備。

『部長先生，貴國政府對于日本的答覆是否已經考慮好了？』陶德曼一反平時的穩重，剛進門就急不可待地開口。

『陶德曼先生，你了解日本人嗎？』王寵惠顧左右而言他。

『日本人？我不怎麼了解，不過就我所了解的來說，日本民族是一個喫苦耐勞、勤奮嚴謹甚至有點死板的民族，在某些方面和德國人相同，不過日本人也非常冷酷。部長先生，你問這個幹什麼？』

『陶德曼先生，我贊同你的意見。不過日本人還有另一面，那就是慣用卑劣手段，出爾反爾不守信用。』王寵惠停了一會，繼續說：『就這次日本提出條件而言，它先提的條件籠統含糊，企圖使中國接受，之後，再以補充說明，任意提出要求，因此，我國希望日本的條件更詳細些，但沒想到等到的卻是非正式四項條件及補充說明。大使先生，你想想日本是不是在施加陰謀？』

『那麼你認爲該怎樣呢？』

『大使先生，如果日本政府將詳細辦法正式通告我方，我國則可以考慮答覆。』

『部長先生，據我個人認爲，日本方面恐怕不會將細節明白表達。』陶德曼接着說：『據東京

發來的電報，日本軍部堅持須中國迅速有明白答覆，御前會議已經決定如果中國政府不答應日方的條件，決定不承認國民政府。部長先生，根據這個情報，我希望你能轉告委員長，最好認真考慮日本的條件，十五日前做出答覆。」

「謝謝大使先生。」

第二天，迫不及待的陶德曼又和王寵惠舉行兩次會談。

王寵惠沒有再說什麼，在例行公事地向陶德曼和德國政府表示感謝後，便宣讀了一份早已寫好的聲明：

「經過適當考慮之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作確切的決定。」

聽完王寵惠宣讀的聲明，陶德曼覺得自己受到愚弄，沉默良久後，反問道：「這個聲明就是答覆嗎？」

「我方所要知道的是四項條件的內容。」王寵惠顯然是答非所問。

「如果日方認爲這是一種躲避的答覆呢？」

「如果我們有意躲避，又何必要再詢問其內容與性質！」王寵惠毫不客氣的回答，彷彿他面對的不是陶德曼，而是可惡的日本人。

『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近衛聲明無情地給陶德曼調停劃上了句號

正如陶德曼所預料的，當狄克遜將中國的聲明轉達給廣田時，對于此項不置可否的聲明，廣田很不滿意，惱怒地說：『這簡直是個明顯的借口，爲了作一個肯定或否定的答覆所必需的一切環節，中國都已知道了。竟然還要什麼說明。總之，被打敗了而不得不求和的是中國，不是日本。』

廣田的話可以說既正確又錯誤，中國確實在戰場上失利，但並沒有求和，請陶德曼和德國政府出面調停的，也是日本而不是中國。

狄克遜要求日本政府將四項條件和補充聲明作爲正式聲明向中國轉達。

廣田拒絕了。

他對狄克遜說：『我認爲中國的聲明，是一種躲避的答覆，怎樣回答它的聲明，得由內閣商議決定。』

一月十五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就中國的聲明進行討論。

多田駿，大本營參謀次長，一個老謀深算的穩健派首腦人物，率先發言：『我認爲，在舉國一致的決心尚未成熟的情況下，絕對不能不等中國方面最後明確答覆，即轉入前途暗淡的長期戰。對決定否認蔣介石政權一事，今日且予保留，等待中國方面的明確回答。』

杉山元針鋒相對反駁道：『今天尚未收到中國的回電，限期已到，這證明中國無和平誠意。

我主張應該不以蔣介石爲對手。在他屈服以前繼續進行作戰。」

廣田支持杉山元的意見：『根據我長期外交生活的經驗，中國方面的應對姿態，顯然並無和平解決的誠意。參謀次長是否相信這一點？」

最後，雙方仍然誰也說服不了誰，決定無法做出，這時，海相米內使出了殺手鐧，說：『政府相信外相，統帥部不相信外相，亦即對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只有辭職。」

多田駿一聽，聲淚俱下地說：『明治大帝曾有仰勿辭職的聖諭，値此國家重大時期，所謂政府辭職，成何體統。』

然而，無論多田駿，海軍司令部次長古賀峰一再堅持繼續談判，終究胳膊拗不過大腿，在杉山元，廣田等大多數人的主戰聲中，不得不屈服。

一月十六日，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

攻陷南京後，帝國政府爲給予中國國民政府最後反省機會正及于今日。然而國民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竟策動抗戰，內不體察人民塗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全局之和平。

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之調整兩國邦交，協助新中國之建設……

這就是第一次近衛聲明。

針對這個近衛聲明，國民政府隨即發表了指斥宣言。

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召令駐日大使許世英歸國。

一月二十八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也撤回日本。

陶德曼調停結束。

站在窗前，傾聽着江水流淌的聲音，陶德曼感到有說不出的勞累，幾個月來的努力終于付之流水，一切化成了泡影，他無法擺脫它帶來的痛苦和失望。

空襲警報鬼哭狼嚎般響了起來，雖然是冬天，但日軍的空襲卻一日緊似一日，漢口幾乎快要被炸成廢墟，街頭上，滿是傷殘的中國士兵和逃難的民衆。

『戰爭就是這樣的，』陶德曼在心裏感嘆道，『誰要他們選擇戰爭呢？』

第五章

尋找第三勢力

吳稚暉突然跪倒在汪精衛的脚下，請汪『救救中國……』

當陶德曼將一月十六日日本答覆照會交給王寵惠的刹那間，他清醒地意識到：作爲調停人，他的使命已結束了。

這個照會是廣田對中國十三日聲明的答覆：

『我們只能認爲：中國方面的這種拖延的態度，表示沒有以接受全部和平談判的基本條件來謀和平的意念，因此帝國政府現在決定放棄（帝國政府對此是深爲遺憾的）承閣下的政府竟誠幫助而進行的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目前的和平談判，並且從一個完全新的立場來處理目前的事件』。

日本決定放棄由德國進行的和談，和平的大門已經關閉。

戰爭的魔鬼繼續肆虐于中華大地。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本制定《中國事變帝國作戰指導綱要》，決定長期戰爭，暫不擴大戰場。同時，日本調整了在華的兵力，華中派遣軍以陸軍大將畑俊六爲司令官，下轄第三、第六、

第九、第十三、第二〇一師團，另有步兵第十旅團和第三飛行團。

華北方面軍以寺內壽一大將爲司令官，下轄第一軍、第二軍、方面軍直轄兵團。

日軍在華北、華中、華東加緊對國軍的進攻。

戰場的失利，特別是上海戰役和南京保衛戰的失敗，使國民黨兵力受到嚴重損失，爲了應付危急局勢，國民政府在通過德國與日本周旋時，在戰場上也作了調整，將原來的四個戰區調整劃分爲六個戰區，並設置武漢衛戍總司令部。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國民政府的主和派並沒有停止活動，隨着戰爭局勢的發展，妥協空氣再度甚囂塵上。一天，汪精衛在重慶上清寺官邸宴客，與會者都是中樞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當大家談到當前的局勢時，突然，被世人視爲政壇上泰斗的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走到汪精衛的座前跪下，無限悲憤地懇求汪精衛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救中國的也只有你了。怎樣去結束這場不利的戰爭，你有對黨國的責任，不應爲了自全自保，再這樣袖手旁觀下去！」

汪精衛這時也感動得離座對跪，彼此握手欷歔。

其實，吳稚暉根本就不了解汪精衛，更不了解蔣介石。

陶德曼調停的失敗，不過表示由第三國出面來調解中日衝突已經不行了，另一條通道實際上已經在迅速開啓。

蔣介石心裏明白，完全靠中國的抵抗，抗戰是不可能勝利的，只有採取兩面手段，也許可以堅持到國際形勢的變化。于是，蔣介石一面在戰場上積極抵御日軍的猛烈進攻，暗地裏又和日本

勾勾搭搭，進行和平工作。

高宗武，便成爲蔣介石對日交涉的代表。

高宗武，一九〇六年生，浙江溫州人。從小留學日本，畢業于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被人稱爲中國的『日本通』。三十年代回國後，曾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此時，中日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他發表的有關中日外交問題的論文，深得汪精衛賞識，汪當時兼任外交部長，便邀請高宗武入外交部工作，先在亞洲司任科長，不久即升任代理司長。一九三四年，在同日本人談判關于中國和僞滿洲國通車通郵事宜的過程中，由于表現出色，被當時輿論稱爲『辦日本外交的能手』，他和日本駐華使館官員及各方的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高宗武因此官運亨通，並博得了蔣介石的青睞，很快被提升爲亞洲司司長。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對日和戰方針搖擺不定，周佛海、胡適等低調俱樂部的伙計們，決定打通和日本的外交渠道，經多方商定，由高宗武出面主持和日本的直接交涉。

在胡適等人的一再推薦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蔣介石、汪精衛一起接見了高宗武。在見蔣介石之前，高宗武在吳震修的引薦下，見到了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南京事務所主任西義顯，西義顯是日本著名的特務，他主張通過談判來迫使中國屈服，此人和吳震修非常熟悉，而吳震修時任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經理，曾留學日本，和日本人關係素來親密，是衆所皆知的親日派，高宗武見到西義顯時，交流了對時局的看法，一致同意中國方面由高宗武出面勸說蔣介石主

和，日本方面則由西義顯做工作。

當矮小瘦弱的高宗武進來時，蔣介石先是一愣：怎麼回事？胡適竟然推薦這樣一個病秧子？但是聽完高宗武一席慷慨激昂的講話後，蔣介石深爲折服：果然不負胡適的評價：『能負責任、並有見識。』

高宗武說：『只有驅逐日本侵略者，才能立即停止日本對中國的壓迫。這是我的信念。但是，由于我是亞洲司司長，必然要妥善處理日本提出的取締排日的要求及降低關稅這類的事務性交涉。但實際上，我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我的願望在于：使中日關係來一個一八〇度的大轉變，以實現東亞歷史性的變革。這樣，日本那小小的懸而不決的疑案，便可一舉解決。』

對于高宗武的大膽陳述，蔣介石雖然並不贊同，但是覺得他勇氣可嘉。

見蔣介石的態度猶豫，高宗武覺得有機可乘，在汪精衛鼓勵的眼色示意下，他斗膽陳言：『委員長，卑職認爲，時至今日，若一步錯誤則東亞全滅。值此非常時期，宗武請求承擔這次對日最後交涉的重任。宗武當以熱誠說服近衛，借近衛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一綫爲界，于此便可實現使日軍從華北全面撤退的願望。故望委員長及主席責成我去完成對日外交之革命性轉折。拯救中國防止亞洲滅亡，唯此一途。』

汪精衛聽後，當即表示贊成，但是蔣介石沉默不語，既不表示贊成，也不否定。

沉默就是同意，高宗武想。

在蔣介石的默許下，高宗武、西義顯積極爲促進中日和談而奔走效勞，西義顯的活動得到了

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右的支持，不僅免去了他對滿鐵的一切事務，專心做和平工作，而且給了他一筆巨款作爲活動經費，並將他介紹給近衛文麿，但是此時由于中日雙方正忙于德國的調停，『和平工作』無從開展。

董道寧的到來，似乎給了他一劑强心針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南京路匯中飯店的一個房間。房門剛被敲過便輕輕地推開了，一個白皙肥胖的紳士走了進去。

『呀，好久不見，你好哇，西義君！』

『啊，好，好，許久不見了，董道寧君。』

原來這個胖紳士就是董道寧。

董道寧，祖籍浙江寧波，從小長在日本橫濱，初中是在東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學是在京都念的，日語講得非常流利，連日本人也非常佩服，被稱爲『日華人』。曾任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參事，後調到外交部工作，擔任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對日本的外交事務。

這次到上海來，是高宗武派他來的，其任務就是取得和日本的聯絡。

董道寧的到來，給西義顯一個意外的驚喜，由于南京大屠殺的醜聞和中國的抗戰決心，使西義顯以爲中國不會再與日本談判了，再加上到東京時，近衛文麿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對日本政府也喪失了信心。這時，他正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怨天尤人哩。

董道寧的到來無異給了他一劑强心針。

應酬一番後，西義顯就問：『以你的地位，這時在上海出現，我認爲意義重大，不能視爲尋常。』

董道寧假意說：『我雖然精力充沛，但對于世事已經厭棄，聽說你在大上海，才跑來和你閑談。』

當然，這話又哪能騙得了西義顯。

西義顯眨了眨眼睛，接着說：『你所說的話，我只承認一半，其餘一半當爲陶德曼調停的讓步而來吧！董君我沒有說錯吧？』

董道寧見西義顯顯然知道自己來上海的目的，便不加掩飾地說：『這倒是事實。對我這樣的「日華人」來說，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除希望陶德曼調停取得進展外，對世事無所指望。我曾會見川越大使，進行了大量促進談判的工作，但毫無結果。』

董道寧的一番話，啓發了西義顯，這時一個具體而宏大的計劃便醞釀在腦中。他猛地站了起來，凝視着寬闊的江面，沉默不語。

突然，他轉身問道：『董先生，您已經到上海來了，趁此機會，赴東京一趟如何？』

『到東京去？』西義顯的建議使董道寧十分驚訝。

西義顯卻不顧及這些，不管他聽不聽，一個勁說了下去。

『董先生，以交戰國外交官的身份，既秘密來上海，會見敵國大使，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赴東京直接説服敵國政府，理義相同，而效果則更大。不過，對于你的行動，我絕對負責保守秘密，而且，這樣做，比你在上海更易于保守秘密。你如果有這種決心，我當馬上先回東京，説通中央的要人，爲你赴東京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見董道寧聽得十分專注，臉上似乎有點猶豫的神色，西義顯便決定趁熱打鐵，繼續説：『當然，你完全以個人的名義去的，但這已足夠了。雖説是個人的名義，但你是現任亞洲司第一科科長，僅這一條，東京就要感激的喲。這與辦交涉不同，不是進行外交的討價還價，而是以中國民族的誠意，打破日本民族的固執，使民族與民族的血脈相通。今日的悲劇，是由于兩民族相互缺乏信任產生的。即使你隻身飛往東京，什麼也不幹，僅這行動本身，就告訴人民：中國人是抱有相信心這一信念的。首要的工作是創造互相信任的氣氛，倘若兩民族能互相信任，就會對命運有相同的感覺。倘若日華兩民族的感覺一致，東亞社會的建立便開始就緒了。』

西義顯一番煽感，顯然深深打動了董道寧。他一直把日本做爲第二故鄉，東京、橫濱、神户使他懷有留戀之情，重訪日本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謝謝，西義顯先生，我聽從你的勸告，決定去東京』。

影佐禎昭説：『如他真來，我一定幹！』

一月十七日，西義顯懷着激動的心情，將董道寧想去東京的消息報告了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時任設在上海的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訊社中南總分局局長。松本當即表示：如果董道寧到日本

去，他非常贊同，並建議西義顯立即返回日本，與參謀本部謀略科長影佐禎昭聯繫，以取得他的支持。

影佐禎昭是繼石原莞爾之後緩進派的中心人物。石原莞爾，生于一八八九年，日本山形縣人，早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後曾任陸軍大學兵學教官、日本駐德國武官。一九二八年任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原來也是一個積極發動侵華戰爭的法西斯軍人，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之一，然而，他在長期侵華活動中，對中國有了較多的了解，也看到了日本目前的國力還不足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因此主張把對中國的强壓政策改爲友好拉攏，待實力具備後，再改爲積極方針。

然而，石原莞爾很快被排斥在參謀本部之外，第一部部長的職務被撤消，在石原莞爾影響下主張對華不擴大方針的影佐禎昭便成爲不擴大派的中心人物。

西義顯一到東京，就直往橫濱影佐的私宅。

一月二十日，影佐私宅會客室。

西義顯問：『影佐君，您知道董道寧這個人嗎？』

影佐回答：『不知道呀，這是個什麼人物？』

『您作爲參謀本部的中心人物，對此事太遲純啦，現在漢口國民政府的內部產生第三勢力，準備從中調停日中和平，董道寧是那些少壯人物的代表，現在已經到了上海，準備到東京來。』

『你不是在說夢話吧。真有這個人嗎？』

『當然有，我在上海見過他。他曾說和我一塊來日本，但我恐怕東京現在還不了解，所以我先來讓當局下決心。如果不抓住這個實現日中和平的綫索，您影佐禎昭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您能下決心幹嗎？』

『這個人真的來嗎？』

『一定來！』

『如果真來，我一定幹！』

其實，影佐禎昭早就等待中國方面派人來，在一月十六日近衛聲明發表後，他曾策動參謀本部，擬以統帥權獨立的理由，用所謂『帷幄上奏』來推翻該項決定。但是，考慮到在戰爭中這樣做將導致暴露陸軍的內部紛爭，後果嚴重，因而中止。而現在董道寧竟然主動到日本來，這內中的含義不言自喻，正中影佐禎昭的下懷。

得到影佐禎昭的承諾，西義顯喜不自禁，立即命令他的助手伊藤芳男急赴上海，爲董道寧赴日代辦入境手續。

蔣介石似乎被影佐禎昭的行動感動了……

在伊藤芳男的陪同下，二月十五日，董道寧在長崎登岸。十七日，與西義顯等人經東京來到橫濱。

在西義顯的精心安排下，董道寧先後與影佐禎昭、參謀本部中國班長今井武夫及參謀次長多

田駿中將進行會談。

他們向董道寧表示，雖然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近衛聲明，但是，由于事變有意外延長的趨勢，日軍内心的真正意向無疑是想迅速實現『和平』。

一晃眼，十多天過去了。

臨走前，影佐禎昭特地趕到車站送行。爲了答謝董道寧來日本的誠意，他給何應欽、張羣倆分别寫了封信，托董道寧帶去。

張羣、何應欽是影佐禎昭日本士官學校同年級同學。

書信的大意是：

日中兩民族不幸發生戰爭，導致一月十六日帝國政府之聲明的發表，東洋命運不能不說窮途末路了。爲了打開此窮途之道，首先是貴國出現了一個偉大的王倫，以解除我國朝野之士的誤解。現董道寧先生來日，親自傳達貴國的誠意，使我當局大爲感動。這是擺脱困境的第一步，但願有人繼他之後，再進一步試行啓我等之蒙，以期待貴國的真意和我國的感動心情得以交流。

在這兩封信上，影佐簽上『影佐大佐』之名，這就使得書信超越了老友之間的書信來往這一個人意義，明確了這是日本帝國的陸軍大佐這一負有責任的地位上的公開聲明。

三月七日早晨，完成了任務的董道寧和西義顯等三人乘上開往大連的『烏蘇里丸』。在船上，滿懷喜悦的董道寧一邊欣賞明石海峽的風光，一邊約定：爲了表現進行日中和平運動的盟友的誓言，稱西義顯爲太郎，董道寧爲次郎，伊藤芳男爲三郎。

從此，由董道寧牽頭的中日和平談判拉開了序幕。

就在董道寧離開日本之際，高宗武也秘密從香港趕到上海。

原來，一九三八年二月，爲了不因陶德曼調停失敗而影響中日兩國的秘密交涉，汪精衛與周佛海密議，在漢口設立一個以搜集日本情報爲名的機關——日本問題研究會，經蔣介石批準，由高宗武出任主任，不久，周佛海又以在漢口難以搜集日本情報爲由，向蔣介石報告，請求派高宗武到香港活動。

臨走時，蔣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見了高宗武。

近衛第一次聲明，對蔣介石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雖然他早已預料到，對日本條件採取躲避的態度，一定會惹怒日本人的，但那麼嚴重的後果他還是沒有想到，因此，對于近衛聲明的真實意圖，他還是有點懷疑。

『宗武，佛海要你去香港搜集日本情報，你有什麼困難沒有？』

『報告委員長，沒有困難，周部長都已經安排好。』

『那好，你到了香港務必弄清日本的真實意圖，有可能的話，嗯，嗯……』

蔣介石嗯了幾聲後，沒繼續說下去，高宗武已經十分明白蔣介石話裏的弦外之言。

當高宗武去辦赴港手續時，竟然意外的順利，原來在召見高宗武之後，奉蔣介石之命陳布雷就命令侍從室第二處秘書，軍委辦公廳秘書長羅君强，爲高宗武準備蓋有軍委會大印及蔣介石簽章的軍用出差證明書，填上『特派員』的頭銜，以避免出國及入境時的檢查。同時，蔣介石還每

月從軍事機密費中撥給高宗武活動經費六千元，折合美元二千元，由羅君強持蔣介石手條向軍需處代領代匯。

作爲日本問題研究會主任，高宗武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找到打通日本的路綫。因此，他一到香港，就秘密赴往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在國民黨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家裏，約見了松本重治。松本重治，出身于日本名門望族，畢業于東京大學，後在芝加哥大學及柏林大學深造，專攻政治學，頗有造詣，因地位和名望，被稱爲民間大使，是近衛文麿的智囊之一和他的私人駐華代表。高宗武和他早有來往，而且關係相當密切。

松本重治一進門，互相慶賀健康後，來不及寒暄就立刻進入了談話的主題。

『松本先生，我是爲了同你會面來的』，高宗武本想客套幾句，急切的心情卻使他很快就轉到近衛聲明上來：『請問一月十六日近衛聲明中「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是出于真心還是什麼問題？』

『高先生，一月十六日的聲明，作爲我個人，無論有什麼事情，我認爲是笨拙之至的聲明。正因爲陶德曼的民間談判沒有成功，就斷言以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作爲從去秋起就寄希望于和平的日本政府，是不合道理的。之所以發出這次聲明，一定有其他的迫切原因。你問我「是真心還是什麼」，日本政府不得不回答說：是真心。』

『你說是真心的，我也不能不接受。但是，阿重，日本政府繼續採取這個聲明的態度能到什麼時候爲止呢？』

『日本政府發出這個聲明，既經過那樣重要的手續，又召回了川越大使。因此不能從明天起就取消。首先，在目前暫無辦法。這種態度至少繼續一年半載不可吧？』

『你說日本政府是真心，但並沒有下決心永遠堅持那種態度？』

『高先生，假如我說日本政府的決心不堅定，這是背叛日本。我不說「不堅定」，但是，如果從問題的本質上考慮，這個堅定的決心，我認爲也有什麼時候不得不變更的可能性。』

松本重治模棱兩可的回答，使高宗武仍然不明了日本政府的真實意圖。

三月十五日，董道寧和伊藤芳男到達上海。

第二天下午，高宗武即在華懋飯店會見了董道寧等人。董道寧詳細地匯報了赴日的情況，高宗武極爲專心，一字不漏地聽了進去。

談話間，伊藤芳男介紹了他們三人的互相稱呼，松本重治乘機向高宗武提議：『宗武，你如果不反對，你做「四郎」，我做「五郎」怎樣？』。

高笑着回答說：『「四郎」也行，假如你是「五郎」的話』。接着，『六郎』的稱號自然授給了影佐禎昭。

接着他們又討論了轉交影佐書信的事，按照董道寧的想法，他想回漢口面交何應欽、張羣、但高宗武不同意：『如果冒冒失失地幹下去，你和我都要被整，這不絕對慎重不行啊！』

于是，他們決定月底前南下香港，待一起商量後再做決定。

一個罪惡的陰謀在淺水灣酒店形成了……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華的避暑聖地——淺水灣酒店內十號房間，突然涌進來幾個陌生的面孔，從他們的着裝來看，很像溫文爾雅的紳士。

原來，這是中日雙方的秘密交涉代表，他們進入的十號房間正是西義顯早已預訂好了的。其中，中方代表是高宗武、董道寧，日本代表是西義顯、松本重治、伊藤芳男。

會談從上午十一點開始。

會談開始，先由高宗武說明漢口的國民黨中樞方面的情況，對陶德曼調停經過和蔣介石、汪精衛的意見作了介紹。他說：

當蔣介石接到陶德曼送來的日方條件時，即召集在南京的將領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討論，白崇禧甚至說：『如果是這樣的條件，那麼爲什麼要打仗呢？』顧祝同說應該接受，唐生智說如果各人都贊成，他也沒有異議。會後，蔣介石接見了陶德曼，蔣認爲日本不可相信，但是如果在德國始終擔當調停者的條件之下，那麼可以考慮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爲談判的基礎，至于汪精衛，他曾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會議根據蔣介石的意見，一致同意以日方所提條件作爲基礎，進行談判。

高宗武强調說：『我之所以將這些情況向日方報告，是爲了使日本友人了解中國方面對陶德曼大使所轉達的廣田外相的和平條件，大體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麼兩國就是

已經走到和平的大門口了。』

西義顯回答說：『聽了上述情況，我們也越發對一月十六日聲明深感憤憾。在德國政府的調停意圖之中，雖然明顯地有着意想不到的不足之處，但若没有冷靜、寛宏的度量去配合工作，東亞的危險局面是不能挽救的。但是問題在于：在最後，以近衛首相爲首的內閣竟然屈服于擴大派。現在軍部存在的不擴大派，就是這次次郎去會見的影佐等人，就是和平派，而且是和平派的中心人物。和平派最終被擴大派所打敗，其原因也由于未能具體而清楚地掌握中國方面的和平意圖，因而缺乏應有的自信心。總的說來，他們對處于優勢的擴大派，缺乏與之作戰的最重要的武器。

『但是，這次次郎到東京，以實際行動清楚地表明了大家的和平意圖，也給影佐提供了與擴大派鬥爭的武器，並促使影佐本人決心與擴大派鬥爭到底。作爲可供補充的武器，就是要把第二個次郎，第三個次郎陸續派遣到東京去。』

五郎松本重治接着說：『武器云云，說不定有點語弊。即使如此，也是次郎對日本軍閥的一次抨擊，並開始打破了影佐這一缺口，請你們朝着這一缺口進行强有力的和平攻勢，對此次日華戰爭的首要原因，即日本國的情況進行清算，撲滅日中戰爭的戰火。而且，請你們成爲滅火的「水泵」。武器，就是那個「水泵」……』

性急的三郎伊藤芳男忍不住說道：

『「水泵」，武器，也還來得慢！要做的事只有一個，必須以影佐大佐的書信對漢口政府進行

强有力的衝擊，以打開實現和平的「噴水口」，再使這種力量反噴過來，以勢頭猛烈的水返注到影佐那兒。影佐大佐的書信表示的和平願望越强烈，就會使漢口政府的反響越强烈。爲實現這目的，次郎應以飛往東京時的勇氣，飛往漢口，親自把影佐的書信送去。」

『你說的完全正確。』五郎松本重治隨即補充說：

『在漢口，不管怎麼說，四郎是可以向蔣介石以下的要人直言勸諫的。因此，雖不是方才太郎的主張，但他必須把影佐的書信作爲一個「武器」去說服蔣介石。』

于是，這幾個人得出了一個相同的結論：中日兩國間的和平意向如果信息相通，加上兩國和平派的交互作用，中日間的和平實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後，又討論了如何把影佐的書信送交漢口的何應欽和張羣，經過權衡利害得失，決定按照高宗武的意見，將信件不先直接交給何、張兩人，而是由周佛海轉交蔣介石。

第三天，高宗武、董道寧從九龍的啓德機場乘機飛往漢口，向蔣介石匯報與日方的會談情況。

高宗武回到漢口後，立即向周佛海匯報了與日方接洽的情況，並讓周佛海看了影佐的信。周佛海看後，大爲振奮。兩人商量之後，又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認爲，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見，以給蔣介石看爲好。于是，通過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把這兩封信交給了蔣介石。

西義顯的建議使高宗武目瞪口呆

四月十六日的早晨，淺水灣酒店。

西義顯自從送走高宗武和董道寧，心裏總覺得不安，整日裏無法靜下心來，時而走到陽台上，海灣的風光他無心欣賞；時而躺下，翻翻早已過時的報紙，很快又感到厭煩。不知道漢口方面的反應如何，雖然他也明白，作爲蔣介石的使者，高董兩人的意見應該就是國民政府的意見。可是，他總有點擔心，害怕哪一天突然到來的高宗武告訴他，蔣介石拒絕了他們的意見，而且董道寧已經被捕，罪名是未經許可，擅自跑到敵國交涉。

輕輕的敲門聲，隨即閃進來兩個人。

『次郎，四郎，你們都好啊……』驚喜的西義顯快步迎上，看着顯得特別愉快，特別精神的高宗武、董道寧，西義顯知道事情一定很順利，久懸的心立時踏實了。

董將去漢口的經過說了，告訴他，根據董道寧的意見，外交部免去了他的亞洲司第一科科長的職務，以便他今後在上海自由地和日本進行聯絡。

接着，高宗武說，『我有點事，須和西義顯單獨相商。』董道寧一聽知趣地告辭了。

高宗武說：『這次來，是受蔣委員長的派遣，他對我說：再去趟香港，把這個意思告訴日本，我們並不是反對和平，不過先反共然後和平，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戰，我們自然會反共的。對于影佐的信，蔣委員長讀了後非常感動，並要求我向日本當局口頭傳達委員長的意向。』

高宗武傳達了蔣介石的意思：

影佐大佐給何應欽及張群的信，我已看過。向敵將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予敵將，而影佐敢于這樣做，說明其對兩國和平外交具有足夠的誠意。對其誠意及勇氣深表敬意。

我方亦以武士之心情與禮儀，除對此事表示感激外，當絕對不發表，請予放心。

以我自己多年對日交涉的經驗，這次由董道寧和高宗武所携回的報告，使我特別感到日本所具有的誠意。所以，我自己也披瀝誠意，以求了解。我想指出的是：中國與日本作戰之根本意旨，是由于不戰就不能親日，至于勝敗如何，則是另一個問題。如果能諒解我的這種真意，我有以下條款之考慮。

我認爲日本對中國作戰的真正意圖是：

(一)、在對蘇關係上的安全保障。

(二)、對中國經濟發展和依賴的確保。

這兩項意思，原則上予以承認。

第一項更進一步分類如下：

1、東北四省。

2、內蒙。

3、河北、察哈爾。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協商，三則絕對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之領土主權之確立及行政完

整，日本須尊重。

若上述趣旨承你們諒解，則先行停戰，然後以上述條件爲基礎，進入和平細目的交涉。

蔣介石的提案，對西義顯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的餡餅，聽完後，激動地對高宗武說：『我已經完全了解，我一定把你的意思如實的傳達給東京政府。不過，我也有一個要求，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聽？』

『請講吧！』

『如果只憑我所傳達的東西，那麼日本當局，不，日本軍部只能這樣理解：恐怕你們又是要耍什麼手腕進行試探。現在日本軍部，一方面感到了歷史的真實，一方面又喪失了信任對方的能力和力量。我提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與日本參謀總長閑院宮先生見面。』

『啊！』聽到西義顯的提議，高宗武驚訝得目瞪口呆。

『確實，這是一個罕見的事，但你不是一貫主張說要把東亞的歷史來個一八〇度大轉變嗎？要做到這一點，不這樣做不行。』

『你想，通過主將與主將直接談判而結束戰爭，像這樣成功之事不是未曾有過嗎？而且，蔣介石向閑院宮先生請求會面，這不就是敗者向勝者乞降？可是，中國並沒有敗，日本也沒有勝。』

『但是，如果在蔣宮會談上，把你今天的提案作爲軍事上的問題提出來，然後你會看到，確立東亞和平的基礎將馬上完成。』

『但是我認爲讓蔣委員長向閑院宮先生請求會面，這是不可能的事。』

無論西義顯怎樣勸說，高宗武還是沒有答應。

四月二十七日，西義顯由香港回到東京。

在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室，召開了聯席會議，參謀次長多田駿，第二部長豐間雅晴，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出席，影佐與伊藤列席。當西義顯滿腔熱情地報告他與高宗武接洽的經過情況及蔣介石的條件後，得到的卻是一陣難堪的沉默。多田駿，甚至連影佐禎昭也不發一言。

原來，此時東京的形勢已發生變化。三月底四月初，侵華日軍在台兒莊戰斗中被殲滅二萬多人，損失慘重，軍部被激怒，現在正在調兵遣將，準備進攻徐州，氣焰十分囂張。在這種氣氛下，影佐沒敢表態，西義顯只好空手而返，將東京的實情告訴了高宗武，同時，西義顯還帶來一個消息：日本由于看出戰爭有長期化的危險，爲了對付中國的持久抗戰，即將改組內閣，重新制定其對內對外政策。

西義顯要求高宗武親赴東京，向日本當局游說。高宗武考慮到未能征得蔣介石的同意，沒有答應。

五月底，高宗武返回漢口。

這時，日本近衛內閣果然實行改組，與蔣介石、張羣有舊的『溫和派』宇垣一成繼廣田弘毅出任外相。上任前他要求近衛必須實行外交一元化，也不拘泥于『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近衛同意了上任後，宇垣宣稱：只要中國放棄抗日政策，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日本願意考慮和平問題，再次向國民政府表示談判的意向。

宇垣的聲明，使蔣介石大爲振奮。

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羣，立即發電響應，祝賀宇垣出任外相，實現中日友好的夙願，並表示日本若有意重開和平談判之門，可由汪精衛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周佛海更是大受鼓舞：『日本有可能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政策，應該派人去接洽。』于是對高宗武說：『到東京去一趟怎麼樣？』

高宗武躍躍欲試。

但是，蔣介石卻另有想法。

原來，蔣介石害怕高宗武往返次數太多，爲外界知道，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自己被動，同時，他還擔心再派高宗武赴香港可能會被汪精衛所利用。因此，蔣介石準備不讓高宗武去香港，而另派親信去和日本洽談，而讓高宗武在漢口活動。

當陳布雷把蔣介石的打算告訴給高宗武時，正在興頭上的高宗武猶如數九寒天被人澆了盆冷水，十分沮喪，急忙向周佛海求計。

周佛海打着包票說：『委員長那方面由我負責，你應該斷然到東京去，而且只有快走，這件事要是外面知道得多了，你要負責。好事成功，大家高興，萬一不順手，老頭子會爲你負責嗎？』

東京之行，高宗武另找了一條路

六月十四日，匆匆趕到的高宗武與西義顯在香港九龍酒家會面，雙方訂立了保證今後共同行動的《覺書》，其内容如下：

一、鑒于日華兩國內部事情，爲仲介和平，計劃第三勢力之結合。

二、第三勢力，對于互相交戰之日華兩勢力須保持公正妥當之立場。

三、和平實現之絶對條件，爲日本放棄其帝國主義，以兩國平等之原則，相互承認其立場。這種條件爲和平之前提，並使和平仲介能以成交之條件。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確立正確的進步的指導勢力，使此勢力確約上述條件之實現。

四、第三勢力于達成和平仲介之目的時，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統一中國之實現。

六月十七日，松本重治從東京飛抵香港，與高宗武再次會談。兩人一致認爲，和平運動的首要之點在于日本撤兵。

高宗武說：『如果日本方面聲明在一定期間内撤兵，僅僅有這個聲明，和平運動必定能夠成功。』

在松本重治的再三勸說下，高宗武決定背着蔣介石，親自前往東京。

七月五日，高宗武乘坐的『皇后號』輪船抵達横濱。在影佐禎昭的安排下，高宗武被接到東京，住在麻布區住友公館，一座建築典雅的別墅裏。這時陸軍省也已改組，由板垣征四郎任陸

相，東條英機任次官，影佐擔任了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兼任陸軍省軍務局課長。軍務局是陸軍省内最有權勢的一個局，局長中村明人，對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軍務局長，深受板垣信任。

經影佐的引薦，高宗武先後會見了參謀次長多田駿、陸相板垣征四郎、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

高宗武發現，日本對蔣介石既想跟日本謀和，又要依靠歐美等西方大國的兩面政策强烈不滿，因此表示不能同意與蔣介石進行談判。突然，一個念頭在高宗武頭腦中產生：會不會寄希望于汪精衛呢？

他想：日本現在不承認蔣介石政權，爲了造成日中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介石以外的人。而除汪精衛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精衛早已痛感到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内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因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由此造成蔣介石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爲妥當。

于是，高宗武要求近衛首相寫一封信給汪精衛，保證日本願以汪爲和平運動中心，遭到了近衛的拒絕。近衛認爲一國總理如果這樣做，實在太過分，至少爲時還早。但囑咐板垣寫信説明此意，由高宗武送交汪精衛。

七月底，漢口。悶悶不樂的蔣介石在院子裏走過來走過去，空蕩蕩的大院，除了知了煩人的鳴叫外，在炎熱的陽光下，没有其他人。蔣介石正在生氣。

原來日方希望汪精衛出馬讓蔣極爲難堪，而這時孔祥熙也來找蔣介石『論理』來了。作爲中央銀行的總裁，孔祥熙看到軍委會辦公廳請求爲高宗武匯款的文件後，大爲惱怒：高宗武作爲司長被派往國外，我作爲行政院長意然毫不知情，那我這個行政院長還有什麼用？便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蔣介石只得好言相勸，並否認曾派高宗武出國。左勸右勸之後，孔祥熙才悻悻而去。蔣介石盛怒之下，寫手條問軍需署，高宗武月費何人領匯。軍需署據實答覆。蔣介石立即叫來羅君强，責備說：『爲何這樣一件小事，弄得中央銀行人人都知道了。』羅君强雖口裏連連自責，但心裏卻直喊冤屈：作爲行政院長，又是蔣介石的連襟，竟然連高宗武出國交涉這樣重要的事，蔣介石也不讓孔祥熙知道。小小的羅君强怎能知道其中的奧秘呢？就在派高宗武出國不久，孔祥熙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已派人和日本談判。蔣介石當然不想讓孔祥熙知道他背後還留有一手。

蔣介石一氣之下，立即下令停止發給高宗武的活動經費，並命令高立即回漢口。

七月九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從長崎乘船到上海，因咯血，住進了楊浦醫院進行治療，待身體稍好，即飛往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經蔣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蔣介石扣留，不敢回武漢。

第六章　宇垣一成換湯不換藥

張群不失時機地給敵國新外相發去賀電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武漢。

『台兒莊大捷！』

『國軍大勝，日寇大敗！』

報童揚着手中的號外，滿街飛跑。行人爭相購買，喜形于色。抗戰以後，報紙上都是國軍敗退的消息，現在卻有勝利的捷報傳來，每人的精神都爲之一振。

蔣介石也是非常得意。

台兒莊是徐州北面的重要門户，而徐州自古以來就是兵家要地。日軍磯谷師團、板垣師團氣勢洶洶地猛撲台兒莊，但板垣師團在臨沂受挫敗退，磯谷師團孤軍深入，在台兒莊遭守軍拼死抵抗，陷入重圍，幾乎被全殲。

台兒莊大捷，是國軍隊抗戰以來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蔣介石翻閱着戰報，越看越得意。台兒莊一戰，非嫡系的部隊，如西北軍孫連仲、張自忠、

孫桐萱部，雲南的盧漢部，山西的商震部，四川的孫震、鄧錫侯部等，表現出色，台兒莊一戰共擊斃擊傷日軍二萬餘人。

李宗仁評價說：『台兒莊捷報傳出之後，舉國若狂。京、滬淪陷後，籠罩全國的悲觀空氣，至此一掃而光，抗戰前途露出一綫新曙光。』

蔣介石頭腦有些發熱了，說：『没想到雜牌軍還能打如此勝仗，可見敵人也没有什麼了不起。』

他認爲，魯南戰役證明敵人『危殆』，中國軍隊應『爲戰略上適切之協同，促成絶對的勝利，以利全局。』于是他緊急抽調二十萬軍隊馳援徐州，會同原有守軍四十萬，擺出與日軍決一雌雄的架式。

然而，蔣介石實在算不上高明的戰略家，他大肆吹噓的徐州決戰還没開打，就犯下致命的錯誤。他没有乘台兒莊大捷擴大戰果，反而將六十萬大軍擺在徐州周圍作正面防御，此舉正中日軍下懷。日軍正急于捕捉國軍主力，一舉殲滅之，迫使蔣介石早日投降。

徐州六十萬國軍，就像案板上的一塊大肥肉，正等着日軍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大刀猛砍。

五月十九日，國軍全綫崩潰，從徐州向西撤退。數十萬大軍奪路西奔，損失慘重。

面對敗局，蔣介石心驚肉跳，爲阻止日軍追擊，保住鄭州，他慌忙下令，掘開黄河大堤，水淹日軍。六月九日，黄河之水從花園口滾滾東下。日軍雖然措手不及，狼狽後撤，但八十多萬老百姓卻被洪水吞没。

爲逃避罪責，蔣介石聲稱，是日軍飛機炸毀了黃河大堤。

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蔣介石從興奮的頂峰反跌回恐懼的低谷。雖然徐州之戰，主力没被日軍喫掉，日軍速勝速決的迷夢破滅了。但國軍步步敗退，長此以往，如何是好？蔣介石又陷入迷惘。是戰好，還是和好呢？在蔣介石又開始搖擺不定的同時，日軍也終于發現自己喫不下個大胖子。

徐州會戰，興師動衆，只拿下徐州一地，讓國軍主力溜掉了，速勝論的夢做不成了。特别是台兒莊一戰，讓日本全國都大喫一驚，不敢再輕視敵手了。

步兵第十聯隊在戰鬥詳報中記載着這一樣段話：

『研究敵……之作戰精神，其奮勇死戰的氣概不愧受到蔣介石的極大信任。全部守軍憑藉散兵壕頑强抵抗直至最後，敵在狹窄的散兵壕內，屍體相枕力戰而死的情景，雖爲敵人亦須爲此感嘆。曾令翻譯勸其投降，絶無應者，屍山血河，非爲日軍所獨有。不識他人，滿足于自我陶醉，爲國軍計，極應以此爲戒。』

戰爭長期拖下去的迹象越來越明顯，而日本資源貧乏，根本打不起持久戰。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就頒佈《全國總動員法》，企圖傾全力一搏。市場上商品變得更爲稀缺。原棉、棉布脱銷，鐵『稀少得像黃金一樣』，農林省的專家甚至開始研究用老鼠皮製革作爲皮革的代用品。

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無可奈何地發現，憑借日本如此有限的兵力，只能使中國局部流血，卻不能刺破中國的心臟，置中國于死地。

近衛痛苦地承認，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田莞爾的預言，『戰爭要拖下去，並成爲消耗國家資源的無底洞』，即將，不，是已經成爲現實。

近衛無望地認識到，日本一手扶植起來的『臨時』『維新』兩個僞政權的王克敏、梁鴻志之流，不過是一幫毫無民衆基礎的政客，他們『不是舊社會的遺老，就是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政府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們既不能轉移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視綫，也不能號召國民黨軍政人員歸附，靠他們根本不能收拾時局。

近衛更頭痛地承認，中國的團結抗戰的强大潮流已席捲全國，『即使把蔣介石推翻了，這一潮流還將繼續向前』。

近衛後悔了。他後悔自己魯莽地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爲談判對手』的聲明。這個聲明把他逼入進退不得的難堪境地。

有人批評這個聲明爲『非常之失敗』，近衛也自認發表這個聲明『係最大之失敗』。

近衛自然不甘心，到五月初，他還公開强硬地說：『在達成徹底膺懲蔣政權並使之崩潰的目的之前，決不休戰；帝國所決定的方針，即是費時數年也不會變更。』

但，口頭强硬管多少用？

台兒莊？『皇軍』碰得頭破血流。徐州？興師動衆，只拿下個戰略要地。可是，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喫掉中國軍隊的主力，要地方有多大用？

近衛向前硬衝擺脫不了窘境，只好向後尋找出路。

鑒于形勢，近衛得出結論：

『武力不是結束戰爭的有效手段。』

『我們必須做的，是挽救並設法利用蔣』，利用一切機會，採取『寬宏大量的態度，同中國談判一項體面寬大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日，宇垣一成出任外務大臣。他是日本第一個出任外相的非職業外交家。六月十七日，宇垣外相首次在外國記者面前亮相，就暗示中日有議和可能。他說：『大局根本變動時，可以重行考慮日本態度。』還說：『日本和英國有傳統友誼，今後將盡力重建這種關係，以利世界和平。』

他的話很快得到英國響應，英國外務次官巴特勒在下議院發表聲明說：『英國樂于盡力採取任何步驟，單獨或聯合其他各國促使中日衝突停止。』英國駐華大使也在重慶表示願作中間人。

當然，宇垣很快得到外務省內衆人的支持，並獲得外務省中國問題專家石射豬太郎的理論支持。石射豬太郎上了一份《意見書》，宇垣認爲是有見地，欣然採納。

石射豬太郎的《意見書》主張：『應順着中國民族主義的風來揚帆』。辛辣地比喻日本對華經濟政策使中國購買力下降，對華出口急劇下降爲，『像一條章魚把自己的觸角都喫掉了似的』。還把『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比喻爲『摔跤者閃電般地把對手摔出圈外』，和平希望化爲烏有，綁住了自己的手腳。對于有人反對與一個有共產黨聯合在內的政府談判，《意見書》反駁說，『中國共產黨只是被允許參加抗日陣綫而已』，主動權仍在國民黨手中。

六月二十四日，日本五相會議正式決定《處理中國事變的今後方針》：「一、集中國家力量，直接解決中國事變，以在年內達到戰爭目的爲前提，使內外政策都與此相配合；二、不妨根據條件接受第三國的友好調停。」

看來，日本政府是急于儘快「和平」解決戰爭了。

蔣介石獲悉宇垣的和平意向，一面高興，一面又深怕日本和平條件過于苛刻。

在日記中，蔣介石寫道：

「敵國輿論似漸轉向和平之路，然敵國陰謀在「媾和」時更增險惡，不可不慎之又慎。」

左思右想，蔣介石拿不定主意，就把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羣叫了來。

張羣很快來到蔣介石的官邸，見蔣介石正坐沙發上沉思，便輕輕叫了聲：

「委座。」

「噢，」蔣介石滿臉高興，「你來得好快，坐，快坐。」

「委座今天叫我來……」，張羣見蔣介石如此熱情，一時有些慌亂。

「宇垣一成似乎願意和平解決中日戰爭，你認爲日本政府今後會有什麼動向？」蔣介石問。

「宇垣一成我還是比較了解的」，張羣說，「他屬于主和派。他出任外相，確實表明日本政府的政策有了變化，預示着謀求和平的時代的到來，會推動日本向和平方面的傾向發展。」

「你能肯定嗎？」蔣介石又問。

「可以肯定」，張羣說，「另外還有其它迹象證明了這一點。比如，二月二十三日，意大利駐

華大使苛萊和日本非正式駐華大使伊藤在香港拜訪了財政部長宋子文，傳遞日本的議和條件：1、中國承認滿洲國；2、日本在華北駐軍；3、日本在華北有經濟特權；4、上海設立中立區，但日本並不要求租界；5、賠款。宋部長當即拒絕了。從這件事看，日本並沒有把和談大門關死，仍留有縫隙。』

見蔣介石點頭贊同，張羣又進一步建議：『我們是不是趁宇垣新任外相之機，表示一下我國希望與日本重開和談的愿望呢？』

『可以，』蔣介石正中下懷，『如果在日寇未攻到武漢以前成立妥協，再好不過。』

『你可向宇垣電賀，說他出任外相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你再試探一下他是否有意和談，如有此意，可以由你或汪兆銘出面接洽。具體措辭，你自己斟酌吧。』

宇垣一成很快覆電致謝張羣，並問張羣能否赴日本一行。張羣予以肯定的答覆後，宇垣又顧慮張羣的親日態度不利于和談，因此又建議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赴日本面談。孔祥熙也很快響應，雙方商定，先由孔祥熙的秘書喬輔三和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在香港會談。

孔祥熙是態度最積極、路子最多的主和派

孔祥熙本人對這次和談極爲賣力，因爲他歷來主張對日妥協。

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生于一八八〇年，自稱是孔子後裔，家裏經營票號生意。他三歲喪母，隨父親長大。也有人說他小時是個撿煤碴的苦孩子出身。由于他幼時患病被美國教會

醫院治好，父子二人就信了基督教。孔祥熙在通州協和書院（燕京大學前身）畢業後，由教會介紹赴美留學，畢業于美國歐伯林大學。回國後任美國用庚子賠款創辦的銘賢學校校長，並娶宋靄齡爲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靠向美國販賣鐵砂發了大財，從此『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迅速積累起巨額財富。由于他和孫中山是連襟並爲孫中山辦了些事，受到孫中山的信任，算是個顧命大員。又由于他和宋靄齡極爲撮合蔣宋聯姻，爲蔣介石所信賴。

抗戰開始後他當上行政院院長。

由于孔祥熙的利益主要在江浙一帶，因此特別熱心對日妥協。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第二天，國民政府針鋒相對地宣告：『中國政府于任何形式之下，畢竟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爲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在日軍佔領區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潛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可是在同一天，孔祥熙就對記者說：『中國從未欲有戰事，故無論何時，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中國可準備議和。』他還說，對近衛聲明的唯一答覆是增强應戰能力，但只要日本有和平誠意，中國願以友誼態度與之合作。此外，他還在上海派遣私人代表，一面搜集日本情報，一面伺機與日本接洽和談。抗戰中，孔祥熙是態度最積極、路子也最多的主和派。

正因爲孔祥熙一貫的對日妥協態度，宇垣一成才選中他爲接洽對手。

而孔祥熙選擇喬輔三爲自己的代表，就是因爲他是自己的親信部下。喬輔三曾留美八年，回國後代理銘賢學校校長，後又調任中央銀行秘書，直接在孔祥熙手下工作。一九三八年，喬輔三

正好在香港作孔祥熙的代理人。

宇垣一成把蔣介石下野當作談判的籌碼

中村豐一接到宇垣命他與喬輔三會談的電令，他十分爲難，認爲按以往的政策，沒辦法談，而新的政策又不明確。他只好迅速乘飛機回國請示。

一見到宇垣，中村便大發牢騷：『「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不變，我沒有辦法去開始談判。』

宇垣對中村的情緒並不在意，他很溫和地告訴中村：『日本最後是要放棄「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旗號的，可是現在我們不能那樣作。還不到時候。還有，我這裏有份石射豬太郎的《意見書》，你可以看看。另外，他這《意見書》還建議取消「蔣介石下野爲條件」，認爲不如此和談，一開始就不會有希望了。』

『確實是這樣，』中村十分贊同地說。

『對此我已考慮過，』宇垣解釋說，『日本最後的態度是不以蔣介石下野爲條件，但鑒于日本國內的反蔣情緒，不宜在一開始就露出底牌。你可循這樣的思路去同喬周旋：日本國內反蔣情緒相當强烈，是否以蔣下野爲條件，目前不遽爲決定，留待日後解決；至于其他各點，你去和喬談。』

『還有，』宇垣又補充道，『要把蔣下台和賠款、承認滿洲國聯繫起來，以便創造更好的氛

圍。』

『我明白了。』中村這才知道了宇垣的意圖，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蔣介石下台等，不過是虛晃一槍，最後一讓步，賠款、滿洲等問題就好解決了。

『喬輔三轉達孔祥熙的意見，要求明確日本的條件。』中村又提出新的問題。

『儘管政府改組了，新內閣和外交大臣是一致的；雖然接替了廣田，日本對外政策仍然沒有實質性變化。』宇垣說。

中村心裏清楚了宇垣的想法。『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仍然是首要條件，具體的還有中國承認滿洲國，中日在華北與內蒙古共同防共，中日滿經濟文化合作，日本駐兵于若干地區，中國聘請日本顧問，中國賠償日本人的損失。過去的條件沒有變，只要蔣介石承認這些，所謂對手問題自然不會存在了。但是，蔣介石怎麼看要他下野的前提條件呢？見到這個條件他還會談下去嗎？從宇垣外相那裏告辭出來，中村豐一還是滿腹疑慮。

外相的策略是不錯，可是下野問題應該是蔣介石最忌諱的問題，會不會一開始就成爲談判不可逾越的障礙，使談判無法深入呢？

中村豐一就這樣帶着疑問回到香港。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喬輔三與中村豐一首次會談。

『領事先生』，喬輔三迫不及待地問，『貴國宇垣外相對外國記者談話中表示：當中國方面發生根本變化時，日本打算和談。請問所謂根本變化指的是什麼？』

『先不要這樣着急』，中村狡猾地岔開話題，『日本政府希望和平是肯定的。可是中國對和談是什麼態度呢？』

喬輔三見狀，只好回答：『今年四月佐藤少將來訪時，完全看不到講和的希望。隨着時間推移，中國的負責人在考慮，這場戰爭究竟爲什麼爆發？應該繼續到什麼時候？目前，雖然有一部分激進論者反對和平，但這也是可以依蔣介石委員長的意志來決定的。』

『請問，』中村緊盯着問，『雖然以孔院長爲首的負責人希望和平，但中國方面從國內外看，對講和有没有阻礙呢？』

『阻礙不大。』喬輔三答道，『以蘇聯和其他國家當前與中國關係看來，和談是没有阻礙的。同時在內政上，就李宗仁和白崇禧同共產黨的關係問題看來，雖然没經漢口大致確定，我現在難以明確回答，但李、白二人在中央的地位並不怎麼重要，可作爲另一問題處理。只有共產黨是真正障礙。』

見中村在認真聽，喬輔三接着說下去：『孔院長和汪精衛、何應欽等人對日本都非常友好，並且和各黨派親近，有影響力，他們都是和平主義者。蔣委員長本身，內心是希望和平的，這不必說，但處在他的位置上不便說出口。宋子文雖然反對和談，但他還是以蔣委員長意見爲轉移的。同時，我們也都應該看到，戰爭拖長了，日華兩國都有可能受到與遠東有關各國的利用。因此，和談不要有第三國參加，希望只在兩國之間秘密進行。』

『我同意你的觀點。』中村說。

『還有』，喬輔三又一次詢問，『日本是否還要蔣委員長辭職爲前提呢？』

『蔣的辭職，無論怎麼說，也是絶對必要的。』中村口氣很硬。

見中村如此回答，喬輔三不好再說什麼，就又說：『孔院長指示我，請貴國先拿出和平方案。』

中村依然傲慢地說：『和平條件大綱，去年年底已由德國方面提出，諒你們有所知曉。我們認爲，國民政府方面理應明確自己的和談條件。如果要和平，首先國民政府方面理應表示真正反省的誠意，講價錢這時是毫無用處的。』

『……』，見中村說話如此傲慢無禮，旁若無人，喬輔三張了張嘴，還是忍住了。

中村接着說：『大家須開誠佈公，關于蔣介石下野問題，據東亞局長報告，是否叫蔣介石下野爲和談前提條件，東亞局長不便說作任何變更，但日本政府内某部分人把它認作絶對條件，主張强硬意見，民間的輿論也是一樣。』

『請容我請示。希望我們雙方都懷着誠意進行和談。』喬輔三說。

談到此處，第一次會談結束。

幾天後，六月二十八日，喬輔三根據孔祥熙的訓令拜訪中村豐一，表示和談的誠意，並對中村耳語道：『這件事當然不是經過與蔣委員長商議過的，希望把孔院長希望有條件和談的誠意，充分轉達宇垣大臣。』

七月一日，喬輔三奉命第二次拜訪中村，表示孔祥熙等人衷心希望和平，並特別希望馬上終

止戰爭行動，最好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解決，並說：『幸好直接折衷之門敞開，希望日本政府迅速答覆。』

七月十三日，喬輔三第三次拜訪中豐村一。

喬輔三告訴中村：『我已經把過去會談的情況作了書面匯報。昨接孔院長電話通告，說漢口方面誠意希望和平。只是日本政府果真有和平誠意嗎？通過幾次接觸，確信日本政府有此誠意的話，我可以飛回漢口覆詳情。』

等中村說了一翻稱贊孔祥熙的話後，喬輔三又說：『在這次會談期間，沒有經過總領事先生，中國已通過意大利代辦，由汪精衛向日本提出大致六項條件，因此，孔院長提出條件時已經注意到這些經過。這不是討價還價的態度，而是開誠佈公的。另外，順便說一句，國民政府並沒有承認您提出的條件，具體答覆要到我從漢口回來時再奉告。』

日本人的條件如此苛刻，孔祥熙還是要談

七月十八日，喬輔三又回到香港，當夜即與中村豐一展開會談。

喬輔三面對傲慢的中村豐一，面對日本的和談苛刻條件，即使不想談也無法，因爲孔祥熙要他談。

『首先，』喬輔三說，『我先談談孔院長的意向。』

『第一，孔院長對中日兩國目前的情況感到非常遺憾。日本只想用武力來解決中國，中國軍

隊卻不容易屈服，同時中國人民的怨恨也在日益加深。目前的局勢發展下去，中日兩國必然兩敗俱傷。在中日兩國交兵期間，英、美、法、俄各國，日益擴充軍備，日本即使推倒中國，但由于自身疲憊的結果，中日兩國必然同歸覆滅，因此，必須早日轉向日華共存共榮的路綫。』

中村點點頭，插嘴說：『關于日華共存共榮論，彼此同感。』

『第二，』喬輔三接着說，『即使維護臨時、維新兩個政府，然而這兩個政府都沒有真正的民衆支持，只能是受日本的援助，維持佔領地區局部治安而已。這兩個政府的實力如何，日本了解的最深。如果將來日本與其他國家有事之秋，它們反而是日本的累贅。』

『第三，過去因種種緣故，總有日本人與國民政府接觸，但會談不是連續的，結果有始無終。這將開始與日本政府負責人之一的中村總領事會談，並依其指引直接提出解決時局的條件，不勝欣喜。但是仔細研究過去日本首相、外相、陸相等的聲明，即使充分了解了日本外交當局的遠大立場，如果受到軍部的破壞，所有的企圖恐怕終成泡影，歷史的覆轍是值得憂慮的。』

『第四，希望在漢口淪陷之前迅速完成和談，如果漢口失陷的話，講和就很困難了。』

『第五，停戰是最理想的，希望兩軍在協定成立時就地停戰。』

『第六，蔣委員長自西安事變後，事實上是國家元首，集全國衆望于一身，日本要他辭職是非常困難的。既然日本政府也有一定方針，形勢到此，本來行政院長是孔先生，因而孔院長表示可負全責，引咎辭職。不知這樣可否緩和日本人的情緒？』

中村豐一見喬輔三說完，便開口說：『今天的改造內閣，沒有軍部、外務省的區別，完全是

全國一致的內閣，因而没有必要顧忌軍部干擾。過去雖説有許多日華接觸，但是没有成功，這都是你們的錯誤。總之，孔院長的具體建議，我將轉達日本政府。然而，若蔣介石不辭職就是難説話的。」

停了片刻，中村又加重語氣説：『如果要按日本的條件談和，蔣氏對中國人民負有責任，就是不等待日本的要求，他也應當辭職。這一點如果按日本的責任感看來，不難理解。』

沉默了半晌，喬輔三面露難色。他知道日本要以蔣介石下台爲前提，不過是種手段而已。

中村看着喬輔三的模樣，心裏也很困惑。他自己也認爲不應以蔣介石下台爲前提條件，宇垣外相也不過是拿這一條籌碼，可是七月八日的五相會議已經決定：蔣介石辭職是日本『接受中國當時中央政府的投降的先決條件』。這個決定是不能更改的呀。

喬輔三終于開口了：『孔院長曾對我説：「蔣主席本持自願下野態度，但果真如此，將由誰同日本簽定條約呢？又有何人具有履行條約的能力呢？目前，我本人身爲行政院院長，列爲蔣之次席，但我實無壓服國人與日本簽定條約並使其正確履行的能力，此事須由蔣主席執行。」』

中村對這個問題不想再説什麼，就保持沉默。喬輔三又説：『我這次回漢口。于十五日向孔院長作了報告，第二天，孔院長即發表上述那明確的意見。我在漢口逗留期間，孔院長曾和蔣委員長見面，除蔣委員長下野問題外，其他全部都和蔣委員長商酌過的。這裏是孔院長親筆起草的和平條件，請總領事先生過目，並提出意見。』

説完，喬輔三從文件包中取出一張紙，推到中村豐一面前。中村拿了過來，只見上面寫着：

（1）中國政府積極實現對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爲。希望日本也要爲遠東永久和平積極爲日華關係好轉而努力；
（2）滿洲國以簽訂日滿華三國條約而間接承認。其次深切希望滿洲國自發地成爲滿洲自由國，給中國人民以好感；
（3）承認內蒙的自治；
（4）決定華北的特殊地帶非常困難，但是中國承認互惠平等的經濟開發；
（5）非武裝地帶問題，有待日本的具體要求提出後解決，中國軍隊不駐防，希望由保安隊維持治安；
（6）雖然還未充分討論，但清算與共產黨的關係，或簽定加入防共協定的特別協定等，必須再加研究；
（7）中國現在非常荒蕪而且貧困，因而對中國政府來說，雖有賠償之意，亦無力支付。

中村豐一看完孔祥熙開列的條件，說：『除蔣的辭職是重要的先決條件外，對日本來說，當然還有其他要求。但對孔草案是要加以批評的。對滿洲國，是既成事實，還有，華北成爲特殊地帶，是日本的當然要求。』

喬輔三說：『中國人民一貫把長城以外看成「未開化」地區，因此，中國願意默認滿洲國的存在，也同意日本在內蒙駐軍並建立一個特殊地帶。但是不能同意長城以內的地區也歸日本佔領。如果日本在華北無限期的駐軍，中國人民就會確信並堅持日本最後企圖吞併整個中國的看

法。』

中村這時終于把宇垣的侵略者本性暴露出來，他說：「宇垣外相告訴我：「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本人和段琪瑞政府簽訂的協定的繼續。」」

喬輔三還是堅持：『劃定華北的特殊地域，以中國方面看來，首先容易引起領土分離的誤解；有困難，但希望不限于華北，而在全中國協力進行經濟開發。』

中村這時更爲傲慢，他說：『如果只是說在中國平等互惠，則是把日本的地位與各國同一對待，日本到底是不能滿足的。』

中村咽了口唾沫，接着說：『過去華北已經形成特殊地位，而且日本已進行純粹的經濟提攜，由于國民政府對此過分干涉，以至釀成這次日華事變。因此，必須意料到將來，不再發生這種情況，而適應日本的任何要求。況且今天華中方面，既設立了我方的經濟公司，有鑒于此，從日本方面看，如果列舉特定事項，是不是在全中國都加以承認的意思？』

喬輔三說：『我没有聽到孔院長詳細談過。』中村豐一對此不加理會，又問：『關于非武裝地帶問題，你有什麽具體建議？』

喬輔三回答說：『日本方面想劃定的地方和範圍大小都不明確，無法馬上承認，以過去上海地區的實例看，是有許多實際困難的。再有，在劃定這種地帶時，希望日本方面不駐兵。』

中村說：『那我們先保留這個問題。防共是日本方面最重視的，中國政府將怎樣對待共産黨？』

喬輔三說：『國共兩黨是注定要分裂的，因而即使不從國民黨方面放手，共產黨方面也會自動離開。』

中村說：『中國還必須向日本賠償損失。』

喬輔三說：『我再一次要說明，中國方面並沒有賠償能力。』

中村的態度蠻橫起來：『中國今天的情況，要以現金賠償確是有困難的。但是，在我方看來，中國方面把保管的日人財產破壞或沉沒水中，要求賠償是理所當然的。至于付款日期和條件等可以另行商談，但是在原則上必須予以承認。』

喬輔三心想，日軍燒殺搶掠，給中國造成多大損失？特別是南京大屠殺，我們還沒叫日本賠償呢。但是，戰場上日軍佔有優勢。國軍一再失利，打不過小日本，又有什麼辦法呢？于是喬輔三用沉默來對待中村的蠻橫。

孔祥熙說他要辭職以謝天下，宇垣一成則憤而辭職，閉門不出

七月十九日，喬輔三和中村豐一再次會談，不可避免地，又碰上蔣介石下野的問題。

喬輔三再三向中村解釋，由于中國內部情況複雜，蔣介石下野是不可能的。

中村根據宇垣的指示，詭詐地說：『如果你們一再要求日本人適當考慮中國國內問題，那麼人們也應該意識到蔣介石同樣給日本政府造成了國內問題。日本人把蔣介石看作敵人，並且說過不同他打交道。但是日本人對中國人民並不抱有惡意。可是鑒于蔣領導中國，造成了當前的局

勢，因而大多數日本人都憎恨他。宇垣外相曾說，中國想在滿洲國和賠款問題上得到讓步，就應很好地處理蔣的問題，同意他下台，以緩和日本人的情緒。』

喬輔三說：『孔祥熙院長已經表示，他可以辭職來緩和日本人的情緒。』中村裝作推心置腹地說：『其實蔣下台對你們中國比對日本更有利，因爲這樣能創造一個好的和談氣氛。』

見喬輔三似有鬆動，中村又用威脅的口吻問：『假如一切條件都談妥了，剩下的只是蔣的辭職問題，萬一因此而引起和平交涉破裂時，蔣還要堅持保存現在的地位嗎？』

喬輔三回答說：『情況若是這樣，蔣委員長下野當然没有問題』。中村見硬的收了效，趁勢緊逼，他質問：『還有，維新政府、臨時政府與國民政府合併組織新政府，就存在那麼大困難嗎？』

喬輔三說：『該兩政府現在已經負責地方治安，本來同是中國人，因而合併還是比較容易的。』

喬又說：『我以上說的兩點，都不能作爲孔院長的負責意見，而是我自己的個人看法。』

喬輔三和中村豐一的談判一直接續到九月份。雖然日本條件苛刻，但蔣介石急于求和，因此和談得以繼續。八月底，日本甚至開始準備用軍艦護送孔祥熙到長崎與宇垣一成直接談判。但終于因雙方在蔣介石下野問題上寸步不讓，孔祥熙于九月一日通告喬結束談判。宇垣一成這時也是後院起火，無心和談了。

進入八月底，日本軍部反對宇垣外交之風愈颳愈烈。連最初支持宇垣的陸相板垣征四郎也一改初衷，不斷發表談話，重提『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老調。

爲對抗宇垣的外交，日軍積極發動進攻武漢的戰役，並積極拉攏唐紹儀、吳佩孚、汪精衛等人，並極力設置『對支院』，統一處理有關中國的問題，以此剝奪宇垣一成的外務省對中國的外交職權。

八月底，宇垣在內閣會議上詳細報告中日之間的接觸經過，並提出賦予和平交涉全權的要求。陸軍人士立即羣起而攻之，並多方活動，拉宇垣下台。

近衛首相迫于軍部的壓力，只好同意設『對支院』。

宇垣一成見到此景，勃然大怒，闖入近衛的辦公室，當面質問近衛：『我入閣時向首相提出的四個要求，首相現在都忘了嗎？首相竟然同意了軍部那些目光短淺的愚人的主張，難道首相不知道，這次同孔祥熙的和談在軍部破壞下破裂，使帝國失去了千載一時的好時機嗎？現在我繼續留在內閣已經毫無意義，我要求辭職。』

說完，宇垣一成把辭職書往近衛面前一摔，斜眼看了看目瞪口呆的近衛文麿一眼，轉身走出門去，連善後事宜都没和近衛交待。

從此，宇垣一成閉門不出。

誘降、迫降，日本人彷佛是在辦動物園

爲了和宇垣一成對抗，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制定了一套『謀略計劃』，希望以此『導致蔣政權倒台和蔣的下野，以資早日解決事變』。

這套多方籠絡、瓦解、爭取的計劃，各工作都冠以動物名稱作代號，五光十色，有如一個動物園；具體如下：

起用唐紹儀、吳佩孚等『第一流人物』爲鳥工作，加强臨時、維新兩政權及其與蔣政權合併爲鳩工作，在蔣政權内及民衆間掀起反蔣運動爲鷹工作，離間蔣政權將領及政客爲鷲工作，釀成蔣政權内部的和平空氣爲鷺工作，釀成建立西南政權的趨勢爲鳶工作。

使蔣政權内『雜牌號』瓦解歸順爲獸工作，其中包括宋哲元軍（狐工作），舊韓復榘軍（栗鼠工作），舊東北軍（狗工作），閻錫山軍（狸工作），石友三軍（貓工作），劉建緒軍（鹿工作），徐源泉軍（牛工作），其他請求歸順的軍隊和武裝團體（兔工作）。

如此多方致力，可見其用心狠毒。

其中日軍最重視的是起用『第一流人物』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等人的工作，他們認爲這些人尚有餘威和遺留影響，而且權慾重，民族觀念淡漠，容易利用。

可惜這三個人日軍一個也没拉到手。

唐紹儀，雖然積極合作，並派了女兒到武漢公開向蔣介石等要人游説主和，但他想勸蔣介石

退位，惹惱了蔣介石，被扮作古董商的特務在六國飯店用利斧砍死。宇垣一成對此評價爲『巨星墜地』。蔣介石爲了掩飾，還發訃告，嘉獎唐紹儀的一生，撥巨款厚葬。

靳雲鵬更乾脆，最後竟告訴日本人自己『禮佛有年，無心向世』。

吳佩孚，秀才將軍，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餘威，但領袖慾極强，不想受日本人擺布。他曾說：『你想拉我上賊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的把戲，哪樣瞞得過我？』並講：『不把政權交出來，我是不會出來的！我吳某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由你們擺弄！』還提出要成立三十萬人的軍隊由自己指揮，日軍撤出，才能就職。氣得土肥原發誓：『把這家伙幹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吳佩孚患牙病，請日本醫生診治開刀，結果剛一開刀就死了。

到此，『第一流人物』就一個不剩了。

第七章

唱低調的汪精衛

高調對低調，蔣汪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重慶，上清寺汪精衛公館。

汪精衛正襟危坐，侃侃而談。他對面的路透社記者則筆走龍蛇，飛快地記錄。

『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爲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

他的這篇談話，立即掀起喧然大波。共產黨姑且不論，以陳誠爲首的抗戰强硬派也向汪精衛發起猛烈攻擊。當然，他也有自己的支持者，陳立夫、陳果夫等CC系，張公權、郭心崧、程天放等政學系和王陵基、潘文華、鄧錫侯等軍人都表示贊同或支持。因此汪精衛的言辭還是有些市場的。

汪精衛名兆銘，一八八五年生于廣東。他二十歲時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專科，二十二歲參加同盟會，任書記長。一九一〇年，他秘密潛入北京，企圖炸死攝政王淳親王載灃，事泄被捕。年輕的汪精衛當時還頗有些慷慨赴義、不計個人生死的氣度。被捕後曾作詩『慷慨過燕地，從容

作楚囚」。辛亥革命成功，他出獄回到上海，與陳璧君結婚。爾後，他成爲孫中山的左膀右臂，非常活躍，並在孫中山病榻前起草《孫中山遺囑》，可謂顯赫一時。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與手握軍權的蔣介石爭權奪利，『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汪再次合作，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奉行對日妥協政策，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上，他因蔣介石缺席而代受刺客的槍彈，不得不再次出國。『盧溝橋事變』後，他東山再起，任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要職。

早在抗戰前，汪精衛就奉行媚日政策，表示『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式和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之間一切糾紛』，實現『中日攜手』。抗戰爆發後，他更到處散佈抗戰必敗的論調。他稱主張抗日的人是『唱高調』。他的親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等經常在南京西流灣八號周佛海家聚會，鼓吹『戰必大敗，和不致陷于大亂』，故人稱『低調俱樂部』。汪精衛則是『低調俱樂部』的首腦。

汪精衛也始終沒有放棄同蔣介石的權位爭奪。

現在，汪精衛又開始發起對蔣介石新的一輪衝擊。

他慷慨陳辭，放出一顆顆炸彈。

『由于對焦土抗戰的誤解，致名城長沙遭受到人爲的大火災，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抗戰唯恃民心，縱有物資也不能隨意使用。』

『繁華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壞，拱手讓給敵人，只要民心尚在我方，在淪陷後仍可以用一切

物資去破壞敵人，使之有助于我們收復失地。」

『如果，像長沙那樣化爲焦土，就萬事休矣！如果，燒掉戰區內的一切物資，我們又將以何處的物資去抗戰呢？』

汪精衛還反對游擊戰，責難軍隊在各地游蕩，耗盡民力，是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所在。他還別有用心地散佈謠言，並說堅持抗戰是大家陪蔣介石一個人跳火坑。

恰值其時，漢口陷落。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修改了一月十六日的第一次近衛聲明，變『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爲『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絶』，要求國民黨放棄抗日容共政策，更換人事組織，還是堅持要蔣介石下台。

對此汪精衛躍躍欲試。

對此，蔣介石絶不讓步。

在十一月十三日的重慶國民黨紀念周集會上，蔣介石公開演說：『中國抗戰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條戰綫上的中國軍隊，已退到山區，能阻止日軍的進攻，形勢更對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戰已使全國統一，國民團結，任何强大的敵人都無足畏懼。』

這就是蔣介石對近衛聲明的答覆，也是對汪精衛進攻的回擊。

汪精衛聽到這番話，勃然大怒。十六日，他與蔣介石一起喫飯，以退爲進，當面向蔣介石提出：

『使國家民族瀕于滅亡，國民黨責無旁貸，我等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罪于天下。』

蔣介石自然不甘示弱，立即反駁：『我等若是辭職，究竟誰來負政治上的責任？』兩人爭論得面紅耳赤，蔣介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汪精衛晾在一邊。

『今後兄爲其易，而弟爲其難。』汪精衛說

汪精衛自覺以自己的力量難以戰勝蔣介石，下定決心，另出奇兵。他打算出走，借日本人的力量打敗蔣介石。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重慶珊瑚壩機場。没有日機來襲的迹象，機場上人來人往，一片忙碌。

上午九時許，陳璧君、曾仲鳴、何文杰、陳常燾來到機場，最後落實飛機起飛事宜。一切都已準備完畢，只等汪精衛于飛機起飛前幾分鐘趕到。

也許是個巧合。空軍司令周至柔也來到機場，要搭機飛滇。這着實讓陳璧君緊張了一陣，趕緊示意曾仲鳴上前周旋，含糊其辭地說是陳璧君有事去雲南。周至柔絲毫没想到汪精衛要出逃，讓陳璧君稍稍鬆了口氣。

時間一分分逼近起飛時刻，汪精衛仍然踪迹杳然。陳璧君焦躁地看着表，心跳個不停。如果汪精衛不能準時起飛，一切就都完了。她把曾仲鳴叫到一旁，低聲耳語：

『如果汪先生遲到，你就向機場說明，汪先生要搭機飛雲南，命令飛機延緩起飛。』

陳璧君確實是汪精衛的得力助手，陳公博曾說：『汪精衛無陳璧君不足以成事。』只是他還

補充道：『無陳璧君不足以敗事。』

陳璧君明白，現在已經是箭上弦，刀出鞘，不得不發了。周佛海等人已經分別離開重慶，到了昆明、香港、越南等地；自己已經同雲南王龍雲接洽完迎接汪精衛，並取得龍雲對汪出逃的默契；今天，蔣介石正在重慶向全體中央委員訓話，汪精衛決定趁此時機離開重慶，清晨已經向家中傭人說明自己的最後決定，秘書、傭人們已經匆匆收拾行李，分乘四輛汽車順公路先行出發了；最後最重要的是，汪精衛已給蔣留下封信，說『今後兄爲其易，而弟爲其難。』現在走不成怎麼行呢？

陳璧君焦急地眺望遠處。終于，從珊瑚壩上，一輛汽車疾駛而來，不久，汪精衛偕衛士桂連軒緩緩拾級而下，來到機場。陳璧君這才鬆了口氣，趕緊迎上去。周至柔照例上前謁見，陳璧君才透了點風，『汪先生是去昆明講演。』

飛機預定起飛時間到了，但因爲油還没加滿，仍遲遲不能起飛。汪精衛爲掩蓋自己的緊張心情，强作從容，在機場上散步，環繞機場走了兩圈，飛機才準備好起飛。

汪精衛來機艙門口，剛要抬腿上飛機，機場負責監視的保密人員恭恭敬敬地走了過來。當時，中樞要人若想離開重慶，如非因公，必須先獲得最高當局的批准。保密人員職責所在，只得硬着頭皮上前攔阻。

汪精衛一瞪眼，厲聲斥問：『我身爲國民黨副總裁，連行動的自由都没有嗎？』保密人員只得諾諾而退，而汪精衛則頭也不回地登上飛機，命令起飛。

飛機昂起，直衝入藍天，向昆明飛去。汪精衛這才舒了口氣，仰身倒在座椅靠背上。猛然間，他又嚇了一驚：周至柔走進駕駛室，許久沒有出來。

陳璧君也心驚肉跳。她怕蔣介石故意讓汪精衛上飛機，再命周至柔把飛機駕回重慶，然後治汪精衛的罪。怎麽辦？毫無辦法。她只能暗暗叫衛士桂連軒戒備。

正當汪精衛一伙人忐忑不安之際，周至柔從駕駛室出來了。原來，他是想在副總裁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飛行本領，去親自駕駛飛機了。現他已過足了駕駛的癮，走回自己的座位，還向汪精衛致意。這時的汪精衛驚魂初定，那裏還有心情理會周至柔。

飛機當天下午一點到達昆明機場。機場上龍雲正率領僚屬及樂隊恭候汪精衛，歡迎場面非常熱鬧。汪精衛只得勉强敷衍一下，便驅車直奔龍雲的官邸，同龍雲上樓密談。一直談到深夜。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麽。

第二天下午，汪精衛給蔣介石發了份電報，說自己因『飛行過高，身體不適，且脈搏有間歇現象，決定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云云。然後，他便登上向歐亞航空公司包租的飛機，從昆明起飛，傍晚飛抵河內，住在高朗街二十七號。

聽說汪精衛已離開重慶，到達河內，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欣喜異常，立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開篇便說：

『日本政府……決定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進而，近衛又開列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個條件，即近衛三原則。他具體地把三原則闡述如下：

『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國進而同滿洲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關係。』

『鑒于中國現實情況，爲充分達到防共的目的起見，要求在承認在防共協定繼續有效期間，在特定地點駐紮日軍進行防共，並以內蒙地方爲特殊防共地區。』

『要求在日、華平等原則基礎上，中國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的自由……特別在華北和內蒙地區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積極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這三條近衛原則，實際上就是滅亡中國的條件，只不過說得好聽些罷了。但汪精衛已然利欲熏心，認爲近衛所說的『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就是自己，爲了同蔣介石一爭高下，他置國家民族的命運而不顧，立即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致電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響應近衛聲明，這就是『艷電』。

汪精衛在『艷電』中說，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要求國民黨『即以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艷電』一發，徹底暴露了汪精衛的賣國嘴臉，汪精衛真正走上賣國求榮的可耻道路。

河內刺汪案，捅了大漏子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重慶草堂，蔣介石官邸。

蔣介石煩躁地在房間來回踱步。

汪精衛出逃，令他十分震怒。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于不顧，是豈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覺回頭耳！』雖然蔣介石不排除同日本妥協，但爲確保自己的地位，他顧慮重重。共產黨，還有國民黨內一些有名望的人主張堅決抗戰，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又太苛刻，蔣介石不敢明目張膽地同日本人妥協，他在靜候時機。可是現在，汪精衛跑到河內發表『艷電』，搶先同日本人接洽，該如何處理呢？

其實蔣介石內心並不痛恨汪精衛出逃投敵。

如果他要阻止汪精衛，在汪精衛飛昆明並逗留在昆明的一天多時間裏，只要下一紙命令，汪精衛就怎麼也到不了河內。

汪精衛叛國投敵，立即激起全國的憤怒聲討，各政黨、團體、軍隊等紛紛發出通電，各地民衆紛紛舉行討汪大會，聲討汪精衛，要求給予嚴厲制裁。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蔣介石勉强同意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但没有同意下通緝令，也没有公開責罵汪精衛。他還派谷正鼎到河內，勸汪精衛回重慶。汪精衛不答應，他又派谷正鼎攜去錢款和外交護照，勸說汪精衛出國遠游。可是汪精衛卻執迷不悟，又予以拒絕。

蔣介石才決定要除掉汪精衛。

他命令戴笠儘快進行活動。剛才戴笠來電話，說要匯報刺殺汪精衛的情況。蔣介石正焦急地

等待。

『校長』。不知什麼時候，戴笠已畢恭畢敬地站在蔣介石的面前。

『坐，快坐。』蔣介石指了指沙發。

『是，』戴笠趕緊欠身坐在沙發邊上，也不敢看一眼蔣介石，開始匯報。

『校長交待任務後，我把原任軍統局臨澧特訓班副主任余樂醒召到重慶，和他具體商定了行刺辦法，又在特務總隊中挑選了武術和槍法最好的唐英杰、陳邦因、陳步雲等六人，由余樂醒帶隊前往河內。余樂醒曾經留法勤工儉學，能說流利的法語，對河內又熟悉，到河內後在汪兆銘的住所附近找到房子。並且，他通過仔細觀察，已經掌握到高朗街二十七號汪住宅的內部結構及汪兆銘等人的活動規律。因爲法國人派有大批越南軍警保護汪兆銘，遲遲不能下手。』

『是麼？』蔣介石有些不悅。

『我心中也是十分着急，』戴笠見狀更加緊張，『我怕汪兆銘到南京後更難找到機會，一再電令余樂醒早日動手，最後決定越牆而入。』

『嗯。』蔣介石哼了一聲。

『余樂醒他們于昨天半夜越牆進入高朗街二十七號，找到汪兆銘的房間，本想破門而入，結果門打不開，只得在門上劈了個洞，用手電照着開槍射擊，打死一男，打死一女。

『這麼說汪兆銘已經歸天了？』蔣介石高興了。

『不，』戴笠張口結舌，『不……不是的。誰也沒料到曾仲鳴的老婆昨天晚上到了河內，汪兆

銘臨時把自己的大房間讓給曾仲鳴夫婦，自己搬到另一個小房間去了。余樂醒他們不防有變，黑暗中曾仲鳴又鑽到床底下，只露出半截身子，就把他當成汪兆銘了。曾仲鳴作了汪兆銘的替死鬼。』

『什麼?』蔣介石似乎並不十分驚訝，『後來呢?』

『槍聲驚動了保衛的軍警，』戴笠頓了頓，看了眼蔣介石没發火，又説，『結果只有余樂醒、唐英杰逃了出來，其餘的人都被抓住了。』

『混蛋!』蔣介石再也按耐不住，破口罵，『廢物!你們都是廢物!』

高朗街的深夜槍聲令汪精衛又驚又怒。

汪精衛匆忙把曾仲鳴送到醫院。望着曾仲鳴那被子彈打得馬蜂窩様的身體，他心如刀絞。

曾仲鳴是汪精衛的心腹親信，他的姐姐曾三姑——曾醒，是同盟會的老會員，與汪氏夫婦感情甚篤，而曾仲鳴的妻子方君璧又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的胞妹，因此汪精衛一直把曾仲鳴當作自己的兒子般看待。曾仲鳴很早就留學法國，就讀于里昂大學，但中文卻是汪精衛親授。曾仲鳴學成之後，始終追隨汪精衛左右，能模仿汪精衛的字到幾可完全亂真的程度。『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回國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行政院長，曾仲鳴則任中政會副秘書長、鐵道部次長及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事無大小，汪精衛都放心地委派曾仲鳴辦理。望着奄奄一息的曾仲鳴，汪精衛怎能不淚如雨下。

曾仲鳴彌留之際，喘息着説：『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麼不放心的。我能替

代汪先生死，我至欣慰。』又掙扎着派人到寓所取來支票簿，把五萬元存在銀行的旅費交給汪精衞。

這一切更刺激了汪精衞。

汪精衞本來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自從中央黨部遇刺中槍後，尚有一顆遺留體內，更容易動肝火。曾仲鳴一死，使汪精衞悲憤、惱怒至極，如同惡魔附體。

本來汪精衞對叛國投敵尚有一層顧慮。他也知道漢奸賣國賊爲國人唾棄、遺臭萬年，因此他並不敢立即直接投入日本人的懷抱。

他曾對受蔣介石之命，攜帶現金、護照前來游說的谷正鼎說：『以前我因蔣的兇、殘、暴、虐、自私，我反對他，他用盡各種方式來危害我，槍傷我，下流到綁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逼迫出國，我亡命海外，船經新加坡，他致電該地政府，以共產黨名義引渡我回國，說我勾引賀龍、葉挺、張發奎等禍粵。……沿途尚設許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嘗要過他甚麼護照，他現在要我拿了他的護照，憑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孫總理在英京公使館的被誘人、釘箱，送回給他安排。……他（指蔣）如把黨國搞得好，我便終身不回國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還是要回來。』

汪精衞拒絕蔣介石的護照，是想防蔣介石一手。谷正鼎走後，他曾對曾仲鳴說：『我們今日以後，要小心點，他要消滅我們三個人了。』

汪精衞本來曾打算，一旦『艷電』在國內起不到預期作用，就帶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

曾仲鳴流亡法國。

曾仲鳴被刺慘死，汪精衛最後一點理智也喪失了。個人恩怨完全迷住了他的心竅。爲了回擊蔣介石，爲了揭露蔣介石也同自己一樣主和，汪精衛于刺殺事件後第六天，即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舉一個例》。

他首先說：『他（曾仲鳴）臨死的時候，因爲對于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爲放心。我一息尚存，爲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爲着安慰我念念不忘的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

寥寥數語，悲傷、惱怒的心情溢于言表，堅決當漢奸的決心也躍然紙上。

他進而又揭露蔣介石：『我因發表艷電，被目爲主和，主和是我對于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且舉一個例罷。』接着他就公佈了隨身攜帶的有關陶德曼調停的秘密文件，把蔣介石對戰與和的態度公諸天下。

最後，汪精衛還爲自己百般辯解，說：『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爲重慶方面採納，終有一日，爲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則我可以無憾。』

汪精衛自以爲在對日問題上和蔣介石是一樣的，這是大錯特錯的，蔣介石雖然在抗戰問題上

有動搖、妥協行爲，畢竟和投敵叛變有着質的差別。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從河內逃出，乘船于五月六日到上海，五月三十一日又到日本，拜見日本新首相平沼騏一郎，取得日方的保證後，又回國籌建僞中央政府，策劃『還都』南京。從此一步步滑向投降賣國的深淵，不能自拔。

『讓汪精衛的手下人說說蔣介石……』

汪精衛已然被永遠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今天的人們回過頭審視歷史，蔣介石與汪精衛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呢？

相同之處，蔣介石、汪精衛對抗戰前景信心不足，一有機會便謀求妥協，企圖實行『和平』；蔣介石和汪精衛都視共產黨爲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打着繼承孫中山的遺志的大旗，而爭奪權利地位。

不同之處，蔣介石在全國抗日呼聲逼迫下不敢公然向日本侵略者妥協投降；汪精衛則公開奉行媚日政策，極力主張『和平』，接受一切亡國條件；蔣介石不甘心聽任日本人擺佈，汪精衛則不惜一切去作日本兒皇帝；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他總想解決了共產黨之後再全力對付日本，汪精衛則只看到他與蔣介石的個人之爭和個人恩怨，置國家、民族的前途于不顧。

汪精衛的手下人，他本人，都爲自己的行爲極力辯解。似不妨看看他們的話，從另一角度來看看蔣介石和汪精衛的異與同，看看蔣介石對日和談的真實心態。

周佛海在《回顧與前瞻》中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明的。這種把戲，哪裏瞞得過他？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得更高。在他的意思，以爲他的調子一高，一方面可以壓服反對的人，使他們失掉倒蔣的理由，同時對日本也表示自己的決心，使日本知道這次不可以威脅成功……』

他又說，蔣介石的這種作法不僅没有『獲得他預期的結果，反足以作繭自縛，逼迫他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

這一席話，雖然是自己作賊卻誣陷共產黨等居心不良，但仍說出了蔣介石在全國抗日浪潮推動下，被迫抗戰的事實。

對于蔣介石的『容共』政策，梅思平在《和平運動之如是我聞》中長篇大論：

『「以應付内戰的方法來辦外交」，這就是蔣介石氏的外交絶技，……你說蔣先生是抗日，蔣先生何嘗真是抗日；無論在「八・一三」以前，或「八・一三」以後，直至于今日，蔣先生何嘗一時一刻放棄對日和平的願望。你說蔣先生是聯俄容共，蔣先生何嘗真是聯俄容共；他自西安事變以後，受了共產黨的劫持，何嘗不懷恨切齒，隱忍而不敢發！他的策略，就是「挾日以對俄，挾俄以對日」。』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甚至于南京失陷以後，一般人僅知道政府或蔣先生個人只有堅決抗戰到底，那知道其中時時刻刻不斷的有和平運動；或者可以說，蔣先生的希望和平，並不減于

抗戰。』

他說：「這次事變（盧溝橋事變）如果釀成戰爭，中國可以亡國的！」』

『汪先生，國內一些名流學者，以及蔣先生的一部分幕僚（如張羣等），都隨時向蔣先生建議「適可而止」，蔣先生的答覆，總是「時機未到」四個字。』

『蔣先生還和某君說：「我是有反共的決心，但是必須待戰事結束之後，我才可以開始撲滅共產黨的工作。』

『蔣介石指使下的和平運動，是把什麼條件都答應了！』

『總而言之，蔣先生的策略，是明裏抗戰，暗中偷和；明裏容共，暗中反共。換言之，就是拿共產黨打日本，又拿日本打共產黨。』

梅思平的這番論述，可以說切中蔣介石的要害，『明裏抗戰，暗中偷和；明裏容共，暗中反共』，把蔣介石的兩面派手法勾勒得維妙維肖。

當年盛傳蔣抗戰、汪投敵是蔣、汪雙簧戲。可能是捕風捉影，但似乎有些蛛絲馬迹在內。因爲汪精衛出逃，如事先沒有蔣介石默許，就不能離開重慶，更不能離開國境。汪精衛離開重慶時曾對陳公博說：『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以爲是政府的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

這似乎就蔣汪雙簧的表白。

汪精衛臨行留給蔣介石的信：『今後兄爲其易，而弟爲其難』。周佛海解釋說：『汪先生所

說的難與易，就是指的抗戰與和平。因爲不論其爲勝爲敗，凡獻身于抗戰陣營者，無疑都將成爲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國家元氣，與敵言和，則千頭萬緒，事繁責重……措置稍有不當，條款稍有出入，則出苦心爲國始，而以千古罪人終。』周佛海又說，戰勝了有蔣介石，戰敗了有汪精衛媾和在先，『和戰並進，爲國家打算，不能不說是一條萬全的計謀』。

蔣、汪雙簧似乎果有其事了，其實不然。

蔣、汪之間有條截然的分界綫。

汪精衛的外甥陳春圃後來在《蔣介石、汪精衛爭當『兒皇帝』內幕和汪精衛傀儡戲班底的拼湊與滅亡》中分析道：

『原來蔣、汪出自同一目的，都要當媾和的對手，蔣不虞汪有急奪的一着，因此在汪發出臭名遠揚的《艷電》之後，事先既來不及防止，事後不得不勸阻他作與敵談判的對手。……汪雖虛與委蛇，但早已視若耳邊風，蔣因此發恨非除去此對手不可』。

陳春圃還提到河內高朗街刺殺汪精衛之後的兩次行刺：『軍統特務吳賡恕策動陳承綸（石生，湖北人）利用與汪爲師生關係教他打入汪家，取得信任後進行藥殺；又如利用粵人黃逸光腕力强大，試圖在汪接見他時把汪掐死等種種煞費苦心的佈置，儘管爲「七十六號」的汪僞特務所破獲從而犧牲了不少人，但仍在所不惜而進行不懈，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急于消滅「對手」。』

日本人把最好的菜留給了蔣介石

汪精衛的投敵，影響到蔣、日和談的格局，使和談發生微妙的變化。

就在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汪精衛建立僞中央政府的同時，日本軍部圍繞汪精衛問題出現激烈爭論。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南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不久改組爲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日軍召開會議，討論對三方會議（汪及維新、臨時政府）的對策。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桶口季一郎、影佐禎昭少將、興亞院華北聯絡部長官喜多誠一中將，南京維新政府顧問原田熊吉少將等參加。

會上影佐和桶口主張支持汪政權建立，華北方面軍和喜多中將等人卻熱心對重慶進行和平交涉，結果議而不決。

與此同時，日本各報連日報道：『日華接近和平』。宣傳建立統一的全國性的汪精衛僞中央政權；而日本在華各機關則相繼提出，建立汪政權，不能破壞蒙疆既成事實，華北獨立自治等，並說明汪集團缺乏實力的『無力狀態』。

衆說紛紜，日本陸軍和海軍首先對立，陸軍主張大力利用汪精衛，把日軍撤到黄河以北，以防備蘇聯進攻；海軍則力主保持華中、華南地盤。不久，陸海軍的爭論又變爲參謀本部同陸軍省的對立：前者主張利用汪精衛，收縮，重點防守蘇聯，後者則提出『不能從皇軍流血之處退下

來！」

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關于汪這一人物的利用價值問題。最後，以爲汪精衛軟弱無力，『對汪不信任』，主張『佔領地確保論』乃至『進攻重慶論』一派佔據上風。

這場爭論波及陸軍與海軍，參謀本部與陸軍省，中央軍部與在華日軍機關，暴露出日本侵華政策上的矛盾和混亂，也使日本人認清了汪精衛的價值：汪精衛早已是被人們詬罵爲親日派；國民黨的實權不在汪而在蔣手中。

汪精衛本想拉陳濟棠、龍雲、何健、張發奎和四川軍隊將領上他的船，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力的將領上他的賊船。他的圈子裏，只集中了一羣失意政客、落伍軍閥和投機分子，既無物質力量，也無號召力量。

日本人見靠汪精衛的利用價值不大，還是照舊極力誘迫蔣介石投降。今井武夫回憶說：『從本質上講，同重慶政府達成全面和平爲最終目標。因此，僅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並不是目標，而只是從側面推進的策略，應該認爲這僅僅是一個階梯而已。』所以汪精衛僞政權建立，過了八個月，直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認。而且，汪僞政權自政府主席以至到各院各部官銜，都冠以『代理』二字，汪精衛只是代理主席，主席定爲林森，並虛席以待。

日本寄望于蔣介石投降，想把『最好的菜』留起來，等待蔣介石來享用。

今井武夫回憶說：『爲了誘導重慶政府放棄它的抗戰主義而轉向全面的和平主義，南京政府就成爲日華協作的實驗台，而且在全面和平時，又可作爲媒介，具有充作墊腳石的決心。』

汪精衛不過是日本人的『實驗台』、『媒介』和『墊腳石』，即使到後來他作爲政治人物的利用價值喪失殆盡後，日本人還利用了他的餘熱，在他的身體上進行了真正的科學實驗。

在和汪精衛的談判中，日本人把極爲苛刻的條件不斷加碼，逼迫汪精衛接受，以便將來向蔣介石按章索取。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本强迫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及兩個附錄和八項秘密諒解事項。這個《綱要》首先規定：『承認事變中，新國交修復以前既成事實之存在』，並『承認在事變繼續中，基于必然之要求而起之特殊之事態，隨情勢之推移，乃到事變之解決，以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爲根據，逐次調整之。』

好個獅子大張口！

這就是明白地要汪精衛一面承認日本在中國已取得的侵略權益，還要根據其進一步的侵略，滿足其新的要求。

《綱要》開列的主要內容有：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游、廈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于日軍駐紮地域及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路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這個《綱要》自稱是近衛第三次聲明的具體化，實則是它的擴大化，大大超出近衛聲明的範圍和要求，也違背了重慶會談的協議。連一些日本人也認爲太厲害了。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高宗武、陶希聖因分贓不均等原因叛汪，逃回重慶，並在香港《大公報》披露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今井武夫針對此事說：『日本方面超出了近衛聲明的强硬的權益要求，可以說這是必然要發生的問題。』

日本侵華野心至此暴露無遺。

一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就日、汪密約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和《告友邦人士書》，指出汪精衛政權的性質和日軍亡華的狠毒，警告各國日本妄圖『根本取消各國在東亞之地位矣』！英、美、法等國也紛紛發表聲明，決心維護『九國公約』，否認汪僞政權。美國連續給蔣介石兩筆二千萬美元的貸款，英、美、法國還抽調兵力增强遠東地區。

汪精衛爲此《綱要》喪盡民心，已經失去在國內的一切市場。

汪精衛當然對《綱要》的後果也很清楚。

草案簽字之後，汪精衛憂懼流淚，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第八章

香港密談

偷梁換柱夫人出馬，蔣介石重開和談

一九四〇年二月底，重慶的清晨，照舊有濃濃的霧，照舊有日機轟炸後留下的團團硝煙。

老草堂蔣介石官邸格外寧靜。

天剛剛放亮，清掃院落的衛士們就開始工作了。他們走路踮着脚，落地的掃帚輕無聲響，相互見面時，也都以眼神、表情互致問候，生怕驚擾了委員長夫婦。

蔣介石早就起床了。他的生活規律是一成不變的，即使在軍營中也是雷打不動。他從清晨四時起床開始，就佇立在卧室的窗前，默默地望着東方漸漸露出的微弱晨曦，進行例行的清晨凝思。

抗戰已進入第四個年頭。雖説在諸多因素的推動下，蔣介石仍然咬牙抗日，但一遇機會就想與日本講和。只是由于日人的條件太苛刻，他不敢接受，怕成爲千古罪人，更怕共産黨搶走抗日的領導權，才没有放下抗日的大旗。

現在蔣介石又在認真考慮對日和談了。

戰場上，雖然武漢、廣州失守後，日軍已無力再次發動大規模進攻了，但國軍退守西南一隅，只好憑借山川險隘，在日機轟炸下苦苦支撐；勝利希望渺茫。

太陽已經升起東方天際，但在濃霧和硝煙的阻隔下，已經失去那誘人的萬道霞光，剩下的只是一個慘淡而凄涼的桔色圓盤。

望着這失去魅力的旭日，蔣介石更加愁腸百結。

蔣介石自認國軍不是日軍的對手。他只有靠廣大國土纏住日軍的把握，卻沒有戰勝小小日本的信心，他渴望英、美等國的援助。然而，英、美等國卻遲遲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恰在此時，歐戰爆發，英法更無暇東顧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對波蘭發動閃電式襲擊，從而拉開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帷幔。英、法諸國，乃至于蘇聯，爲自己國家的存亡，關注的焦點轉向歐洲，就像宋美齡一再說的那樣，『只有美國可以幫助中國了。』

但是，正如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所揭露的那樣：

『日本人正在竭力引誘金融家支持他們剝削中國的行爲。他們許諾給與各種利潤……美國金融家如果聰明，他們就會仔細地考慮一下整個問題，而不會輕易落入這樣的圈套：在日本人援助下以犧牲中國人的利益爲代價去「迅速致富」。另一方面，支持中國就能及時爲外國投資打開廣闊的天地和打開一個具有極大價值的市場……如果各民主强國拒絕給中國任何援助，如果他們向日本人提供任何具體援助，他們將犯下歷史上最大的罪行。』

美國就是遲遲不肯給中國以任何實質性的援助，反而和日本大做廢鐵等生意。一想到這裏，蔣介石不由得從鼻孔中重重地哼出一口氣。

蔣介石早已打好了主意，只要日本人開列的條件別太苛刻，別再堅持讓自己下台，就和日本媾和，趕緊緩緩氣。

根據戴笠搜集來的情報，也根據過去多次與日本的和談，蔣介石判斷：此時日本也在積極地尋求儘快從中國解脫出來。

他對所有的和談活動是瞭如指掌的。雖然他不肯自己直接出面，但他卻暗暗指揮或默許手下人在上海、香港等地和日本人頻繁接觸。

一九三九年底，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派駐香港的鈴木卓爾，奉命策劃建立與重慶政府間的聯絡路綫。鈴木經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居間介紹，提出要會見住在香港的宋子良——宋美齡的弟弟。當時被宋子良以個人政治活動，必須特別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爲理由，予以拒絕。

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馬上敏感地認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他爲了從政治上遏制汪精衛僞政府的成立，爲了緩解自己困守蜀地的不利形勢，還爲了找到一個重要砝碼，爭取國際援助，蔣介石歷經深思熟慮，決定和日本人在香港秘密接觸。

但是，現任西南運輸公司主任的宋子良滿腦子都是生意經，沒有對日交涉這類大事的經驗，是個不稱職的人選。再者，日蔣密談這種事，萬一走漏消息，他蔣某人必然成爲汪精衛第二，變成新的漢奸靶子，風險實在太大了！

如果易人參加密談，又必然給日本人造成一個迫于求和的印象，這對談判實在不利。

怎麼辦？蔣介石進退維谷，苦無良策。

俗話說得好：賊人自有賊主意。戴笠終于想出個萬全妙計：偷梁換柱。軍統局有個叫曾廣的特務，和宋子良長相酷似，又精通外事。由曾廣冒名頂替宋子良和日方談判。萬一這次密談失敗或生出其它枝蔓，請出真的宋子良闢謠，蔣介石依然立于不敗之地。蔣介石召來曾廣一看，就激動地說：

『萬無一失，好！』

現在，曾廣，不，日本人並不知道真相。我們還是稱他爲『宋子良』吧。『宋子良』在香港和鈴木秘密接觸，已經取得很大進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宋子良』主動要求和鈴木見面，並向鈴木表示『他自己並没有對日交涉之類的政治權限，但卻能得到宋美齡的大力支持，可以暗中活動，把日中兩國政府的意圖向雙方轉達，可以起到一些聯絡作用』。

接着『宋子良』向鈴木轉達了重慶政府的如下條件：

一、關于國民政府繼續進行抗戰的真實意圖。

——日本方面破壞了陶德曼工作（中國最高國防會議已準備接受該方案，而日本非但將該提案予以變更，且不給中國方面以研究之餘地）；

——對日本所說的尊重中國主權和保全獨立，大有疑問；

——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舉行會談的態度。

二、國民政府『關于收拾時局』的意見：

——日本若尊重我國的名譽和主權，就準備和日本和談，因此希望在承認汪精衛中央政府之前進行協商；

——中國希望美國等第三國從中調停；

——在談判前實行停戰，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證；

——請日本相信國民政府會鎮壓共產黨的抗日行動；

——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國民政府進行改組等內政。

三、國民政府對日本提出的疑問：

①日本是否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爲對手的聲明；若想重新考慮，那麼用什麼辦法使中國方面確認此點？

②日本對華態度，果真是採取中日經濟提携的話，那麼在能够達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局面？

③日本政府有沒有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蔣介石本人遞交有關和平問題的親筆函件。因爲公開進行會談，對蔣介石的對日和平工作會造成極大妨害。你方的《近衛聲明》就是因已公開，以致使蔣介石的立場陷于極端困境。

因爲鈴木卓爾只是奉命與國民政府秘密聯絡，所以對『宋子良』的質疑毫無回答的準備。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二月三日，『宋子良』又和鈴木卓爾會晤了兩次，鈴木就若干問題作了回答：一九三八年底的第二次近衛聲明，只是日本政府的一個宣傳姿態，實際上中日和平是決定了的日本最高國策；日華和平應排除第三國介入，由兩國直接談判；重慶政府同汪精衛的關係，中國方面如能照顧到日本對汪的道義，可以作爲中國內部的問題，聽任雙方直接協議，妥善處理。

『宋子良』也轉達說：在中日兩國正式會談前，二月底在香港各派三名代表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和平條件，重慶政府對此抱有極大期望。代表持有委任書，同時宋美齡也預定來香港從側面給予援助。

鈴木對此表示十分高興，說：『重慶政府如能迅速指派能代表中央政策的私人名義的代表來香港，與日方私人名義的代表相互開誠布公地會談，自然會消除誤解，或許能發現打開局面的方案。』

二月五日，『宋子良』到重慶，二月九日返回香港後，告訴鈴木：『我已向蔣介石等首腦說明了與日本會談的原委。二月七日最高國防會議經研究後，作出確切決定：重慶政府準備派蔣委員長最信任的人到香港與日方代表進行秘密會談，並建議，第一次會談在香港舉行，第二次以後會談可在河內或馬尼拉進行。』

當時正值高宗武、陶希聖叛汪出走，並披露了日汪之間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其附件。

針對此事，『宋子良』說：『在重慶，抗日及反汪空氣異常高漲，由于日本的對汪工作强烈地刺激了美國，使美國對日感情走向惡化，政府裏的某些人士反而表現出高興的樣子。』

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部根據鈴木的匯報，爲急速明了交涉的實情，又派今井武夫大佐于二月十四日抵達香港。當日下午，今井、鈴木與『宋子良』會見。雙方商定：日、中雙方于二月底前後舉行圓桌會議，迅速得出結論，立即任命正式代表簽約。

對于『宋子良』在香港的活動，蔣介石可以說是密切關注的。他已經決定讓夫人宋美齡在雙方會談時到香港去一趟，加重談判的份量，溝通香港與重慶間的消息，並可取得日方的信任。

既然準備讓夫人出馬，怎樣動員她自告奮勇披挂上陣呢？

蔣介石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並決定今天早晨就最後敲定此事。

靜靜地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訂出當天的活動日程。蔣介石就完成了例行的一小時的晨思。然後，他開始做數十年如一日的軍操。身上微微冒汗後，再洗個澡，喝杯新鮮桔汁，蔣介石就完成了一日之計在于晨的活動。

今天，他剛想在中堂客廳的雙人沙發上休息片刻，忽然一陣悅耳的鳥鳴飛進屋來，令他想起故鄉山林之美。他身不由己地走到門口，欣賞鳥兒的悅耳鳴唱。

早餐過後，宋美齡轉身抓起自己小巧精美的皮包，溫情地對蔣介石說：

『Darling！我該去電台對美國人民播音了。』

『不！』蔣介石急忙站起身來，攔住宋美齡的去路，格外動情地說：『夫人，你已經爲抗戰

做到鞠躬盡瘁了，絕對不能再去做力所不及的工作了！」

『謝謝你的關心！不過，我還能在這個特殊崗位上工作。」

『不，不！你更需要換換環境，去香港休息休息，治治病。」

宋美齡望着那雙熟悉的威嚴眼睛，感到從那裏射出愛憐、乞求的目光。她一再品味這真摯情意，立即想到了『患難與共』這四個字，她身不由己地投入蔣介石的懷抱……。

知情的人都知道，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純係政治婚姻，兩人在婚前、婚後都不曾有純粹的情愛。但在中華民族面臨存亡、蔣家王朝偏安重慶時，兩人卻有了一段美好的愛情生活。

宋美齡依戀不捨地離開蔣介石的懷抱，請求地說：

『讓我去吧，因爲我們企盼着美國人民的覺醒啊！」

『不，車到山前必有路，水到橋頭自然直。再說，我需要你和我長相依、共患難，度過這危厄而漫長的歲月！」

『正因爲如此，我才不願意拋下你去香港獨享清福呢！」

『夫人，你去香港，絕不是爲獨享清福，而是去進行一場非常艱巨的戰鬥。」

宋美齡愕然，疑惑地看着蔣介石。

蔣介石慢慢地點了點頭，滔滔地說了起來：

『汪兆銘叛敵出逃後，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經過一段緊鑼密鼓的吹打，已決定近期在南京成立僞政權。而近衛文麿又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談判對手」，把我們的中央政府貶爲地方政

權，這就等于向全世界宣佈：只有汪僞政權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對此，我們決不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但是，如果自身難保的英、法屈服于日本壓力，如果美國爲自身利益而繼續坐視日本侵華，並追隨日本之後承認南京汪僞政權，形勢就要急轉直下了。怎麼辦，首先，必須阻止日本承認即將誕生的汪記國民政府；其次，要利用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爭取陷于和德國決戰前夜的英、法等國等支持我們的國民政府；再次，必須說服美國利用經濟手段和軍事威懾，遏制日本的囂張氣焰。』

宋美齡一向十分自信，但聽到蔣介石這宏觀戰略後卻面露難色——她不知道自己在香港養病期間，如何完成三件足以改觀亞洲戰場的大事。

蔣介石似乎猜到了宋美齡的心事，笑了笑說：『這三件大事，我早已在港着手進行。只要夫人親自出馬，一到香港，就會增加我方談判的砝碼。』

宋美齡聽後驚得不知所以，又暗自生氣：『像這等重要大事，又牽連到我，卻瞞了我這麼久……』她望着不動聲色的蔣介石，方才心中泛起的愛情漣猗，猝然間化做氣憤的波濤，那股甜蜜的味道也變得苦澀了。

『夫人實在是太辛苦了，我不敢再把這樣的重擔壓在夫人肩上，幾次想把這些事通報給夫人，可一見你那疲憊不堪的倦容我就只好把張開的嘴又閉上了。可是現在……』蔣介石有意停頓下來，重重地嘆口氣，『我們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我不得不請夫人出馬，劈開一條生路。』

蔣介石不愧是情場老手，這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話語，立刻使宋美齡的不快一掃而光，

她急切地說：

『快把這三件大事的內情告訴我吧！』

『不忙！我已經讓戴笠他們準備了一份材料，夫人一看便知。』

宋美齡點了點頭。

『夫人此行的工作重點，不是自己親自動手去辦這些棘手的大事，而是……』

『什麼？』

『爭取人心！』

『爭取人心？』

蔣介石微微點了點頭，旋即，臉上又籠上了層凝重的愁雲。

『Darling，難道這爭取人心的工作，比上述三件大事更難嗎？』

『對我而言，難于上青天；而對夫人而言，雖不能說馬到成功，但奏凱的希望很大。』

『有這麼複雜？』宋美齡急不可耐，『快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吧。』

蔣介石未語先嘆，他認爲目前要解決四件事：戰場上與日軍交戰，防止共產黨、八路軍借抗日之機壯大，改變國際輿論導向並遏制汪僞政府成立，動員國內一切力量擁戴他作抗日的領袖。但他又深知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使他大失人心，也丟掉了許多國統區的民族精英人士。隨着國土喪失，這些人相繼雲集香港，圍繞在宋慶齡周圍，既抨擊蔣介石消極抗日，又揭露汪精衛賣國，影響很大。如何改變這些人的反蔣立場，進而擁護自己獨舉抗戰大旗呢？最簡單的

辦法，就是請宋慶齡到重慶來。蔣介石深知宋慶齡與自己爲敵的歷史原因，也記得宋慶齡在西安事變期間捐棄前嫌，爲自己獲釋而奔走的事，他審時度勢，認爲在汪精衛成立賣國政府前夕，宋慶齡可能再度化敵爲友，支持自己。由誰去請她呢？自然非宋美齡莫屬。

『夫人，卧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在此國難深重之際，夫人能把阿姊慶齡請到重慶來，就等于爲我搬來十萬雄兵。』

『原油交易』：『桐工作』

在蔣介石爲香港秘密會談處心積慮、調兵遣將的同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部也在積極籌劃，日本政府和軍部已經認識到自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攻佔廣州、武漢後，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日軍投入中國戰場的兵力已達極限，達二十四個師團、一百萬人以上，國內僅剩一個近衛師團，在朝鮮只留下一個師團，在滿洲也只有八個師團。而蘇聯在遠東的兵力達二十八個師和十八個航空兵團。一貫把蘇聯作頭號假想敵的日軍，不免極爲憂慮。

爲此近衛發表第二次聲明，修正『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向蔣介石伸出橄欖枝。同時，日軍内部提出：『靈活運用謀略、政略的措施，削弱抗日勢力』，軍事活動則以攻爲守達到佔領區『治安警備』的目的，並抽調若干師團回國或加强滿洲。

蔣介石曾對此評價說：敵人『進到岳州以後，就不能再攻進來，這就證明它的力量不夠，氣勢已竭』。這一事實『可以證明敵人的力量不能消滅我們』。

對蔣介石的這番話，狂妄的日軍此時也無可奈何。

日軍大本營鑒于武力亡華的困難和統一在華日軍指揮權的需要，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設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于南京，以西尾壽造大將爲總司令、板垣征四郎中將爲參謀長，來加强作戰和誘降。日本人自己說，西尾大將是肩負『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的特別使命』、『抱着迅速解決事變的願望赴任的』。

西尾上任不久，國軍發動『冬季攻勢』，雖然規模不小，以極大代價取得微小戰果，但也使西尾『深感敵尚强大』，更決心儘早結束戰爭。

西尾手中已有兩條和談路綫，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姜豪兩條路，但收效不明顯。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在香港與『宋子良』的接觸開始進入實質性階段後，這兩條路綫就放棄了。因爲西尾也同意一批手下人的觀點：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非得和重慶直接談判不可。』

當今井武夫由香港返回南京報告與『宋子良』接觸情況時，西尾壽造又懷疑起『重慶政府的真正意圖是進行武力偵察』，並深感『把這一工作與建立汪政權工作擺佈得當』十分困難。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西尾收到陸相畑俊六《大陸指第六六一號》指示，將通過『宋子良』的這個路綫命名爲『桐工作』，作爲派遣軍總司令部的謀略進行，方針是『對重慶或者把它包括進來或者使之瓦解』。

同一天，西尾又收到參謀總長載仁親王指示：要按《桐工作指導綱要》進行會談：『協議時可

同意中國方面所提出之方案，借此以誘導重慶參加乃到進行分化離間工作；在建立新中央政權日期確定以後，開始會談』，並使『所建立之新中央政權（即汪政權）的根本工作不能使之動搖』；參加交涉人員，『應絶對避免渴望早日成功的焦慮情緒或我方急于求成態度』，『做好隨時均可中止會談的思想準備』；鑒于派遣軍總司令部内外影響之重大，『不得給人以正在商談停戰協定之印象。』

西尾壽造接到指示，頓時更深地陷人這樣的矛盾中了：一方面急于『和平』，另方面又不想降低談判條件。

參謀次長澤田這時也訓示負責和談的今井武夫：『目前和平下商談不是第一着。那種不管怎樣只要停戰的想法是不妥當的。不要認爲只要能實現停戰，在條件方面降低一些也可以。』這一切使今井武夫感到，東京『談到「桐工作」，只是一種「成功的話倒也不錯」的玩笑態度。』

日本人就在這種既渴望『和平』又堅持不降低條件的心理下投入和談。

爲做好保密工作，日本煞費苦心地製作了一套『桐工作』暗號略語，並在短時間屢次改換。今井武夫後來披露了三月二十一日訂正的略語表，從中不免折射出日本人的狠毒用心。這套略語堪稱用心良苦，其中不乏溢美、貶低，也不乏機智乖巧。不明就裏的人看到他們的文電往來，還會以爲是商業文件呢。

桐工作代號爲『原油交易』，國家和政府則冠以商會之類的名號。如，日本（大和商會），中

國（人民商會），共產黨（赤星屋），蘇聯（赤木洋行），大使（事務所長），領事（派出所長）。

中日兩國人員都冠以日本人的姓名。例如，米內首相（楠），蔣介石（中山或上田），毛澤東（田口），周恩來（宮崎），朱德（山下），宋子良（田中或山田），汪兆銘（松木或松原）。

地名則基本用日本地名代稱，如東京（新京、奉天），南京（廣島），香港（大阪、神户），台灣（四國），重慶（東京、橫濱），揚子江（利根川）。

這套略語中對日本侵略行爲和政策極爲贊美，而對中國的抗戰則極盡貶低之能事。如「善鄰友好（松），共同防共（竹），經濟提攜（梅），防共（儲蓄），容共（借款），反汪（公司債），抗日（公債），抗戰（赤字），佔領地區（顧客），日本軍（僱主），中國軍（職工），援蔣（予以貸款）等等。

當然，這套略語中還有一些乖巧的代號，令人看了不僅失笑。例如：聲明（廣告），領土（煤礦），主權（總經理），撤兵（輸出），駐兵（投資），建立政權（開店），汪蔣合作（松本家和上田家提親），逃脱（夜間出發），內部工作（黑市交易），秘密「機關」（火藥「交易所」），軍隊（資金），治安（行情），戰鬥（競爭）等等。

宋美齡看了看曾廣的照片，滿意地笑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一架「DC——3」型客機穿透山城重慶的重重濃霧，朝東南方飛去。這就是宋美齡赴香港治病的專機。

宋美齡坐在舒適的座椅中，微閉雙目，眉頭一副不堪飛機升降的苦色。終于，飛機結束了爬升，像艘特製的游艇般平穩地急馳在長空碧海之中。宋美齡此時無心欣賞機翼下的雲海、山川，也不想和隨侍們開心解悶，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

宋氏家庭，特別是宋氏三姐妹像謎一般吸引着人們。宋美齡身上就有許多謎。首先，她的生年就有一八九八、一八九七、一八九九、一九〇一等多種說法。

身爲富有的宋氏家庭的幼女，宋美齡在濃厚的宗教氣氛和極爲西方化的環境中度過童年。一九〇八年，她與二姊慶齡同赴美國，先就讀衛斯理學院、韋爾斯萊學院，主修英國文學，副修哲學，同時還選修法文、音樂等科目，一九一七年她取得韋爾斯萊學院博士學位時，幾乎已經變成了個美國人。

她自我解剖的名言就是：『唯一還能認出來我是個東方人，就只剩我的面孔。』

回國後，她羡慕阿姊慶齡嫁給孫中山而成爲國母，一心想嫁個有權有勢的。這時蔣介石闖入她的生活，一直追求了她十年，最後雖然阿姊慶齡極力反對，哥哥宋子文從中作梗，但有貪權好財的大姐宋靄齡夫婦極力撮合，宋美齡終于一九二七年嫁給蔣介石，圓了她的第一夫人夢。

但，蔣宋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個政治婚姻。蔣介石看中的是宋美齡的姐夫孫中山，看中的是宋、孔兩家的財力和宋家同美國的親密關係。而宋、孔兩家則看中了蔣介石手中的軍政大權。當時上海的報紙就稱他們的婚姻爲『蔣美聯姻』，一語雙關，一針見血。

成爲第一夫人的宋美齡和蔣介石的感情從來就沒有密切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經常吵架。宋美

齡一怒之下總要跑回上海娘家，而孔祥熙夫婦則總是出來打圓場，各打五十大板。

宋美齡十分欣賞蔣介石縱橫捭闔，利用各種力量加强自己權力的手段，但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卻有微辭，西安事變，她勇敢地站出來反對何應欽等親日派煽風點火趁機奪權的陰謀，並親自到西安去營救蔣介石。對張學良送蔣回南京被扣後，她也頗表不滿。

儘管意見有分歧，宋美齡還是清楚只要蔣介石大權在握，就有自己的地位和宋家的金錢。因此，最後她總是要服從蔣介石的。

到了重慶，宋美齡的生活習慣仍然是美國化的，喜歡過夜生活。然而日本飛機總是白天來轟炸，喜歡白天休息的她只好蹲在防空洞裏，喫盡了苦頭。天長日久，身體有些喫不消了。

時人曾撰文指出：『雖然蔣夫人斷言她身體很好，並且不是那種稱之爲健康不佳的人，但她的健康狀況並不令人滿意。……失眠和過度操勞，使她顱穴發炎，遭受到最痛苦疾病的折磨。』

侍女送上來的果汁，把她的思緒拉回到現實中來。

打開公文包，她取出戴笠呈交的關于『桐工作』情況的材料，仔細研讀起來。

不經意間，飛機已來到香港上空。宋美齡看了看冒名頂替宋子良的曾廣的照片，滿意地笑了。

收好『桐工作』的材料，隨侍女給她繫好安全帶，宋美齡又習慣性的閉上眼，準備承受隨飛機降落造成的不適。

到香港後，宋美齡下榻于沙宣道孔宅。女主人就是蔣、宋、孔三大家庭結盟的紐帶——宋氏

三姐妹的大姐宋靄齡。

宋靄齡遷居香港，除了貪圖香港沒有轟炸的安逸生活，除了更好地指揮孔家手下大發國難財外，還肩負對日本進行秘密和談的使命。辦理和談之類的事，她已有兩年多的經驗，可謂輕車熟路。

在宋靄齡的幫助下，宋美齡很快進入角色，並和身在重慶的蔣介石建立起密切聯繫。

誰的實力强，誰説話口氣就硬，不講理又怎樣？

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自從日本對中國沿海實行全面封鎖後，便成爲重慶政府對外聯絡的唯一基地，許多機關和要人都在這裏落脚。

由于香港總督限制一切政治活動，日本人和蔣介石派來的代表只能謹慎地秘密行動，生怕出一點紕漏。爲了保密，會談地點設在了地處偏僻的東肥洋行二樓。『宋子良』見日本人積極地準備了會場，心中不安，便要求由中國方面負責保衛警戒工作。可是他那裏能想到，日本人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機場，碼頭，甚至中國代表下榻的旅館房間對門，都有日本人監視。每個代表的一舉一動早就讓日本人摸得一清二楚。談判還没開始，日本人就佔了上風。

三月七日，晚九點正，第一次會談如期舉行。

『宋子良』特意精心装扮了一番，顯得格外精神。他知道自己大顯身手的時候到了。他見今井武夫和鈴木卓爾已經就座，便開了口：

『對此次談判，蔣委員長給予了極大關注，他特別派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

陳超霖對今井和鈴木微微點了點頭，很有大將風度的樣子。

『還有中國前駐德大使館參贊、現任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的章友三……』

章友三身體向前傾了傾，也是面帶微笑。

『加上敝人，共三個人爲正式代表。還有一位預備代表，侍從次長、陸軍少將張漢年。他具體負責會場的警備，可能二位就見不到他的面了。我們還有一位聯絡員，就是張治平。』

『非常高興能和諸位在一起爲日華兩國和平而努力，』今井武夫今天精神狀態也不錯，『日本對此次會談也是極爲重視，派出的談判代表是大本營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鈴木卓爾中佐和本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大佐已經從東京乘美國輪船克利芝總統號起身，原預定于五日到香港，可惜途中遇上大霧，現在還沒有到。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開始初步會談的。』

陳超霖輕咳一聲，也開了口：『我方全體人員三月二日即已全部到港，蔣夫人五日也到了香港，從側面協助我們。會談的結果，我們可以通過無綫電向重慶匯報，另外，我們還特設了聯絡組，每天乘班機往返于香港、重慶之間，可以在次日的會談前，及時獲得政府中樞部門的指示。因此，在香港會談，對我們來說，和在重慶會談別無兩樣。』

『這太好了，』今井武夫知道陳超霖所說的都是實情，『首先，爲慎重起見還是按約定相互出

示證明吧。這裏是我們日方代表的證明書，請諸位過目。』

陳超霖接過今井武夫遞過來的證明書，此外還有一份陸相畑俊六的證明書，陳超霖把這兩個證明文件遞給其他人傳閱，說：

『我們已經拿到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羣的證明書』。

今井清了清嗓子，朗聲説道：『此次會談，旨在探討召開日華和平會談的可能性問題。所以，關于和平條件只就其大綱加以研究，即使遇到雙方意見不一致時，希望相互諒解。彼此的主張，避免決裂，經過再次研究後重新調整意見，我方務求設法促成正式會議的召開。』

章友三作爲主要談判發言人，立即接過話頭，對今井說：『由重慶啓程前，蔣委員長特別强調了下列三點：

1、必須得到日軍撤兵的保證；

2、明確日方的和平條件；

3、要在絶對秘密中進行會談。

上述三項，務希日方委員予以協助。』

今井武夫點點頭，說：『好。我們下面應就一般問題，以交換意見爲重點。我必須首先就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予以原則性的説明。』接着他就重複了一通諸如日本没有亡華之意，只想防共和促進東亞經濟發展之類的老調子。

章友三等他說完後，才强調說：『上述三原則，歷來即爲日華兩國所共同希望者，我對今井

君今日說明的主旨毫無異議。當運用此原則于具體實施時，雖預料到在細節方面將來尚會發生困難，但是希望我們雙方爲本會談的成功共同努力。」

今井武夫覺得應該進入實質性問題了，就開始說明日本對和平條件的具體要求，語氣十分强硬：『妨礙善鄰友好的症結所在是中國之抗日和滿洲國問題，故而，中國必須停止抗日。』

章友三不由火往上撞。破壞中日兩國和平的原因在于日本侵華，中國的軍隊是在自己的國土上作戰，又沒有打到日本去，怎麼能說中國抗日妨礙了善鄰友好呢？章友三把嘴張了張，但終于沒有說什麼硬話，因爲他清楚，目前中日兩國軍隊實力還差一大截，國軍又總是吃敗仗。在談判桌上，誰的實力强，誰說話口氣就會硬，不講理你又能怎樣？自己所能作的，也不過是據理力爭，儘量爭得些更有利些的結果罷了。想通了，章友三平靜下來，很有分寸地開了口：

『如果和平實現了，中國自然會停止抗日。』

『中國應當承認滿洲國』，今井口氣仍然是不容爭辨的樣子，『進而同滿洲國建立邦交。』

『願使滿洲國作爲日華兩國的保護國。』章友三說。

『滿洲國現在是很好的獨立國家，根本沒有作爲保護國的必要。』今井武夫立即駁回章友三實際是默認滿洲國的提議。

『希望保留本問題。』

對章友三的話，今井武夫本想再批幾句，但前面已說過今天是交換意見，不能就一個問題爭論不止，也只好改換話題：

『希望締結日華兩國的防共協定。』
『那倒是可以。』章友三回答得很乾脆。
『内蒙應設特殊化區域，以便防共。』
『這也可以。』
『日軍撤兵後，爲防共起見，有在特定地點駐紮日軍的必要。』
『這會使全國輿論沸騰，蔣委員長也絶對不能認可。最好等達成和平協議後，另行談判吧！』
章友三提出新的建議。
日本急于解決和平協議簽訂後日軍繼續留在中國的問題，因此，今井武夫對章友三的提議表示不滿：『在滿洲國對蘇加强戰備，實爲絶對必要，這也是日本堅定不移的方針。而在中國，如日軍不能駐兵，則共同防共就毫無意義了。因此，希望在和平協議中把駐兵問題明確下來。』
陳超霖是此次和談的中方負責人。他見雙方頂了牛，就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當日軍撤兵之時，在不得已和必要的地方，可以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嘛！』
今井武夫覺得這種辦法似乎可以考慮，就說下一個問題：『有必要把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爲日化經濟合作的地帶。』
『如果以中國爲主，日本爲從，是可以的。』章友三說。
『長江一帶有各國的權利，希望加以考慮。』陳超霖補充道。
『當在華北開發自然資源時，希望特别要利用日本技術，並希望給日本提供便利。』今井武夫

說。

『這倒是可以的。』章友三答。

談話到此，雙方已就主要問題交換了意見，但還有一個和平條件以外的問題讓雙方都十分關切，這就是保密。

一談到對和談的保密，雙方的意見是一致的，所以都很熱心地對一旦有人企圖揭露此次會談將如何處理發表意見。

對意外的『泄密』，『宋子良』大爲光火

三月八日正午剛過，張治平急匆匆地要求會見鈴木卓爾，面交一份備忘錄：

『根據昨晚蔣介石委員長親派的特使聲稱，日軍中某氏在上海將這次香港會議消息向中國新聞記者泄露。因其違反了會談開始前雙方的約定，希望採取嚴加取締手段。』

鈴木卓爾見到這份備忘錄，一呆之下，竟不知說什麼好。

『對于日方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爲，我們提出嚴重抗議。』張治平說完，轉身就走了。

鈴木不知所措，只好趕緊找今井商議此事，還沒商量出結果，『宋子良』又找上門來。

今井武夫趕緊陪笑上前，問：『今天中午張治平送來的備忘錄我已看到了。請問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宋子良』也沒好氣，說：『你們日本人口口聲聲說什麼信義信義的，可是卻如此出爾反爾，

背信棄義。這樣的話，我們還怎麼談？』

今井武夫確實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好耐着性子向宋子良問個究竟。

『宋子良說：『昨天夜間，蔣委員長突然緊急遣派特使前來香港，告訴我：蔣委員長昨天清晨接到上海某中國人的急電，說他由和知大佐處得知這次會談的情報，電報中詳述今井先生來港之任務，但未列舉臼井先生之名，還說和知大佐準備在報紙上披露此次會談。』

今井得知此事真相，只得賠禮道歉，並保證今後一定嚴加保密，不再發生同類事情。

『宋子良』並不滿意，說：『中國方面之所以提心這次會議泄露，是防備心懷不良的人趁機搗亂。而現在，根據你們的所作所爲，不能不令人懷疑，這是日方處心積慮的一個計謀。』

今井見『宋子良』如此說，感到事態嚴重。他歷來就對日軍中一些人自行其事，極爲反感，現在，他更氣憤別人泄密導致這次會談出現中途夭折的可能。因此，他立即向『宋子良』保證：

『我將立即向南京的派遣軍總司令部拍電，要求對肇事人指名予以處理。』

『正夫不能承認姦夫、淫婦結婚』

三月八日，晚九點，第二次會談又開始了。

今井武夫向『宋子良』、陳超霖、章友三介紹剛剛到達香港的臼井茂樹大佐。

今井作爲日方的主要發言人，再次先發制人，既蠻橫又狡猾地說：『爲了日華提攜，中國應給予日本人在中國內地的居住及營業權。同時，日方可以考慮撤銷治外法權和交還租界。』

「這是當然的。」章友三說。

「中國應當從日本招聘財政、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技術顧問。」今井趁勢緊逼。

「這倒是可以的。」章友三再次同意。

見前面兩個問題解決了，今井武夫又轉到一直不能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來：「中國應當承認滿洲國。」

「希望保留一天。」章友三言外之意是要再請示一下。

「中國須承認日軍的防共駐兵。這與撤兵問題有必要區別開來。」今井武夫話鋒又轉。

「中國正在努力討伐「共匪」，所以防共交給中國自己辦好了。」章友三拋出個軟釘子。

「日本所謂防共，主要不是中國國內「共匪」問題，而是爲了對外的軍備。」今井武夫窮追不捨。

「「駐兵」這樣的名詞是不適當的。延長撤兵期限也可以嘛！」「宋子良」出面掩護章友三。

「駐兵的細節研究後，可以搞秘密協定加以確認吧。」臼井茂樹提議以新的辦法來達到駐兵的目的。

「「駐兵」二字公開地說出來，對國民政府是有危害的，秘密協定可以考慮。」章友三對臼井的建議表示同意。

「把防共協定對外發表，將駐兵問題搞秘密協定怎麼樣？」今井武夫十分狡猾。

「原則上是可以的。」章友三同意了。

「没有别的意見嗎？」今井問。

「別給會談製造妨礙是必要的。」「宋子良」没忘記用剛發生的泄密事件敲打一下日本人。

「日本還有别的什麼意見？」章友三問道。

「對汪兆銘問題，你們的意見如何？」今井知道汪精衛投日後，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已經成爲臭名昭著的漢奸，國民黨也多次發佈文件，揭露和批判汪精衛的叛國投敵罪行。但日、蔣談判，汪精衛是不能回避的難題，而日本政府和軍部都認爲蔣、汪合流共搞「和平」是最理想的結果。

「這是我方掌管以外的事情，希望知道日本方面的意見。」章友三表示日、蔣和談不應涉及汪精衛問題。

「日方對汪兆銘是出于道義關係，所以希望重慶方面與汪派協議，進而合併起來。」今井道出了日本的目的。

「反對汪兆銘既是全中國的民意，那麼，在汪兆銘政府成立之前，建立日華和平是必要的。」章友三不失時機地道出蔣介石的阻止汪精衛建立僞政府的意圖。

「日華首先停戰，然後舉行重慶與汪派的合併會議，可以吧？」臼井茂樹遷就了蔣介石的要求，準備背後壓迫汪精衛不要急于成立政府。

「別給日華停戰製造障礙是必要的。」「宋子良」插嘴贊成，他知道，只要汪精衛不能如期成立僞政府，就是個不小的勝利。

「和平實現之際，國民政府應公開發表聲明，放棄容共、抗日政策。」今井武夫要求。

『國民政府將以誠意來處理這件事。』章友三表示某種程度的同意。

『爲此，就迅速達成談判協定吧』今井武夫感到和談達成協定的前途很樂觀，就提議道。

『同意。今天到此結束吧！』章友三說。

『結束了。明晚整理條文，後天寫成備忘錄吧！』今井說。

『可以。』章友三滿口答應。

三月九日，日本方面預先把雙方談判情況寫成備忘錄，交給中國方面的代表。會談在晚上九點繼續進行。

今井武夫毫不客氣，劈頭就問：『承認滿洲國的問題怎麼樣了？』

『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現在並無干涉的意圖，希望暫先不觸及這個問題。』章友三說。

『蔣介石委員長對表示承認滿洲國毫無異議，』『宋子良』插嘴，『只是準備採取緘默態度，亦即事實上等于承認。可以打這麼個比方：滿州國宣佈了獨立，從中國角度看來，好像一個不貞節的妻子，私奔到姦夫那兒去了。從而，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無異乎脅迫本夫正式承認姦夫、淫婦二個結婚。本來既然默認，又不故意堅持異議，即便不發給結婚證書，長此不去，豈不就自然解決了嗎？……』

今井武夫等人聽到這裏，心中暗自好笑。

『因此，如果解決的話，也要四、五年才能解決吧。』『宋子良』說，很得意地地一笑。他卻不知道日本人非但沒有被他的比喻打動，而且正在嗤笑他呢。

張治平見勢頭不妙，趕緊補充：『現在承認的話，會引起國際上的誤會，政府會失掉國民的信任，以後向外國借款就困難了，所以希望研究一下方法。』

『在重慶也有各種派系的軍隊，如果現在承認的話，會使形勢變得險惡。我們要聽候最高當局的指示後，在正式代表會議上來決定如何？』章友三又說。他是想儘量拖延這個問題。

『在日本這是最關緊要的問題。』今井不想拖延下去，就語氣嚴厲地說：『本問題如果難望解決時，正式代表會議的召開就困難了！』

『我們明天晚上飛往重慶，等四天後，可能給日方以答覆。』章友三還是個『拖』字。

『我們後天也要回東京，根據貴方的回答結果，再決定委派正式代表。』今井武夫仍然緊追不放。

會談至晚十一點三十分結束，約定第二天晚上整理條文而宣告會談解散。

蔣介石忽然發現自己被引上絶路

第二天，三月十日，正午稍過，張治平來訪鈴木卓爾，告訴他：『中國方面委員會昨夜徹宵協商結果，決定大體同意貴方提出的備忘錄，作了一些改動後，並已經向重慶政府請示。』

鈴木接過備忘錄，仔細讀起來：

備忘錄

日華兩國爲了確保東亞永久和平，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作爲締結和平條約的基

礎。並爲迅速停戰、調整邦交起見，一致認爲雙方有協議的必要。經研究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條　中國以承認滿洲國爲原則（在恢復和平後），日本對中國尊重主權的獨立及領土的完整。又，不干涉其內政。

第二條　中國要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戰的同時，發表此項聲明。

第三條　日華兩國爲了共同防共，締結防共協定。其原則內容以及日本在內蒙與華北若干地區，在一定期間內駐紮所需軍隊的要求，將以秘密條約締結之（本條款在恢復和平後協議之）。

第四條　在華北及長江下游地區，應取得日華經濟合作的實效。關于華北重要資源，中國對日本應提供便利，共同進行開發（中國自然處于主人地位）。

第五條　日華兩國保證承認日華兩國國民在兩國國內，有居住及營業的自由。日本要考慮撤銷在華治外法權及歸還租界。

第六條　爲求日華提携合作，中國從日本招聘軍事及經濟顧問。

第七條　停戰協定成立後，國民政府與汪兆銘派協力合作，但日本不干涉中國內政。

第八條　日本在恢復和平的同時，務須盡速撤回派遣到中國的兵力。隨之，中國確保各地區的治安，並保證條約的執行。

鈴木見關鍵性的改動，只有第一條『中國承認滿洲國』和第七條，『停戰協定簽訂後，國民

政府與汪精衛派等合作，重新組成新政府。』一共兩處改成現在的樣子，不免十分高興。

今井武夫和臼井茂樹看到中方修正的備忘錄，也是大喜過望，只等着晚上簽字通過。

三月十日晚九點，第四次會談開始。

章友三没等今井武夫等人說話，搶先發言：『今日上午十一時，接到蔣介石委員長的長篇訓令，因整理電文直到傍晚才完。』

望着今井等人期待的目光，章友三一語驚人：『希望日方在昨日的備忘錄上、中國方面在新的和平意見上分別簽字。』

爲什麼蔣介石突然來了這麼一招呢？因爲他忽然發出自己被日本引上了絕路，害怕了。

蔣介石很清楚和談的關鍵，即雙方急執不下的地方，就是承認滿洲國、撤兵、汪精衛政權三個問題。

首先是承認滿洲國問題，蔣介石只想使其成爲中、日兩國的保護國，或者默認現狀；而日本則必欲蔣介石公開聲明承認其脫離中國的獨立性與合法性，來鞏固這個侵略果實。板垣征四郎曾說過：『不論秘密會談能否成功，中國應承認滿洲國這一條，這是日本的絕對要求。』蔣介石深知，一旦公開承認滿洲國，自己的政權立時便有垮台之虞。

其次，關于日本撤兵。日本以防共爲借口，要求在内蒙和華北等地駐兵，以求軍事佔領合法化。而蔣介石則要求撤兵。最多只能在内蒙駐軍，在日本的堅持下，又答應其緩撤並以密約定下來。但東條英機多次講到，决不能在中國撤兵。日本答應緩撤也不過是推延之詞。蔣介石很清

楚，所謂歸還租界之類不過是誘餌而已，如果日軍佔領中國，歸還租界便毫無價值了。如果承認這一條，就等于他蔣某人投降和垮台。

再次，關于汪精衛政權。日本欲使中國淪爲其殖民地，必須製造傀儡政權，汪精衛是典型的親日派、投降派，而蔣介石則有嚴重的親英、美傾向，因此日本希望蔣政權淪爲地方政權最後消滅之，或者搞以汪精衛爲主的汪、蔣合流，使蔣成爲汪的附從和二等傀儡。蔣介石自然不肯吞下這枚苦果。他也深知，汪精衛已臭名昭著，一旦蔣、汪合流，也就等于蔣某人的覆滅。

考慮到這些危險，蔣介石忽然變計，不肯在備忘錄上簽字了。所謂分別簽字，也不過是個遁辭罷了。

蔣介石另立一攤，搞的和平意見如下：

和平意見（中國委員）

中華民國、日本帝國爲謀確保東亞之永久和平，基于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主權獨立的原則上，結束中日戰爭的研究，茲經詳細協議後獲得之結論如下：

第一條　關于滿洲國問題，中國在原則上同意考慮，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議之；

第二條　關于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問題，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此條應包括在第三條範圍內）；

第三條　關于共同防共問題，原則上同意，但軍事秘密協定在和平恢復後秘密協議之；

第四條　關于經濟合作問題，原則上同意，但資源開發，中國應處于主權者地位；

第五條　關于中日兩國居民居住、營業自由問題，絕對同意。同時，日本帝國應考慮取消在中華民國之治外法權及租借地；

第六條　關于顧問問題，中日兩國爲提攜合作，如中國需要技術顧問時，得招聘日本帝國之軍事及經濟專家爲顧問，但不得干涉中國之內政；

第七條　關于汪兆銘問題，此純爲中國內政問題，在和平恢復後，以汪氏與國民黨歷史之關係，中國當有適當處置，無庸提爲和平條件之一；

第八條　關于撤兵問題，日本帝國應于和平妥協時，將在華軍隊從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遲撤退，至各地方治安，由中國政府維持之（撤兵步驟另細訂之）。

附則：

以上意見，日本帝國不得視中華民國爲被征服國。中日兩國應站在平等之立場，以最高誠意的公平互讓爲結束戰事之基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日

今井武夫等人明白，備忘錄對日本極爲有利。而這八條和平意見則針對備忘錄的八條，有的予以否定，有的予以修改。眼見煮熟的鴨子又要飛了，叫他如何不急。

今井武夫馬上反駁：『備忘錄是日華兩國委員，歷時三天討論的結果，好不容易才求得一致意見的成果。日華委員應一齊在這上面簽字。』

章友三說：『雙方代表一致通過的備忘錄可以作爲參考意見予以保留。』

雙方由此爭執不下，互不讓步。開始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激烈辯論。

最後，章友三只得表示：「作爲中國方面的委員，作爲當事者，我們也不好表示不同意在備忘錄上簽字。我們可以保證，趕快返回重慶，把這次會議的氣氛以及日方不存私心的主張向蔣委員長及其手下的首長們匯報。我們一定從內部努力，務必促使承認這個備忘錄。」

今井武夫這才鬆了口氣，表示諒解。于是，雙方分別領取了備忘錄和和平意見。

此時，臼井茂樹還沒有忘記提出新的要求：「日方希望把海南島設置爲海軍基地，供日華兩國海上防禦使用。」充分表現出貪得無厭的兇殘嘴臉。

章友三對此以須請示爲由搪塞過去後，提議：「以後再開正式停戰會議時，應避免在香港，可選定在馬尼拉等其他第三國進行。」

今井武夫表示同意。『宋子良』又和鈴木約定，至遲一周內攜帶正式答覆返回香港。歷時四天的會談就此結束。今井武夫自稱：「當時無不滿帶希望的神情，于當夜十一時半就解散了。」『宋子良』于十一日凌晨二點，陳超霖和章友三則于十二日凌晨二點，分別由香港起飛前往重慶。今井武夫和臼井茂樹也于十一日從香港乘船離開香港，分赴南京和東京，留下鈴木卓爾在香港等待『宋子良』的回信。

『蔣介石終于辜負了我們的期望』

回到南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度日如年，焦急地等待「宋子良」給鈴木的答覆。

他不能不着急因爲汪精衛政府已經宣告了成立日期：三月二十六日。日本要人和參加汪僞政權的大小漢奸已經雲集南京。成立僞政權的活動已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西尾壽造總司令也焦急地等待蔣介石的回音。到了三月十九日，還是沒有回音，他只好派犬養毅和板坦征四郎出面，讓汪精衛同意，把『國民政府的還都』典禮推遲四天，到三月三十日再舉行。

三月二十四日，蔣介石的簽覆終于從重慶傳到鈴木卓爾手中，內容是：

『關于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意見分歧，形成對立，很難作出決定。因此，確切答覆希延期到四月十五日』。

今井武夫大失所望。

西尾壽造大失所望。日方決定不再拖延汪僞政權的成立。

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國民政符終于『還都』南京了。

宋美齡爲蔣介石搬來十萬雄兵

宋美齡圓滿完成了『側面援助』香港會談的任務，對自己十分滿意。直可謂夫人出馬，一個頂倆。

但是如何完成請宋慶齡到重慶的任務，爲蔣介石搬去十萬雄兵呢？

宋美齡和大姐靄齡幾經商議後，聯袂叩開了九龍嘉林邊道二十五——二十七號宋慶齡公館的大

門。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宋慶齡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中去了。上海淪陷不久，她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來到香港，利用香港人才薈萃、信息靈通的有利條件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開展抗戰救亡工作。她深知，堅持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綫，是抗戰取得最後勝利的保證。爲爭取國際友人、海外華僑的援助，她以民族利益爲重，拋嫌釋怨，團結在政治上長期分道揚鑣的親屬宋子文、孫科，發起保衛中國大同盟。宋慶齡氣憤蔣介石消極抗戰，憑險偏安蜀地，更氣憤汪精衛叛國投敵，並宣佈成立傀儡政權。正當她思索如何遏制汪精衛僞政權建立，至少抵消汪僞政權帶來的消極影響時，她那『鷄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阿姊靄齡和小妹美齡找上家門。她深知自己三姐妹的地位及在抗戰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因而興奮地把兩個迎進門。

很快，姐妹三人都聚居在宋靄齡的宅第。政治上的分歧在日寇的逼迫下被摒除了，三姐妹形成了一個『聯合陣綫』。三姐妹一起聊天，一起烹飪，一起回憶幼時的逸聞趣事。三姐妹在多年分離後，終于一起度過了一段充滿親情的日子。

宋美齡成功地使阿姊慶齡同意同赴重慶，行期就安排在汪精衛就職典禮的時候，向全國、全世界表示團結抗戰的決心。向日本和汪精衛示威。但是，阿姊慶齡提出個條件，要大姐靄齡一個月後陪她回香港。因爲，她清醒地認識到，蔣介石仍然在背叛中山先生的遺訓，仍然在消極抗戰。另外，香港還有無數工作等待着她。

臨行前，三姐妹在宋子良的安排下，一起出現在香港飯店，向世人表明三姐妹的團結。這事立即引起轟動。

四月一日，汪精衛的南京僞政權成立的第二天，還是那架著名的「DC—3」型客機從香港啓德機場緩緩起飛，載着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向烽火遍野的中國大地飛去。

第九章

澳門會談

中國方面不能輕易下決心召開最高級會議

雖然今井武夫認爲蔣介石「終于辜負了我們的期望」，但他不死心。他知道，要解決中國問題，不和蔣介石打交道不行。

西尾壽造也曾指示鈴木卓爾：會談即使延續到四月，也不要使對方失望。

西尾壽造在三月十七日就接到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的重要指示，《大陸指第六七六號》，要他根據大本營三月十五日制訂的《桐工作實施要領》與重慶政府代表進行停戰談判。

對于《桐工作實施要領》，西尾壽造仔細研究了一番。

這個《要領》分三個部分：「停戰的條件」、「停戰綱要」、「處理桐工作與建立新中央政府工作關係要領。」

停戰條件基本還是老樣子：中國承認滿洲國；停戰同時「聲明放棄抗日容共政策」；「日本在蒙疆及華北要地駐紮一定的軍隊」、「蒙疆成爲防共特殊區域」，並且，「駐兵一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保密』；『在華北及揚子江下游地區實行經濟合作』，『華北重要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給日本以特別方便』;在『華南沿海特定島嶼上(包括海南島),實行海軍軍事上的合作』,並且可『保密進行』;中國要『從日本招聘軍事及經濟顧問』;『中國允許和保證日本人在中國內地居住和營業的自由』;『與汪精衛等新中央政府組成分子協力合作』。這些條件之後,還是拋出兩個並無實際意義的甜果子:即中國答應上述條件後,『日本將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其內政』,『日本考慮撤銷治外法權,歸還租界。』

停戰綱要部分則指出:停戰協定的有效期間,『定爲自實行停戰的第一天起的四周間』;停戰期内,『禁止通過宣傳、聲明等進行的一切敵對行爲』;停戰協定適用地區,『定爲能夠執行蔣軍所發之停戰命令的地區』,並且,『在停戰期間遭共軍攻擊時,日華協力予以討伐』;停戰的實行,『需要在兩國軍隊之間劃定一定距離』,而且『不得使最前綫的日軍後退』;『艦船除不得炮擊對手國外,在海上行動不受約束。』

至于『桐工作』與『建立新中央政府』關係,則指出:『不能以中止或延期建立新中央政府作爲停戰條件』;『在建立新中央政府之前舉行停戰協定簽字時,要轉告汪精衛,祝賀「和平」運動的成功,以促進對重慶的合作』;如汪政權建立先于停戰協定簽訂,『應盡最大努力使重慶方面接受。爲此,我方對承認新中央政府的時間,準備有所保留。』

這個《桐工作實施要領》,仍然是個無所不包的滅亡中國的條件。

但,西尾壽造認爲,蔣介石可以接受這些條件。儘管蔣介石又在故意拖延,西尾壽造卻覺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西尾壽造得知：四月十一日，『宋子良』從重慶回到香港，告訴鈴木卓爾重慶政府已決定了成熟的方案，要求再次舉行預備會談；五月七日，章友三到達香港，宋美齡也要到香港來『治牙病』了。

于是，西尾壽造命令今井武夫于五月十一日再赴香港。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晚九點，九龍半島酒店二四三號房間，『宋子良』、章友三和鈴木、今井、坂田特派員會面。

章友三告訴今井武夫：『可以說當前和平的難題是中國承認滿洲國，與部分日軍駐兵問題。這暫且放它一放，留待日華恢復和平後，再談判解決。這樣作，雖然給汪兆銘政府的善後問題多少帶來些困難，但料定還不致造成決定性的障礙。因此只要秘密預備會議日華雙方取得一致意見，日華兩軍即可停戰。同時，重慶政府將發表反共聲明。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馬在澳門舉行第二次會談。』

今井武夫見章友三說汪精衛問題不會成爲『決定性的障礙』，認爲這個問題似乎比較容易解決了。但是，今井武夫也清楚地知道，在承認滿洲國和日軍駐兵問題上，蔣介石是不會作根本讓步的，同意默認和以後用秘密協定解決駐兵問題，就已經算不錯了。只是日軍中强硬論根深蒂固。今井武夫一想到這裏就頭疼，自認『從日軍的實際情況中還看不出任何能夠解決的曙光』。

今井武夫感到，日本方面不緩和一下條件，和平會談的成功希望就很渺茫。因此，在動身來香港前，他還特地去見板垣征四郎，申述緩和日方要求的必要性，但是板垣卻明確告訴他：『不

管談判成功與否，中國必須承認滿洲國，這是日本的絕對要求。』而且竟然還說：『「承認滿洲國」不就是五個字嗎。』似乎承認滿洲國對中國、對蔣介石是小事一樁一樣。

今井武夫想：『那些多少心存希望的觀望者、持强硬論的人們，如果身爲代表親臨會議，到了關係到和平談判成敗的最後關鍵時刻，他們怕不會死硬地固執已見以會議的決裂爲賭注吧。』

不管今井武夫怎樣想，上峰的命令總要執行，而按這個命令談就不會成功，怎麼辦呢？

眉頭一皺，今井武夫有了主意：直接召開兩國首腦人物參加的巨頭會議，到那時，即使蔣介石不肯正式承認滿洲國，也是木已成舟，對日本來説便不足爲慮了。再說，如果把板垣總參謀長拉到談判桌前，他也許會改變認識而讓步吧。

于是，今井武夫提議：『鑒于目前仍然有些問題難以解決，何不盡可能省略秘密預備會議，乾脆就此進行高級會談，一舉解決呢？』

章友三當然不同意，說：『現在舉行高級會談，時機並不成熟。再說，所謂高級會談，其實你現在實際上就是和蔣介石委員長會談，没有比這更高級的了。請相信我們，要大人物出場，也得到會談成功時才行，這是躲避不了的事。』

今井武夫自然極力促成正式的巨頭會談，因此他又問：『若舉行高級會談，日方可以由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出席，中國方面由誰來參加呢？』

章友三說：『高級會談，倘能如期召開，重慶政府準備派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羣或軍政部長何應欽與會。』

今井武夫又說：『日本內部持強硬論調的人很多，把承認滿洲國作爲日本最起碼的、絕對的要求。而中國方面又不肯承認滿洲國。雙方差距太大，我們作爲和談委員，又難以縮小這個差距，因此，最好的辦法還是省略秘密預備會議，盡快召開高級會議，讓兩國的負責任的人當面說清，問題就較容易解決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章友三亮出了底牌，『中國方面的意見認爲，一旦召開有雙方要人參加的高級會議，不論會議成功與否，僅僅因爲召開會議這個事實，就會給共産黨及其它抗戰強硬派造成反對蔣介石的口實，進而發展成爲內戰。這一點是洞若觀火的。因此，高級會議召開的時機，一定要以簽訂協定爲前提，且必須準備好剿共的部署才行。』

『也就是說，』章友三換了個角度，『高級會議一經召開，即使中國方面對內容不滿意，但除了承認日方的提案外，別無其它的方法了。』

今井武夫口中稱是，心中卻十分尷尬狼狽，因爲對手把他的如意算盤點破了。

最後，章友三的結論是：『只要秘密會談中對日方的最後方案不能確認以前，中國方面就不能輕易下決心召開高級會議。』

今井武夫暗自叫苦：還繼續進行爭論不休的秘密預備會議，達成妥協的希望仍然渺茫。

忽然，今井武夫心念一動：蔣介石有誠意和談嗎？該不是他在搞什麼陰謀吧？

『宋子良』對今井武夫透露『真心話』

天終于暗下來了。

今井武夫看了看錶，時間到了。他深深吸了口氣，急急忙忙地抓起外套，三步並作兩步地跨出門外。

直到現在，今井武夫心裏還納悶。『宋子良』請自己到香港島南岸的香港仔蘆山酒家喫晚飯，而且講明了只請了自己一人，他到底搞什麼名堂。想聯絡感情？沒有必要，而且時機也不恰當，和談還未有結果，該做的事太多了。想秘密地談談？人來人往的酒店裏也不方便。真是奇怪。不過，今井武夫還是打定主意，倒要看看『宋子良』想幹什麼。

八點三十分，今井武夫準時走進蘆山酒家的大門，一眼就看見『宋子良』在靠窗子的一張餐桌旁坐着，正滿臉笑容地向他招手。

今井武夫徑直走過去，坐下。『宋子良』則忙着招呼侍者上菜。酒菜上齊，『宋子良』端起酒杯，『來，咱們先乾一杯。』

『宋先生今天這麼高興，有什麼喜事啊？』今井武夫把酒杯放下後問。

『没什麼，我是忙裏偷閑，樂一樂，放鬆放鬆嘛。』『宋子良』哈哈一笑，接着就張羅着勸酒、佈菜。

兩人酒足飯飽，『宋子良』興致不減，提議到海灣裏泛舟賞月。今井武夫欣然同意。于是，

兩人走出酒店，到碼頭上租了條小船，向海灣裏划去。

這天是農曆十四，月亮已經圓圓地掛在天上，海水像金波銀波般蕩漾起伏，微風徐來，岸上的燈火和高峻的山峰的黑影更顯得旖旎動人。兩人坐在船上，望着這迷人的海灣夜景，呼吸着新鮮的海風，都有些陶醉了。

良久，今井武夫打破了沉默，『宋先生今天請我來欣賞這美麗的海灣，興致真高啊。』

『唉』，『宋子良』嘆了口氣，『其實我心裏也急得很哪。不瞞你說，我在重慶爲了推動和平煞費了一番苦心，也花費了不少經費。如果這次和平談判不成功，那我就……』

『我明白你的意思』，今井武夫微微一笑。

『不談這個也罷。坦率地說，我甚至已經考慮到，若發生萬一情況，我們雙方都要有採取非常手段的決心，作爲最後的對策。』『宋子良』顯得很坦率。

『我個人認爲理當如此。』今井武夫對『宋子良』表露出來的對于和談成功的熱誠期望很滿意。

『有些事情你可能還不了解』，『宋子良』突然壓代了聲音，『蔣委員長表面如何暫且不談，他內心希望和平確屬事實。因而，在香港首次秘密會談的備忘錄上記載着，日方倘對第一條和第三條承認中國方面的意見時，協定必然能達成。』

見今井武夫在聽，『宋子良』繼續說：『目前，在重慶政府內部，反對達成和平的是共產黨和馮玉祥。』

『是麼？』今井武夫來了興致。

『對共産黨，如果秘密會談一旦達成協議，當然要進行討伐』，說到這裏，『宋子良』把手一揮，『而且，討共計劃業已制訂，如果可能的話，希望在七月底以前就實施。胡宗南、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薛岳等將領已經集中到重慶，並且已協商完畢。因此，恢復和平以後，恐怕還要向日本請求武器補充等等的援助哪。』

『噢！』今井武夫鼓勵『宋子良』說下去。

『看來，中國方面在日華停戰的同時，就要發表反共宣言，所以在下一次秘密會談中，涉及時機內容等項問題，希望能與日方協商解決』，『宋子良』說。

『那麼馮玉祥呢？』今井武夫誘導『宋子良』繼續說下去。

『對于國民黨內反對派元兇馮玉祥，蔣委員長準備使用各種方法挫傷他的鋒芒，實在不得已時，甚至將採取最後的强硬手段』，『宋子良』回答得很乾脆。

今井武夫没想到『宋子良』會把國民黨內部機密向他和盤透露，于是乘勝追擊，談到召開第二次秘密會議的問題。兩個人又就一些細節問題商談了一陣，最後意見大致趨于一致。兩個人就又蕩起槳，向岸邊划去。

周佛海取笑日本人不辨真僞

五月十八日，今井武夫乘上『白銀丸』，從香港啓程，趕回南京，匯報和談的進展情況。輪

船經台北向上海駛去。

日本參謀本部顯然十分關切『桐工作』的進展，特別派遣門松少佐隨今井武夫一同登上『白銀丸』，及時了解情況。因爲門松是參謀本部派來的，今井武夫不敢怠慢，一路上並没有功夫享受旅途的愜意，而是詳細向門松匯報。

今井武夫對于『桐工作』的前途樂觀，他仔細地把談判中的細節說給門松，還特別提起了『宋子良』和自己在小船上的密談。

『没想到『宋子良』說話那麽坦率』，今井武夫得意地說：『從他話裏話外，我感覺『宋子良』一定是爲和談投入了一筆不小的個人資本，所以他才對和談成功急不可耐。看來，這次和談如果失敗，『宋子良』要賠上一大筆了。

對于『宋子良』的得失，門松並不放在心上，他不緊不慢地問，『噢，有這個可能性嗎？』

『可能性比較大』，今井武夫趕緊退了一步說，『從他對我透露的中國內部機密看，「宋子良」的誠意和熱情是可以肯定的。』其實，今井武夫對『宋子良』並不十分了解，他總覺得『宋子良』像個謎，處處透着古怪。這次他回南京，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查清『宋子良』的真面目。

門松似乎看穿了今井武夫的心思，好像很隨意地問了一句，『聽說，有關方面對「宋子良」這個人有懷疑，是嗎？』

『是』，今井武夫趕緊回答，『自從去年十二月，鈴木與宋開始會見以來，「宋子良」這個人確實有許多疑點。因爲我們周圍找不到過去與他熟識的人，我們就擴大範圍來尋找和他有過交往的

人，目前爲止還沒有結果。雙方都對和談持嚴格保密態度，特別是重慶更是再三聲明要確實保密，我們就難以向中國方面公開聲明求證，所以得不到重慶方面的積極協助。無奈，我們只好姑且相信那個香港大學的張治平的介紹。可是，在首次秘密會談中，陳超霖和章友三兩人都攜帶着身份證明書，唯獨「宋子良」一人未曾攜帶，而且在會談席上，以發言的狀況和地位的比重來，「宋子良」總是打圓場，沒有什麼有份量的話，這也有叫人懷疑的地方。』

『就這些嗎？』門松似乎很不滿意。

今井武夫趕緊往下說：『還有，關于「宋子良」的能力，中國人是有些風傳的，同這個實際對手比較起來，卻存在優劣之別。這就更加深了我們的疑問。恰好趁這次半島酒店會談的機會，決定進行深入的調查。我們安排了從中國事變前與「宋子良」相識的一些中國人，在第二課的參謀岡田芳政中佐等人的努力下，搜集情報，查閱文獻資料，但沒有找到任何可下斷言的材料，很難弄清問題。舉個例子說，根據幾種「人名鑒」所載，僅就他的出生年月日一項，就有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九年兩種說法。即使像有名的宋美齡女士，也有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一年生的兩種說法。我們連「宋子良」究竟是宋美齡女士的哥哥，還是她的弟弟都不能斷定。就按「宋子良」是一八九九年生人，大致認爲他是宋美齡的哥哥，把所有資料綜合起來判斷，「宋子良」的特征該是……』

今井武夫喝了口酒，繼續說道，『「宋子良」年齡三十四歲，獨身，身量矮，大概一米六左右，面貌平庸，左手曾患過類風濕病，活動受限制，四方臉形，膚色微黑，唇厚有黑痣，說話

快。他還特別嗜好雪茄。」

『是嗎？』門松很感興趣。

『另外，據與其兄長宋子文有交情的四明銀行董事長吳啓鼎的説法，宋家好像是海南島黎民出身，身體四肢發育不均衡，男孩的名字簡單不能成爲其特點，並説「宋子良」臉上沒有黑痣。照他所説，如果和我們的實對手相比，倒是很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像之點。不過，據自稱與「宋子良」會見過的日方全體人員的意見認爲，完全難以斷定是另外一個人。」

『看來，要查清這個對手的真實身份還真不容易啊。』門松感慨地説。

『是啊』，今井武夫表示同感，『不過，趁這次在半島酒店會談的機會，鈴木趁他們沒有察覺，暗中從門鎖洞孔，拍攝了會談中的「宋子良」的照片。』

『這樣就好辦了。』門松高興地説。

今井武夫卻苦笑了一下，『只是照片的效果差一些，現在還難説有什麼作用呢。』

二十一日，今井武夫一到南京，就趕緊把從香港帶回的『宋子良』的照片拿出來，給汪僞政權的陳公博、周佛海等許多要人傳看。結果仍然不得要領。周佛海説像宋子良，但更像他的弟弟宋子安；陳公博説不像；四明銀行的董事長吳啓鼎也説像宋子安，等等，衆説紛紜。搞得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既惱火又無奈。

當時，日本人曾接獲這樣的情況：有個重慶政府派到香港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藍衣社）的香港地區負責人，名叫王新衡，生于浙江省奉化縣，與蔣介石是同鄉，得到藍衣社首領戴

笠的信任，年三十六歲，面色白皙，身高約一米六。日本人認爲，只從容貌圖像來看，王新衡的相貌比起宋子良來，更與實際的會談對手相像，因此，王新衡似乎就是談判的對手。

最後，還是不能斷定自稱爲『宋子良』的這個人的真假。今井武夫這樣分析：『從他與藍衣社之間的關係似乎特別密切這一點，再從會場周圍的警戒情況和透露有關肅清反對和平派的內幕及其它方面來判斷，確有充分可以首肯之點。至于他們與重慶政府中樞要人有直接聯繫這一點，可由下面種種情況不難推測出來：如陳和章出示的身份證明書；他們乘飛機在重慶和香港間隨時往返聯繫；還有，會談席上作出充滿信心的回答等等情況。此外，中國方面委員也曾講過，他們每逢來香港時，宋美齡似乎也相隨而來。而且，從歷次新聞報道中可以證實。』最後，今井武夫的結論是：『我們對于這個自稱「宋子良」的替身儘管有不少疑惑，但大家商定今後不再過分拘泥于他的真假問題了。』

對于無法查清『宋子良』這個人的真假，今井武夫只好掩飾說：『本來我們充分諒解像「宋子良」這樣地位的人，不是處理和平大事的那樣高級人物。我們一向只不過是利用他作爲和平路綫的窗口，不强行論及他這個人物的大小和職位的高低，所以今後把重點放在專以這條路綫溝通與重慶的直接聯繫方面上去。因此，仍然繼續會談下去。』

日本因爲急切希望盡快解決中國問題，趕緊從中國拔出脚來，因而對一切聯繫渠道都不放過。鑒于與重慶的聯絡路綫很難開闢，因此大本營決定，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仍然不放棄『桐工作』，但要採取一面慎重地警惕，一面繼續談判的方針。

周佛海爲此曾取笑日本人：『數月對手之真僞尚莫辨，實一笑話也。』

當然，日本人最終還是清楚了會談對手『宋子良』確實是假的，只不過時間晚了些。一九四五年六月上旬，上海日本憲兵隊逮捕了一個自稱是藍衣社社員，名叫曾廣的人。一天犯人們在放風時，一個曾參加香港密談的日本翻譯，一眼就認出這個曾廣就是當年自稱『宋子良』的人。曾廣直認不諱，還公開對日本人說：『日本到今年九月一定要慘敗。』今井武夫當時正在上海，便想通過他尋求『和平』，到獄中去跟他談了幾次。日本投降後，曾廣恢復了自由，而今井武夫卻被拘留在南京，曾也到獄中去看今井武夫。到一九五五年，兩個人還有書信往來。這自然是後話了。

宋美齡得意洋洋飛回重慶。她不能不得意洋洋，因爲她的支持督促幫助，中日香港會談總算有了些成果，而且更令她得意的是，她成功地把二姐慶齡，這位在國共兩黨及其它黨派有强大號召力的『國母』，還有大姐靄齡一起請到了重慶。宋氏三姐妹的專機一飛到重慶，立即在霧都上空扯出一條晴朗的天空，在日機狂轟濫炸下艱難度日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因爲宋氏三姐妹的一同出現，本身就是個强有力的象征，全民團結抗戰的象征。各黨派勢力都借孫夫人、孔夫人蒞臨重慶之題大作文章，蔣介石更是借機大樹抗日民族領袖的高大形象，力圖改變自己的孤立地位。然而，借來的强心針不可能根治軀體中的痼疾，就在宋氏三姐妹旋風般地視察重慶、成都，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抗日熱潮時，蔣介石發現自己的日子又一次變得難過起來。國際反法西斯戰場節節失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國內抗日戰場上失利的戰報也雪片般飛向他的案頭，叫他難以高興起來。

這天上午，戴笠匆匆走進蔣介石的官邸，雙手呈上一份機要密件。

『報告校長，這是日方對香港秘密會談的反應情報。』

蔣介石伸手拿過這份密件，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着，表情越來越凝重。等他看完，把密件往桌上一扔，就往後一靠，許久不說一句話。

戴笠察言觀色，見蔣介石那出神苦思的樣子，不敢貿然提問。寬敞的房間裏空氣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嘀嗒嘀嗒的鐘擺聲在襯托這緊張的空氣。

『你對日方要求承認滿洲國一事是怎樣看的？』蔣介石終于開口打破了沉寂。

『我認爲這是日本的絕對要求。』戴笠看了看蔣介石那緊鎖的雙眉，『您方才看過的密件，其中有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說的一句話……』

『承認滿洲國不就是五個字嗎？』

『對！對……』

『對個屁！』蔣介石狂怒地罵了一句，又習慣性站起身了，在屋子裏急速地走來走去。終于，他壓下了火氣，停住腳，看了一眼惶恐不安、躬身待訓的戴笠，伸手示意：『坐，請坐下。』

戴笠毫無表情地坐回到沙發上，欠身聆聽訓教。

『承認滿洲國』，蔣介石語氣格外沉重，『等于我放棄收復失地的宣言！同時，也就等于我把抗日救亡大旗拱手交給共產黨，交給國民黨內部反對我的人。從此，不僅黨要分裂，國家要大亂，我蔣某人也就成爲汪精衛第二！』

『校長所言極是，但是……』戴笠又身不由己地站起來，『整個國際形勢對我們很不利，校長身上承受的壓力就更大了！』

蔣介石聽到這兒，只是重重地嘆了口氣。

戴笠見狀，就繼續說道：『投降德國的法國政府準備讓出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利益，封鎖桂越公路；無暇東顧的美國政府，也準備封閉滇緬交通綫。』最後，他憂心忡忡地說：

『加之，日本人封鎖了自大連至廣州的海防沿綫，這就等于…』

『切斷了我們所有的國際補給綫，把我蔣某人困死在四川！』蔣介石漠然冷笑，又搖頭自嘆地踱起步來。

戴笠知道蔣介石又苦無良策了。遂告辭悄然離去了。

日本政府和軍隊對『桐工作』的進度太慢不滿，既然誘蔣投降不太成功，那就在軍事上加大力量，壓迫蔣介石讓步、投降。于是，岡村寧次選調湘、鄂西北隨縣、棗陽地區的日軍向國軍發起進攻。蔣介石命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率部迎戰。這就是著名的隨棗戰役。

由于戰區緊臨川東，雙方打得十分慘烈，陪都重慶朝野上下爲之震動，一時『四川難保』的謠言不脛而走，人心慌慌。五月七日清晨，宋美齡由孔公館匆匆趕回委員長官邸。望着面對軍事地圖冥思苦想的蔣介石，她十分不安。

『Darling，鄂西戰况怎樣？』

『不樂觀！』蔣介石隨手抄起教鞭，指着標有不同記號的軍事地圖，『今天，棗陽陷落于敵手

無疑。接下來，新野、唐河、南陽、桐柏等也必將陷落。我看無需幾天，國軍就會大敗于鄂西……』

宋美齡聞言大驚失色。雖說她不懂具體戰役的勝負得失，但她確知鄂西作爲出川門户的戰略價值，不免擔憂起來：

『一旦隨棗失守，這天府之國……』

『安然無恙！』蔣介石放下手中的教鞭，『當年的劉備劉玄德，雖失出川的白帝城，但仍握有入川的咽喉要塞夔門，還是能穩坐川中。今天的日軍再强大，他也無法强行逆流闖過三峽。』

宋美齡這才長長出了口氣。

『二位夫人今天還回香港嗎？』

『她們堅持行期不變。』宋美齡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在這國難當頭的危機時刻，她們，尤其是我阿姊慶齡，是難以和我們共患其難的。』

『不要爲此傷情。她來重慶的作用已經完成了，我很滿意夫人的香港之行。』蔣介石好像很輕鬆的樣子，『夫人，我建議你隨二位阿姊再去一趟香港，幫我再去借十萬雄兵來。』

『怎麼？你還要讓我去香港？』

蔣介石深沉地點了點頭。

『我呀，』宋美齡爲難地嘆了口氣，『可没有辦法再去給你借十萬雄兵來了。』

『有！』蔣介石微微一笑，『夫人有辦法。這對夫人而言，易如反掌。』

『那我的任務……』

『第一，向日本人做姿態，我蔣某人和日軍交戰是出于被逼無奈。在你陪兩位阿姊返回香港的同時，我命令你那位假子良弟弟帶着我的手諭赴香港，重新開始所謂的秘密和談，借以減輕隨棗失利的壓力。』

『那第二呢？』

『請你的阿哥子文來重慶，接受赴美的戰略任務。』蔣介石望着鄂然的宋美齡，『把話說明白，就是請子文把美國拉到我們這邊，請美國人幫我們打日本！』

『他能完成如此重任嗎？』——『他能！』蔣介石很自信。

『Darling！你不要忘了這樣的現實：美國人幫助我們抗戰，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面而已。』

『放心吧！我算好了，要不了多長時間，美國人就會改變這種立場。』

『根據呢？』

『日本人趁英、法兩國在歐洲戰場上的失敗，一定會揮兵南下，搶奪英、法佔有的富饒的印支半島和印尼羣島。我想，美國人也絕不是有便宜不佔，把肥肉送人的傻瓜。他們作爲世界强國，當然知道菲律賓、印尼這些島國的戰略地位。這樣一來……』

『我懂了！』宋美齡露出了欣喜的笑靨，『我一定再幫你——不，幫我們再借這十萬雄兵來。』

宋美齡陪宋靄齡、宋慶齡返回香港的當天，戴笠奉命指示假宋子良（曾廣）等人攜帶蔣介石的親筆簽署的委任狀也返回香港，同日方舉行秘密的澳門會談。同一天，日軍攻陷棗陽。十日又

陷新野，十二日再陷唐河、南陽、桐柏等地。不久，李宗仁重新佈署，在南下增援的孫連仲集團軍策應下，實施反攻計劃，很快就收復了南陽、新野、唐河、桐柏等地。蔣介石喜慶勝利，只是美中不足，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不幸以身殉國。

澳門，一幢兇宅中，又一輪和談開始了……

『宋子良』在重慶時，就再三給留在香港的鈴木傳信，希望從六月四日起在澳門召開第二次預備會談。日方同意。雙方還商定由三日間香港首次預備會談的同樣人員參加。日本方面，除今井、鈴木、臼井三人外，還有總司令部派來的內之宮中尉任翻譯，片山參謀負責聯絡。六月三日，這些人都集中到廣東，四日下午五點又乘『白銀丸』冒雨抵達澳門。爲了避開外人的注意，他們分別住宿，今井和臼井住貝拉比斯塔旅館，鈴木住三和公司，内之宮住利貝拉旅館。

會談場所一切由中國方面準備。爲了切實保密，會場選在澳門市郊的海岸馬路上行人十分稀少的地方，臨時租了間空房。

六月四日晚上九點。張治平將日方人員接到會場。途中曾一度下車步行，在杳無人迹的黑暗道路上左拐右拐地走了好一陣，讓日本人心裏直犯嘀咕。好容易才到達會場，今井武夫一看這幢房子就覺得它像座兇宅。進門後，日方委員被引到地下室。房間中央擺着一張長方形桌子，桌子上一溜點着四支蠟燭。桌兩側放着椅子，雙方分別在兩側相對而坐。房子周圍由中方張漢年負責警戒監視。整個院子黑沉沉的，靜悄悄地似乎没有一個人。既便偶然路過的人，也絶不會想到這

幢房子的地下室裏，中日兩國的特命代表正唇槍舌劍，激烈地討價還價呢。

正式會談開始前，雙方首先互相出示委任狀，表明個人身份。日方先出示了閑院宮參謀總長的委任狀。「宋子良」也拿出自己的委任狀。委任狀寫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箋上：

茲派陳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決中日兩國事宜。此令。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二日

蔣中正

並有軍事委員會大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簽名及蔣中正小印。「宋子良」還一再解釋，爲什麼自己不用宋子良的名字，而使用宋子杰的名字。日本方面因爲已經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也就不加追究了。

今井見章友三左腳負了傷，跛足而行，關切地問原由。

章友三苦笑，「五月底，日軍飛機轟炸重慶時，我因爲向防空洞逃晚了一步，被炸彈碎片打成這副樣子了。」

陳超霖不想浪費時間閑扯，馬上大聲建議：「我們現在就開始吧。」見大家把注意轉向自己，他迅速站起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書面材料，大聲宣讀：

「蔣介石委員長最初雖然對本會談抱有懷疑，爲了明確日方的真意，曾批准陳、章等人參加香港會談。結果，相信有實現和平的可能性，終于下決心實現和平。」

讀完開場白，陳超霖轉入正文。「在首次香港會談中，關于中國承認滿洲國問題及日軍在中

國駐兵問題，因日華雙方意見不一致，故最後未能取得實質性的效果，甚爲遺憾。但另方面不得不確認，對于下列五個項目已收到了巨大的成果：

『一、過去，日華兩國間處于互不溝通心意的狀態中，但自香港會談以來，使兩國隔閡距離顯著縮小，從而中國相信有與日本接近的可能性。』

『二、中國的青年將領一向很難消除日本企圖完全征服中國的想法，通過這次會談逐漸得以了解日本的誠意。因此，考慮了今後爲實現和平而籌建組織的方案，對積極推進日華和平表示贊同。』

『三、以往中國對日本進行外交活動時總是抱有懷疑心理，認爲日本總在言外尚存在什麼不軌之圖。因此，凡當提出有關和平問題時，蔣委員長概予拒絕。香港會談後，才恢復了信任，知道解決事變的重擔完全落在板垣總參謀長一人肩上。因此，我們明確了儘管過去若干和平路綫曾被拒絕，但認爲現在我們這次的路綫是最爲確實可靠，堪稱捷徑，而且是最足以信賴的獨一無二的途徑。』

『四、中國共產黨料到在和平到來的同時，國民黨將立即發動對共產黨的剿滅戰，因而企圖儘可能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擴大自己的勢力。因此，國民黨各要人在香港會談後，對于進一步加緊防共方針的意見，愈趨一致。蔣委員長也派了有魄力之軍政要員數人到西北地區，命其擔當防止共產黨反抗的任務。中國的防共對策已開始轉入逐步實行的階段。』

『五、于五月二十八日已經和反對和平的急先鋒馮玉祥及其他將領進行商定，得知他們亦有

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條件若不甚苛刻，則表示不反對和平。過去的障礙既被排除，抗戰到底的口號亦會隨之消滅。』

陳超霖讀完書面發言，看了看桌對面的三個日方代表，穩穩地坐回到椅子上。

今井武夫端然坐在椅子上，不緊不慢地開了口：『日本在中國事變爆發後不久，即確定此次事變應從大局着眼，以調整日華邦交爲目標，因而發表了近衛聲明，但結果並未見到中國方面有反省之意。爲此，我部分國民對上述從大局着眼的政策產生了懷疑，以至今春在議會中出現了質詢演說。爲了將國內民心的動向引向和平，我方亦有不亞于中國方面的困難。因此，日華同志不應斤斤計較于訴說各自的苦衷，而必須以善意和同情之心，儘量減輕對方同志的困難。我建議此次會談應以第一次會談的備忘錄爲基礎，進行討論和研究。』

章友三輕咳一聲，開口把話題轉開：『中國政府對備忘錄第一條及第三，即承認滿洲國及日軍在中國駐兵問題，絕對難以承認。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諒解的話，希望今天首先就汪兆銘問題進行商討。』

『可以。』

章友三見日方點頭，便大談『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的觀點，並要求日本方面居間斡旋，或者叫汪精衛出國，或者叫汪精衛隱退。而當時日本正極力誘降蔣介石，實現蔣汪合流，自然對章友三的意見表示反對。

鈴木閫述了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日本對汪精衛先生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不能作有

違道義的行爲。再者，如果汪精衛先生下野，則必將引起日本國民要求蔣介石先生也下野的要求。』

章友三聞言，義正辭嚴：『蔣介石委員長身爲中國的最高領袖，汪兆銘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汪兆銘的所作所爲已經引起中國朝野的普遍譴責，反汪情緒高漲。因此有汪兆銘在，和平難以達成。』

『當此中日兩國期望道義結合之際，蔣汪同爲中國人，沒有不能合作的理由。希望重慶方面顧全大局，以道義爲重，本着善意的態度，從開始停戰到達成和談之間，與汪精衛方面通過協商解決。』鈴木還是强調『道義』、『大局』。

雙方你來我往，爭論不休，始終達不成一致意見。今井武夫見時間到十一點三十分了，就提議散會，明天再議。

『宋子良』步出會場，接到香港發來的電報，是宋美齡到香港後發出的，讓他前往聽訓。于是『宋子良』趕乘凌晨三點啓航的聯絡船趕到香港，得到蔣介石的訓命後又匆匆返回澳門。他的行踪爲日本情報人員掌握，只是日本人不知他帶回什麼訓令而已。

六月五日，晚八點三十分，中日兩方人員再次聚集在那座空房。『宋子良』等人似乎胸有成竹，提議就前一天未有結果的汪精衛問題繼續商討。

章友三首先接前一天的話頭繼續發言，『對于如何處理汪兆銘問題，我們進行了仔細磋商，想了一些辦法，但以汪兆銘隱退外游爲最上策，其部下可令其足資信任的人士主持處理。如果貴

國覺得不好辦，困難大，可以由我方派適當人物代表蔣委員長，在中立地帶和汪本人會面，就和平及其部下安置問題協商。」

見日方沒有立即表示反對，章友三又說：『蔣委員長肯于派遣代表與汪兆銘協商即是希望實現和平的重要表現。僅就此事而言，可以說是個顯著的讓步了。因爲過去汪兆銘逗留在河內時，曾提議派遣顧孟餘聯繫友好，爲蔣委員長嚴辭拒絕。之後，汪兆銘又再三提出同樣的方案，又一一遭到拒絕。現在蔣委員長肯派代表與汪聯絡，表示出相當誠意，再者，蔣委員長所派人員，定然會是與汪兆銘地位相等的人物。』

『對于中國方面的誠意，」今井武夫說，『我們很欣賞。但是，在蔣先生派遣的人士與汪本人會面之前，雙方應先派代表進行協商。而且，蔣先生所派人士必須是與汪精衛具有良好關係者，且絕不能將汪精衛作爲漢奸看待，應保證汪的身份。』

『這一點，我方可以考慮。」陳超霖表示同意。

『好，我再談談下一個問題，」章友三繼續發言，『香港第一次會談的備忘錄中，第三條關于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問題，我們原則上同意。但是，在和平會談中，絕不應該觸及日軍在華駐兵問題。希望恢復和平之後，在締結防共協定時，將日軍在華駐兵問題作爲軍事秘密協定加以規定。我們之所以如此主張，理由是充分的。因爲在和平會談中，如果締結日軍部分駐兵的協定，不僅難以取得我國國內諸多將領的同意。而且會破壞對蘇聯的信義，結果反爲不美。請對此多加考慮。』

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日方不讓步。今井武夫說：『既然實行防共，則對蘇聯不存在信義問題。另外，既使以秘密協定方式解決駐兵問題，也必須承認日軍在華北和蒙疆的駐兵，並在停戰以前的協議中予以明確保證。』

『宋子良』明確表示：『中方即或對防共駐兵問題能夠諒解，也只能做到默契的程度而已。』關于滿洲國問題，雙方也都絲毫不讓步，中方要求通過外交手段另行解決，日方强硬主張中國公開承認。結果，第二天的會談就談僵了，沒有任何進展。

爲打破僵局，『宋子良』于第二天下午二點，由張治平相伴，來到貝拉比斯塔旅館，拜訪今井武夫。『宋子良』在互相寒暄後，很巧妙地轉入正題，並以私人情感來打動今井武夫。『在此次會談中，』『宋子良』很誠懇地說，『我個人曾付出極大努力，萬一協定不能訂立，我將會蒙受很大打擊。因此，我個人特別希望日方能作出讓步。』

今井武夫早就注意到『宋子良』表示出來的意思，即爲了和平會談，『宋子良』曾投入個人錢財，經濟上所受打擊不小。但他一方面要爲日本帝國利益着想，一方面對重慶政府複雜的內部情况難以斷定，自然不會被『宋子良』的言辭打動。他說：『日本方面已經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了，再讓步實難從命。其實，我們也是抱有極大真意的，希望我們雙方共同努力，盡量在達成協議後立即簽字或繼續派遣大員進行簽字。』

『宋子良』見此招不靈光，又說：『關于中國承認滿洲國及日軍的防共駐兵問題，日方的主張與以前無任何更改一事，我已據情向重慶匯報請示了。可是無須等候回示，也可以預料這次日

華雙方意見是難求一致的。因此，希望今後的談判，待蔣委員長的代表，預訂爲張羣，在上海或其它地方與汪兆銘先行會談，一俟解決汪的處置問題後，再由蔣介石委員長與板垣中將在重慶舉行會談，你看如何。』

『我看這樣可不行，』今井武夫否定了『宋子良』的提議，『應該把順序倒過來才對，先由板垣將軍與蔣介石先生會談，然後逐一解決汪兆銘等其它問題。請問您對此有何意見？』

『宋子良』沉吟片刻，搖了搖頭，說：『這樣也是不可行的。我國政府內外，包括蔣委員長本人，都不會同意的。』

『那如何解決才好呢？』今井武夫開動腦筋。突然，他眼睛一亮，說道：『這樣好不好？我們暫且抛開板垣、蔣先會談和蔣、汪先會談的問題，另闢蹊徑，進行板垣、蔣、汪三人會談如何？』

『宋子良』沉思片刻即欣然應允，『這個方案成立的可能性較大，好吧，暫且如此定下來。』

見『宋子良』同意了自己的方案，今井武夫興奮起來，拍着胸脯說：『爲了早日實現和平。我們日本的會談委員保證作出極大努力，謀求在此次會談中把所有問題一舉解決。』

『我們中方委員也保證作出極大努力，』見僵局已經打破，『宋子良』也趕緊作出同樣的保證。

最後，兩人又商定，會談至當晚暫行結束，雙方分歧之點應如實分別記錄，以備日後參考。

晚上八點三十分，澳門會談最後一次會談舉行。首先，關于板垣、蔣、汪三人會談的地點問題，日方提議在上海、香港、澳門三地中選擇。中方代表則以蔣介石不可能去上述三地中的任何

一地爲由，表示反對，希望在重慶或長沙中選會談地點。因此，雙方只得分別聽取國內意見，等待研究結果再作決定。

今井武夫又提出新的問題：『香港會談備忘錄第一條闡明的日方要求，是日本的最低限度要求。因此，我們主張，雖萬不得已，備忘錄亦應以秘密協定或其他形式予以保證。』

『在目前形勢下，中方絕對難以從命。』陳超霖表明態度。

『那麼，我們就暫且將日華雙方對備忘錄第一條及第三條的不同主張記錄于案，雙方互相交換好了。再有，香港會談時所商談的關于海南島問題，我們建議在海南島附近島嶼設置海軍軍事設施以保護日華兩國海上交通，要求中方同意設置日本海軍設施並允許日軍使用。』

『關于這個問題，』『宋子良』回答，『我們已請示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指示，對此應在恢復和平後，在討論互不侵犯條約中進行協商，但亦可在派遣大員之際商談。』

『再有，』今井武夫說，『爲調整日華邦交，應指導兩國國民逐步以結成東亞聯盟爲目標。』

『對此，我們應向蔣委員長請示後再作決定。』『宋子良』說。

『在大員會談之際』，今井武夫又提出，『希望中國方面亦對此問題的處理予以研究。』

『可以。』

『爲了使此次會議落實，』今井武夫顯得很有胸懷，『如果中國方面有些懷疑的話，不妨將我日方委員三人作爲人質，我們情願被扣留在重慶。』

『這倒不必，』『宋子良』也表示，『對您的勇氣和責任感，我很佩服。』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天長節那一天，板垣總參謀長向中國派遣軍屬下官兵發佈了一本小冊子，《告派遣軍官兵書》，教導日本軍人對中國民衆謹慎言行，並列明須知事項，這說明日軍內部已展開了在道義上自行約束的風氣。我這裏有這本小冊子的日、中文兩種版本，請章先生面交蔣介石委員長。』說着，今井武夫拿出小冊子來，雙手奉上。

『該當效勞，』章友三也連忙雙手接過。

此後，作爲三天來會談成果，中方委員制訂了一份備忘錄，用以征求日方同意。備忘錄內容如下：

此次會談係基于第一次會談後，雙方意見略有了解，比較接近，便其中仍有不同之點，陳述如下：

根據貴方第一次會談備忘錄第一、第三條，經敝方研究考慮，確有不能接受者。因中日兩國爭端，其禍胎即由滿洲問題所造成，而華北駐兵，亦爲中日事件糾紛之禍根。玆爲東亞永久和平，須從根本上解決，故于可能範圍內，表示意見三點：

一、關于備忘錄內第一條滿洲問題，應于和平成立恢復邦交後，以外交方式解決之。

二、關于備忘錄內第三條駐兵問題，應于和平後，由兩國軍事專家秘密解決之，不應在和平協定時，提出爲附件之一。

三、關于備忘錄內第七條汪精衛問題，另行商議。

其他第一次會談備忘錄內數點，原則上同意。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六日

今井武夫接過「宋子良」遞過來的意見書，又把日方的意見書交給「宋子良」。內容如下：

對于貴方在此次會談中的意見，特提出我方的見解如下：

一、關于備忘錄第一條滿洲國問題，在和平條件中，雖然需要提及，但關于其承認的時間及方法，考慮到中國方面的希望，留有協議的餘地。而關于承認問題，應以秘密協定等某種形式約定之。這些約定，以在高級官員會談中協議爲適宜。

二、備忘錄第三條駐兵問題，應在停戰的和平條件中處理之，按照秘密協定等某種方式確實予以約定。

第十章 巨頭會談胎死腹中

日軍加緊進攻國軍

澳門會談没有進展，日本又開始積極籌劃巨頭會談，希望以此達到停戰。

六月十日，臼井茂樹回到東京向參謀總長和陸軍大臣匯報澳門會談情況。

今井武夫則回到南京，向西尾壽造總司令和板垣征四郎總參謀長匯報。談到談判迄今進展不大，今井大發牢騷，並申述降低和平條件和必要性。

板垣征四郎，這位『九·一八』事變的陰謀策劃者，歷來極爲看重『滿洲國』，是强硬要求蔣介石正式承認『滿洲國』的代表人物。雖然在他的一手策劃下，侵佔了東北，但他在『七七』事變後，又開始主張不擴大論，希望盡快結束『中國事變』，騰出手來防備蘇聯，確保已經到手的侵略果實。

當聽到今井武夫述說澳門會談中提到蔣、汪、板垣三巨頭會談方案時，板垣征四郎非常感興趣，並立即表示同意：

『經過兩次秘密預備會議，仍然没有取得明顯進展，令人遺憾。舉行巨頭會談，一舉解決所

有問題，的確是個極好的主意。至于我，我自己有主動進入敵區的決心。我可以去長沙與蔣介石一會。』

西尾壽造並沒有如此莽撞，他很慎重地特地召見今井武夫，問：『雖然巨頭會議可以加速和平進程，但終究是進入敵佔區會談，如何才能保證汪兆銘及其他日方代表的安全呢？』

今井武夫早就想把板垣拉上談判桌，讓他親自了解蔣介石的態度，放棄『中國必須承認「滿洲國」』的主張。今井認爲滿洲國已是既成事實，沒必要爲『承認滿洲國』這五個字使大有希望的和談破裂。他一直積極地籌劃三巨頭會議，對于西尾總司令的質詢，他胸有成竹：

『事前我將親自到會談的地方進行檢閱調查，儘可能實行局部停戰，研究劃定停戰區域。總之，根本上必須具有將信義置于敵人心腹之中的雅量。』

對于今井武夫的回答，西尾壽造並不滿意。他認爲今井武夫是單相思，召開巨頭會議前，必須得到重慶方面的確切保證和實際行動才行。但是，西尾壽造也急于要盡快解決中國問題，爲『皇軍』南下打基礎。

作爲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西尾壽造對日本的政策發展動向十分清楚。

到一九四〇年，日軍深深地陷在中國的泥淖中，作戰不勝（不能用武力屈服中國），『和平』不成，繼續打下去困難重重。因此，日本又渴望通過與蔣介石談判，達成蔣汪合流，使重慶政府放棄抵抗。『桐工作』也確實大有希望成功，但蔣介石又不完全接受日本的條件，談判曠日持久，遷延不決。因此，日本醒悟到，在目前情況下，不能期望我們的對手結束事變，所以必須貫徹主

動解決的方針。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聯合舉行會議，決定：如果在一九四〇年内不能解決『中國事變』，則從一九四一年初開始，逐步從中國撤兵，到一九四三年，把兵力壓縮到上海三角地帶和華北、蒙疆地區。

西尾壽造從内心深處自然不同意撤兵，五月十九日他還派板垣征四郎到東京以辭職相要挾。但最後他還是只好接受分批撤兵計劃，即六月上旬開始撤兵，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把在華日軍從八十五萬人減到七十二萬人。

西尾壽造已經佈置好，以六月十七日零時爲期，撤退佔領宜昌的部隊，而且一部分行動已經在此之前展開。可是到了十六日晚上八點，西尾接到大本營的命令：停止撤退。

西尾明白大本營爲什麼會下此命令。德國加快進攻步伐，四月初侵入丹麥、挪威；五月進攻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六月初將英法三十五萬大軍壓縮到敦刻爾克，險些將其悉數殲滅；六月十六日，德軍佔領巴黎；英國已是搖搖欲墜。德國横掃歐洲給日本注入一枝興奮劑。日本的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乘英、法新敗大舉南進，因此決定加强對國民政府的「和平」誘降。

西尾立即下令：已經撤出宜昌的日軍立即重返宜昌，大規模轟炸重慶，用武力迫使蔣介石坐到談判桌邊，簽訂城下之盟。

宜昌失陷，蔣介石感到四川難保了

西尾壽造步步緊逼，蔣介石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大批日機正在重慶上空來回盤旋投彈、掃射，重慶城內火光衝天。蔣介石的行營周圍也中了炸彈，燃起大火。

狹小的防空洞裏，昏暗的燈光下，蔣介石鐵青着臉來回繞圈子。侍從們噤若寒蟬，都縮在角落裏。

蔣介石的心要炸開一般，連『娘希匹』也罵不上一句了。

地上扔着一份戰報，那是六月十二日日軍攻陷宜昌的戰報。

蔣介石所以支撑着始終不肯向日本最後低頭，就是因爲他堅信蜀地周圍的高山險壑能擋住日軍的强大攻擊。宜昌失守，入川門户大開，他的這個信念有點動搖了。他發現三峽天險並非萬無一失了。他已派陳誠前往宜昌戰場，但日軍開始進攻重慶的謠言，歐洲戰場上英、法聯軍肯定失敗的言論，都令蔣介石心驚肉跳。

蔣介石苦思對策。

向日本俯首稱臣嗎？不！那樣蔣某人就會淪爲汪精衛第二，死無葬身之地。怎樣擺脱這極端不利的困境呢？

只要能得到英、美等國的援助，蔣某人就能頂下去，從日本人手中爭得有利的妥協。蔣介石

的這個想法仍然不變。

但是，四月十二日會見英、美、法三國大使的情景又浮現在蔣介石眼前。

英國大使說：『目前英、法要以全部力量挫折德國的野心，無暇顧及中國。英、法不願使中國滅亡，所以再三勸告採取對日和談方針。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監視下，也決不會提出過苛要求。』

法國大使說：『現在法國面臨着歐洲危急，在不得已時爲了維護法屬印支的安寧，停止滇越鐵路的運輸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綫則代價太大。因此，中國要想避免巨大損失，只能與日本和解。』

美國大使說：『我代表本國政府向貴國進行忠誠勸告，即日停止戰爭。在英、美、法三國援助下和日本進行談判。』

蔣介石當時以要和平日本必須先撤兵把三國的勸和頂了回去。但三國不肯給中國以援助是蔣介石無力解決的難題。特別是現在，法國淪陷，英國朝不保夕，美國又狡猾地坐山觀虎鬥，外援何日才能到來呢？

蔣介石憤怒。蔣介石搖頭徒喚奈何。

就此認輸吧。不行！蔣介石還没忘記剛和周恩來吵的那一架。

蔣介石指責八路軍外戰外行，内戰内行，敵後游擊是游而不擊，專和友鄰的國軍搞磨擦。周恩來也毫不客氣地指責閻錫山等人發動反共高潮。最後周恩來說：『我以爲抗日最大的危險是來

自汪僞漢奸，其次是來自内部的恐日症。如果這兩種思潮合流，就是日本武力脅迫，政治誘降的終極目的。陰謀一旦得逞後果不堪設想。』

周恩來確實厲害。共産黨確實不好對付。要對日妥協，俯首稱臣，共産黨不會答應，蔣介石受到内外夾擊，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思前想後，蔣介石左右權衡，最後決定：用蔣、汪、板垣三人會談與日本周旋，能爭得有利些的條件就握手言和；爭不到也可利用談判聊解燃眉之急。渡過這道難關，再看形勢發展吧。

六月二十二日，西尾壽造派今井武夫和一直從事汪精衛工作的影佐禎昭向周佛海説明『桐工作』的内容。

今井武夫告訴周佛海：『「桐工作」，是此次對重慶和平工作的代號。經過香港、澳門兩次秘密預備會議，已經取得初步成果。現在召開蔣、汪、板垣三人高級會談一事已提上日程。今天，鈴木中佐從香港來電，稱『宋子良』幾經拖延後，作出如下答覆：

『一、可能接受板垣、蔣、汪會談。』

『二、準備提前于七月上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現大致可以肯定三者會談在七月中旬舉行，待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會期時再定會談準確時間。』

『三、地點定爲長沙。』

『如日方同意，對水路或機場的使用絶無阻礙，準備在會談前進行清掃或修理。』

『重慶方面堅持在長沙會談。板垣總參謀長已決心深入敵佔區赴會，不知汪先生可否前往？』

『汪先生必可前往，』周佛海連忙表態，「只是事前需要嚴密佈置。我今晚就找上陳公博、梅思平一起去向汪先生報告，明天早晨一定回信。」

第二天一早，周佛海便來見今井和影佐。

周佛海不記得他向汪精衛說起三人會談時汪精衛臉上那極爲不悅的表情，但他們誰也不敢在哪怕一點小事上得罪日本人。日本人讓汪精衛去長沙，他就得去；不讓去，想去也去不成。

周佛海以討好的口氣謹慎地向今井和影佐說明汪精衛的態度：「汪先生是可以主動去長沙的，但如果可能的話，他希望在會談之前，由重慶派負責代表，如張羣來上海先談談。」

今井說：『重慶同意三巨頭會談，但是希望我們暫時不要告知汪先生，告知前，須與重慶商量。我們本着信義的態度，未經重慶同意就向你們說明了此事。如果汪先生不想去長沙也可以，而板垣總參謀長是必去的。』

顯然，日本認爲汪精衛在日、蔣會談中無足輕重，有他没他都可以解決問題。這一點，周佛海明白，但他還是積極建議：

『從各方面情況看，雙方會晤于洞庭湖上爲好。』

今井、影佐都認爲這個主意不錯。

六月二十四日，板垣征四郎親自來征詢汪精衛參加三人會談的意向，並仔細地說明了香港和澳門兩次會談的經過情形。

汪精衛立即獻媚：『雖然重慶軍明顯地打敗了，但板垣總參謀長爲了同蔣介石直接會談，親

自前往敵區一事，就是給蔣的面子，使他易于轉向和平。因此，對于日本的關注，我作爲一個中國人不勝衷心感謝之至。』

他竟還記得自己是個中國人！

他又說：『對于三人會談，採取公開方式或者秘密方式，由于情況的差異，我的想法是有很大不同的。』

汪精衛先表明自己的決心：『蔣介石的性格向來是有明暗兩面的。如果會談採取公開方式，我已作好攜帶一隻皮箱，明天就動身的準備。』

接着他又轉彎抹角地說出自己的擔心：『但重慶方面必定認爲公開會談的時機尚早，提議秘密會談的可能性較大。爲了防備這種情況，有必要研究一下保障安全的方法。我從重慶逃出以前，就以日華和平爲理想，但蔣對我公開倡言和平甚抱不滿。當我逃出河內後，找不到再向蔣傳達和平意圖的特別方法。最近也有一個實例，雖然通過龍雲試圖傳達，結果仍以失敗而告終。這次如能在長沙召開三人會談，就能輕易地償遂了我個人的宿願。這是極爲可喜的。』

等到二十六日今井武夫來訪時，汪精衛感到自己在會談中可能是無足輕重的角色，就又卑怯地說：

『蔣介石可能特別不願意與我汪某同席會談，萬一是這樣，那麼就只由板垣、蔣二人會談，在我缺席的情況下，也可以決定一切，這是一點也不妨礙的。』

當然，汪精衛沒忘表忠心，說：『如果需要我參加晤談，我願冒險前往，即使被騙、被殺也

在所不惜。」

今井武夫聽了，頗受感動。

從汪精衛處回來，一個好消息使今井武夫興奮不已：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了解到三人會談的交涉情況，爲了實現停戰，初步決定撤回過去日方的主張，全面接受在澳門會談時重慶方面的意見，爲指導貫徹這個決定，澤田參謀次長已趕到南京。

日本終于要讓步了，和平談判成功指日可待，幾乎穩操勝券了。今井武夫興奮不已，他甚至開始考慮和平實現後自己如何休養一番。但是，談判的結果未經簽字就是廢紙一張。現在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還要努力一段時間才行。西尾壽造要求重慶出具書面證明，確實保證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和南京方面代表的安全。今井武夫清楚，重慶大概是不會輕易出具這個證明的。

果然，不出今井所料，當夜，鈴木卓爾傳來「宋子良」的答覆：「重慶方面負責保障安全理所應當，但使之形成文件，百難從命。再者，一直到會談結束爲止，始終有保持絕對秘密的必要。」

很清楚，蔣介石還是不肯走上前台。他怕會談一旦不成功，日軍會暴露此事，于己不利。

第二天，六月二十七日，影佐、今井和準備趕往香港的參謀堀場與周佛海緊急磋商對策。

影佐提出：『既然得不到重慶方面對于代表安全的確實保證，特別是得不到汪主席的安全保障，因此，我們只能按照澳門會談時重慶方面 所提方案，先在上海與汪主席與蔣介石的特派代表會晤，待有結果後，再在長沙舉行板垣總參謀長與蔣的會談，把會談分爲兩個階段進行，這樣較

爲恰當。』

周佛海自然贊同：『分兩個階段進行確實是目前的最佳方案，我非常贊成。另外，晤談地點是否可以再加上宜昌，在長沙和宜昌兩地中選擇一地。』

『可以。』今井武夫本來還想考慮汪精衛等人的面子，極力促成有汪精衛參加的日、蔣高級談判，没想到汪精衛一伙人知趣，知道自己在談判中毫無發言權。這使今井武夫感到釋然，認爲又向談判成功邁出了一步。

對于日本提出的分兩階段談判的建議，蔣介石感到難以處理。

英國封鎖滇緬公路，蔣介石又幾乎絶望了

蔣介石同意準備蔣、汪、板垣三人會談，是在宜昌失陷，入川門户暴露，和日機狂轟濫炸，陪都重慶遭受重創的困難時，被迫而爲之的。當然，他還没有最後下決心訂立城下之盟。不過是想利用談判緩和一下罷了。爲了借故拖延，給日本製造麻煩，他又拉上汪精衛參加會談。

汪精衛自然是個在談判中毫無發言權的擺設。蔣介石認爲汪精衛自知臭名昭著，不敢在日軍未控制的地方露面，日本人也會有所顧忌，怕這個俯首貼耳的漢奸出事。這樣一來，日本人定會手足無措。他蔣某人就有好戲可看了。

没想到日本對蔣介石踢過來的球，毫不慌張，轉眼就把球踢回了：談判分兩段，蔣、汪談妥再在長沙舉行日、蔣談判。

蔣介石一下子沒了主意。于是，他故技重施：拖。

拖到七月十八日，蔣介石自己先沉不住氣了。因爲一記悶棍打得他眼冒金星，腳步踉蹌。

七月十八日這天，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下院講話：『今日，英、日兩國簽訂了一紙協定，《有田—克某琪協定》，根據該協定，英國將禁止軍火、彈藥、汽油、汽車、載重汽車及鐵路材料，由香港、緬甸輸入中國。禁運時間限爲三個月。』

爲什麼禁運三個月呢？

根日、英協定，日本應于三個月内設法與中國成立『全面之和平』。如中、日兩國同意，則英國願從中折衝。

英國的這一舉動，切斷了中國僅剩的重要對外通道滇緬公路。蔣介石得不到援助物資了。這無異于在拼命苦撐的蔣介石的脖子上又勒上一道繩索。

蔣介石幾乎絶望了。

美國通訊社駐重慶記者發出消息：由于英國封鎖了滇緬公路，中國人中關于對日和平的議論急劇上升，一般認爲戰爭將在六個月内結束，政府將還都南京。

被逼無奈，蔣介石覺得不能再拖延談判了。到了給日本人以答覆的時候了。

但是，蔣介石還是不敢公然和日本談判，他還要最後爭一爭，爭個和緩一點的條件，好向全國人民交待，以便保住蔣某人的位置。萬一日本人不肯讓步，甚至得寸進尺，進一步勒索，蔣某人是不敢簽字的。如果談判不成功，日本人往外一捅，蔣某人就要四面楚歌了。

因此，談判必須秘密進行。

對汪精衛怎麼處理呢？蔣介石知道全國人民對之恨入骨髓，日本又極力實現汪、蔣合流。但，蔣某人不能同汪精衛之流走到一起去遺臭萬年，而且，有蔣無汪，有汪無蔣。蔣介石不能容忍汪精衛和他爭鋒。

七月二十二日，『宋子良』與鈴木卓爾在香港就會談場所的安全等問題進行協商最後，正式交換如下備忘錄：

備忘錄

下記日中代表關于進行停戰會談事宜，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並互相確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之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八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中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　印

代表宋士杰　印

昭和十五（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蔣介石、板垣會談由此確定。

七月二十五日，『宋子良』又就日方提出的分階段會談的新提案，給鈴木卓爾以答覆：『重慶通知：對于發佈保障日方代表安全的文件以及人質留在重慶兩問題，因保密關係，難以照辦。同時，要求日方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第一次近衛聲明，而且確切約定日本方面嚴守秘密和不介入汪、蔣合作，並須將以上事項分別形成文件。』

這個答覆一再要求日方切實保密，而且還要讓日方保證不干涉蔣和汪之間的關係。自然令日方異常不滿，難以接受。

今井武夫說：『答覆的内容完全違背了我們的期望。……這一來，可說是公然表明對日方的不信任，形成了與原來希望召開會議的態度逐漸疏遠的氣氛。』

就在蔣、日和談的這個關鍵時刻，日本由于政策矛盾激烈，内閣接二連三變動，繼阿部内閣垮台後，米内内閣也以短命告終。第二次近衛内閣粉墨登場，陸軍大臣畑俊六大將離職，由東條英機中將接任。戰爭狂人東條英機對日、中和談根本不感興趣，仍沉緬于武力亡華的迷夢之中。

七月三十一日，今井武夫回東京向東條英機匯報『桐工作』的進行經過和現狀。

東條英機對今井武夫以極爲尖厲語氣說：『日、華直接談判這種政策性行動，是中國派遣軍的越權行爲，需要嚴加追究。』

今井武夫只得辯解：『這是遵照大本營訓令而執行的任務。』

與東條英機相反，再次上台的近衛文麿已經深悉，戰爭繼續下去，日本並不能得到美滿結果。因此，他仔細地聽取了今井武夫的匯報，鼓勵今井繼續努力，並表示：『希望能夠取得成

功。』

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參謀本部和派遣軍總司令部也照舊堅持同意重慶方面的要求，向內閣表示『强烈希望召開巨頭會議』。爲此，鈴木卓爾還專程到東京報告交涉的全貌。

最後，日本軍方決定：如果重慶方面接受日本的要求，以書面文件保證代表的安全，則作爲交換，由近衛首相和板垣總參謀長向蔣介石致以私人函件，並由鈴木攜帶到香港。

『宋子良』于八月二十四日來到香港，見鈴木回國了，便于第二天返回重慶。二十六日，改由章友三到香港，知道鈴木已回到香港，便在二十七日與鈴木會晤，說：『八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這十天中，我在重慶逗留，知道蔣委員長及其首腦部門的意向並無任何變化。』

此後，『宋子良』往返穿梭于重慶和香港之間，鈴木提出建議：

『日方將近衛、板垣的私函，中國方面將蔣介石的私函，同時進行交換：或分別讓對方閱讀，從而同時滿足日方對保障安全所抱的希望和重慶方面對蔣汪合作問題以及對日本的態度所抱的希望。』

『宋子良』很聰明地要求啓閱近衛和板垣的親筆函件。他的記性不錯，看一遍就記往了。這兩個函件內容如下：

蔣介石閣下：

聞悉過去半年多來，閣下委派的代表與板垣中將的代表于香港就日華兩國間和平問題交換意見的結果，近期閣下將與板垣中將會見。

余深信此次會談，定可奠定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

近衛文麿
八月二十二日

關于蔣、汪合作問題的保證

關于蔣、汪合作問題，爲了支援日華，尤其是爲了達成內部的圓滿和平，我方應有提供善意的意見的機會。

但（基于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不作爲一項停戰條件。

特此保證。

板垣征四郎

百團大戰使蔣介石渡過了危險期

長沙三人會談的談判一步步深入，日本也在條件上開始表現出鬆動讓步的迹象。這些，如果在一個月前，蔣介石還會高興。但現在，蔣介石也不怎麼想再參加什麼蔣、板垣會談了。

蔣介石已經渡過最艱難的時期。

蔣介石在想：怎樣結束三人會談的交涉呢？雖然蔣介石對三人會談的興趣沒了，但是，他還不敢因爲突然停止交涉而刺激日本人。他知道，儘管日本人戰綫拉得過長，要全面滅亡中國還很困難，但是日軍畢竟佔有作戰主動權，只要集中一點兵力，想佔領哪裏還就能佔領哪裏。蔣某人

在戰場上和日軍硬碰硬還是碰不過，他還要留足本錢準備將來對付共產黨。

怎麼辦？蔣介石頗費腦筋，苦思無有良計。

八月二十日夜，八路軍以一百多個團的兵力，在華北敵後碉堡密佈的五千餘里戰場上，突然發起大規模的攻擊，打得日軍措手不及，疲于奔命，損失慘重。日軍華北司令部把這次戰役名之曰：『挖心戰』，並把每年八月二十日定爲挖心戰紀念日。

後來，有人曾批評百團大戰是暴露實力的魯莽舉動。而實際情況是，百團大戰是在蔣介石投降危機最嚴重，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採取的英明、果斷、大無畏的行動。

日本人分析百團大戰的原因是：『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以後約一個月的期間，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刹那。在八年日中戰爭中，說蔣介石感到最嚴重的危機是宜昌失守之時，原因即在于此，中共察覺到日中進行和平談判的危機突然發動了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不僅迎頭痛擊了日本的新的政治誘降和新的大舉進攻，打擊了日軍對華北的囚籠政策，而且使日軍看到了阻止日本南下戰略的真正威脅來自八路軍，乃調兵遣將急于消滅八路軍。英、美、法等國策劃中的勸蔣投降的遠東幕尼黑陰謀也因此而宣告結束。

百團大戰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戰鬥精神，克服了悲觀失望情緒，舉國上下掀起了慶祝百團大戰奏凱的熱潮。

蔣介石從百團大戰的勝利中，不僅驚懼地看到共產黨日益發展壯大的趨勢，還幸災樂禍地判斷出：日軍必有戰略轉移，由重點進攻國軍的正面戰場，轉向掃蕩敵後的八路軍。爲了借日軍之

手消滅八路軍，他向朱德、彭德懷發去如下賀電：

迭電均悉。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除電飭其他戰區積極出擊，以策應貴部作戰外，仍希速飭所部，積極行動，勿予敵喘息機會，徹底斷其交通爲要。

只要日軍轉頭去打八路軍，蔣某人就可以坐山觀虎鬥了。

而對日本的和談呢？虛與委蛇吧。

于是，蔣介石找來戴笠，問：『香港方面有什麼新進展嗎？』

『沒有。日方以極其迫切的心情，希望校長早日促成三方會談，以結束這不愉快的戰爭。』

『現在已經沒有舉行這種會談的必要了！』蔣介石很堅決地說。

『爲什麼？』戴笠驚訝地問。

『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變化。』蔣介石胸有成竹地說。

『那……如何答覆日方的代表呢？聯絡路綫要不要切斷呢？』戴笠試探地問。

『這還用問我嗎？你會有答覆日方代表的辦法的。下去吧！』蔣介石十分不耐煩地說。

戴笠諾諾退出門不久，宋美齡就一陣風似的走進來，滿臉的喜色。

『夫人，快把美國來的喜訊告訴我吧。』蔣介石不等宋美齡張口便說。

『你怎麼知道的。』宋美齡聞之愕然。

『我是當今居蜀圖興的孔明，』蔣介石得意洋洋，『能掐會算。子文一定發來了有關美援的電文。別的事你也不會高興到那個樣子。』

『對！』宋美齡興奮地說，『羅斯福總統允諾給我們五千萬美元的援助。』

『哼，羅斯福這個老狐狸，真不是東西。他有鋼只肯用在刀刃上。』蔣介石突然變了臉，破口大罵。

隔了一會，蔣介石望着目瞪口呆的宋美齡笑了笑，又說：

『夫人！想想看，歐戰爆發以後，他羅斯福爲什麼不給我軍援？法蘭西亡國，大英帝國喫緊，他爲什麼還要搞遠東幕尼黑？現在，德意日三國結盟，他爲什麼立刻慷慨解囊了？』

見宋美齡一臉的茫然、疑惑，他又說：『他在使小錢賺大利！』

看宋美齡還是不明白，蔣介石索性走到軍事地圖前，比比劃劃地講起百團大戰怎樣打亂了日軍南下的計劃，怎樣給美國填補英、法在印支等地留下的空間爭取了時間，羅斯福怎樣需要中國戰場死死箝制住日軍。最後，蔣介石胸有成竹地下了結論：

『德意日結盟，必然導致英法美結盟。換句話說：美國坐山觀虎鬥，大發戰爭財的日子結束了。同時，亞洲戰場上，由我蔣某人孤軍抗擊日本侵略的時代就此結束了。』

『從現在起，我們的戰略重心必須轉移：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業已強大起來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九月八日，『宋子良』交給鈴木卓爾一分令鈴木目瞪口呆的文件：

關于近衛首相親筆信的內容，通過各方面負責人員詳細研究，尚未能取得十分滿意的結果，茲将全文轉交對方：

一、該信內容，對于糾正近衛首相『不以國民政府爲談判對手』的聲明一點，意義含蓄，並未坦率言明，有隨時加以推翻的可能。

二、該信關于和談問題並未明確表示和板垣總參謀長的主張一致，僅以旁觀者的地位加以贊同。故倘若日本內閣再次發生變更情況，則日本方面對板垣的長沙會談結束後的具體實施，得歸諸由板垣個人負責，從而不予履行條約。

三、根據以前的報告，經過多次商談的結果，板垣認爲必須接受天皇的任命，以代表日本全國的資格出席會談。但綜觀現今近衛首相親筆信的內容，則言辭曖昧，恰似此事完全係板垣參謀長個人的主張，首相本人處于第三者的地位對此表示贊同而已。如此，我方豈能從事會談。

基于上述各種理由，確定我方的要求，作爲我方的要求，特儘速向對方提出三項意見如下：

1、近衛首相親筆信必須表明取消和更正不以重慶政府爲對手的聲明。

2、近衛首相應以當事人自居，而不應退居于客觀地位，回避此次重大責任。

3、近衛首相在親筆信內必須主動表明對和平的誠意。

日本方面如以締結日汪條約來對我方進行威脅，以求得迅速講和，則其結果必將適得其反。

日本方面對此問題（媾和問題）附有一定的時間性，但此時間殊不適合于中國現在所處的環境。

如對方不能了解我方的誠意，則一切交涉暫將不能求得儘速的進展。

這個文件一則大挑近衛親筆信的毛病，二則小小地出些難題，三則以「不能求得儘速進展」相要脅，可謂一個絕妙的回答。

以這個挑毛病的文件爲開端，「宋子良」開始逐步從長沙巨頭會談的交涉中抽身撤退。這也是蔣介石的一貫伎倆：爲以後的和談留條路。

九月十六日，「宋子良」對鈴木說：

『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慶召開的重要幹部會議上決定：關于滿洲國問題及日軍部分駐兵問題，只要日華雙方未取得一致意見，長沙會議暫行擱置。因此本談判沒有迅速進展的希望。』

九月二十一日，『宋子良』再對鈴木說：『滿洲國問題和日軍部分駐兵問題，這兩件懸案，是實現日華和平的癌症，除日方讓步外，則無實現和平的希望。』

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決定：『桐工作』停止，靜觀形勢變化。

十月一日，東條英機嚴令軍方『立即與和平工作斷絕關係』。

抗戰八年中蔣日和談的最高潮就此中斷。蔣介石幾乎就要投降的最嚴重的危機就此結束。

不久，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和參謀今井武夫、鈴木卓爾等人相繼奉調離職回國。

第十一章

『這回日本沒希望了』

蔣介石口氣變硬了許多

『桐工作』中止了，蔣、日和談的高潮過去了，但餘波未盡，和談還在繼續。

蔣介石慶幸自己最終走出了危機的谷底。百團大戰把日軍的攻擊矛頭引向八路軍，國軍所受的重壓迅速減輕了；德意日三國同盟訂立，美國現也不能袖手旁觀，大批美援將要滾滾到來，太平洋上的日美矛盾急劇激化，日、美開戰不可避免，靠美國人打敗日本的想法不再是白日作夢。但是，短期內還不能打敗日本人，和談還是要繼續進行。

蔣介石再次大耍兩面派手法，一面高喊抗戰到底，誰講和平誰就是漢奸，一面暗地裏保持與日本人的接觸。

蔣介石認爲與日本人搞和談是一舉多得，妙不可言。對內，通過對日和談既可勾結日僞軍對付共産黨、八路軍，又可阻止或推遲日本承認南京僞政府，打擊汪精衛。對外，既可用和談逼迫美國趕快多多掏錢援助蔣某人，又可用外援要脅日本人放寬亡華條件。

當然，與日本人搞和談，也有弊病，全國人民不答應，國民黨內也會有許多人不答應。蔣介

石也知道對日和談，如同玩火，搞不好會引火燒身。但是，只要能保密，瞞天過海，這些危險就不足爲慮。

總之，和談利多弊少，何樂而不爲。

當然，在和談中，蔣介石的地位已經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談判的主動權已經開始向蔣介石手中轉移。

過去，是日本提條件，而且不斷加碼，蔣介石則猶豫着要不要簽訂城下之盟，權衡着如果接受日本人的條件，蔣某人還能不能在這把椅子上坐下去。

現在，蔣某人有時也可以提條件了，你日本人接受，就和；不接受，就耗下去，看你日本能頂多久。將來，日、美一開戰，日本必敗無疑，蔣某人自然就不費吹灰之力成爲勝利者。

十一月三十日，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傳來日本要求和談的消息，蔣介石立即決定：公開宣傳，凡中國人談論和平者，一律視爲漢奸；暗地裏卻派人去香港接談。

松岡洋右誇下海口：兩周内實現和平

蔣介石敏銳地發現了自己在和談中地位的改變，日本當局卻絲毫没有感覺自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仍然躊躇滿志地保持着傲慢。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日本第二次近衛内閣上台，松岡洋右出任外相，當時正值德意日三國同盟形成之際。松岡洋右認爲以此同盟爲背景，『可以用來早日解決日華事變』，于是在西義

顯獻策之下，利用國民黨前鐵道部財務司司長張兢立和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爲中間人，重新與重慶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這就是錢永銘工作。在緊張地完成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工作之後，松岡洋右雄心勃勃，大誇海口：

『要使日華和平于兩周内一舉實現。』

十月一日，日本外務、陸、海軍三相會議決定：依據日本與汪精衛政府簽訂的基本條約和重慶政府商談和平。如蔣介石與汪精衛合作，再舉行中、日直接交涉，預期在十月中旬收到實效。這樣，日本就收回了在『桐工作』後期作出的作一點讓步的打算，企圖把和汪精衛簽訂的全面亡華的『和平』條件强加給蔣介石。那些條件連汪精衛都怕得發抖流淚，説『中國不是我能賣得了的』，『這不過是我自己的賣身契而已』。蔣介石怎敢接受這些條件。

如此苛刻的條件，如此短暫的時間，想實現『日華和平』，不啻痴人囈語。之所以把時間限定到十月中旬，是因爲屆時日本要對蘇聯和德國轉變政策，準備利用德國牽制蘇聯，放手南下，又因爲日本預定于十月中旬承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

爲使日蔣合流容易收效，松岡洋右想請德國居間調停。但是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在柏林會晤中國大使陳介時説，德國無意于作中日和談的中介人，可是德國認爲『目前是中國與日本講和的最後機會』，不然日本就要承認汪政權，意大利和德國也要承認。這顯然是與日本如出一轍的威脅口吻。重慶政府對里賓特洛甫的建議没有給予答覆。

松岡洋右十分自信，爲了完美地完成自己迅雷不及掩耳的『和平』計劃，他把對重慶交涉的

大權收回到外務省，通過日軍軍部命令中國派遣軍『立即與和平工作斷絶關係』，由日本政府重新開始與重慶政府直接交涉。

與松岡洋右的看法相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認爲，『桐工作』剛剛停止，現同重慶政府直接談判『已經没有實現的可能性』，因爲日本方面對和平條件没有讓步的打算。而且，日本承認南京汪政府的時間又迫在眉睫，要求幾周内談判成功，將更加困難。國際環境也不利，三國同盟的締結，會使英、美等國將以加强團結對抗德意日軸心，『對中國將更多地增加援助，予以鼓勵』。這樣一來，德意日三國同盟的締結非但不能促進對重慶的和平談判，反而會足以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派遣軍總司令部對日、蔣和談只是『停留在過去努力從事過的「桐工作」的程度上，並不表現積極』。

松岡洋右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還在積極從事『桐工作』時，就開始逐步展開自己的『和平』努力，從實際上看，就是給派遣軍總司令部拆台。這種情況在日本並不罕見。

日本的政界、軍界内部派系衆多，各持一辭，相互攻訐，使日本的政策變動頻繁，内閣走馬燈似地換個不停。特別是政府轄制不住軍人，而日本軍人又個個驕横輕狂，自行其事，任何幾個人湊到一起，就敢去刺殺内閣大員，就敢在國外挑起事端。除了對外侵略擴張的意志相同外，日本軍界、政界各派系的主張千差萬别，而且誰都敢擅自行事，先造成事實再説。這樣一來，日本的政策就經常是出爾反爾，變化莫測，前腳還説主要防備蘇聯進攻，後腳就把絶大部兵力投入中國，前腳説要緩和日蔣談話條件，後腳又把條件加碼再加碼；前腳才要北上，後腳轉身南下。

因此，日本便成爲一羣瘋狂的侵略者組成的混亂集合。

松岡洋右不是超人，同樣也在這個混亂的集合中轉圈子。儘管中國派遣軍的工作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他卻武斷地中止了『桐工作』，同時又展開了他的錢永銘工作，而且夢想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完成。

錢永銘工作存在先天性的致命缺陷。

錢永銘工作的發起人和主要策劃者是西義顯。

西義顯在運動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敵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認爲「汪兆銘的和平工作和日本政府對待它的態度，離開了我設想的本來計劃」，「被歪曲了」，「走上歧途」。因此，他退出汪兆銘工作，消沉了一段時間。

一九三九年底，西義顯在他的上司時任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支持下重新活躍起來，並決定「親自前往重慶，單刀直入，直接向重慶政府做工作，不指望日本政府以及日本軍部等，先由中國人之手築起遠東的防火（世界大戰的戰火）牆，然後再反過來誘導日本政府。」

一九四〇年一月，西義顯經多方努力與老相識、剛剛辭去國民黨鐵道部財務司長職位的張競立接上頭，又通過張競立于八月二十四日勸服錢永銘出面斡旋。

錢永銘是交通銀行的董事長，浙江財閥的首腦，在蔣介石發家的過程中立過汗馬功勞，因而在蔣介石面前説話有一定份量。錢永銘提出了三個斡旋條件：

一、重慶、南京兩政府合併，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統一政府。

全部兵力。

二、日本政府以中國的新統一政府爲談判對手，從中國全面撤退爲推行日華戰爭所派遣的

實施撤兵的具體技術條件，首先應參照締結的停戰協定辦理。

三、日本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締結攻守同盟。

不過，得把特定國從這個同盟的對象中排除。

重慶帶來了份和戰皆可的備忘録

這三條件會被日本接受嗎？當然會。

日本始終竭力推動蔣、汪合流，可謂正中下懷。

蔣介石會接受嗎？不會接受。但是蔣介石將會同意以此三項條件爲基礎進行和談。他雖然不想與汪精衛合流，卻想通過和談阻止或推遲日本對汪僞政府的承認。

八月三十一日，張兢立把這三個斡旋條件縫在腰帶上隨西義顯乘船離開香港。因爲躲避颱風延誤了一段時間才到上海，而西義顯又未經錢永銘同意去南京征求汪精衛的意見，令錢永銘大爲不滿。

汪精衛對西義顯說：『作爲喚起全面和平的調停者，除了錢永銘以外，再没有其他權威人物了。作爲我個人來說，從感情上，與蔣介石絕對不相容。……但是，爲了中日和平這一崇高大義，縱令和蔣介石不容，甚至蔣介石來殺害我的父母，我仍不辭與之合作。』

說話間，汪精衛還流下眼淚來，這是恐懼的眼淚，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恐懼。現在有人出面調停，條件之一就是與蔣介石合作，他自然極力贊同。

一路耽擱。九月十七日，張兢立一行才到東京。因松岡洋右忙于締結三國同盟，到十月間才正式會見張兢立，在錢永銘的三個條件上簽字同意，並建立起包括日本駐香港總領事田尻愛義、上海僞特別市政府顧問船津辰一郎、西義顯和聯絡員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的和談班子。這班人馬在香港聚齊已經是十月二十六日，已經遠超過了松岡洋右誇口解決「中國事變」的十月中旬，更遠遠超過了錢永銘期待答覆的期限：十月十日。

錢永銘見答覆遲遲不到，鑒于德意日三國同盟締結後的國際形勢，已經喪失了信心，極力回避繼續充任斡旋人。在西義顯等人的百般勸誘下，十月三十一日錢永銘才給蔣介石寫了信，轉達日本要求和談的消息，並附上松岡洋右提出的建議：日華事變以日華兩軍停戰而導向結束，之後，日軍完全撤退，今後日華兩國將締結以永久友好和睦、互惠平等的經濟合作和共同防衛同盟爲基礎的新條約。

這是個缺乏具體內容的籠統條件，充其量不過是表示和平的願望罷了。

十一月十二日，張羣的回信傳到錢永銘手中：

『戰爭發生以來，雖然日本與重慶之間再三嘗試疏通意見，但直接到達蔣主席手中，這還是第一次。特別是東京當局表示出誠意，並能傳達到蔣主席這裏，實在是破天荒之舉。對松岡

外相之誠意與勇敢，深表敬意。」

這封信言辭謙恭，不過表示禮儀而已，也同樣沒有任何實質內容，但是信中也流露出不拒絕和談的意思。于是，錢永銘提筆寫了第二封信給蔣介石。

很快，重慶有了反應，發出措辭激烈的佈告：凡是中國人談論和談者，一律以漢奸論處。

西義顯聞訊，不勝氣餒。

十一月十七日，錢永銘找到灰心喪氣的西義顯，神秘地告訴他：『今天，有位大人物從重慶飛到香港來了。』

『是嗎？』西義顯當時來了精神。

『這位大人物的名字我不好告訴你，但是，他帶來了蔣介石的備忘錄。這是抄件，你看看。』

西義顯接過備忘錄抄件一看，又傻了眼，說：『這那裏是和談條件，簡直就是宣戰書的前言嘛。』

『不，』錢永銘笑了，『這個備忘錄肯定費了蔣介石不少功夫。關鍵是你怎麼看它。如果從反面來看，它就是中日修交的原則。按照這個原則，和平將無任何妨礙。』

『……』西義顯摸不着頭腦了。

『這是份和戰皆可的備忘錄，萬一泄露出去，也能應付，其用心可謂良苦啊。』

『那麼，和平條件是什麼？』

錢永銘沉吟了一下，說：『一、原則上承認在華日軍的全部撤兵；二、取消承認南京傀儡政權。倘若日本政府答應上述條件，中國政府準備同日本政府進行和談交涉。』

『太好了。我立即向東京發電匯報。』

『希望日本政府對這兩個條件的答覆迅速傳到香港，這樣我就可立即讓信使送到重慶。一氣呵成地促成和談。』錢永銘很有信心的樣子。

『能否用其他方法加快節奏呢？』西義顯認爲用使者傳遞信息太慢，他知道，御前會議已經正式決定于十一月三十日承認汪精衛政權，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和談的準備工作才有解決『日華事變』的可能。

『你也知道，』錢永銘無奈地說，『我到底是以私人名義進行活動的，不能像政府機關那樣利用精密快捷的密碼電報。香港和重慶間雖然可以自由通信，但事關重大，我只能利用原始的信使聯絡方法。而且，信使是否恰當，直接關係到交涉的成敗。雖然從重慶來的那個大人物在重慶事務繁雜。脫不得身，我還是要把他留幾天，讓他把日本政府的答覆帶回重慶去。這樣一來，東京的答覆就要盡快到來才行。否則，就不好辦了。』

聞聽此言，西義顯連忙告辭，趕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向東京發電。

十一月二十三日夜。東京的答覆還沒有到來。

錢永銘沉不住氣了。日本政府一再公佈承認南京汪僞政府期限爲十一月三十日，這一期限一

小時一小時地臨近了。如果没有十一月三十日這個期限，錢永銘相信松岡洋右會拋棄承認南京政府的政策，答應自己斡旋的交涉，這一點無需懷疑。然而十一月三十日這個期限，正在被全世界盯着。松岡洋右能說服日本各個派系，特別是軍方那些强硬的積極主張承認汪精衛政府的人嗎？

錢永銘搖頭嘆息，坐立不安。

要命的最後期限！要命的十一月三十日。

就在錢永銘疑慮重重的時候，西義顯來了。

西義顯從張兢立處得知錢永銘開始對松岡洋右失去信心。連忙趕來打氣。他說：

『日本政府把承認南京政府定在十一月三十日，並一再把它公佈出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他們這樣做，是由于不知道你的斡旋交涉實情的緣故。』

西義顯情真意切，錢永銘默默無語。

『近衛首相、松岡外相，也都衷心希望實現與重慶政府的全面和平。這一願望，過去之所以没有發現，是由于當時找不到在日本與重慶之間可以信賴、有實力的調停人的緣故。不是說，向南京一邊倒的政策，是不得不採取的。』

西義顯慷慨激昂，錢永銘無動于衷。

『不過，由于出現了你這樣的有實力而又可信賴的斡旋者，因此，目前的事態正在發生變化。松岡外相肯定接受了前些日子重慶政府提出的條件，並準備與重慶政府進行和平交涉。』

西義顯盯着錢永銘，錢永銘望着地板。

『不過，儘管松岡外相接受了你的斡旋條件，老實地說，日本政府說不定也像重慶政府提出不承認南京政府那樣，在你的斡旋條件上再附加一些條件。如果是那樣的話，他答應你的要求，並準備進行全面和平交涉，這將是松岡外相在當今形勢下的堅定決心，而且絕對不會改變，故請原諒。』

西義顯口沫飛濺，錢永銘若有所思。

『松岡現在已下定渡過激流的決心，這是因爲他發現了你這個激流中的巨石。問題已經不在日本政府以及松岡外相如何下定決心，而是要看成爲全面和平的立腳點的你決心堅定與否。好不容易才發現的立腳岩石一旦動搖，松岡外相也便會縮回腳來，斷了渡過激流之念。因此，首要的是你這塊立腳的巨石本身要堅定。』

西義顯拼命打氣，錢永銘似乎有所悟。

西義顯自認成功，凱旋而去；錢永銘將信將疑，徘徊不已。

西義顯前腳出門，船津辰一郎老先生後腳進門。他是來找老朋友錢永銘聊天解悶的。

錢永銘相信這個老朋友的判斷力和對日本政界、軍界的了解，便問他：

『西君强調松岡外相接受重慶的條件，對此是不能懷疑的，但老實講，你是怎麼想的呢？』

船津辰一郎沉吟不語。

『我想聽一下你的直率見解。』

船津辰一郎終于開了口：『說真的，不管是怎樣的松岡，到了現在，要改變御前會議上的政

府既定方針是困難的——我想是困難的呀！』

錢永銘立刻陷入矛盾之中。

是啊。日本御前會議已經決定十一月三十日承認汪精衛政府，日本朝野要求按期承認汪精衛政府的呼聲一天高過一天。特別是那樣狂傲的日本軍閥，想一口把中國喫掉，怎麼會肯讓步與蔣介石談判媾和呢？松岡洋右的本事再大，他能力排衆議，説服這些人嗎？簡直不可能！

既然如此，張季鸞怎麼辦？

自己一直把張季鸞穩穩地藏着，西義顯一班人還以爲他是蔣介石的文膽和敬重有加的陳布雷呢。雖然張季鸞不像陳布雷那樣一刻也不能離開蔣介石左右，但張季鸞身爲《大公報》主持人，也是事務繁雜而重大。

自己硬把張季鸞在香港留了七天，整整七天！這七天裏他的公務一定積壓如山了吧。這可太對起張季鸞了，更太對不起蔣介石了。怎麼還能繼續硬把張季鸞留在香港呢？

于是，錢永銘作了個決定，一個致命的決定。

第二天一大早，西義顯興衝衝地來到錢永銘的住處，錢永銘卻不在。

僕人也不知道錢永銘去了哪裏。

西義顯只好等，焦急地等。

二個多小時以後，錢永銘回來了。西義顯趕緊迎上去，興高采烈地説：『可把你老先生等回

來了。您去哪裏了？』

『唔……唔…我去機場送個人。』錢永銘一見西義顯的滿臉喜色，不知所以。就有些支支唔唔了。

『昨天，』西義顯掩示不住内心的喜悦，『昨天，在東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松岡外務大臣在五相會議上，促使他們承認了重慶的要求。他只在反面加了一條：「重慶政府如若迅速任命正式代表來日，日本政府將延期承認南京政府。」這就是附加的條件，重慶很容易作到這點的，不是嗎？我一接到東京的來電便趕到你這裏來了。』

『什麼？』錢永銘大驚失色。

『我，我，我剛把張季鸞送回。對了，你還不知道張季鸞就是那個從重慶來的大人物。糟了，糟了，這下可糟糕透頂了。』錢永銘頭上冒了汗，急得直搓手。

『快，快讓我看看總領事館的電報原文！』

看完電報，錢永銘立即跑到寫字台邊去寫信，說明在東京發生的一切，並要求蔣介石任命前駐日大使許世英爲重慶政府的首席正式代表，同時賦予張兢立以正式代表的資格。

寫完信，他立即去找逗留在香港策應和談交涉的『海上聞人』杜月笙，讓他立即乘飛機趕往重慶。

但是，屋漏偏逢連陰雨。

香港的英國總督府已經開始封鎖啓德機場，嚴格檢查乘客的行李。杜月笙對付中國的官吏游

刃有餘，而對英國的官吏卻無計可施，只好打道回府。

西義顯趕忙又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把杜月笙送到機場。然而，平時任由西義顯等人出入機場的英國人這時也變了臉。西義顯同樣無計可施。

十一月二十六日，沒有去重慶的飛機。

十一月二十七日，杜月笙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飛往重慶的飛機，騰空而去。

『這回日本沒希望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東京，松岡洋右坐立不安地等待重慶的回音。

上午，受命來到東京督促承認南京汪精衛政府的影佐禎昭，會同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武藤章、企劃院總裁鈴木真一，代表南京政府的阿部特使，涌進松岡洋右的宅第。對松岡洋右進行圍攻。

他們認爲，錢永銘的斡旋交涉，是重慶政府的『詭計』，遣責松岡洋右中了蔣介石的『詭計』。武藤章甚至拔出軍刀在松岡眼前比劃着，粗魯地責罵、威嚇。

這時，傳來美國政府和重慶政府暗中商定給重慶政府二億美元貸款的消息。影佐一行人更是向松岡洋右步步緊逼：

『重慶政府一面提議和平條件，一面又在背地裏圖謀加强抗戰力量，這簡直就是他們毫無和平誠意的最好證明！』

松岡洋右不動聲色。他認爲蔣介石的這種兩手準備很正常，一點也不奇怪，如果他是蔣介

石，他也會這麼作。

松岡洋右只盼着從香港傳來的蔣介石的答覆。

但是，答覆没到，還是没到。

從香港發來的電報，都是田尻愛義總領事要求延期承認南京政府的電報，接二連三，言辭一份比一份懇切。

與此同時，南京的電報也雪片般地飛來，報告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最後督促日本政府按期承認南京政府，電報一份比一份口氣强硬。

下午，近衛文麿的首相官邸，召開内閣會議，目的是最後決定日本政府不能再變動態度。

松岡洋右還在等香港傳來的電報，但是，有關重慶政府任命正式代表的電報就是不到。

松岡洋右無法，只好在内閣會議上提出一個小小的然而卻事關重大的議題：

『是否再等一等香港來電？』

沉默，還是沉默。

近衛文麿和其他内閣成員全都沉默不語。

沉默還是一種表態，自動通過了一個決定。

最後，近衛文麿終于打破了沉默，長嘆一聲：

『啊，這回日本没希望了。』

西義顯未能阻止日本承認汪僞政權

由于杜月笙二十七日才乘飛機趕往重慶，二十八日就不可能有蔣介石任命正式代表的通知到達香港。

錢永銘拼命地作最後一搏，他把松岡洋右承認的斡旋條件中有關「防守同盟」的內容，即「可把特定國家從同盟對象中除外」一句，作了個改動：『除外』的『特定國家』即是美國。

錢永銘認爲如此一改，蔣介石就會打消顧慮，立即同意任命正式代表赴日本談判。

錢永銘立即動員手下的全部力量，向重慶聯絡。

但是，已經晚了。錢永銘的最後努力白費了。

二十八日深夜，松岡洋右無限感慨的電報傳到香港日本總領事館：『日本政府終于決定承認南京政府的既定方針。』

錢永銘工作的發起人西義顯，十分清楚承認南京政府對日本意味着什麼。他還在等，等重慶傳來的消息。他等來了。

二十九日深夜，從重慶拍來電報。電報正式通告日本：國民政府任命許世英爲首席代表，張兢立爲正式代表，赴日本進行和談。

西義顯、田尻愛義立即發報，電告東京和南京。

回到住處，堅尼地道中段的「千歲」旅館，西義顯沒有進自己的房間，而是來到二樓休息室，隔着玻璃窗久久地向外眺望。

防空警報聲在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上空環繞不絕。

黑暗中，維多利亞海峽裏，英國東洋艦隊的艦艇，一艘接一艘向外海駛去。

西義顯知道，停泊在香港灣仔的英國東洋艦隊的所有船隻正利用暗夜向新加坡方向集結。

十一月三十日的太陽終于升起來了。

廣播裏和英文報紙、中文報紙上用顯著的標題報道：日本正式承認南京國民政府。

同樣也在顯著位置報道：美國第三次連任的總統羅斯福宣佈，撥款一億美元給重慶國民政府支配，立即交付五十架最新式驅逐機給重慶國民政府，今後還將提供更多飛機。

灣仔的英國軍艦已經全部開進，維多利亞海峽的水面頓時空空蕩蕩了。

西義顯佇立在窗前，淚水滾滾。他長長地嘆息着：

『亞洲就要成爲世界大戰的大戰場了。』

『日本，唉，日本，今後會是什麼命運在等待你呀？』

第十二章

對日宣戰

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

『虎！虎！虎！』

日本聯合艦隊悄悄地駛離日本，秘密地向美國檀香山逼近。

所有無綫電通訊均已關閉，一切都按預先的部署有條不紊地進行。

一切都是預謀，宣戰詔書將在戰機飛臨珍珠港時向美國提交。日本駐美大使野村一直與美國國務卿進行着艱苦的談判，目的是避免日美間的直接衝突，但事後證明，這不過是日本施放的和平煙幕。

和平的煙幕下掩蓋着洶洶的戰爭。

溫柔的背後也許是殘酷。

珍珠港，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軍港。迷人的陽光在冬日裏散發着溫暖，巨大的軍艦隨着海浪輕輕搖晃，海鷗盤旋在軍艦周圍。軍艦上除了值班的美軍官兵外，其餘官兵都已離開軍艦上岸去享受那難得的星期天。一片和平、安寧的盛世太平景象。

死神正悄悄地向這些龐然大物逼近，和平就將爲巨大的轟炸聲撕碎。

一架架戰鬥機、轟炸機從日本聯合艦隊上起飛，日本的駕駛員們驚奇地發現他們是如此的順利，根本就未遇到美國人的任何阻攔。珍珠港就在眼前，美國軍艦上美國國旗迎風招展，像是引導着日本轟炸機。

瞄準、攻擊。日本轟炸機呼嘯着向毫無防備的美國軍艦，投下一顆顆炸彈。一瞬間，珍珠港陷入火海之中，在日本人的第一次攻擊下，美國損失了其太平洋艦隊的一半。美國人被突如其來的攻擊打懵了，未等他們反應過來，日本人發動了第二輪攻擊，炸彈如雨，硝煙衝天……

太平洋戰爭瀑發了。

消息傳來，蔣介石欣喜若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重慶郊外的黄山官邸籠罩在一片寂靜之中。霧氣一團團地從嘉陵江中升起，瀰漫在陪都的每一個角落。官邸門口的燈發出昏黄的光，持槍的哨兵一動不動，仿佛一點響聲都會驚醒官邸的主人——蔣介石委員長。

中國人正在浴血抗戰，而這裏仿佛是世外桃源，但平靜之中蘊藏着無窮無盡的緊張。中國頑强抗戰已經過了四個年頭，但勝利的曙光依然遙遙無期，大半個國家淪陷于日本人之手，戰場上失敗的消息一個接着一個。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叫嚷『和平建國』。國外的援助雖然逐漸增多，但遠遠不夠，而且蔣介石非常清楚，他們的目的不

過是爲了讓中國軍隊拖住日本人，使日本人無力南進，去損害他們的利益。

凌晨四時，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在黃山官邸響起，打破了夜的安靜。蔣介石從睡夢中驚醒，拿起了床頭的電話。電話中傳來了中央新聞局局長董顯光興奮的聲音：『委員長，根據監聽到的消息，日本已向英美宣戰，日本飛機襲擊了珍珠港。』

『消息確實嗎？』蔣介石抑住内心的欣喜問道。

『消息非常確實，』董顯光說，『并且美英也已經對日本宣戰。』

蔣介石再也控制不住欣喜，連説：『好，好，好。』

宋美齡也爲電話鈴聲吵醒，身着睡袍走了進來：『Darling，什麽事？』

蔣介石向宋美齡介紹了『珍珠港事變』爆發的情況。最後説：『敵寇掀起太平洋戰爭，實爲敵我勝敗的一大轉折點。此後，敵之交戰國增多，我之同盟國增多，敵之戰綫拉長，必然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我之壓力減輕，敵之壓力增大；我之援助增加，敵之援助減少；我之士氣高漲，敵之士氣減弱。美英主力一經轉向，我軍就可發動全面反攻，則陰霾之氣可一掃而空，勝利終可待矣。』

八日晨，『珍珠港事變』的消息通過無綫電波傳遍了中國陪都重慶，引起了一派歡欣鼓舞的景象。國府官員紛紛互相祝賀，仿佛已經獲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在他們看來美英對日作戰，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一位在重慶看到當時情景的美國人寫道：『在美國發生珍珠港事件那一天，在中國就好像是

在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戰日。」

當天，蔣介石處于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上午，蔣介石由黃山官邸回重慶，召集國民黨中央常會，決定方針；下午，約見美、英、蘇駐華大使談話；晚上，召開軍事會議。

蔣介石在約見美、英、蘇駐華大使時，宣佈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在給各個國家的備忘錄中，聲明『反侵略陣綫的各個國家必須對于各個軸心國家認爲共同公敵』；建議『美國對于德意兩國與蘇聯對于日本，皆請同時宣戰；』特別提出『中、美、英、澳、荷、加拿大、新西蘭等友邦國家結成以美國爲領導，指揮共同作戰軍隊的軍事同盟，以一致對德、意、日軸心國，各同盟國互訂不單獨與軸心國媾和條約。』

同時，蔣介石還召見各國駐華使館武官，宣佈中國正準備對香港、越南、緬甸採取軍事行動，配合各友軍作戰，並向美英蘇提出共同作戰的建議。

同日，蔣介石急電在美國的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向羅斯福總統轉達中國政府對日本進攻美國的『憤激莫名之心情』；並宣稱：『在我們新的共同戰鬥中，中國將以其所處之地位，並提供所有，與美國採用共同立場，直至太平洋與全世界得免除暴力與背信棄義的凌辱爲止。』

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在中日戰爭進行四年半之後，正式對日本宣戰。國民政府的宣戰訓令由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蔣介石、立法院長孫科、司法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長于右任簽名。

同時，國民政府也宣佈中國對德國、意大利處于戰爭狀態，所有涉及中德、中意的條約、協

定、合同一律廢止。

只有在美英對日宣戰後蔣介石才敢對日宣戰；

只有在擁有足夠的實力後蔣介石才敢對日宣戰；

只有在最後勝利的曙光呈現後蔣介石才敢對日宣戰。

這是軟弱，還是政治家的謀略？

蔣介石表示要整個地解決世界戰局，決不單獨媾和，然而……

《對日宣戰書》的發表標志着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抗日不再是中國人單獨抗擊日本侵略的孤立行爲，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蔣在對國民黨幹部的講話中總結了抗戰的成就：同時，蔣介石爲自己丟失了大片國土辯護，把它說成是一種策略，『到了「七·七」事變發生，我們第一步就決定要打破敵人的蠶食政策，所以發動了當時上海的抗戰，吸引敵人的兵力南下，不許他從容不迫從東北而華北，而華中、華南一步一步的侵略我們。我們第二步的計劃，就是要破敵人的大陸政策，要使敵人不單純以中國爲作戰對象。』

蔣介石這時候已經忘記了在他的授意下種種與日本的『和平談判』；他記得只有他是抗戰的英雄，高瞻遠屬的領導人。

一九四二年元旦，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其餘二十二國按國名英文的字母依次排列，

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並在華盛頓發表。

毛澤東是『心腹之患』

《聯合國家宣言》『不單獨媾和』的約定，客觀上堵塞了蔣介石與日本和談的可能。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從中國大陸抽調大量兵力，但蔣介石並不抓住機會向日本軍隊發起進攻。因爲：

蔣介石的眼睛不僅盯着日本軍隊，而且盯着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在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最終結果呈現之後，日本侵略不過是『肺腑之患』了，而中國共産黨的迅速壯大，解放區的迅速發展則形成了對蔣介石政權最大的威脅，最終與蔣介石爭奪中國統治權的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南京的汪精衛，更不是大大小小的各地軍閥，而是毛澤東——這是『心腹之患』。

第十三章

日閻勾結

閻錫山說：『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

舊中國有許多『王』——土皇帝。

山西王閻錫山是其中佔山爲王時間最長，也是最穩固的一個，是舊中國政壇的『不倒翁』，從辛亥革命開始，長期盤踞山西，擁兵自重。蔣介石上台後，企圖一舉消滅各地割據的軍閥，一九三〇年，蔣介石討伐馮玉祥、閻錫山，馮、閻與李宗仁結成聯盟，遂爆發中原大戰，蔣介石在張學良的協助下擊敗馮、閻、李聯軍，閻錫山被迫宣佈下野，離開老巢山西，逃居大連。

閻錫山選擇大連作爲他的避難所，有他的用意，一方面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制山西；另一方面，大連當時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他逃往大連，非常安全，而且可以與日本人勾結，憑借日本人的力量，圖謀東山再起。

閻錫山與日本軍界有很深的關係，一九〇四年，閻東渡日本，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一九〇七年，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同期中，岡村寧次當過隊長，板垣征四郎當過教官，土肥原賢二也爲第六期學生。

擁有實力就可以引起各方的重視；而與日本密切的關係成爲閻錫山與日本勾結的有利條件。

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日本用軍用飛機將閻錫山送回山西。閻到達大同的當日，對其親信騎兵司令越承綬講：『張漢卿（學良）自顧不暇，那顧上管咱們的事，他也管不了咱們。』還說：『恐怕不久全國就要行動起來，反對他們（指蔣介石、張學良），他們將自顧不暇，對我也無可奈何。』據越承綬後來分析說，從閻錫山當時的行動和談話看來，他不僅對于日寇侵佔東北以至華北的陰謀有所預聞，而且必然同日本有勾結。

閻錫山回山西後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並成立了僞『滿洲國』。同時得寸進尺，越過長城，侵略華北，華北岌岌可危。但閻錫山胸有成竹，對其部下說：『華北縱然被日本侵入，山西也不至于陷于兵災。』

閻錫山有恃無恐，因爲他與日本人有秘密協定。

日本侵佔了東北；

日本侵佔了熱河、察哈爾；

日本還要侵佔華北；

日本的最終目的是征服整個中國。

中國人從來不肯屈服，面對侵略，掀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衛民族國家主權的高潮。

『一二・九』運動爆發，中國發出了最後的吼聲；

只有實力、地盤、地位。

『有奶便是娘』——這是軍閥的邏輯。

他高喊：『自存、自固、自强。』

因此他說：『……能自存與自固，聯日好，聯俄也好；……若能自强，國聯可靠，英美亦可靠，親俄有益，親日亦未嘗無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和天津駐屯軍參謀古井飛往太原，策動閻錫山加入『冀察政務委員會。』此時，日本在華北各大中城市遍設特務機關，閻錫山爲了適應日本的要求，竟贊助日本在太原、大同、綏遠等地設立公開的特務機關。並嚴令山西的軍政官員：『不得和日本人發生衝突。』

既然有求于日本人，那就不得不對日本人屈膝。

請進來，走出去。閻錫山派他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參謀長，專負勾結日寇的總責。他還在天津設有與日本人聯繫的專用秘密電台。一九三六年冬，閻錫山派太原綏靖公署參事蘇體仁（留日學生）去北平，與日本大倉洋行駐北平經理林龜喜相勾結，直到『七七』事變，也未回任。後來便回山西任僞山西省主席，爲日軍侵華服務。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共產黨紅一方面軍從陜北東渡黃河，準備開赴河北前綫，對日作戰。閻錫山急忙調遣大軍，層層設防，阻止紅軍東進，遭到紅軍的沉重打擊。後紅軍爲了避免内戰，于五月回師陜北。

勾結日本，反中共，這是閻錫山『自存』的兩面刃。

西安事變爆發，國內和平實現，抗日救亡運動高漲。閻錫山見風使舵，高喊：『守土抗戰。』所謂『守土抗戰』，乃是暗示日本人，只要日軍不進攻他的山西，他決不會出兵抗日，同時，也不讓蔣介石的中央軍借口抗日進入山西。

山西是他的禁臠，誰也不許染指。

閻錫山說：『我們今日没有絶對打勝的把握，……不能不向人低頭。』還說：『憑力量亡人國家者，在第三者可以說爲不對，在被亡的國家說，只能責自己不能自强。……我們回頭想想，欺侮我者，不以欺侮我之法加之于世界列强，而獨加之于我，其錯在我明矣。』

在他看來，力不如人，只能任人欺侮；國力不如他國，只能任他國侵略。被人欺侮、侵略不僅不能反抗，反而要承認自己有錯。

按照這種『弱肉强食』的邏輯，中國遭到日本的侵略，只能自怨自艾，只能反省，是談不上，也是不能反抗侵略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向侵略者低頭。

所以，對于丢失的大片國土，閻錫山認爲『……若說收復失地，也没人敢說句不該收復，不過收復倒是對，是一種有條件的對。失地是不敢不復，不過收復可要預先打算打算，看有没有力量收復。……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失的土地收復回來……。』

别人不敢說，閻錫山敢說：『不收復失地』。因爲失地並不是閻錫山的，所以閻錫山不想收復，况且實力不足以收復，所以連提收復失地也是錯誤的。

「實力第一」爲原則，閻錫山以保存山西和自己的軍隊爲目標，與日本人勾結就不足爲奇了。

『我們必須有三個窟窿』

「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山西爲華北軍事重地，擁有豐富的資源，日本人早就將其納入鯨呑的範圍。八月上旬，日軍以第二十師團全部，第八、第十師團各一部，與酒井旅團，沿平綏綫進攻南口，另以第四師團第三十二旅團，與第十二留守師團的鈴木旅團，攻張北及張家口，大井支隊則由沽源往龍泉關側擊平綏路，形成對山西的全面進攻。

與此同時，全國軍民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戰。山西民衆在中國共産黨的發動下，紛紛要求抗日。

閻錫山一面大駡日本人不守信用，破壞密約；一面爲了保住自己的地盤，在民衆抗日要求的推動下，調集兵力。參加了防守晉北的忻口戰役和太原保衛戰，確實打擊了瘋狂進犯的日本侵略軍。

曇花一現，閻錫山的抗日是不得已而爲之，很快閻錫山就後悔了。一九三八年，閻錫山在其第二戰區長官部所在地陝西宜川秋林鎮，對他的心腹高級軍官表示忻口抗戰犧牲太大，他說：『忻口一戰，犧牲了咱們兵力百分之七十，這才使得犧盟會的力量超過咱。』

閻錫山是偷鷄不成反倒蝕把米，原來，日軍進攻山西時，閻錫山爲保住地盤，確實是真正的

與日本打仗，企圖打敗日本軍隊的進攻，阻止日軍進入山西。誰知，山西没保住，自己被趕過了黃河，還損兵折將，實力受到嚴重損失。相反，共產黨領導下的犧盟會趨勢發展起來，大有取代閻錫山成爲山西主要力量的趨勢，這使閻錫山坐卧不安，反悔不迭。

從一九三八年開始，閻錫山就準備和日本人勾結，以圖保存實力「自存」。他對部下大聲疾呼：「你們趕快起來，只要咱們有了力量，蔣介石、共產黨都會怕咱們，日本人更不會小看的。」

强盜有强盜的邏輯。

漢奸有漢奸的邏輯。

閻錫山與日本勾結，自然也有他的邏輯。

閻錫山的投降哲學叫「二的哲學」，也就是說，「存在」——「鞏固政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而爲了「生存」，就必須隨時應變。只要有利于自己「生存」，什麼都可以做。因此，他應用其哲學于抗日戰爭中成爲：「一切事情都不能作得太絕了。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又要準備剿共。」

所以，當日本佔領山西後，他從抗日就轉向聯日。首先，他授意抗戰前派到北平的蘇體仁作爲他的代表，回山西組成僞政權。蘇回山西後，一切重大事情都暗中與閻錫山通氣，實際仍是閻統治着山西。其次，通過各種途徑與日本人接觸，準備與日本勾結。

閻錫山事事與蔣介石爭鋒，所以即使與日本妥協也要不甘落後。他爲了統一人心，就開辦了一個校尉級軍官訓練團，對受訓軍官説：「在蔣先生的腦筋中，決無抗戰的意思。今日只是怎樣

妥協的問題，……一切關鍵問題，要看日本條件能否接受。這種趨勢，我們要看清楚。比方天將下雨，我們就要趕快準備雨傘草帽，否則，一落人後，就要喫大虧。』

閻錫山要投敵，必須趕在蔣介石之前，捷足先登，才能受寵于日本人，得以爲其重用。

不過，他對蔣介石的分析卻是一語中的。

一九三八年六日，閻錫山又把他那逃散的軍隊負責軍官，召集到吉縣古賢村開會。閻錫山在會上痛心疾首地說：『你們的作戰方法，不應該和敵人死拼，現在你們的力量已經大大減少，如再不改變方法，不到三個月，你們就完了，所以給你們預先開個追悼會。』他以此來刺激他的手下，爲他的投敵埋下伏筆。同時，他又說：『抗戰以來，我們抗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今後還有我們晉綏軍的立足之地嗎？』于是，他又向他的軍官們提出『新能存在』，『舊必滅亡』的口號，要他的軍官跟着他『自新』。

一九三八年，汪精衛公開投敵，閻錫山惺惺相惜，對汪精衛的行爲深爲理解，並且多次爲汪精衛辯解：『抗戰與和平是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

又說：『汪先生並不是當漢奸，只是政見不同而已。』

高人自有『高論』。

一九三九年三月，閻錫山爲了反共投敵，召集了軍政軍高級幹部會議——秋林會議。

他在會議期間，提出『無條件存在論』、『狡兔三窟』和『抗戰最高峰』的論點。

『無條件存在』——『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爲了存在，不擇手段，就是投降日本也未嘗不可。

『狡兔三窟』——『我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窟窿，才能存在：第一窟窿是日本人，第二個是國民黨，第三個是共產黨。』又說：『因爲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須費力經營好日本人這個窟窿。』

『抗戰最高峰』——抗戰已到了盡頭，再往下就是投降妥協了。

總之，『一切爲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抗戰是手段。』

實際上，勾結日本也只是手段。

日軍引誘閻錫山上鈎，但是……

閻錫山要與日本人勾結，保存實力，求得生存。

日本人則希望閻錫山投降，分化中國抗戰陣營，消滅黃河以北的抗日力量。

雙方一拍即合。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即制定了一套瓦解和誘降的謀略計劃。閻錫山是日本此次工作的重點，秘密代號爲『狸工作』。

一九三九年中國派遣軍總部成立，對閻的誘降活動更名爲『伯工作』，並由日本華北方面軍專門負責此事。

日本方面認爲：『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的懷柔工作，在分裂瓦解重慶將領的工作中是可能的，而且對其他方面影響很大。』

日本方面分析，閻錫山老奸巨滑，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但閻錫山與日本素有良好的關係，且與蔣介石有極深的矛盾，堅決反共。只要對閻錫山施以强大的軍事壓力，並在政治上給予較高地位，閻錫山爲了生存，就可能投降。

因此，日本陸軍省、興亞院、中國派遣軍總部對該次工作抱有極大的期望，非常重視，責成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靈活地運用他們豐富的對華經驗，以極大地熱情努力推動工作。』

日本希望通過閻錫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機會主義態度的反蔣將領挺身而出，從而打開重慶政權崩潰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傳，以期有利于促進中國事件的處理。』

日本方面利用各種途徑，開展誘降閻錫山的工作。

秋林會議後，閻錫山加緊了與日寇的勾結。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閻錫山爲了和日寇試行『和平談判』，便以其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十九軍軍長王靖國和六集團軍總司令兼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的名義經過僞山西省主席蘇體仁的介紹，派代表到臨汾與日寇淸水師團部的山下參謀，進行談判。

在閻錫山的授意下，其代表向日方提出了閻方的條件，爲：

1. 晉綏軍一部將改編爲『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專事『剿共』。請日軍從隰縣、午城、蒲

縣、勍香鎮等據點撤退，並將汾陽、孝義一帶地區讓與晉綏軍駐防。

2．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剿除在山西境内的八路軍、決死隊。

3．日軍須供給晉綏軍槍械彈藥、充實『剿共』力量。

4．山西各將領在日佔區之住宅、財産，請日軍完全發還。

閻錫山先用『反共』這張牌打動了日本人，以便取得日本軍隊的退讓和援助。日寇當時提出的條件，叫閻錫山『全部投降』，並許誘人之高位。但閻錫山鑒于自己實力不足和周圍環境，一時未敢答應。

臨汾會談後，日本爲了更進一步引誘閻錫山，主動從隰縣、午城、蒲縣、勍香鎮等據點撤退，讓與閻軍駐進並協同『剿共』，並答應其他條件，將根據情況，逐漸解決。

引魚上鈎就必須投之誘餌，日本人先讓閻錫山立即行動，在山西境内向抗日的決死隊、八路軍進攻，企圖將共産黨的力量逐出山西。

閻錫山的反共軍事行動，遭到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的堅決反擊，不僅未能將抗日武裝力量趕走，反而損失了很多軍隊。

在共産黨面前碰了釘子，閻錫山更加快了與日本人的勾結，更加明目張膽地進行投敵活動。日本爲了加緊誘降閻錫山，于一九四〇年春先後派漢奸白太冲和憲兵特務頭子大矢到閻部活動，雙方就『現地妥協，共同防共』達成了一致意見：『雙方在山西境内進入停戰狀態，彼此合作，消滅山西境内的抗日力量——八路軍和決死隊；並且實行物資交往，互通有無。』

日、閻首先在『剿共』上合作，接着就走向『全面合作』。

日寇爲了顯示合作誠意，消除閻錫山的疑慮，首先作出讓步。

一九四〇年四月，日寇根據閻錫山的多次要求，口頭答應：1．將山西各將領在太原的住宅交還；2．日軍在中條山發動戰事打勝後，閻錫山即可向太原前進。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閻雙方在太原秘密簽訂立了一次『軍事協定』：1．日軍決定，爲了和晉綏軍初步實施『合作剿共』的方針，即先將靈石境内之雙池鎮據點，交給晉綏軍駐防；2．由騎一軍速派一部分兵力連夜出發，以『佯攻』佔領了雙池鎮。

閻錫山即派兵『佯攻』佔領了雙池鎮。

一九四〇年七月，日本山西方面軍提出『合作草案』，同意閻錫山所屬各部分住山西各地，閻錫山設長官司令部在太原，並歡迎閻錫山到北平就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職。並提議日閻『雙方密切配合，進行剿共。』

閻錫山對就任職務不感興趣，他更相信擁有實力才能坐穩位子，所以對于日本的『合作草案』，閻錫山只是向日寇提出要求，請求幫助他先充實力量，尤其是充實『剿共』的軍事力量後，再協商具體的『駐防問題』。

但日寇並不是真的支持閻錫山，而只想將閻錫山誘到太原，把他的兵務分散到各處後，讓閻錫山當個可以隨意擺布的傀儡。因此，對幫助閻充實力量的問題不感興趣，經閻錫山再三要求，也未肯明確答覆。致使日閻間的勾結一時停止不前。

正在此時，日本派兵務局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到太原，授意駐太原的日軍司令部說：「只要閻錫山肯投降，要什麼，就給什麼，暫時不必斤斤計較條件。」

閻錫山、日本軍之間的勾結得又活躍起來。

此時，閻錫山處境困難，因而加緊了與日本勾結，企圖從日本方面撈到好處。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間和一九四一年三月兩次秘密派遣心腹趙承綬前往孝義縣白壁關村，與日軍勾結。

趙承綬後來詳細回憶了這段歷史：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間，有一天，閻錫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作了一次時間較長的談話，大意是：「目前咱們的處境很不好，蔣介石要借抗戰的名義消滅咱們，不發給咱們足够的經費，也不給補充人員和武器，處處歧視咱們。共產黨對咱們更不好，到處打擊咱們，八路軍在山西各地有嚴密組織，把老百姓都拿過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們，那就只有被消滅。咱自己的人也不穩定，宜生（指傅作義）已離開咱們，陳長捷也在動搖。青年幹部左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傾的跑到蔣先生那裏做官賺錢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專門拉咱的幹部。咱們如果想在中國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後怎麼轉變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還能談到其他事業嗎？抗戰固然是好事，但又沒有勝利把握，就是打勝了，沒有咱們也不行。權衡情況，目前只有暫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發展咱們自己，這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咱們唯一的出路。日本人也想依靠咱們……，叫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認爲現在公開派代表去太原，還不是時候，所以約定派人先在孝義白壁關村和他們會面。我想別人不可靠，你

去最合適。』

你這次去，主要商量四點，也就是四句話，即『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前三句對日本人無害，他們也希望這樣做，會同意。第四句可能有爭執，一定要爭取做到。如果內政不能處理，老百姓就不會相信咱們，不跟咱們走，咱就不會有力量，那就談不上和他們（指日寇）合作了。這四句話，前三句是咱遷就他們，後一句也要求他們遷就咱一點。如果要讓咱像汪精衛那樣，我是絕對不幹的。』接着又告訴我幾點要求，要我迅速安排前往。

經過白壁關村兩次秘密會談，日閻間的勾結更進了一步。日本方面對于閻方提出的條件滿口答應。日寇又讓出孝義縣屬的況北峪、胡家窰、高陽鎮等據點，由閻派部隊接防，並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應閻的要求，完全將孝義縣城讓給閻，由趙承綬接防。

與此同時，閻錫山通過僞山西省政府的蘇體仁、梁上樵等與日本函電來往，討價還價，逐步接近。

《汾陽協定》終于簽署了

做好充分準備之後，一九四一年八月，閻錫山派趙承綬爲全權代表，前往日軍控制的汾陽城簽訂《晉綏軍與日本停戰協定》。——也稱《汾陽協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趙承綬帶着一群閻軍軍官，由孝義縣城出發，揚言到前綫偵察地形，乘馬向孝義、汾陽兩縣城中間的田屯鎮馳去。在距離田屯鎮不遠時，一行人鑽進路旁的高粱

地裏，脱下軍裝，換上事先準備好的長衫馬褂。悄悄溜入田屯鎮。然後分乘日軍準備好的汽車，駛入汾陽縣城，住在城内的日本旅館。

日本方面對此項簽字儀式十分重視，特派「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中將到汾陽主持此事。同來的有「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少將等人，住城内的若松旅團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舉行簽字儀式，地點在汾陽縣城内南水井三號屋頂花園。會場上懸掛着中、日兩國的國旗，日本的太陽旗掛在國府的青天白日旗上面。

日軍田邊盛武、楠山、若松等人身着日軍軍服，全佩軍銜，首先進入簽字會場，端坐在上首正面，板着面孔，儼然以戰勝者自居。

趙承綬與溫懷光身着國民黨抗戰時期的灰布軍服進入會場時，日軍將領坐在那裏，一動不動，趙承綬等人只好聽人擺布，由日軍參謀人員按指定座位引導入座。

上午十時，簽字儀式開始，日軍隨軍記者十餘人，違背雙方事前的約定（不照像），馬上開始拍照片、電影，還準備有錄音機。趙承綬等躲閃不及，無可奈何。

日軍將領的戰勝者自居的高傲態度，使趙承綬感到了受了極大侮辱，心裏感到非常不愉快，只希望儀式趕快結束。

從來，做漢奸賣國賊的滋味就不好受，趙承綬等也不能例外。

儀式開始，趙承綬和田邊盛武互相交換指派書。田邊看到趙承綬的指派書只有寥寥十幾個字，搖搖頭看了看趙承綬，表示不滿，趙承綬心中不快，也不解釋，儀式只好按照預訂的程序繼

續進行。接着雙方代表分別在事先用日、中文字打印好的《停戰協定書》簽字。趙承綬簽上閻錫山的名字，蓋上閻錫山的圖章，另在下邊簽上「趙承綬代」的字樣。

儀式完畢，雙方代表起立握手，說了幾句客氣話，還碰杯喝了一口香檳酒以示慶祝。然後雙方才分別退出會場。

《汾陽協定》內容很具體，日本為了收買閻錫山，特意將閻錫山提出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作為原則，放在「前言」當中，並規定：「日閻雙方徹底停止一切敵對行為，親善友好，共同提攜，實現東亞共榮。」

在協定中，列舉了各自的條款：

一、日方實行的條款如下：

1. 日方給予閻方步槍五萬支，輕機槍一千挺，重機槍五百挺，並配給一定數量子彈；
2. 日方給予閻方軍費（國幣）二千萬元，另給閻本人機密費七百萬元；
3. 日方供給閻方軍隊給養及一部裝備；
4. 日方先撥給閻方能新成立五十個團的壯丁及全部武器、裝備，爾後根據形勢發展，再繼續撥給五十個團的壯丁和武器、裝備，以充實閻方力量；
5. 日方將雁門關以南全部山西地區的政權讓給閻方，由閻方陸續派人接管。初步接管晉中各縣及晉南臨汾等縣，再逐漸接管其他各縣；
6. 日方將山西境內同蒲人（寧武以北除外）、正太（娘子關以西）兩鐵路管理權讓給閻方

（這一條先有爭執，後來日方答應共管）。

二、閻方實行條款如下：

1．閻本人既刻通電，表明脫離重慶政府，發表「獨立宣言」；

2．閻本人第一步先駐孝義，待日方將晉中各縣政權交讓後，進駐太原，接管雁門以南政權，擴充力量，再進住北京和「南京政府」合作，或擔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3．爾後根據形勢發展和需要，閻可以組織「華北國」；

4．閻方營以上部隊，必須聘請日本人擔任顧問及指導官；

5．閻方將通往陝西的黃河渡口小船窩讓給日軍駐守。

除書面協定外，還口頭協議，閻方先在汾陽縣城設立辦事處，其辦事處人員由日方發給特別通行證，可以通過孝義、汾陽間日軍哨所，以便經常聯繫。

協定規定，閻、日的合作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日軍協助閻錫山擴充實力，由「南京政府」補充槍支彈藥，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給軍費一千二百萬元。此外，日軍借給閻錫山五千萬元爲「整理晉鈔」之用。在此期間，日軍要求閻錫山與汪精衛會談，協議合作。

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後，閻錫山「即向重慶政府敦促反共和平」；如蔣介石不接受，「則向中外宣佈單獨行動」，即宣佈脫離重慶政府，公開投日。同時，與日軍合作，首先肅清

山西境内的共軍。爲此，日方答應臨時給閻錫山二千萬元軍馬、武器費；另外，『南京政府』每月再給軍費二千萬元。在肅清山西共軍後，閻要得華北全部。這時，日軍再給予步槍十萬支、輕機槍八千挺、重機槍一千八百挺，以及其他武器，彈藥和汽車等物資。還允許閻錫山擴大兵力到五十萬人，恢復在太原的兵工廠。

還規定，閻錫山必須『聯合各反共將領，向和平統一方向邁進。』

第三階段，由閻錫山『維持華北全境治安』，由『南京政府』撥給華北善後費一萬萬元。于適當時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華北國防軍總局司令。』

此外，協定還提出，待閻錫山『實力充實時，即行統一國家，實現東亞和平。』

日本侵華軍隊，極力爭取閻錫山，一面使其成爲侵華的幫兇，一面使其瓦解國民政府和分化正在抗日的地方部分，閻錫山卻想依靠日本人來擴展自己的實力和地區。

閻錫山的降日活動爲外界所知，他只好採取觀望態度，然而日方却着急了……

協議雖然達成，但到真正履行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而且閻錫山的態度又有了變化，對于投降採取了觀望態度。

《汾陽協定》簽訂後不久，閻錫山于十月一日派趙承綬前往太原，與日方代表楠山秀吉進行關于履行《汾陽協定》的細則的談判。閻、日雙方互相催促對方履行『協定』規定的條款。

閻錫山急于擴充實力，要求日軍按協定撥給武器、經費、兵員，然後才能「通電宣佈獨立」。日軍要求閻錫山早日通電與蔣介石政府脫離關係，然後再逐步撥給武器、經費等。一方是誘降，一方是爲了擴充實力，所以誰都不願履行協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侵華日軍大批調往太平洋各地戰場，日軍在華兵力不敷分配，戰鬥力下降，更加急于拉閻錫山投降。不得已，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親自飛往太原，催促閻錫山投降。

岡村寧次到太原當天，即與趙承綬會見，岡村對趙承綬表示：「請你趕快告知閻先生，我們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國的人合作。閻先生是華北老將，我們考慮再三，最好和閻先生合作。閻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後在華北的第一個人物，華北人很擁護他，我們既決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應的事，決不會有問題。我們既能把華北交給閻先生，就要讓他有力量維持華北治安。請閻先生放心，不要先斤斤計較一槍一炮。我們和閻先生合作，對閻先生有好處。現在時機對閻先生有利，對閻先生有好處。請你轉達我的意思，萬勿失去機會。」

趙承綬立即把這一情況詳細電告閻錫山，馬上得到閻錫山的回電：「他不放心，咱可是誠意，應趕快履行《汾陽協定》條款，撥給人、槍。咱必須盡快武裝力量，才能拿起華北；沒有力量，連山西也拿不起，那談得上拿起華北。」並要趙和岡村寧次直接交涉，從岡村寧次那裏得到想要的東西。

但岡村寧次也沒有給閻錫山所要的槍、炮、人。

日軍不給閻槍、炮、人，閻錫山就沒有足夠的實力，當然也不會吞下日軍虛設的誘餌，草率投降。

沒有不透風的牆，閻錫山與日軍加緊勾結，實施其投敵叛國的陰謀很快為中國共產黨人洞悉，為了維護抗戰陣營的團結，八路軍駐山西代表王世英對閻錫山作了數小時的談話。針對閻錫山的『日本要北進，配合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思想，對國際大勢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日本北進的可能性很小，而南進的可能性很大。針對閻錫山認為蔣汪合流，組成親日政府，因此，必須要先蔣一步投降日軍，竊居華北的思想，指出，蔣介石在全國的壓力下，不敢公開投敵。會談中閻錫山問：『假如蔣介石投降，你們（指共產黨）怎麼辦？』王世英表明了中共反對投降，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共產黨人的態度很明確，一定要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不論是誰，如果他要投敵，我們就打倒他！蔣介石若真要投降，那麼忠奸之分已明，在全國人民面前，他就不能再戴上抗日的假面具來欺騙人民了。』

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態度雖然沒有打消閻錫山的投降念頭，但閻錫山在中共知道他勾結日軍的事後，在投降的問題上，有了很大顧慮。所以，他對趙承綬說：『日本人什麼也不給咱。叫咱脫離抗戰，這不可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麼也沒有，他們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產黨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夠，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咱可不能這麼幹。』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美、英開戰，對閻錫山來說，出乎預料，衝擊極大。閻錫山為了給

自己投降找理論依據，曾寫了一篇題爲《東亞戰爭、美必助日，犧牲中國》的文章，其論點是：『美國幫助中國抗戰沒有利益，美國爲了自身的利益，必定要犧牲中國，幫助日本，這對美國來說，這是費力小而成功大，最便宜不過的事。』因此，他認爲『中國抗戰終必失敗』。因此，『求和才能生存』，『繼續抗戰，不亡于日，必亡于共。』他將這篇文章印出來，發給大中小幹部討論。

珍珠港事變發生，閻錫山立即收回文章，對于形勢判斷失去信心。看到日本初期大勝，認爲英美不是日本對手；過了兩天又認爲英美國力雄厚，戰事一拉長，日本將招架不住。在立即投日和暫時觀望之時，閻錫山決定先觀望一段再說，等戰局明朗後再作定奪。

蔣介石早已得知閻錫山單獨與日軍勾結的情況，生怕閻脱離了他的控制，分散國民黨的力量，便派徐永昌和賈景德（徐、賈二人都是閻的舊部）由重慶到山西和閻錫山會晤，面商一切。在會商中，徐、賈二人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説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失利是暫時現象，最後日軍可能失敗。對日求和，只可『從緩』，但『不要單獨進行』。閻錫山便乘機大嘆苦經，說：『二戰區的環境惡劣，補給困難，如政府在經濟上不大力予以接濟，則將必在日軍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下遭到毀滅。』于是，提出『補給問題』來要挾蔣介石。經徐、賈二人向蔣介石請示，蔣答以兵源、物資可酌予補充，除清理欠餉外，還可以增加軍費。同時，還同意閻錫山可以爲了『共同防共』而與日本人保持聯繫。這樣，閻錫山從蔣介石那裏得到了一些補充，『有奶便是娘』，閻錫山更加猶豫不決了。

此時，日本方面的楠山調往太平洋戰場，由花谷正接任，此人爲日本貴族，更加盛氣凌人，難以說話。花谷正屢次向趙承綬表示：「閻錫山要想從日軍手中得到《汾陽協定》中規定的武器、物資和款項等的幫助，必須先行發表通電，脫離重慶政府以後才能辦到。」

閻錫山爲了進一步摸清日軍的態度，便打電報將趙承綬從太原召回。趙承綬回來報告說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目空一切，驕橫十足，態度非常强硬。趙又向閻錫山報告說：「從歷次和日本人談判的情況來看，日本人確是誘降，而不是眞正的「合作」。」

閻錫山迫于形勢，便將立即投降的打算，改爲暫時觀望的態度。

花谷正要拉閻錫山去太原，閻哭笑不得

閻錫山對日軍採取了觀望態度後，與日軍的勾結遠不如以前那樣積極。但仍然與日軍互換物資，交換有關八路軍的情報。對他返回太原和進駐北平的事，則隻字不提。

可是，日軍並不輕易罷休，放過閻錫山，反而更進一步施用威力逼降。

此時，日本從侵華部隊中抽調大量力量去太平洋方面作戰，戰綫拉長，兵力難以補充，急切要求在華北有個更有力的漢奸，替他們統治華北，防止八路軍乘機反擊，收復失地。因此，急于逼閻就範，威脅、利誘兼施，要閻錫山早日上鈎。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軍派人給閻錫山送《覺書》，促使其對《汾陽協定》迅速表明態度，並邀請閻去太原會談。同時，一面派飛機轟炸閻長官部所在地克難坡，一面派了二十多架飛機轟炸

黄河渡口小船窩附近的鋼絲木板橋。

閻錫山一面揚言進行晉西大保衛戰，堅決保衛抗日根據地，虚張聲勢；一面又派親信趙承綬到太原再和日軍商談。

于是，趙承綬又回到了太原。

花谷正一見趙，便氣勢洶洶地說：「好！你來了。你能代表閻錫山嗎？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閻錫山詭詐多端，把中國人騙遍了，還想騙我們日本人嗎？我看你還是回去的好，叫閻錫山親自來吧，我們非和他親自談不可。」

趙承綬無可奈何，只好説：「從後方遷移工廠眷屬需要時間；没有力量前進會遭到八路軍打擊，請日本方面先撥給物資、武器和款項，然後再談進一步合作的事。」

花谷正根本就不理睬趙的解釋，説：「你趕快回去，叫閻錫山到太原來。只要你們宣佈脱離重慶政府獨立，我們馬上會撥給你們槍、炮、彈藥和款項。」

趙承綬只好急電閻錫山。並離開太原回克難坡。

日軍一面通過漢奸蘇體仁、梁上椿等奔走周旋；一面聲稱要用重兵進攻晉西。最後閻錫山同意與日軍首腦會談。會談地點定在離閻、日防綫各三十里的一個山村，閻爲之起名爲「安平」，原來閻深怕會有危險，把這個村莊名爲「安平」，又在吉縣境裏，是個「吉慶平安」之兆。

作賊心虚。

作漢奸心亦虚。

四月初，閻錫山到吉縣，爲參加『安平會談』做準備。他秘密接見了從太原到吉縣來的蘇體仁、梁上椿，密商和日軍會商的事。他又通知其『駐太原辦事處』，由太原攜上等酒和招待日軍首領的一切用品，先一日到達安平村。

五月六日天還沒亮，閻錫山率領趙承綬等人，由其警衛總隊掩護，由吉縣出發，前往安平村。到達安平村後，閻錫山進入事先準備好的房間裏休息，並派趙承綬等人在日軍首腦的來路上迎接。

不久，日軍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岩松義雄、參謀長花谷正、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駐臨汾清水師團長清水中將等到達，由趙引入準備好的休息室休息。

隨即，閻錫山在蘇體仁、梁上椿的陪同下與日軍首腦會晤。令閻錫山不快的是，日軍違背了事先約定，拍了照片（閻後來說：『日本人連這一點小事都不照辦，還能談到「合作共事」嗎？』）

雙方進入會場，即相對而坐，開始談判。

閻錫山首先說：『1. 亞洲同盟是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本人願推戴日本爲盟主；2. 在彼此相互需要的合理條件下，進行合作。但必須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原則辦事，以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3. 請日方表明此次合作，是日本的國策還係地方性策略？以及日本對待中國的方針如何？』

這時閻錫山還未說完，岩松義雄以戰勝者口吻，就接了過去說：『你應該看清目前的形勢，大東亞聖戰日本有必勝的把握；你應該抓住時機，立刻發表通電，脫離蔣政府，加入大東亞共榮圈，不要再猶豫不決；只要你過來，我們已經準備好相應的武器、彈藥、物資和現金。你如果能現在就表明態度，我方立即先給你聯幣三百萬元，步槍一千支，作爲禮物。至于《汾陽協定》中你要求的一切東西，可以陸續交付。』

閻錫山一臉老相，端坐在那裏，沒有表情聽着岩松盛氣凌人的談話。

閻錫山早就料到日軍會逼迫他當場表態，立刻就說：『凡事都要有個準備，現在一切還沒準備妥當，通電還需相當時日。最要緊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陽協定》中答應的東西先行交付，裝備起力量來，能對付了共產黨的攻擊，就可以推進到孝義去。』

岩松一聽閻錫山這話，不斷發出冷笑，不加理睬。當閻錫山再次講述時，岩松的參謀長花谷正假裝瞌睡，把頭歪在一邊，發呼嚕之聲，以示不屑。閻錫山發言未畢，花谷正驀地站了起來，用嚴厲的口吻對閻說：『珍珠港一戰，美國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蔣介石更不在話下，閻閣下和日本合作，對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時候，觀望沒有什麼好處。走！你馬上跟我們回太原去。』花谷正說話時旁若無人，說完一邊用手扯着閻錫山的衣袖，並哈哈大笑起來。

閻錫山啼笑皆非，異常尷尬，眉頭不禁皺了起來。會場氣氛十分緊張，會談很難繼續下去。

蘇體仁見狀建議暫時休會，雙方各暫回休息室。

這時，閻錫山的警衛人員發現，在日本人來的路上，有許多騾馬向安平村前進，懷疑是日軍

炮兵部隊開來。閻錫山得到報告，急得搓手搖頭，十分驚惶。正在着急，閻的警衛總隊長報告屋後有一小道可以出去，于是閻在警衛人員的扶持下，從小道離開了安平村。

繼續開會時間到了，日軍首腦在會場上左等右等不見閻錫山，便讓趙承綬去催，誰知趙承綬回來說：『我們長官已經走了。』岩松義雄非常氣憤，與其隨行人員憤憤而去。

岩松義雄一行離開安平回太原後，採取措施懲罰閻錫山。

日軍將在安平會議中所攝的閻錫山和岩松義雄握手言歡的照片印成傳單，派飛機散發到重慶、西安等大城市，說明閻錫山已決定脱離重慶政府而加入『大東亞共榮圈』，煽動蔣介石派兵討伐閻錫山，迫使其走投無路，不得不向日軍投降。

同時，日軍又到處張貼佈告，表示與閻錫山斷絕『友好關係』，並對閻實行經濟封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軍再次發出佈告：

爲佈告事：查我山西派遣軍曾有五月二十五日的佈告，闡明與山西軍斷絶友好關係而成爲敵對關係，並指示爾後山西省向之路徑，我軍稽考現時事態，茲再佈告，以使前述之趣旨徹底。

（1）山西省民務須不拘舊日因緣，凡與山西軍之關係，一概解除、斷絶；

（2）山西省民須盡力協助我軍對山西軍正在實施中之經濟封鎖。

近來山西軍在我地區内以武力敢行征糧之暴舉，故此我軍隨時起來膺懲之。同時將來仍有抵抗我軍妨礙建築新中國之情形，即有立刻擊死之決意與準備。

為了給閻錫山以實質性打擊，日軍又從華北各地抽調一萬多人，向閻錫山駐汾南的三十四軍部隊猛然進攻，給閻錫山以所謂「膺懲性」打擊。三十軍軍長王乾元受傷，四十五師師長王鳳山陣亡，部隊潰退入汾北山區。日軍還揚言要進攻吉縣。

閻錫山迫不得已進行抵抗，同時又打着與日軍繼續勾結的打算。一次日軍一個大隊和閻軍騎一師三團發生衝突，閻錫山親自下令說：「這次不同以往，務必給我狠狠地打，要叫日本人也知道知道我閻錫山並不是沒有力量的！千萬不能敗回來！否則以組織紀律制裁，絕不寬貸！」閻錫山是要借機顯示實力，增加他和日軍重新修和的資本。騎三團與日軍激戰一晝夜，日軍死傷五十人，不得不撤退。

閻錫山為了保存實力，便給岩松義雄去信緩和矛盾，說：「希望不要把同情你們的人當作敵人。」岩松義雄接信後，認為閻錫山已低頭求饒，如果再繼續進攻，將閻逼過黃河，再「誘降」就不好辦了。于是將兵撤走，暫停進攻，又要求閻錫山履行《汾陽協定》，早日「合作」。

閻錫山為了試探日軍在「安平會議」後對他的態度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便又派趙承綬到太原會見岩松義雄。岩松對趙說：「讓我打個比方吧，閻錫山好比一個漂亮的姑娘，我很愛她，但她一時不從我，我也不忍一槍把她打死，我還得等待一時，期望將來。」趙承綬將岩松的話告訴閻錫山，閻錫山高興地說：「這樣看來，日本人還算聰明，我們可以放心了。」

實際上，日軍對閻錫山的心理也瞭如指掌，認為閻錫山是個「老奸巨猾不喫虧的家伙」，「內心是腳踏兩隻船，企圖從日、蔣兩方面盡量多得好處。」但由于日本本身兵力不足等困難，其對

閻態度基本是爭取利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軍批准對閻工作的指導方針爲：『從物資和精神兩方面給以更大的壓力，從而使「伯」迫于現實，……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屈服，與我合作。』

日本認爲閻錫山雖不能指望起反共壁壘的作用，但在華北卻是有用的力量。

正因如此，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認爲岩松義雄將已『煮熟的鴨子』飛掉，對閻錫山『誘降』工作，處置失當，功虧一簣，遂將岩松義雄、花谷正調走，代之以吉本中將和蝠毛少將，企圖調整人事，再度對閻錫山展開『誘降』活動。

閻錫山自從『安平會議』後，已成驚弓之鳥，心懷畏懼，不敢再親自與日軍進行談判。但也不敢與日軍公開決裂，而是通過他的『辦事處』與日軍繼續勾結，互通情報，保持密切聯繫，並交換物資，還指使一部分軍官和士兵公開投敵，移植敵佔區充當僞軍，替他發展和保存『剿共』實力，協助日軍進行『反共』活動。直到戰爭結束，閻錫山一直沒有停止與日軍的勾結，但也沒有公開投降，一直留在抗日陣營內。

第十四章

『不許用我的名義』

唐生明『投敵』，日方如獲至寶

唐生明是帶着蔣介石給他的三項任務，離開重慶加入南京汪僞政府，這三項任務是：第一，維護在上海、南京的軍統特務，營救被捕的特務；第二，轉達蔣介石對投降敵人大小漢奸的『寬大政策』和進行聯絡；第三，要限制新四軍在敵後的發展，盡力幫助忠義救國軍。

簡單地說，唐生明是被蔣介石派到汪僞方面去的高級間諜，負責保護上海、南京的特務工作；策反漢奸；反共之大任務，並沒有與日本人勾結一項。

唐生明參加汪僞政權後，一九四一年六月擔任汪僞「清鄉委員會」軍事處處長。在擔任此職前，唐曾向蔣介石密電請示，蔣介石回電極力主張唐去幹這項工作，並指示要利用日僞軍去消滅新四軍；同時保護軍統的忠義救國軍，使其能夠擴大和發展。

唐生明與日本人搭上關係，完全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以至後來成爲蔣介石與日本人聯繫的一個重要的渠道，這也是蔣介石、戴笠始料未及的。

一九四二年冬，唐生明和汪僞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群正在蘇州搞清鄉工作。有一天，李士群接

到從上海來的一個報告。便連夜從蘇州趕回上海。臨走前，李士群對唐生明說：『這幾天我回上海，這裏的工作你多負點責，沒有必要不要離開蘇州。』他知道唐生明喜歡享受，特意加了一句：『要想去上海玩，等我回到蘇州後你再走。』

原來，汪僞特工總部破獲了軍統局上海區的組織，區長陳恭澍被捕。李士群在軍統上海區的秘密文電中，發現了一個電報稿，內容是向重慶建議，希望以後不要在上海等地去暗殺個別日軍官兵，因爲這種作法完全得不償失。電報中特別列舉了當時軍統在上海愚園路附近殺了幾個日本憲兵後，日軍對這個區進行嚴密封鎖，使幾千居民遭到牽累，還使幾十個無辜居民遭了日軍的殺害，因此產生了對重慶政府的埋怨情緒，希望重慶方面不要再這樣零零星星地去幹這些意義不大的工作，以免失掉淪陷區的民心。

李士群對這個電報非常重視，經過仔細研究，認爲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發那樣的電報。他知道唐生明是戴笠要好的朋友，關係密切，這個電報又非常像唐的口吻。因此認定了唐生明是重慶方面派來的人。

實際上，李士群等對唐的這個建議並不反對，只是非常不滿意唐和軍統有往來而不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這點，是汪僞最忌諱的事。

李士群立即將唐生明與軍統勾結的事報告給汪僞政府。陳壁君和陳公博非常氣憤，向汪精衛提出：『一定要嚴辦唐生明，否則南京政府威信全無。』汪精衛不置可否，只是打電話給李士群：『你將唐生明送到南京來，我要親自和他談談。』

李士群立即給在蘇州的唐生明電話：「你趕快回上海來，坐今晚的火車，我有要緊的事和你當面商議。」

「什麼事？」唐生明問道。

「你不用多問。電話中不便多談，你來了就會明白。」

次日晨，唐和妻子徐來剛到上海，便被李士群派去的親信特務直接拉到李士群在上海的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特工總部。

李士群一見唐生明，劈頭就問唐和軍統的關係。唐生明拒不承認爲戴笠工作，只承認和戴笠過去是要好的朋友。

李士群見唐生明不承認，便用誘勸的口吻說：「有關係也不要緊，我可以負責，沒有問題。只希望不要避開我，把我也當成要好的朋友，有什麼事先同我談談。」

唐生明一口咬定：「你殺了我，我也承認同戴笠是朋友。」

李士群似乎相信了唐的這句話，過了一會兒才說：「你的問題，我不能解決，汪先生有電話來，叫我把你們送到南京去見他，你當面去和他談談吧！」

于是，李士群當夜帶着唐生明等人乘火車去南京。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李士群的這一切行動都掌握在駐在七十六號的日本憲兵隊手中，日本特務機關立即報告了南京的日本派遣軍總部。唐生明要重慶不要在淪陷區再去殺個別日本人的建議獲得了日本人歡心，

認爲：『這個建議很有見識。』

而日軍更感興趣的是唐生明和重慶政府的關係。

于是，日軍決定將唐生明弄到手。

一九四二年，日本進攻達到頂點，由于戰綫拉長，兵力不足、物資匱乏的虛弱現象顯露出來。戰場的整個形勢由攻轉守。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美在中途島激戰，日本戰敗，損失了聯合艦隊的航空母艦的大半，日軍喪失在太平洋的戰略主動權，優勢轉到美英一方。

一九四二年八月，美英軍隊開始反攻。美軍在瓜達卡納爾島登陸，這一行動表明在南太平洋上日美遭遇戰的作戰主動權正在轉移到美國手中。此後，作戰地點、時間的選擇，日軍都將隨美軍的行動而定。

美軍很快轉入反攻，這是日軍大本營没有預料到的。

没有預料到的事發生了，形成的衝擊更大。

雙方圍繞爭奪瓜達卡納爾，投入了大批陸、海、空力量，激戰半年之久，日軍力竭而敗，損失慘重：陸軍二萬八百名，海軍三千八百名，損失驅逐艦五艘、潛艇二艘，另外戰艦三艘和驅逐艦十九艘分別受到了損失，導致海軍的戰鬥力對美比例已顯著減低。

此後，戰備上日本防守，退卻；美軍進攻，前進。

而在中國戰場，蔣介石的抗戰能力雖然逐漸減弱，但卻相信美最後勝利，繼續進行消極抗

戰。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日本政府判斷：

重慶政府在當前的形勢下，繼續其消極抗戰是可能的。

1、人力資源豐富。

2、財政經濟上極其困窘，但糧食和輕武器可以自給，因此，不能期待其抗戰體制很快會發生破綻。

3、軍隊有地面部隊約三百個師（其中中央軍約一百一十個師），空軍部隊約有戰鬥機一百架，裝備雖然很劣，但對消極戰鬥並無影響。

在華美軍空軍部隊，最近約有飛機七十架，並在逐漸增加。

4、蔣介石的地位尚屬鞏固，其統帥能力尚未衰退。

因此，日本政府期望重慶在日軍初期勝利的强大壓力下單方面屈服，不以重慶爲談判對手的政策没有成功，中國問題的解決便完全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發展下去。

希望盡快解決中國問題，從而專心致力對美英戰場的願望，隨着戰局的演變愈益强烈起來。到了美國在南太平洋方面的反攻漸趨激化的一九四二年秋前後，要求爲打開對華關係而改變戰略的空氣日漸醞釀成熟。

日本陸軍常年有八十萬以上兵力被牽制在中國，對此寄予了最强烈的希望。但由于缺乏和重慶政府聯繫的有效渠道，媾和工作無法進行。因此，當日本中國派遣軍總部獲知唐生明的情況

後，如獲至寶，決定將唐生明弄到手。

唐生明和李士群一行于第二天晨抵達南京下關車站。但到站台上來迎接的不是汪僞政府的人，而是幾個佩帶參謀標誌的日軍軍官。

唐生明見日軍軍官朝他們的車廂走過來，心中大爲恐慌，這下可完了，這件事日本人知道了，小命算是完了。悔不該當初爲了享受，接受蔣介石派遣，爲他賣命。他知道日本人要怎麼辦的時候，汪精衛也沒有辦法，心裏就更害怕了。『這是怎麼回事，不是汪先生要親自和我談談嗎？怎麼會是日本人？』他向李士群問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李士群也一臉茫然。

李的翻譯下車後先與日本軍官交涉了一番，又把李拉過去談了幾句，最後，李士群無可奈何地將唐生明交給了日本軍官。唐生明心裏難過得不得了，認爲此去兇多吉少，生死難卜。

唐生明忐忑不安地坐上日本人的汽車，一直駛到日軍『中國派遣軍』總部，下車後，他被帶到參謀部，參謀部裏，三個日軍佐官都印大佐、延原大佐、市川中佐正在那裏等候。

出乎唐生明意外的是，他們非常客氣，熱烈地歡迎唐，並和唐握手，並安慰唐生明，叫他不要害怕，還稱贊說：『唐先生不愧是中國的優秀人才，見識不凡。』唐生明驚異萬分，不知日本人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因此，唯唯諾諾，不作正面答覆。

都印說：『我們很久一直找不到與蔣介石閣下有關係的人商談；今天找到了你，我們非常高興，所以特別請你來談談。你能到南京這方面來，我們很歡迎，可惜沒有讓我們早點知道，我們

一定會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唐生明還在莫名其妙之中，不知道日本人是什麼意思。延原大佐接着說：『你把你和重慶聯繫的電台保留下來，我們負責保護你的安全。至于南京政府那裏，由我們給你作主，他們不敢爲難你。如果沒有專用電台的話，我們幫助你建起來。』

唐生明不知日本的真實意圖何在，內心保持警惕：千萬注意不可上當，李士群盤查我沒有弄清的問題，不能一下在日本人面前漏出來。日本人奸詐兇殘，一旦不慎，被他們抓住把柄，那就會性命交關。

過了一會兒，唐生明依然沒有什麼表示，三個日軍參謀商量了一下，便陪同唐生明去見總參謀長河邊正三中將。

河邊正三中將在談話中更坦率地說：『我們因爲找不出辦法，才拉汪精衛出來，希望通過你能和蔣介石閣下直接商談中日合作方式，請你多從中協助我們早點完成這個任務。』

原來如此，唐生明感到此時才消除了疑懼。日本人拉汪精衛出來是出于無奈，汪精衛既沒有人，也沒軍隊，又沒有錢，只是一副空架子，對日本人改變在華的狀況沒有多大幫助，因此，希望通過唐生明拉蔣介石出來，蔣介石有人、有槍、有錢，實力雄厚，如果這樣，日軍就可以將在華全部兵力轉向太平洋對英美作戰。

河邊正三越說越謙和，『蔣先生雄才大略，是中國真正的領導者，我們很佩服他，希望和他合作。』

同時，河邊反反複複地說：『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爲了大東亞共存共榮，日本對中國沒有野心，決沒有打算長期佔領，我們應當很好地合作在一起反共。……』

唐生明起初害怕，後來慢慢地一面感到高興，一面也慎重考慮，應當如何答覆他們。因爲唐生明知道，日本人很難纏，完全是利用他，如果稍不合意，便會馬上翻臉，隨時可以殺他，因此，唐生明心情非常矛盾。

處于這種情況下，唐生明既不能否認與蔣介石的關係，又不便立刻承認這種關係，只好說：『我在重慶方面認識的朋友的確很多，我願意先和你們研究一下，再去和他們商量，看他們的態度如何再說。』

河邊聽唐生明如此說，便不再勉强說下去，又陪唐生明去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唐生明以前見過他，這次再見他時，畑俊六對唐生明客氣多了。畑俊六重複了河邊等人的話，最後對唐生明說：『你是個聰明人，唐先生，你應當發揮你的才能，爲中日合作、和平提攜貢獻你的作用，這樣可以名垂千古。你好好幹，我們保證你的安全，負責你的生活。』

午飯後，河邊把唐生明送到他們招待外賓的地方住下，對唐生明說：『我們已經決定，派一個人和你保持密切聯繫，負責保護你的安全，保證你的工作順利進行。』

第二天，唐生明去拜見汪精衛，心情已完全不同了，因爲日本人要依重他與重慶聯絡，所以有了靠山，對汪精衛也不太在乎了。汪精衛已知道了昨天的事，因此見到唐生明時，一臉的尷尬。因爲汪精衛覺得日本人還想方設法找人和蔣介石聯繫，無形中說明沒有把他放在眼裏，至少

不夠重視。因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極不舒服的樣子。

但他是漢奸，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是他的主子，所以他不敢罵日本人；

唐生明瞬間成爲日本人面前的大紅人，他也不能夠怎麼樣。

所以，他只能埋怨唐生明「太不夠交情，我那麼對你推心置腹，那麼信任你，而你卻一直瞞住我，不向我吐露半點真情。」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把自己完全出賣了還不如待價而沽的好。蔣介石比汪精衛就聰明在這裏。蔣介石一直與日本來往，但一直不投降，日本爲了徹底解決中國事變，就必須以蔣介石爲對手，否則就不能成功，無形之中，爲了打開與蔣介石聯繫的渠道，反而不重視汪僞政府了。

對手有時比朋友更加受到重視，就是這個道理。唐生明就沾上了這個便宜。

汪精衛只有尷尬的份兒，無可奈何。

蔣介石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唐生明立即將與日本人會面及日本人請他聯繫重慶政府，早日商談中日合作方式的情況通過秘密電台向蔣介石報告。

蔣介石接到唐生明的報告，大喜過望，當着戴笠的面稱贊唐生明：「孟源（唐的別號）果然很好，不負重托，打開了與日本人聯繫的渠道。你馬上給他回電。告訴他我很滿意，讓他跟日方往來。不過，」蔣介石停了一下又說：「你提醒他，目前還不能以我的名義與日方接觸，以免授

人以柄，造成不必要的麻煩。讓他先以個人的名義和日本人交往，多與之周旋，對日方提出的一切問題，不要先作具體的答覆，隨時與你聯繫。這樣，我們就可立于不敗之地。』

蔣介石雖然宣稱不與日本單獨講和，但從來没有放棄與日本來往。日本人提出的『一致反共』正合蔣介石的心意。因此，他一直希望重新與日本建立聯繫，現在日本人主動通過唐生明，建立與重慶政府的聯繫，蔣介石自然是大喜過望。于是他對戴笠推心置腹地說：『今天，以中國的地位和我的聲望，不抗戰是不行的，單獨與日本講和也是不可能的。不抗戰就會失去民心，失去國際援助，失去輿論；單獨講和實際上就是與日本站到了一起，必然遭到國際社會的反對，我們没有力量與整個世界爲敵。但，我們不能坐視共產黨借抗戰之機壯大，以我二十多年革命的經驗，共產主義乃是本黨唯一的敵人，共產黨乃是我黨唯一的對手。因此，如果能找出辦法，與日本人共同對付共產黨，乃是這種聯繫的價值所在。』

戴笠按照蔣介石的意思親自擬了一電給唐生明：

孟源兄：

接二十一電，已報校長，校長甚爲滿意。校長囑我轉告你，不要承認自己代表什麼人，保持好這一聯繫，不使之中斷。與日本人接觸，判斷日人是否出諸誠意，亦或另有企圖，對日人所提一切問題，不作具體答覆，隨時報告。兄爲黨國棟梁，望多珍重。

唐生明接到戴笠的電報後，不但没有高興，反到感到害怕。因爲他知道政治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事情。需要你時把你捧上天，不需要你時將你打下

地獄，這是蔣介石一貫玩弄的手法。明明是蔣介石派唐去和日本人往來，但又不允許唐用他的名義與日本人周旋。將來事情弄好，自然没有問題；萬一出了問題，或給各方面發覺遭到責難反對，要影響到他的利益時，蔣介石便可以把一切都推到唐生明的身上，説這是唐個人的行動。蔣介石不但可以不負責，而且可以振振有詞地要求懲辦唐。

唐生明對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長沙大火」明明是蔣介石讓酆悌放的，但事一發生，遭到全國的反對，蔣介石便把一切罪過委之于酆悌身上，殺了酆悌平息衆怒。當時，唐生明正好和酆悌對調，酆由「常德警備司令」調任「長沙警備司令」，而唐生明由「長沙警備司令」調任「常德警備司令」，否則，挨刀替過的就可能是他唐生明。對此唐生明當時暗自慶幸，現在還是心有餘悸。

焉知這次和日本人往來會不會出事，一旦出事，依蔣介石的過去的作法，替罪羊將是唐生明，唐生明將成爲「酆悌第二」。

于是，唐生明左思右想，準備爲自己留一點餘地。

唐生明開始兩面敷衍。

日本方面多次派參謀官與唐生明聯繫，詢問重慶的反映怎樣，唐生明總是説重慶方面正在研究。日本似乎也看出蔣介石雖然在動搖，但同時害怕中國民衆的反對，影響他的統治地位，還在繼續消極抗戰，所以對唐生明催而不緊。

重慶蔣介石似乎比日本人更加急迫，屢次發電給唐生明，催問唐生明日本方面提出了什麼條

件沒有，日本方面的態度是否誠懇等等。唐生明每次均回答日本方面沒有提出什麼具體條件，只是希望和重慶政府直接和談。因此戴笠每次均囑唐生明加緊與日本人聯繫，探聽他們的條件。

這樣敷衍了半年左右，唐生明覺得無法再敷衍下去，因爲蔣介石和日軍都對唐生明聯繫無功感到不滿。最後，只好同意日本人的意見，由日軍上海駐軍司令部派一個名叫松井的大尉到他家中，擔任聯絡和保護的責任。松井每一天早到唐家，一直到晚上唐家休息時才回軍營。

松井到唐生明家後，戴笠便讓唐生明把原來與重慶聯繫的秘密電台由上海郊區搬到他家的三樓上，公開與重慶通報。

唐與重慶政府聯繫渠道受到日軍的高度重視，唐自己不僅受到日軍的嚴密保護，而且因此得到許多特殊優惠。唐生明所住的那個地區，一向輪流停電，電台通報常常受到影響，因此唐生明把這一情況告訴松井，松井馬上轉告日軍司令部，日軍司令部立刻命令電力公司，唐生明所住的地區不準再輪流停電，還要通宵供電。住在唐生明附近的一些熟人，知道這個情況後，經常對唐開玩笑說，佔了唐這個重慶政府「代表」的光。

此外，當時上海的煤、米供應以及汽油等很困難，常常是有錢買不到。自從松井到唐家後，日軍司令部也規定給唐一份供應，並且非常充分。唐生明自己喫不完、用不完，每月均有剩餘可以周濟他人，這是許多汪僞政府的大員都自嘆弗如的。

從此以後，唐生明的身份也慢慢地公開出來。原先蔣介石一直不允許唐生明用他的名義對外活動，但無形中誰都知道唐是重慶政府派到汪僞方面的。別人問唐時，唐也不加以否認。就這

樣，在重慶方面大叫「抗戰到底」的時候，唐生明作爲重慶政府的代表，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長期在日本佔領區中活動。

唐生明的主要任務是與日本人聯繫

一九三四、一九四四年，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希望早日對華和平，因此，不斷催促唐生明詢問重慶政府的和談條件。

蔣介石對日本侵華的基本弱點和戰爭形勢的最後結果雖然有所估計。但對中國戰場的國軍卻缺乏信心。

一九四四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中國軍隊在日本打通「大陸交通綫」的戰鬥中一敗塗地。

一九四五年五月，雅爾塔秘密協定簽定後，蔣介石爲了阻止蘇聯進入中國，更害怕蘇聯進入中國後支持中國共產黨。蔣介石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向日本發出「和談」的信號，唐生明就是他經常利用的途徑。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本通過唐生明向重慶政府提出和談條件：

1、日軍撤出中國大陸，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況

2、『滿洲國』現狀不變，內蒙由新的協議規定之；

3、重慶政府回到南京，與汪的關係由蔣汪協商解決；

4、日方撤軍的同時，英美軍隊同時從中國撤出；

5、中國承認在華的特殊利益，並得保護之；

6、新的日華關係由新的協議規定之；

7、中、日合作，共同反共。

日本人還說：『在幾年戰爭中，日本人已深深體會到共產黨的勢力一天天在壯大，已成燎原之勢。中國不亡于對日戰爭的慘敗，也不亡于對日和與未和，而會亡于共產黨。在外戰未結束之時，就會發動內戰。而依靠英美，繼續與日軍作戰，只會使共產黨坐大。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臨崖勒馬的大好機會……』。希望唐生明能向蔣介石陳言，與日本和平，共同鎮壓共產黨。

這次重慶的回電很慢，唐生明知道蔣介石在仔細研究日本人的建議，唐生明也不去催促，只向戴笠試探蔣介石的態度如何。

日本人幾乎每天都在催問唐生明重慶對「和談」條件的態度，唐生明每次均答「正在研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蔣介石攜宋美齡赴開羅參加盟國首腦會議。開羅會議一致同意：中國東北地區、台灣和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允許朝鮮獨立等。

《開羅宣言》發佈後，蔣介石回到國內，通過唐生明提出中國方面的和談條件：

1.日軍撤出中國大陸、台灣及澎湖列島，東北四省；

2.日軍撤出朝鮮，允許朝鮮獨立；

3．取消汪精衛政府；重慶政府還都南京；

4．日、華關係由新協定規定之。

同時，蔣介石轉達日本方面：中國政府對天皇制抱有善意，日本內政由日本民意決定等等。

日本方面接到重慶方面提出的條件後大爲不滿。日方對開羅會議的決定毫無所知，中國派遣軍對日本國內衰落的情況也不清楚，認爲蔣介石口出狂言。決定不予理睬。

因此日方通過唐生明向重慶政府表示不能接受蔣介石提出的條件。並說：我方下最大之決心，中國派遣軍可撤至山海關，時間爲一年。

這樣蔣介石和日軍方面的條件有相當大的差距，雙方始終不肯讓步，雖經唐生明函電交往，終至不可調和。

實際上，岡村寧次後來回憶說：『對方並不希望日本元氣喪失殆盡後停戰，而願重新謀求中日合作。』

因此，一九四五年二月，蔣介石再次經唐生明電告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提出：

1、中國與美國不可分離，但我認爲中日合作對大東亞至關重要。

2、因此擬于適當時機爲日本講話。拯救日本非我莫屬。然日本人誤解我本意，實爲憾事。

3、望互相盡力克制。

當時正是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綫』戰役獲勝之時，從一九四四年四月到十一月，一度深入貴州獨山，使重慶政府驚惶失惜。因此，日本方面雖然認爲全面戰爭形勢不利，日軍還有力量繼續

作戰，在華戰場上還擁有相當優勢。對蔣介石的良苦用心視而不見，加以拒絕。雙方條件相距甚遠，終沒有坐到談判桌上，「日華和平」亦不可能實現。

但唐生明卻是盡心盡職的，從一九四二年以後，唐只在汪僞政府保留了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主要任務是和日本人勾結。

唐生明不願去當湖南省長

一九四四年秋冬間，日軍攻陷湖南以後，日軍和唐生明商量，準備讓唐去湖南省當省長。日本方面這樣做是暗示蔣介石，如果蔣介石要和談，日本可以逐步地把這些佔領的地方用這種變相的方法交給蔣介石。

唐照例先向重慶報告，蔣介石聽了非常贊成，立刻回電指示唐生明可以去。在這個問題上，蔣、日、汪三方面是不謀而合，他們都抱有同樣的目的，唐生明這樣一個三方面都有關係、都能接受的人去了以後，可以把湖南作爲汪僞與蔣介石之間的緩衝地帶。

戴笠在覆電中除了轉達蔣介石的指示外，他還答應將湖南、廣西的軍統特務武裝部隊（包括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兩個縱隊和軍統局直屬的幾個行動總隊、破壞總隊等）都交給唐生明改編成僞軍，由唐生明指揮。這樣使唐生明掌握一些實力，可以配合日軍肅清在湖南境內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

但蔣介石又有點擔心唐生明到湖南去以後，和日軍的聯繫渠道中斷。接着又讓戴笠拍電報給

唐生明，去湖南後，一定要保持和日軍總部的聯繫。當時，駐華日軍正調集大軍，揚言進攻四川，迫使國民政府投降。當時，蔣介石一方面準備撤往西康；一方面作談和的準備，生怕唐生明這條關係斷了，找不到可靠的人與日軍總部聯繫。

南京剛剛傳出唐生明可能出任湖南省省長的消息後，敵僞報紙還沒有刊出這一新聞，重慶的中央日報卻根據香港方面的傳聞，搶先登載了這條消息。

蔣介石在戰場失去的東西，希望用這種方式得回來。因此，想促成唐生明早日去湖南。

唐生明在去留之間猶豫不決的時候，想起了他大哥唐生智在他離開重慶時說的話：「此去弄得不好，便會遺臭萬年，千萬要愼重。」唐的母親和大批親屬均在湖南，唐生明去當漢奸省長，家裏人肯定反對。而且唐生明在汪僞政權的幾年中，親眼看到當漢奸完全是傀儡，包括汪精衛等大漢奸都是如此。一切得聽日本人安排，害怕日本人成天拿他幹壞事，使不了解真相的人以爲他真心投敵，隨時會把他幹掉，白白送掉性命，在勝利快要到來的時候，這樣做太不值得。

因此，唐生明採取「拖」的辦法，連日本人要他到湖南去看看都不願意，他擔心他一到湖南，汪僞政府立即明令公佈，反使他進退兩難，不幹不行。

對日本方面，唐生明推說重慶方面還在考慮，他們希望他多做聯絡工作；

在重慶方面，唐生明說是當省長後，與日軍總部的聯絡不方便，日軍方面還要考慮一下。

巧就巧在日本方面和重慶方面都不能對證唐生明的話，唐生明就把這個棘手的事情拖了下去。

唐生明和日本建立聯絡，一直到抗戰勝利，日本宣佈投降才停止。日軍方面一直認爲遲早可以通過唐生明這一橋梁來和蔣介石直接進行談判，因此很有耐心地等待從唐生明那兒傳來重慶方面的「和談」信息。而蔣介石也一直捨不得放棄唐生明與日本「中國派遣軍」總部這一關係。

第十五章

日本對華新政策

日本人故伎重演

珍珠港事件只是日本人向英美開的第一槍。珍珠港的勝利刺激了日本人的狂妄野心，他們要征服太平洋和亞洲，與德、意法西斯一起統治整個世界。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寄望于德國一定能打敗蘇聯，英美陷于歐洲戰場無暇顧及遠東，這是南下攻擊英美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一旦制服英、美，也就毀掉了重慶政府的後援力量，迫使蔣介石不戰而降。日本即令陷入長期戰，亦須期其毫無遺憾。』

日本突然襲擊，英美措手不及。

日本節節勝利，英美潰不成軍。

戰場上的勝利使日本人趾高氣揚，于是故伎重演，提出『帝國不進行任何以重慶爲對手的誘和工作。』

日本政府和軍方估計：『通過南方作戰佔領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新加坡、緬甸等地，其結

果，一向依靠英美支援的繼續抗戰的念頭就消失。』他們也估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會一時激發蔣介石政權的士氣，但是又估計『隨着加强封鎖，士氣將會逐漸減弱，最後終將屈服』。而且，太平洋戰爭一爆發，將不僅杜絶英美援華之路，而且通過『採取掌握在華租界，爭取南洋華僑和加强作戰等政略、戰略手段，促使重慶政權屈服。』

在經過一番研究後，判斷如下：

一、日本對英、美、荷開戰後，將促使蔣介石愈益堅決地依靠美、英、中、荷聯合陣綫，以進行長期抗戰的決心。一開始即將激揚其抗戰意志，促使其與美、英等國合作越發鞏固，將抗日戰爭進行到底，至少要延遲到整個戰爭完結之時，才能實現日華全面和平。

二、上海、香港等援蔣據點將喪失；隨着帝國向南發展，滇緬援蔣路綫將被切斷；由于我方保護南方作戰的成果，南洋華僑對蔣的援助將中斷。這些將使其財政經濟緊迫，實際抗戰力量逐漸降低。隨着戰力的遞減，一般民衆固不待言，即使重慶政權的主流，其繼續抗戰的意志也將受到重大影響。騎牆的將領將投降到南京方面，其數量將逐漸增多。最終將造成重慶方面統一戰綫的破裂，蔣政權更加衰弱。

日本以先發制人，突然襲擊的手段，取得意外的成功。『勝利』成爲日本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的依據。

日本無力短期内打垮重慶政權，在日本以各種條件『誘降』，蔣介石仍不上鈎的情况下，便想先解決英美問題，然後回頭擊敗蔣介石、解決中國問題。

『指導』汪精衛對重慶實施「政治工作」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美國飛機初次空襲日本，在日本國內引起極大恐慌。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中途島受到美軍的重創，珍珠港的戰果轉瞬化爲灰燼，而且日軍喪失了在太平洋上的主動權。中途島之戰成爲太平洋戰爭日本由勝轉敗的轉折點。

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美軍在瓜達卡納爾登陸，日、美軍隊在瓜島展開激戰，美軍對日軍的正式反攻已逐漸呈現出激化的狀態。

在此形勢下，日本政府並未實現其迫使蔣介石投降的目的。于是對重慶政府作出了新的判斷：

1、美英必將盡各種手段極力督促和鼓勵重慶對日抗戰；

2、重慶的抗戰能力雖將逐漸減弱，但將相信美英的最後勝利，仍然不會放棄繼續抗戰的意志。

3、在現在的形勢下，繼續其消極抗戰是可能的。這是因爲：

a．人力資源豐富；

b．財政經濟上極是困窘，但糧食和輕武器可以自給，因此，不能期待其抗戰體制很快就會出現破綻。

c．軍隊在地面部隊約三百個師（其中中央軍約一百一十個師），空軍部隊約有飛機一百架，裝備雖然低劣，但對消極戰鬥並無影響。

d．蔣介石的地位尚屬鞏固，其統帥能力尚未衰退。

蔣介石的消極抗戰使日本的希望化爲泡影。

美英的進攻使日本嘗到了兵力不足的苦頭。

隨着日本戰局的不斷惡化，重慶蔣介石政權的作用顯露出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日本政府和軍方認識到，從前因縮在內地而具有意義的重慶，現在卻與美英的反攻相響應，作爲戰略的一環，企圖在反攻戰局中發揮支撑點的作用。現在如不立即采取根本性對策，勢將養癰遺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日本政府召開御前會議，議題是『爲完成大東亞戰爭所需要的對華處理根本方針。』

東條英機首先對提案理由加以說明，解釋爲什麽要制定對華新政策。提出：

『天皇發佈對美英宣戰的詔書已經一年有餘，鑒于這一時期的內外形勢，尤其是重慶的動向，就中國的事態，整個世界的形勢的演變等，帝國對中國問題處理上應根據日華合作的根本精神，專注于加强國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時設法消除重慶方面抗日的根據和名義，和革新中國（指汪僞政府）同心協力，向完成戰爭邁進，盡快奠定全面解決中國問題的基礎，爭取創造得以專心致力于對美、英戰爭的局面，這是今天國家的當務之急。』

這項對華新政策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的某些讓步，向中國民衆進行欺

騙，從而對重慶政府產生相當大的心理衝擊。同時，使重慶政府失去繼續抗戰的根據和名義，以達到瓦解其抗戰意志的目的。通過此『曲綫誘和』的辦法，使重慶政府放棄抗戰，與日本合作。另一方面，提出不以重慶政府爲對手進行誘和工作，但又說根據需要再進行誘和工作時另行決定。同時決定汪僞政權應順應日本政府的態度開展此項工作。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和大本營再次奏請召開御前會議，討論通過《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

日本方面估計美、英反攻將逐步加劇，並認爲在美英方面的攻勢達到高潮以前，必須牢固地建立大東亞政略態勢。對重慶政府，日本方面提出『相機指導國民政府對重慶實行政治工作。』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日本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得出結論說：『現在要使國民政府對重慶開展政治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的聯席會議進一步作出決定。

一、弄清汪主席對重慶開展政治工作的真實意向和辦法後，再指導國民政府對重慶的政治工作。

二、重慶政權如繼續實行下列事項，帝國政府即認爲重慶政權有斷絕其同美英關係的誠意。即：

1. 解除在華美英軍隊的武裝，或使之從中國撤走。
2. 斷絕同美英的交通聯繫。

但並不一定要求重慶政權對英美宣戰，不過，要對帝國完成大東亞戰爭進行實質性幫助。

九月二十四日的聯席會議上，再次決定：

關于對重慶的政治工作，暫且原則上由內閣總理大臣直接負擔同主席（指汪精衛）的聯繫指導工作。『派出機關除必要的通信傳達外，若無中央指示，不得插手此項工作。』

黔驢技窮，日本政府在用戰爭切斷蔣介石政權的外援而使蔣介石屈服的投機冒險政策失敗後，不得已又開闢新的日、蔣和平路綫只不過是通過汪精衛政府作爲中間聯繫人開展此項工作。

九月二十二日，汪精衛飛往東京，接受日本政府的旨意。

周佛海向重慶方面懺悔，終爲蔣所用

汪僞政府開展對重慶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通過周佛海進行的。

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後投入國民黨陣營。一九三八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是汪的左右手，在汪僞政權內身居要職。但周佛海看到戰局不斷變化，蔣介石政權也没有投降，因而發生動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周佛海在日記中說：

『兩年前的今日，離開重慶，回首前塵，恍如隔世。兩年來不僅國家情勢，個人身世，發生無限變化，即世界情形與兩年前亦有巨大變動。今後如何發展，非人力所能預知，惟觀察日本疲憊不堪的情形又似重慶見解爲正當，而吾人爲錯誤矣。』

在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又說：

『返寓後客少人稀，因得冷靜考慮，深覺在漢在渝時，對日本之觀察甚爲錯誤，今事實表現，在在（件件）足以説明抗戰派之理論正確。』

周佛海動搖不定還與戴笠派唐生明做了不少策反工作有關。同時利用周的岳父名義給周佛海寫信，勸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爲周家祖先和子孫丢臉。』

周佛海是湖南人，對母親一向孝順，戴笠便利用這一點，派人把周的母親接到重慶，拉攏周佛海。

一九四三年二月，周佛海派人到重慶，向國民黨蔣介石表示『他悔悟前非，願意主動贖罪，聽候驅策。』

隨後軍統局派人秘密潛到南京，架設秘密電台，建立與周佛海的直接聯繫。

日本政府決定由汪僞政府進行對重慶的誘和工作，使周佛海與重慶的聯繫更加明目張膽，周佛海派人到香港、澳門、重慶、廣東與蔣介石的人聯繫，傳達日本政府對重慶『和平』的條件。

但是，通過周佛海進行的日華和談工作並没有收到成效。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日本駐汪精衛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矢崎勘十中將報告日本政府：周佛海的使者葛啓恩預定明年一月前後回來；估計没有成功的希望；今後除利用中立國外，别無良策。

日本政府對重慶政府的『和平』工作隨着戰局的惡化變得越來越困難。

通過汪僞政府對重慶的政治工作也宣告失敗，不得已，日本政府重新決定以絶大的勇氣，不惜一切代價，打開對重慶和談工作的局面。

第十六章

和平掮客

繆斌引起了日方的重視

在歷史的關鍵時期，總有人跳出來，充當歷史中的小丑。

因爲有這些『小丑』，沉重的歷史也變得輕鬆起來。

繆斌就是這樣一個小丑。

繆斌早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前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軍事委員會經理處長。後又被提拔爲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在任江蘇省民政廳長時，因貪污瀆職爲蔣介石所被罷黜。因此，他對蔣介石懷恨在心。

抗日戰爭爆發後，繆斌立即投降日本做了漢奸。在日軍的授意下，于一九三七年冬，在北平創辦奴化教育團體『新民會』，任副會長。

汪精衛叛國投敵後，在南京成立僞國民政府，繆斌又托今井武夫將他介紹給汪精衛。他瞞着華北僞政權，搶先進行參加南京汪僞政權的活動，取得『立法院』副院長的位置。

因此，繆斌受到了華北僞政權方面人士的攻擊，但是改變身份後又受南京汪僞政府的冷落，

結果是徒有虛名，有職無權，實際上未被重用。

繆斌只得跑到上海，策劃反對汪精衛政權，加緊與日本人聯繫。同時秘密和重慶政府聯繫，派他的兒子秘密奔赴重慶，與軍統頭子戴笠搭上了關係。對重慶鼓吹日華和平工作。

他經常對外宣稱：『和重慶有特殊的聯絡，』與重慶政府的參謀總長何應欽及軍統頭子戴笠均有密切關係。

一九四四年十月，今井武夫被任命爲日本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繆斌利用他與今井武夫早就熟識的關係，立即拜訪今井武夫，對今井武夫說：『我受重慶政府的委托，願爲日華和平談判而努力。請您從中斡旋，允許我再度使用被日本憲兵隊封閉的電台。』

經過今井武夫的周旋，繆斌再次使用無綫電台與重慶取得了聯繫。

日本終于作出重大讓步

日本決定由汪偽政府單獨對重慶進行所謂政治工作，汪偽政府派人到了廣東、澳門、重慶等地，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力求實現媾和，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均未成功。

而一九四三年底，美英中三國召開開羅會議後，重慶蔣介石政府的態度日趨强硬。

這使日本政府在解決中國問題上一籌莫展。

然而，戰局越來越糟，日本更加希望儘早結束中國戰爭，在對重慶的和平條件中，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讓步：

1、全面和平後中國和英美之間的關係：

以中國的善意中立爲滿足。還有，使中國方面促使在華美英軍隊自動撤出。

2、汪蔣關係：

承認蔣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統一政府。但兩者間的調整（指重慶政權和汪僞政權），乃是中國的國內問題，聽任兩者直接談判。

3、日華條約的處理：

廢除日華同盟條約，重新締結友好條約，以保證全面媾和後的日華永久和平。

此時，對中國內政問題一律不加干涉。

關于延安政權與共產軍，亦同樣處理。

4、撤兵問題：

在華美英軍如撤退，帝國也完全撤兵。有關實行辦法，依照停戰協定。

5、『滿洲國』問題：

關于『滿洲國』，不得變更現狀。

6、蒙疆問題：

作爲中國內政問題處理。

7、香港及南方地區的處置：

香港移交中國。有關南方權益問題另行考慮。

8、將來的保證：

關于中國方面對帝國提出的保證要求盡量予以滿足；帝國對中國的保證要求則是，爲了對付美英軍隊重新侵入中國，使其承認派往必要的部隊。

這是一個「除去滿洲，全部讓步」的和平條件，可見日本當時面臨的困難，不得不放棄侵略來的利益。

除了作出重大讓步以外，小磯内閣寄希望挺身而出的宇垣一成大將，希望和重慶政府取得直接聯繫。宇垣一成假借視察爲名，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中旬和坂西利八郎同行，從滿洲開始到華北、華中旅行，企圖秘密前往重慶，終因毫無收穫而回國。

小磯國昭對此非常失望。

這時，繆斌的活動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小磯國昭決定由日本政府進行「繆斌工作」。

繆斌的品質導致日方不願信任他

日本政府利用繆斌爲居間人，由日本政府自行推行日華和平的意向傳到了南京。駐南京和日本大使館和陸海軍的派出機關都對繆的品質和繆斌熱心于日華和平工作的目的表示懷疑，認爲繆斌不可信任。

因此，駐南京的日本大使和陸海軍武官感到必須向小磯首相闡明必須以没有私心和没有陰謀的真誠人物作中間人，才能獲得日華和平工作真正的效果。

一下飛機，日本駐華大使谷正之和今井武夫等人立即拜訪日本外相重光葵，弄清政府對繆斌工作的政策。

重光葵說：『我已向首相建議，促使他改變原意停止此項工作，但得不到首相的理解。』因此，谷正之和今井武夫立即又去拜訪小磯國昭總理大臣，從上午九點開始，會談了大約兩個小時。

今井武夫等向小磯國昭報告了他們的看法，建議政府停止『繆斌工作』。聽完報告，小磯國昭立刻改變了臉色，用急不可待的粗而低的語調說：『諸位，請暫且聽我來說幾句。』小磯詳細地闡述了必須盡快結束戰爭，進行和平工作的必要性，最後說：『諸位爲什麼非反對日華和平不可呢？』

今井武夫回答說：『我們也認爲只有抓住現在這時機，盡快實現和平，這一點我們和首相的認識是一致的。我們身在戰場，經常體驗到戰爭的變化，了解中國當地的實際情況，因此比日本國內的人更加痛感到日華和平的緊要性，深信絕對應該謀求其實現。正因爲如此，所以不能單憑主觀唯心的觀點去强調原則，而是要作爲實際問題，研討繆斌作爲居間人是否得當之後，起用人格更加高尚的人物，以維繫重慶政府的信任，這是很重要的。』

今井武夫特意强調說：『而且這次和平工作恐怕是最後一次機會了，萬一失敗，將會造成第二次機會不可再得的局面。因此，希望政府不要盯在偶爾拾到的繆斌路綫上，别認爲它是獨一無二的，而是應該確立根本的方案，開創適當而切實可行的路綫去促進和平工作。』

但是小磯不爲所動，而是要堅決地開展繆斌工作。並且企圖通過內閣改組，撤換反對他進行此項工作的外相重光葵兼大東亞大臣的職務，但遭到重光的反對而作罷。

由此可見，小磯的決心是非同小可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小磯派其士官學校同期同學山縣初男大佐到上海，推動繆斌工作的開展。山縣初男一回到東京，繆斌工作的爭論再度表面化。今井武夫委托恰好到南京出差的《朝日新聞》記者池田濾治，請他將日本中國派遣軍的反對意見轉告緒方竹虎國務大臣，但得到的回答是：「姑且不談其他事情，只就繆斌工作這件事，雖有苦心孤詣的忠告，但仍不能中止。」決心全力以赴地進行以繆斌爲中間人的日華和平工作。

繆斌住進了日本迎賓館，又被提出

日本方面急于開展「繆斌工作」，是由戰局對日本越來越不利。盟軍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攻佔了硫黃島，更加逼近日本本土，美軍飛機日夜轟炸日本本土大中城市，給日本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

同蘇聯的關係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更加惡化。

通過汪僞政府對重慶政府的和平工作迄今沒有任何成效。

繆斌成爲開展對重慶政府「和平」工作的重要渠道，一時間，繆斌成爲「和平」運動的要人。

繆斌像一根救命稻草，被小磯國昭緊緊抓住。

繆斌得意忘形，活動更加頻繁。

一九四五年三月，應小磯總理大臣的要求，日本陸軍省下令，由日本在華派遣軍派飛機將繆斌送到東京。

繆斌于三月十六日從上海到達東京，受到小磯的熱烈歡迎，被當成重要人物住進了日本迎賓館。當晚，繆斌就向緒方竹虎提出了他的日華全面和平實施方案：

1. 南京政府即時自動宣佈取消；

2. 在南京政府取消的同時，重慶承認民間有力人士組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南京留守府；

3. 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府成立時，就和重慶商談停戰撤兵的事，停戰協定正式發表時，重慶的中央政府就還都南京；

4. 中日代表即在澳門會商。

三月十七日，繆斌首先會見了東久邇稔彥親王，他說重慶政府不願意看到日本被完全摧毀。『日本是中國的防波堤。』如果現在兩國締結和平，『我們能阻止蘇聯出兵。』繆斌强調：『蔣介石所信賴者唯有天皇一人。』希望東久邇親王將這一口信帶給天皇陛下。東久邇以礙于憲法體制『不能越過内閣而直接上奏天皇。』十八日，小磯會晤繆斌，繆向小磯出示了重慶給他的一封『可以去東京』，除早已提出的條件之外不能提出其他内容的電報。雙方討論了《中日全面和平實施方案》。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小磯臨時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報告已將繆斌接到東京，並擬根據繆斌提出的日華全面和平實施方案的內容爲基礎，准許繆斌使用無綫電，由他與重慶政府直接聯繫，詢問重慶政府的意見。

小磯的提議遭到與會多數人的反對。陸相杉山元說：『繆斌是重慶政府不敘用的人，他以何種資格當此重任？如果具備了執行這種斷然必行的政策的强大政治力量，與其選擇身份不明而社會輿論最不好的繆斌爲居間人，不如由日本政府自己出面向重慶派出使者，從正面開始談判，實無躊躇的必要。這樣豈不更好嗎？』

外相重光葵更表示反對，並宣讀駐華大使谷政之拍來的關于繆斌訪日的電報。電報說：『這種計劃既違反過去的決定，也輕視汪政權，決無成功的希望，况且從繆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讓步的方案的結果僅是被他個人及重慶所利用，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海相米内接着說：『一國首相輕易與繆斌這樣的人會談，徒然讓對方獲得情報。而日本方面反而有泄露立場的危險。』

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更進一步分析說：『繆斌極不可信，提出的日本單方面撤兵是不能接受的，違背了日方與英美軍隊同時撤退的決定。美英軍隊如不撤出，日軍單方面撤退是非常危險的。作爲一國首相，這樣做太輕率，近乎魯莽，不負責任。』

嗣後，小磯首相同有關大臣秘密地交換意見，仍舊未得到支持。但小磯鑒于戰局惡化，固執己見，孤注一擲，單獨秘密進行繆斌工作。他把繆斌介紹給天皇之弟東久邇稔彦親王和石原莞爾

等人。更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單獨上奏裕仁天皇，提出同重慶政府和平談判的設想，請求天皇接見繆斌。但木户内大臣以天皇之尊不能接見繆斌這樣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傳出去有損天皇威信爲由拒絶讓繆斌晉見日本天皇。

次日，天皇就此事召見海相、陸相、外相，重問此事。天皇在召見重光葵時說：『小磯首相昨日入宮報告政務，提及繆斌來日之事，希望准許他進行重慶工作。我認爲，和平工作通過繆斌這種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時採取這種謀略手段，對整個大局是無益的，但小磯似乎不以爲然。今晨我召見陸相征詢意見，陸相也表示反對；又召見海相，海相强烈反對，對一國的總理採取此種手段深表遺憾。你的意見以爲如何？』

重光葵回答說：『政府已討論數次，繆斌大概已經回國，請勿憂慮此事。』

天皇說：『不是，他並未回國，仍在此地活動。』

于是重光葵將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所發表的意見重複講了一遍，並補充說：『今日戰爭已經惡化，如何使它結束，願遵照聖旨去進行。國家處于危局，日本應當採取的態度必須走大路。只要無虧大義名分，即使一旦國破，將來還有復興的希望；若是玩弄不正當的手段走入歧途，日本也許將永遠滅亡。』

天皇說：『我也有同感。』

于是，重光葵立即出宮訪問小磯，勸告停止繆斌工作。

小磯隨後入宮參見天皇，天皇對小磯說：『取消南京政府有違國際信義。』並說要在三個月

内從中國撤兵，在没有船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指示小磯「盡快讓繆斌回中國去」。小磯爭辯説：「這樣讓繆斌回去太可惜了。」天皇對小磯的抗言爭辯極爲惱怒，隨後對木户幸一内大臣説：對小磯國昭不能信任。

小磯因爲「繆斌工作」遭到天皇反對，「和平」工作破産；而恢復現役，兼任陸軍大臣的願望由于軍方的反對未能實現，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宣告内閣總辭職。因爲「像這樣由于中國一個怪人物的關係而被迫總辭職」，這在日本是没有先例的。

隨着小磯内閣的總辭職，直到前一天爲止還被隆重款待于迎賓館的繆斌立即被趕了出來。失去了利用價值。繆斌像一條狗被扔到大街上。一曲鬧劇降下了帷幕。

第十七章

越過戰綫的會談

爲了和平，即使違背了禁令，作爲軍人，也萬死不辭

一九四二年二月，南京。

被日本人踐踏了八年的南京。

春天的南京，路邊的積雪還沒有融化，一陣陣凜冽的西北風吹過空曠的街道，天空上的雲壓得很低很低，彷彿要將南京古老的城牆摧垮。春節剛過去幾天，但在日本人統治下的中國人用沉默反抗着：沒有爆竹，沒有煙花，沒有了喜慶，他們將憤怒和仇恨埋在心底。他們對汪僞政府的權貴們側目而視。汪僞的權貴們奉日本人之命製造喜慶的氣氛、掛出的『日中友好，和平提攜』，『大東亞戰爭必勝』等標語也被風吹得七零八落，幾點爆竹的殘屑散落在積雪上，如春天的殘紅，特別地刺目。

岡村寧次，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一個標準的日本軍人，渾身充滿『武士道』精神，自從戰爭爆發後來到中國大陸已經多年，從未回過日本。他認爲軍人的使命就是完成天皇陛下的任務，軍人的生命就在戰場上。但此時，他意志也不禁變得衰弱，望着窗外冷冷清清的庭院和遠處

寂寥的天空，一種說不出的凄涼之意油然而起。除夕之夜的日本軍官聚餐會上，作爲總司令官發表了强硬的鼓舞人心的講話，但在內心，他卻非常清楚。

日本敗局已定。

太平洋戰場上，美國陸、海、空三軍並進，把日本軍隊從一個個島嶼上逐出、消滅，戰火已經快要燃燒到日本本土，除非出現奇迹，才有可能反敗爲勝。但奇迹並不是經常出現的，尤其在以全部國力爲後盾的世界大戰中，戰爭的結果在戰爭爆發之時就已決定，勝負昭然若揭。

中國大陸還有百萬「皇軍」，想到此，岡村沉重的心情也不覺變得稍稍輕鬆起來，憑借這百萬雄師和中國大陸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戰爭還有可能出現轉機。目前首要之事，乃是採取非常手段，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然後將這百萬之師轉向對英美的太平洋戰場……

「叮呤呤……」

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斷了岡村寧次的沉思，他回過頭，有些厭惡地看了電話一眼，彷彿責怪這電話來的不是時候，剛剛好轉的心緒被電話破壞了。他回到辦公桌旁，拿起了電話，耳機裏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總司令，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待您的指示。」原來是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

「今井君，什麼事？」岡村以一種不滿意的口氣問道。

「總司令，南京政府的軍事參議院院長楊揆一上將給我打電話，說要給我介紹一個重慶方面

的人。」今井適時地停止了講話，他知道岡村的脾氣是不喜歡別人囉嗦。

「什麼人？」

「此人叫吳樹滋，是根據國民黨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的指示，由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一集團軍何柱國上將派遣的特使。」今井武夫特地表明何柱國的身份是爲了引起岡村寧次的注意。

岡村寧次聽到吳樹滋是通過楊揆一介紹，心中立即閃過一片陰影。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況不利，對局勢非常敏感的南京政府首腦們對前途感到絶望，紛紛尋找出路，政府要人各自尋找自保之策，似乎都在爲尋求投靠重慶方面的要人而絞盡腦汁。

行政院長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長，社會福利部部長丁默邨甚至竟然拋棄部長要職，自行謀得浙江省省長的職務，常住杭州。這些混蛋們都看中了上海和杭州是通往重慶的要道，便于和重慶聯繫。而日本政府對重慶的和平工作不讓中國派遣軍總事部干預，一切讓南京政府採取措施，使這些人更加明目張膽地打着工作的大好時機，而且使南京政府看透了日本的戰爭前途，導致佔領地區日軍領導勢力威信日益低落。

這次楊揆一是不是也在爲自己尋找出路，岡村寧次不禁有些懷疑。

今井武夫見岡村寧次沉吟不語，心中惴惴不安，只得耐着性子等岡村寧次説話。

「吳和楊是什麼關係？怎麼聯繫上的？」岡村寧次問道。

「吳和楊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期同學。吳在幾個月前潛入南京，同楊和楊的弟弟，南京政府

參謀次長楊振中將商議之後，直到最近才下決心和我會見。」

今井武夫繼續分析道：「根據楊和吳的談話，何柱國派吳來，當然是得到蔣介石總裁的許可的。另外可以斷定的是，站在中國戰區現任指揮官的立場上，如果未經蔣介石的批准，是不能作出這個行動的。」

「雖然可以斷定吳是得到蔣介石的許可才被派來的。但是，陸軍省自一九四三年以來曾下令禁止軍方對重慶進行工作。」

岡村寧次提出的問題今井已經料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但他覺得這是與重慶蔣介石取得直接聯繫的好機會，所以堅持要說服岡村寧次同意他與吳樹滋會面。

「太平洋戰況已經到了對日軍極其不利的今天，顯然，我們錯過了日華和平的好機會。我以爲，爲了戰局危急之時實現和平以扭轉國運，即使違背了禁令，作爲軍人，也萬死不辭。更何況此次和過去所謂的重慶路綫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過去無論怎樣去調查研究也沒弄清和重慶的關係，依靠的是未必能保證進行聯繫的中間人。現在是同重慶政府軍隊內部、其地位身份都非常明確的現任集團軍司令官進行聯繫，只要能直接會談的話，即使不獲得成功，但我認爲可以看到某些重大啓示，這是無疑的。」

岡村寧次對于陸軍省和日本政府禁止軍方插手對重慶的工作早就心懷不滿，覺得今井武夫的分析很有道理，也爲今井敢冒生死違抗禁令而激動，立即同意今井通過吳樹滋與何柱國聯繫，盡快促成雙方直接會談，開展對重慶的工作。最後，他特意叮囑：「此項工作必須在絕對保密的狀

態下進行。』

岡村寧次認爲重慶很寬容……

得到岡村寧次的同意，今井武夫立即通知楊揆一同意與吳樹滋會面，在電話中，今井特意叮囑要注意保密。

次日晚，吳樹滋在楊揆一的陪同下乘坐楊的黑色轎車來到今井在南京路的宿舍。吳樹滋身材不高，謝頂，穿着一身合體的西裝，楊揆一則是一身軍裝，顯得大腹便便，一幅老氣橫秋的樣子。

今井將吳、楊迎進客廳，短暫的寒喧之後，吳樹滋拿出證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今井仔細看了看，便談起正題。

今井一開始便提醒吳樹滋要嚴守秘密：『吳老先生，我很佩服您的勇氣，孤身一人潛入南京與我方接觸，但爲吳先生人身安全起見，希望此次接觸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以免消息走漏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謝謝今井先生的提醒，一切當然應在保密狀態下進行。』吳樹滋知道如果他和日本方面接觸的消息傳了出去，不僅自身將背上漢奸的臭名，而且將引起國際國內的政治波瀾，將來蔣介石也輕饒不了自己。同時他也知道，在日本軍隊內部一向存在着繼續戰爭和主張和平解決中國事變的兩派，一旦消息走漏，主張繼續戰爭的日本軍人也許會採取强硬手段，後果不堪設想。

『我受岡村總司令的委托，與吳先生會見，請吳先生提出中國方面的條件，我們在此基礎上進行會談。』今井開門見山地要求令吳樹滋感到有點尷尬，此次吳樹滋只是奉命與日本人接觸，探聽日本方面的談判條件，並未攜帶中國方面的任何條件。因此，吳樹滋以退爲進，說：『我只是與貴方接觸，使貴我兩方的高級領導人能夠舉行正式談判，所以，並未帶有任何條件。不過，如果貴方有什麼條件的話，不防先提出來，我負責傳達。』

『哦！』今井武夫揚了揚眉毛，顯得有點不太滿意，『從「七·七」事變開始，我就致力于中日間和平工作，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東亞兩大國之間爭端，使兩國和平相處，結成東亞聯盟，共同對付英、美等國，反對共産主義。但和平每到關鍵時刻，均功虧一簣，其中固然有我方的原因，但貴國政府既缺乏和平決心，又没有和平誠意，在談判中拖延不決，乃造成今天之局面，如果此次仍無和平之決心，雙方的損失將更大。』

吳樹滋對戰局的發展非常清楚，知道日本方面急于解決中國事變，以便集中全力阻止美國在太平洋上攻勢，按照蔣介石的一貫方針，採取『拖』的戰術，但此時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很快就將失敗，蔣介石不希望此時與日本拼個你死我活，去年日本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綫』的戰役，使國軍遭到了極大損失，而中國共産黨卻乘國軍敗退之機，猛烈擴大其根據地，這使蔣介石寢食不安。所以也希望與日本停止衝突，以保存實力，用來對付中國共産黨。吳樹滋甘冒風險到虎穴之地，就是擔負着探聽日本和平條件的任務，如果日方的條件能夠接受的話，蔣介石就可以與在華日軍達成停火協議。因此，吳樹滋立即表白說：『此次我是受何總司令的委

托，抱着極大的誠意，確實希望能通過談判解決貴我雙方的問題，希望貴方提出的和平談判的基礎意見，我方一定會加以考慮。」

于是，今井武夫提出了日本方面的意見，企圖仍舊維持僞「滿洲國」作爲日本作戰的大後方，同時維持內蒙的現狀，維護日本在中國的特殊權益。日本雖然節節敗退，但在華仍然擁有百萬軍隊，今井武夫仍然抱有不切實際幻想，因此提出的條件與戰爭開始時的條件本質上並無多大區别。

吳樹滋聽完後，心中不禁暗駡，但仍不動聲色地說：『貴方的條件我一定轉達。』

吳樹滋與今井武夫會談後，即將會談情况通過秘密電台向何柱國匯報，何柱國立即又報告了蔣介石，得到蔣介石的嘉許。

何柱國在河南開始準備，準備于日本人會談。

經過今井武夫的一再要求，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中旬，吳樹滋非正式地提出了中國的和平原則大綱，主要有三點：

一、日軍無條件地從山海關至廣東的中國國土上全部撤兵。

二、日軍今後應根據日華協議的條件，從滿洲撤出兵力。

三、中國不妨礙日軍在中國以外戰場上的行動。

今井武夫將吳樹滋提出的中國方面的和平原則與岡村寧次討論後得出結論，中國所要求的絶對條件是第一、第二條，即日本軍隊必須從中國大陸全部撤兵，恢復中國的獨立主權；而第三條

則是中國方面作出的討價還價的讓步，即日本只要履行第一、第二條，對于中國以外戰綫上日軍的戰鬥行動，即日本與英美在太平洋戰爭概不干涉，保持中立。

岡村寧次沉痛地說：『我軍作戰至此，已落入必敗之困境。冲繩一戰，已耗盡帝國之元氣，本土已處于美軍的攻擊範圍之內，遭受慘無人道之大轟炸，軍民死傷無數，物資損失慘重，已無支撑戰爭之能力。如果本土陷落，在華軍隊亦將遭到優勢敵軍的攻擊，後果不堪設想。于今之計，須下果斷之決心，忍前所未有之耻辱，與重慶政府談判，爲帝國保存最後一絲元氣，以圖將來之復興。今觀重慶政府所提和平原則大綱，並無過分之處，反而極其寬容，當抓住難得之時機，斷然徹底解決中國事變。』

于是，岡村寧次命令今井武夫抓緊與中國方面聯繫，舉行雙方的正式會談。

一九四五年四月，日本小磯國昭內閣因無力結束戰爭而總辭職。

隨即，受天皇的委託，七十四高齡的鈴木貫太郎就任首相，組成內閣——結束戰爭之內閣。鈴木從天皇的旨意中理解到，天皇的意圖在于盡一切努力迅速結束戰爭。所以鈴木在四月八日晚對日本國民的廣播中宣稱：『如果我殉國而死，各位國民要跨過我的屍首前進！』但其聲明真意在于：『即令本人被兇漢刺倒，也決心在最近在時機結束戰爭。』

四月下旬，經過鈴木首相與陸軍、海軍和外務大臣協商後，取得一致意見，認爲通過南京政府對重慶進行和平工作缺乏現實條件，這種政策沒有收到任何結果，南京國民政府在開展此項工作時無能爲力，根本就不爲重慶方面重視，因此決定採取無視南京國民政府的姿態，以異常堅定

的決心，斷然進行直接對重慶開展『和平』工作，以求停戰。這樣不論是對于結束戰爭，還是進行『一億玉碎』的本土作戰，都是立于不敗之地的政策，決定由陸軍大臣負責，由日本在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擔任此項工作。隨後將此決定通知岡村寧次。

因此，今井武夫和何柱國之間的地下聯繫工作也逐漸公開，並加快了走向正式談判的步伐。爲了盡快達成雙方會談的日期，今井武夫催促吳樹滋立即趕回河南，與何柱國洽商決定。

此時，希特勒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擊下徹底失敗，德國宣佈投降。日本驚恐萬分，面臨着美、英的全面攻擊，美、英將全部人力、物力轉向太平洋戰場，準備對日本的最後一擊。

六月中旬，爲最後洽商會談日期，吳從南京出發前往何柱國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安徽兩省交界處的潘丘。臨行前，今井武夫對吳樹滋說：『吳先生此去，實擔負着貴我雙方停戰和平的重任，請吳先生向何總司令轉達我方決心停戰和平的誠意，盡快安排貴我雙方的正式會談，以早日實現中日兩國間的和平。』

但是，天公偏偏與日本方面爲難，使今井武夫焦慮萬分。

當時正值雨季，吳樹滋輾轉多日才回到何柱國的司令部，向何詳細匯報了他與日本方面每次接觸的詳情，並說：『日本因戰局不利，急于在中國實現和平，解決大陸問題，以便抽調兵力準備本土作戰。這樣是敵急我不急，處于有利地位。』何柱國點頭稱是，事後將吳的匯報報告了蔣介石，並請蔣確定與日本方面進行正式會談的日期。

得到蔣介石的指示，何柱國指示吳樹滋通過秘密保存在南京政府參謀本部裏的秘密電台，指定會見地點在何的部下黃泛區東部的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周口鎮南邊的新站集。

這在日本方面來説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雙方的會談或者在中立地區，或者在日軍佔領地區，從未在中國軍隊控制的地區進行談判，由此可見，外交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的，由于日軍的失敗急于求和，所以不得不接受中國方面提出的會見地點。

今井武夫接到吳樹滋的密電後，立即攜帶岡村寧次開具的證明文件離開南京前往河南。今井武夫于七月四日乘飛機從南京出發，剛從故宮機場起飛不久就遇到美機的空襲，所以又慌忙回到南京。約二小時後，空襲警報解除，再次起飛，但天有不測之風雲，飛機發動機發生故障而被迫在蚌埠着陸。無可奈何，今井武夫只好懷着沉悶的心情縮在蚌埠的日軍司令部裏。

第二天，雖然從早晨開始就修好飛機，但是暴雨不停，直到下午六時才從蚌埠出發，此時已是黃昏，雖然是難得的晚霞滿天，但今井武夫無心欣賞，當晚八時不得不在開封降落，又住了一夜。

當時，美國飛機頻繁地襲擊平漢、津浦鐵路綫，企圖摧毀日軍的交通綫。美機在拂曉時從陜西西安和四川萬縣機場起飛，到達平漢路上空大概總是上午八時左右。今井武夫所乘的飛機必須在此時間以前到達預定的河南許昌機場，否則就有被美機擊落的危險。因此，今井武夫于六日凌晨四時天剛亮時從開封起飛，但是由于駕駛員的錯覺，看錯了地圖，兩個小時後不得不飛回開封機場，令今井武夫非常掃興。

與此同時，爲了準備這次會談，何柱國司令部也忙活起來。何柱國派吳樹滋去泛東軍區，找軍區警備司令張慶第，此次，何柱國打電話給張慶第說：『明天吳樹滋參議去軍區，有要事商談，希遵照密函妥爲佈置。』次日，吳樹滋攜帶何的親筆函到新站集，信中大意是：『國際友人于明日到達軍區與我會面，暫撥霍守義部一營兵力到達新站集，歸你指揮，沿途保護，妥爲警戒，以防意外。』當時，張慶第問吳樹滋所謂國際友人是誰，吳只是搖頭，說：『明天你自己去問總司令吧！』張慶第立即按照何柱國的要求開始布置。首先派人去六十公里外的界首購買各種物品，酒宴用的食品、酒等，又派人將新站集的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並爲『國際友人』準備了住宿的房間。

中國是禮義之邦，對于戰敗的對手也給予足夠的尊重。

今井武夫焦慮不堪地等待了一天，天不遂人願，國事不堪，天公也來欺負，事事不順。七日早晨八點，在已經發出危險信號後，强行從開封起飛。在飛機上，今井武夫看到了美機轟炸的後果，日本軍用列車遭到美機的轟炸，正熊熊大火中燃燒，乘車的日本軍隊正在避難。今井武夫所乘的飛機也只有五分鐘之差，幸免于難。許昌的日本飛機場是在平原的莊稼地當中應急修建的臨時機場，爲躲避美機的轟炸，作了周密的僞裝。飛機在圍繞飛機場周圍一次又一次的盤旋，直到第八次才辨認出機場的正確位置，這使今井武夫捏了一把汗。飛機一着陸就被引到五百米以外的村子裏去隱蔽起來，並且在飛機上施以僞裝之後才叫今井武夫下來，踏上了結實的土地，今井武夫懸着的心才放了下來。

在許昌，今井武夫與先出發的翻譯官今井明保，日軍許昌特務機關長新榮幸雄會合，于七日黃昏，美機停止空襲後，坐上鐵路的輕油車急駛堰城，在堰城的三井物産公司辦事處住了一夜。

七月八日，又等到傍晚美機停止空襲後才乘卡車前往周口鎮，宿在日本守備隊裏。

九日清晨，何柱國從瀋丘的第十集團軍總司令部出發，前往新站集。何柱國身材高大挺拔，一副標準的軍人形象。到新站集後，受到吳樹滋和張慶第的歡迎。從何柱國那裏，張慶第知道所謂『國際友人』。

九日早晨，今井武夫一行脱下日本軍裝，穿上事先準備好的中國衣服，八時步出日軍的崗哨綫，向新站集徒步而去。

在周口向東南到新站集之間，約十幾公里之間是不屬于中、日雙方任何一方的無政府地帶。使今井驚奇的是，在這個地區中，拿着中日兩軍通行證或身份證的農民和車夫，絡繹不絶地推着獨輪車，或者拉着排子車來來往往，非常繁榮熱鬧。

原來預料是一個荒涼的地方，卻感到意外地見到了『和平』的另一天地。

没有政府有時比有政府更能促進商業的畸型繁榮。

今井武夫等人在七月炎熱的陽光下，一會坐着排子車，一會兒步行，同時還要防備在這中、日雙方都不管的地帶的『土皇帝』——土匪。幾個灰色的土匪士兵聚集在一起，肩上扛着舊式步槍，挺着胸膛，睥睨四周的進行巡邏，耀武揚威。他們對來往客商强行盤查，敲詐勒索。

一路跋涉，直到下午二時，今井武夫等才到新站集對過的小村莊。這兒已時中國方面的勢力

範圍，今井受到了吳樹滋的歡迎。

『今井先生，歡迎您。何總司令正在等您。』吳樹滋滿面笑容的說。

『感謝您對雙方正式會談所做的努力，沒有您的勇氣和智慧，我是不可能來到這兒的。』今井武夫疲倦的臉上也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

『您一路辛苦了，請吧！』

再向前走了兩公里，何柱國派了三十名士兵牽着馬前來迎接他們。

在吳樹滋的引導下，今井武夫一行跨上了矮小的中國馬，于下午二點終于到達了目的地新站集。

今井武夫不覺鬆了一口氣。

今井武夫對何柱國提出的條件感到不寒而慄

新站集村口。

黃海東部軍區警備司令張慶第少將一身戎裝，代表何柱國迎接今井武夫。他是奉天講武堂第五期學生，後來留學日本，從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畢業，所以對日本抱有良好的感情。他用日語致歡迎辭，使今井武夫大爲感慨。

一排穿戴整齊的中國士兵列隊吹起了喇叭，接受今井武夫一行的檢閱，就好像歡迎友好國家使者的儀仗隊。

新站集駐軍的門窗緊閉，通往軍區司令部的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街上也沒有觀看的老百姓，顯然事先做了準備。但是門上和牆上張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不忘七七事變」之類的抗日標語，這是前兩天紀念盧溝橋事件活動的激昂情緒而留下的痕迹，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並不沒有加以清除。今井武夫看到這些刺目的標語，不禁皺了皺了眉頭，也勾起了今井武夫的回憶。

正好八年前，今井武夫正在北平的日本大使館當助理武官，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今井武夫在隆隆的槍炮聲中，同冀察第二十九軍直接談判，力求不擴大中國事件，但那時日軍對中國擁有絕對實力，一心要征服整個中國，所以由盧溝橋事變起，全面侵略中國。八年後，日軍面臨整個世界聯合起來的力量，攻守之勢完全易位，此次再同中國將領會談，不知結果又將如何，不禁感慨萬千。

很快，就到了軍區司令部的門口。身材魁梧的何柱國站在門口迎接今井武夫，何柱國並不盛氣凌人，反而顯得彬彬有禮。

簡單地握手，寒喧之後，何柱國親自將今井武夫領到司令部內今井住處。

戰勝者總是對戰敗者盛氣凌人，尤其是浴血奮戰的軍人，他們只承認實力。何柱國的禮貌周到，使今井武夫感到由衷的感激。

何柱國與今井武夫的會談共進行了四次：

七月九日下午六時半開始第一次會談，時間二個小時；

七月九日深夜十一時半開始第二次會談，時間一個半小時。

這兩次都是通過今井翻譯官翻譯的。

七月十日上午九時開始第三次會談，時間一個半小時；

七月十日上午十一時開始第四次會談，時間一小時。

何柱國是日本軍官學校留學生，這兩次會談只有何柱國和今井武夫，雙方用不太流利的日本話和中國話，夾雜着筆談進行的。

今井武夫重複了以前歷次中、日『和談』中提出的條件：『我方的條件已經請吳先生轉告給貴方，不知何先生有何看法。我們希望中國方面承認「滿洲國」獨立；同時按照日華雙方的協議，撤出中國，但在若干重要地區允許日軍部分駐兵，具體駐兵地點在協議中由雙方商定；中國承認日本在華擁有特殊利益，並在協議中體現。』

何柱國對今井武夫在日本敗局已定的情況仍癡人說夢，提出那樣的無理條件，因而嚴肅地對今井說：『戰後，日本首先從滿洲以及從海外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就是朝鮮、台灣、庫頁島等地也必須交還。』

『本條件已經由同盟國方面協議完畢，所以沒有任何更改的餘地。日本方面必須照此實行，方能求得真正的和平，否則，日本只有徹底被擊敗一條路。

『中國將按照《開羅宣言》的協定，收回被日本軍隊佔領的所有領土，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目前的情況下，貴方應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現實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今井武夫遭到何柱國的反擊，沉默了一會，又提出：「日本希望日華兩國直接進行和平談判，但中國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

「日華單獨講和在《開羅宣言》發表後的今天，無論如何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何柱國用强調的語氣說，「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國和平的話，那麼必須同時把世界和平作爲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同時，何柱國又强調了中國對于結束戰爭的看法，他强調說：「日本戰敗，結果衰亡，這決非中國所希望的。我們寧願日本即使在戰後仍作爲東亞的一個强國存在，和中國攜手協力維持東亞和平。」何柱國看了看坐在對面的今井武夫，「因此，中國熱切希望在必要的國力尚未耗盡的時候，日本政府明智而妥善地早日結束戰爭。」

『作爲中國來說，期望日軍在全面喪失戰鬥力之前，從速結束戰爭，爲了維護戰後亞洲的和平，也希望日本作爲領導國的一員參加。』何柱國更加明確地說。

這不是外交辭令，也不是勝者對敗者的憐憫，在外交場上没有人道主義。

如果拋開對共產黨的政策，這樣就是不可想像的。

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和日本人合作的基礎就是「共同反共」，在反共這點上，蔣介石和日本人有着默契。

日本保存必要的國力，保持强大的軍隊，不是爲了維護東亞和平，而是爲了反共。

因此，何柱國接着說：「雖然日華之間没有實現單獨講和的可能性，但中國願望協助日本盡

快結束戰爭。因此，日本萬一有什麼請求，中國方面將毫無保留地將日本的和平提議轉達給盟國。』

『日本以維護國體，保全國土爲絕對條件，這點如不被容納的話，則決心繼續交戰到底。』今井武夫說。

『中國，特別是蔣介石委員長對日本天皇制的繼續存在表示善意，並已向各國首腦表明了這個意向。』何柱國說，『如果和平不能實現，對于日本、盟國都是極大的損失。日本戰敗，盟國軍隊必然要佔領日本，這點是不容置疑的。』

聽了何柱國的回答，今井武夫提出了第二個條件：『很感謝蔣介石委員長的善意。但對于滿洲國和南京政府的處理，日本希望努力做到不違背道義，對此，很想知道中國方面的設想。』

『這是中國的內政，中國政府已有了處理的設想。』

何柱國與今井武夫的會談是在極其平靜、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但對今井武夫產生了强烈的衝擊。

此前，今井武夫知道兩年前在開羅和德黑蘭舉行的盟國首腦會議，也看到過夾雜在報道日軍勝利的無數次新聞中，表面敷衍地登在報紙一角上的《開羅宣言》。然而，對此今武夫一向認爲充其量不過是敵方盟國作爲戰爭的策略而進行的威嚇和示威的宣傳戰而已，不加重視，或者說，不願意重視，而且更不知道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塔會議的秘密協定的內容。

在雅爾塔協定中，規定蘇聯在擊敗德國三個月後對日宣戰。

此時德國失敗已經兩個月，蘇聯正在向遠東調集兵力，準備參加對日戰爭，因此，日本不僅面臨英、美從海上的正面攻擊、而且將面臨蘇聯在後面的猛攻。今井武夫在心理上還不願意承認日本已徹底失敗。

因此，今井武夫在此回憶錄中說：

『何柱國坦率而懇切的談話內容，對于他來說是在盟國之間協商好的既定條件，對于聽者的我來說，猶如受到了雷擊般的震驚。

『如果同六、七年前，不，同兩、三年前我們向重慶政府提議的和平條件相比，我重新真正認識到敵我所要求的條件完全顛倒過來了，有了天壤之別。對于歷史車輪飛速地轉動和現實世界的嚴峻，感到不寒而慄。

『特別是我對于去年九月決定的小磯內閣的讓步方案尚不同意，與迄今我所知道的日本政府的和平條件，兩者相差過于懸殊，說話的人無疑是真誠的，但作爲聽話者的我看起來，幾乎是十分殘酷的內容。……。

『大東亞戰爭僅隔數年，談判內容的和平條件，發生了賓主顛倒的巨大變化。不外乎是由于這兩年來的戰況，特別是最近的冲繩失陷等太平洋戰區日軍戰敗的結果。

『即使在中國大陸的戰況，至今仍可誇耀日軍的百戰不敗，但日本的國際地位發生急劇變化，祖國的命運陷入困境。對此，只有做好充分精神準備。』

今井武夫在此次會談前，準備並不充分，所以，當幾年來一直杞憂着的不祥預感成爲事實時，感到極端傷感。

同何柱國會談完畢後，今井武夫懶洋洋地穿過院子，回到他的住處，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直到蠟燭燃盡爲止，兩眼盯着天花板，熬過了一夜。第二天，除了同何柱國會談外，今井武夫就悶在房中，憂心忡忡。

由于雙方彼此的差距太大，今井武夫只是反複地提出這樣那樣的疑問。最後雙方約定將會談的結果各自盡快向本國政府報告，聽候指示。

十日下午一點，今井武夫與何柱國告別，從司令部出發，在新站集的村頭，從列隊的部隊前面騎馬通過，迎着來時的路綫，急忙返回周家口，當夜一氣回到了許昌。

今井武夫心急如焚，急于趕回南京向岡村寧次報告。但受美國飛機空襲和惡劣天氣的影響，日本飛機不能正常飛行，今井武夫只好乘火車，心情如陰雲密佈的天，異常沮喪。火車十一日過開封，十三日經徐州，十四日回到南京。

今井武夫立即向岡村寧次報告，向日本大本營打電報，然後又將會談情況詳細地寫成書面報告，寄到國內，希望能夠引起足夠的重視。日本大本營收到今井武夫關于河南會談的報告後，立即研究加以利用，並着手配備人員，但由于戰爭後期日本通訊混亂，再加上日本很快宣佈投降，缺少時間上的寬裕，所以今井武夫與何柱國的會談未能收到任何效果。

何柱國在會談後，即向蔣介石報告會談情況。七月二十六日，蔣介石按照與日本方面在會談

中的約定，將他希望保留日本天皇制度的意見電告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三巨頭：杜魯門、斯大林、邱吉爾（後期爲艾德禮）。但當時美、蘇兩國積極主張天皇退位，英國也不反對，所以蔣介石的意見沒有被採納。

第十八章

勝利之後

蔣介石決定『以德報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通知美、蘇、英、中四國，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投降。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發佈終戰詔書，向日本國民、軍隊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的決定。

在日本天皇宣佈終戰詔書前一小時，蔣介石驅車前往重慶中央廣播電台，面對麥克風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

在這個演說中，蔣介石回顧了八年間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和犧牲，希望這是世界最後的戰爭，同時禁止對戰敗的日本人施予報復、强調人道——『不念舊惡』及『與人爲善』。

這就是蔣介石別具一格的『以德報怨。』

蔣介石是要體現中華民族的泱泱大度還是另有所圖？

委員長想起了中國共產黨，他不准中共部隊接受日軍投降

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人民終于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八月的天氣炎熱，抗戰勝利使中國人的心頭更熱。
孩子們歡笑了；老年人哭了；士兵舉起槍，射出歡慶的子彈；顛沛流離的人們準備返回家園；國民政府準備還都南京。
人們涌向街頭，爆竹響起來，焰火放起來，歌兒唱起來，歡慶的鑼鼓敲起來。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
從國統區到淪陷區，還有解放區；
全中國都在歡呼，慶祝。
和平、安寧、幸福永遠是值得歡呼的。
與民同樂，蔣介石看到重慶街頭歡呼的人流，一向矜持嚴肅的臉也露出了微笑。勝利畢竟是令人高興的。
與民同慶，毛澤東出現在延河兩岸舉着火把游行的老百姓中，爽朗的笑聲富有感人的力量。
然而，他們兩個都知道，這還不是最後的笑，在笑臉的背後都帶有極度的緊張。而誰笑到最後，才是真正的笑。
趕走了日本，共產黨和國民黨開始了新一輪較量。

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爲了與中共爭奪抗戰勝利果實，蔣介石想起了日本人，企圖利用日本人對付中國共産黨。

蔣介石在抗戰八年中，與日本人的來往，都是在非常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日本投降，蔣介石與日軍的配合就在『受降』的幌子下明目張膽地進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蔣介石電令何應欽：『應警告轄區以内敵軍，不得向我已指定之軍事長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繳械。』隨後，蔣介石將中國戰區分爲十五個受降區，任命其親信將領爲受降區長官，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卻没有浴血奮戰八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將領。

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名義向日本南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致電，提出日軍受降的原則：一、立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二、暫保現有武器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三、所有飛機及船艦應停留現在地，但長江内的船艦應集中宜昌和沙市。四、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

八月十七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岡村寧次，告知日方聯絡人員飛往湖南芷江機場。日軍方面接電後，派遣今井武夫副總參謀長及隨行人員，于八月二十一日飛抵芷江。

八月二十日午後，何應欽率領中國陸軍參謀長蕭毅肅等三十餘人，從重慶九龍坡機場分乘兩架美國運輸機，飛往湖南芷江。同時，中國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等，也從昆明乘飛機到芷江。此外，中國戰區各地區受降主官湯恩伯等，以及中、外記者，亦紛紛雲集芷江。

芷江本是一個不出名的小鎮，由于抗戰期間這裏是美軍空軍基地，又因爲中國戰區洽降在那

裏舉行，一時成爲中外矚目的地方。

二十一日午後三時，蕭毅肅代表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芷江城内萬壽宮接見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在接見廳的正面牆上懸掛着孫中山遺像及國民黨黨旗，對面牆上掛着中、美、蘇、英四國國旗。廳中央放一張長桌，長桌上鋪着白布，居中坐着蕭毅肅，左右坐着冷欣、柏諾德等。對面放一張長桌，今井武夫等人坐在桌旁。其他兩旁還會有中美軍官和中外記者百餘人。

廳内莊嚴肅穆，蕭毅肅首先自我介紹：

本人是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閣下的命令，代表何應欽上將的蕭毅肅中將。左面是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右面是中國戰區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諾德准將。請你説明身份，並出示身份證明。

今井：本人是奉日本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的命令特來會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全權代表的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這位（指右）是橋本參謀，這位（指左）是前以參謀，都是我的隨員。

蕭：請你出示身份證明。

今井：本人並没有特別的身份證明，只有岡村寧次大將授命鄙人前來接洽之命令，隨身帶來，請過目。

橋本參謀出示作戰命令副本。

蕭：我認爲作戰命令可以代替身份證明。根據八月十八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發給岡村寧次將軍的電令，希望提供駐在中國、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越南地區內所有日軍作戰分佈兵力的位置以及各指揮系統等文件。想你已經帶來，可即交出。

今井：此項電報已經收到，製成的概要圖帶來了。但是台灣及越南地區的日軍，因爲不屬于中國派遣軍管轄，不能提供詳細情況，只盡所知概要的情況附記于上。詳細情況，及其他所需表册，須俟回南京後再詳爲列奉。

橋島參謀面交概要圖。

蕭：這份概要圖由我方保管，細節隨後再行聯繫。此外，沒有攜帶其他文件嗎？

今井：沒有攜帶其他文件。爲了說明南京、上海地區機場的情況，所以讓航空參謀前川隨同來了。

蕭：可以在以後說明。現在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發給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的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部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當面交給你們（用中、美、日三國語言朗讀原文）。今井少將如果接受此備忘錄，要在收據上簽字蓋章，並負責面交岡村寧次將軍。

隨後，雙方就無綫電通訊建立直接聯繫交換意見。

在交給岡村寧次的第一號備忘錄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第二條。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命令『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内的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立即各就現在及指定地點靜待命令，凡非蔣介石本總司令官所指定的各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空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

任何物資』。

蔣介石不僅不准中共部隊接受日軍投降，而且命令日軍不得向中共部隊投降。這樣，蔣介石完全把持了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力。

蔣介石的這一計劃，很快得到了日軍方面的積極響應。岡村寧次認爲『國共兩黨本來冰炭不相容，戰爭期間，暫時在表面上採取了一致行動。』岡村寧次還親自起草了《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

《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

第一　根本方針

中國是東亞殘存的唯一大國。鑒于今後必須在列強壓迫下進行興國大業之艱難形勢，帝國此時更應貫徹宿願，一掃日華間的舊怨，極力支援，加强中國，以期有助于將來帝國之飛躍及東亞之復興。

第二　要領

（一）　沒有……

（二）　不得已需以武力自衛時，應不失時機地採取斷然態度，發揮皇軍的實力。

……

（四）　有關加强對華支援，應以真正掌握中國民心爲主。首先須促進重慶中央政權的統

一，以此協助中國的復興建設。至于渝、延之間的關係，本來須由中國本身處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爲，則應斷然應予討伐。

（五）應向中國移交的武器、彈藥、軍需品等，根據統帥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地交付中國方面，爲充實中央政權的武力作出貢獻。

（六）在華一切軍用及國有各種設施、器材等，嚴禁破壞損毀，如數向中國方面移交，以利其復興。

…………

于是，岡村寧次決定在投降中，站在國民黨一邊，反對中國共產黨。這是一種自覺的行爲，出之于岡村寧次等人的反共天性。而唯有在這一點上，蔣介石與戰敗的岡村寧次找到了共同語言。

雙方一拍即合。

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要求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解除日軍武裝，岡村寧次以『不法擾亂治安』爲名，通告『不視爲蔣委員長統制的部隊，不得已將斷然採取自衛行動。』並命令日軍未得統帥系統的命令，對敵人的任何要求，堅決予以拒絕，必要時應斷然實行武力自衛，毋庸躊躇。

此後，日軍對八路軍、新四軍對他們發出的投降要求，均加以拒絕。對于八路軍、新四軍武力迫降，日本軍隊拒絕交出槍械投降，各地均發生了戰鬥。

岡村寧次助蔣反共的良苦用心可窺一斑。

蔣介石爲了籠絡日本人爲其服務，也是極盡拉攏之能事。

接受日本投降的蔣軍軍官大部分是早年留學日本，與日本的軍界人士有着密切的關係。在與日軍的接觸中，處處照顧日軍軍官的情緒。在雙方舉行正式會談的會場，爲使日方代表不覺得有威脅性的壓迫感，國民黨方面準備採用圓桌會議的形式布置，但在臨開會前，美軍插手干涉此事，才改成長方桌面對面對談方式。日本留學出身的人們對此表示不滿，以美國人不理解東洋道義而表示憤慨。

在會談結束後，國民黨中留學日本的軍官爲今井一行順利完成任務而高興，認爲今井雖是戰敗軍隊的使節，並未曾有損于他們曾經留過學的國度的日本軍人的體面，他們本身覺得很光彩。

八月二十七日，冷欣率領部屬、顧問、憲兵等百餘人分乘七架飛機，于下午五時在南京大校機場降落，在南京設立了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

到南京後，岡村寧次先是托病不與冷欣見面，等冷欣住定後，今井武夫代岡村要求冷作一次秘密談話，希望不要讓美國人參加。于是，冷欣以探病爲名，只帶醫官、翻譯各一人到岡村寧次的住所。岡村首先聲明他害的病並不重，主要是爲的借此避開美國人來談談他對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建議，也是爲了表示他投降後對中國應有的『忠誠』。他說：

『中國的對日抗戰是結束了，但今後難題尚多，主要就是剿共的問題。這是中國的心腹之患。

我既然受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國，我就應該忠實找機會爲中國政府效勞。」

經過一番表白之後，岡村寧次接着說：

『現在我們駐在中國的完整部隊還有一百幾十萬人，裝備都是齊全的，趁現在尚未遣散，用來打共産黨，當能發揮一定的力量。這是替中國着想。另一方面，我們的軍隊連同軍隊附屬人員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總共不下六、七百萬人，驟然被遣散回國，不要說安置職業成問題，就是喫飯也大成問題。與其回去無法生活，還不如就在中國駐下來好些。因此，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出建議，希望得到採納。但事不宜遲，恐怕稍延時日，軍心一經渙散，戰鬥能力就不保險，要大大削弱了。』

冷欣聽了岡村寧次的反共計劃，覺得大爲可行，當即予以慰勉，並答應岡村寧次立即將他的計劃轉報上去，聽候指示。

冷欣回去後立即密報何應欽，何應欽又密報蔣介石，很快，蔣介石致電冷欣立即攜帶岡村寧次的具體計劃飛往重慶當面向蔣介石報告。

岡村寧次的這份計劃，深得蔣介石的嘉許，蔣介石本打算採納這個建議，何應欽、白崇禧等人也極力聳恿蔣利用日本人反對中國共産黨。但『不幸』的是這個計劃走漏風聲，被美國政府派駐重慶的代表得知，遭到反對。美國人認爲這樣做有違國際道義，違背盟國之間的協定，日本也將因此保留下來大批武裝力量。

蔣介石希望依靠在中國大陸的日軍與中共作戰，但他更需要美國人的援助，所以一經美國人

反對，蔣介石考慮再三，只好忍痛放棄岡村寧次的反共計劃。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何應欽飛抵南京。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在原國民政府國防部舉行了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的簽字儀式。並將各地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稱爲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各地區代表日本投降部隊的日軍司令部，統改稱爲該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

此後，日軍在各地仍然武力抵抗八路軍、新四軍，爲國民黨賣命。到國共内戰爆發後，仍然有少數日軍留在國民黨軍隊中與解放軍作戰。